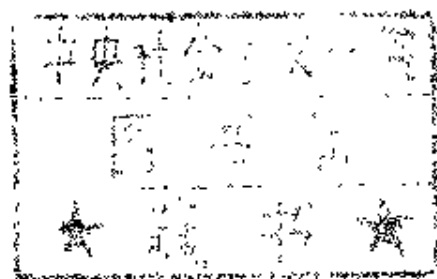




周恩来外交文选

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外交文选
ZHOUENLAI WAIJIAO WENXUAN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1740信箱)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 17.75印张 330,000字
00,001—16,000册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73-0046-3/A·16 定价 7.50 元



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



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为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尽了最大努力，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5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同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图为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机场迎接周恩来。



1954年6月，周恩来在缅甸总理吴努的招待会上。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两国达成建立代办级“半外交关系”的协议。图为周恩来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1955年4月，周恩来率代表团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对保证会议成功、促进亚非团结发挥了重大作用。图为周恩来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



万隆会议之后，周恩来访问印尼，双方签订了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体现了平等协商、公平合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

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周恩来出访亚洲和东欧11国，“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图为周恩来访问波兰时同波领导人会谈。





1960年春，周恩来出访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和蒙古6国。图为周恩来访越期间，在河内巴亭广场召开的群众欢迎大会上讲话。

（此照片由何谦同志提供）



1963年10月，周恩来会见戴高乐将军的特使、法国前总理富尔，商谈中法建交问题。之后，两国于1964年1月27日宣布建交。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出访非洲10国，给“觉醒的大陆”带去中国人民的友谊。在埃及，他宣布并阐述了中同非洲、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图为周恩来同纳赛尔总统在一起。



1964年2月，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时，同布托外长全家合影。（周右边的女孩为巴现任总理贝·布托，时年11岁）



1965年6月，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在机场同尼雷尔总统亲切交谈。



1969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1970年3月，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迎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对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国干涉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1970年3月，
周恩来在北京
会见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执委
会主席阿拉法
特。



1970年4月，周恩来访问朝鲜，与金日成同志一起观看歌舞演出后，同演员合影。



1972年2月，
周恩来同美国
总统尼克松会
谈。会谈后签
署上海公报，
打开了中美关
系的大门。



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同日本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在北京签署中日建交的联合声明。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抱病在医院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亲王签署两国建交公报。

邓小平

出版说明

这本文选，收入了周恩来同志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五年关于外交方面的重要著作，共八十篇，多数是首次公开发表。

周恩来同志在建国前就是中共中央外事方面的领导人；建国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并兼第一任外交部长，直接领导外交工作长达二十六年之久。他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是新中国外交战线的一代楷模，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这本文选，集中反映了周恩来同志在外交方面的卓越思想和重要理论贡献。

收入本书的著作，编者对已经公开发表过或有手稿的，都保持原貌，只作了个别字句和史实的订正；对讲话记录稿作了非实质性的文字整理，查证了史实，核对了引文，有的重新拟定了标题。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些著作，还作了题解和注释，题解放在各篇第一页下边，注释附在书末。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目 录

- 新中国的外交 (1)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
- 亚洲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处理 (8)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
- 中苏缔约后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 (11)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日)
- 关于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 (18)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 (20)
(一九五〇年九月三十日)
- 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 (25)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日)
- 抗美援朝，保卫和平 (28)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 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34)
(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 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
声明 (38)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

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47)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九日)	
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	(48)
(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	
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 问题	(58)
(一九五三年六月五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63)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发言	(64)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	
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最后会议上 的发言	(74)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	
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	(79)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二日)	
中日关系的关键是和平共处	(87)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	
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94)
(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	
反对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	(106)
(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	
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109)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四日)	

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112)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	
主要发言	(112)
补充发言	(120)
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126)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中国愿就台湾地区问题同美国进行 谈判	(134)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关于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135)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多做和平友好工作	(140)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高举五面旗帜，推进世界和平运动	(149)
(一九五五年六月七日)	
希望法国采取同中国完全建交的方式	(155)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	
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	(158)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日)	
支持和平中立政策，争取和缓国际局势	(163)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	
中日两国人民要多多来往，为两国关系 正常化铺平道路	(168)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争取外援，但不依赖	(172)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	
倡导在国际上建立和平共处互相监督的制度	(175)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	
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	(182)
(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	
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	(225)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230)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同美国青年代表团的谈话	(239)
(一九五七年九月七日)	
新中国坚持反对制造“两个中国”	(253)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台湾海峡形势和我们的政策	(262)
(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	
西藏问题与中印关系	(268)
(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	
在新德里答记者问	(277)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关于促进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	
三原则	(289)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	(292)
(一九六〇年八月三十日)	
中日双方都应该向前看	(303)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致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电	(310)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支持蒙哥马利元帅关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 的三项原则	(311)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当前世界局势的特点	(316)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同阿尔及利亚驻华使团团长的谈话要点	(322)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日)	
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	(327)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致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电	(329)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倡议建立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	(330)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一日)	
我们为什么反对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 条约	(335)
(一九六三年九月五日)	
以积累渐进的方式推进中日邦交	(340)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	

同出席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 代表的谈话	(349)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	
关于中法建交问题	(359)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在开罗答记者问	(373)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 五项原则	(387)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388)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	
在塞古·杜尔总统举行的文艺晚会上的讲话	(390)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关于非洲国家的独立问题	(396)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六日)	
友好当先 抵抗在后	(403)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	
中日经济合作应当把眼光放得更远些	(412)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422)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	
我们期待中菲两国关系的发展	(424)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 关于禁止核武器和裁军问题 (430)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日)
- 中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 (436)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日)
- 关于发展中苏两国关系的六点建议 (445)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五日)
- 支持越南反对美国和谈骗局的立场 (448)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 抓紧科学技术考察 (458)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
- 关于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四句话 (460)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
- 致柯西金的信 (462)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
- 民族独立运动在不断高涨 (465)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 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谈话 (469)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
- 台湾回归祖国，中美关系会更好 (476)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 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对外政策 (481)
(一九七一年八月七日)
- 日本必须承认台湾已经归还中国 (485)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	(489)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美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492)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	(494)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三世界国家要自主地发展民族独立经济	(497)
(一九七三年二月三日)	
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的谈话	(500)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	

新中国的外交*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斗争经验的,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学,或者翻译一套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做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唯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从前者我们可以采用一部分,从后者我们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

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

* 这是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今天整个世界还有阶级存在，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国家机器在今天还必须重用，这就是阶级斗争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国家机器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单一民族或是多民族的国家里，总有一个阶级掌握领导权。我们是解放了的工人阶级，现在联合其他阶级来掌握国家这个机器，对内统治反动派，统治过去压迫和剥削我们的阶级，反对地主压迫农民，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也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工人；对外联合各兄弟国家，联合各国被压迫的人民，反对敌视我们的国家。所以国家机器在现在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武器。

国家这个统治武器，最主要的是军队和监狱。这些东西表面上看来同外交并无多大关系，实际上却是外交的后盾。军队是保卫我们的，要有备，才能无患。今天国内战争尚未结束，还需要军队，全国解放了，军队经过整编，还得作为捍卫国家的力量。在没有发生战争和破坏的时候，对内对外都要进行保卫国家利益的工作，对内就不说了，对外而言，外交就成了第一线工作。

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

合的。我们应当认识清楚，否则就会敌我不分。

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敌友。先说对帝国主义，刘少奇同志在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曾引用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在黄河以西打游击时说过的话：我们对帝国主义在全盘战略上应该藐视它，但在具体战斗的战术上应该重视它^{〔1〕}。这两句话是非常合乎科学的。我们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应当藐视。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打倒了三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被打倒了三个，削弱了两个，使美帝国主义陷于孤立，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却壮大起来，在东欧也出现了各人民民主国家。事实说明了真理，从两个世界对照来看，难道我们还不能肯定说帝国主义终将死亡吗？读一读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在三十多年前已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三四十年来，就看到了这种情势，帝国主义正在走向死亡。美国表面上强大，实际上是纸老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物质上的损失是不大的，但战后在政治上的损失非常之大。一九四六年起，美国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很快地衰落下去了。美国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战后不到四五年，在国际上的威信就很快地降低了，所以我们说它是纸老虎，我们有理由藐视它。

拿五四运动到现在的三十年同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的七十九年相比是短的。再拿日本投降以后的四年同前两段时间来比更是短的。这说明我们的革命越接近胜利，就发展得越快。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到二十世纪初，经过六十年产生了列宁主义。从二十世纪初到一九一七年，仅十几年的功夫，列宁主义在苏联就胜利了。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三十二年，中国革命就胜利了。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从“五四”到现在三十年来，我们的星星之火已经成了燎原之势，烧遍了全中国。认识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看到全世界帝国主义正在走向死亡，这是战略的一方面。

不过从战术上来讲，我们要促使帝国主义死亡，就不能轻视它。我们在外交工作上对帝国主义既要藐视，又要重视，这是辩证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对具体斗争我们必须用心组织，好好地进行。这同打仗一样，我们稍不经心，就会打败仗。二十二年前，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井冈山建军的时候，就有胜利的信心，但是要达到使敌人死亡的目的，是要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的。这条路并不简单，外交斗争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有病，它是想尽方法要活的，因为其体内尚有未衰的因素，有新生的血球存在，它必定要挣扎。所以，我们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时，必须要留意，要仔细，但也不要怕它，否则就会处于被动，它就处处威胁你。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

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它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它们的外交官当作外侨来看待，享受法律的保护。他们犯了法，我们一样照法办事。它们对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对每一个战斗、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视，都要有信心，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就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义和团的民族热情是可贵的，然而它的领导者造成了盲目排外情绪则是错误的。我们要善于掌握这种情绪。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军队在平时要演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尤其是我们的年轻同志，往往最容易轻视敌人。我们打硬仗，必须要仔细，不要害怕。

工作是做出来的，经验是积累而成的，必须磨练自己。对外必须要一致，一切事情在一定组织范围内都可提出来讨论。想问题，提意见，纠正工作上的缺点，这样才可以不断进步，才能打胜仗。过去我们可以说是打游击战的，只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2]等，不是全面的战斗。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我们更应该加倍谨慎。

另外，联合一方面，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国家承认我们^[3]，加上阿尔巴尼亚，共有十个国家。除此而外，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要来承认我们。加上印尼、越南等，便要有十几个国家了。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大家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要是认为同这些国家之间毫无问题，那就是盲目的乐观。乐观是应当的，但对这些国家也要注意联合中的某些技术问题。“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这个联合工作是不容易的，做得不好，就会引起误会。误会是思想上没有沟通的结果。我们应当研究如何改善关系，不要因为是兄弟国家，就随随便便。

我们要藐视帝国主义，但不轻视具体斗争；要联合兄弟朋友，但不要马虎。一种是联合，一种是斗争，这两种

都通过外交形式出现。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我们大家要在具体工作中，加强团结，才能把外交工作搞好。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一再告诉我们，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亚洲的事情应当 由亚洲人民自己处理*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三月十五日又发表了一篇关于亚洲的冗长演说^{〔4〕}。艾奇逊近来不断地发表演说谈话，其目的是欺骗一部分对于美国侵略政策还缺少经验的人们。但是人们只要拿事实来对证一下，就可以看出艾奇逊的话是颠倒的。艾奇逊在十五日的演说中说：美国不要从亚洲“取得任何东西”，不要使亚洲人民“得不到任何机会，任何自由和任何权利”。但是在事实上，美国不但在五十多年前就取得了菲律宾和太平洋上的许多战略岛屿，不但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后控制了日本和南朝鲜，而且力图控制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缅甸和印度。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政府为了取得中国，曾经支持蒋介石匪帮进行了大规模的内战，使中国人民得不到独立地和平地生存的任何机会，任何自由和任何权利。直

* 这是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演说的谈话，刊载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到现在，美国政府还在供给蒋介石匪帮以轰炸机来轰炸中国大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美国正在以同样的方法支持保大⁽⁵⁾、李承晚⁽⁶⁾和季里诺⁽⁷⁾等傀儡，以破坏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朝鲜、菲律宾等地的民族独立运动。但是艾奇逊却说，美国是“支持”亚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这难道不是极端的颠倒吗？

艾奇逊对中国人说：你们为什么不要求美国的援助呢？美国是多么想“援助”你们啊！但是中国人已经从亲身的经验中懂得了美国的所谓“援助”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几百万人的死亡，就是民族自由和权利的丧失。自从中国人摆脱了美国的“援助”，中国就好起来了，就真正地独立起来了。这个教训，对于全世界人民都是有益的，对于已经或正在被美国帝国主义选择为侵略对象的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尤其是有益的。

艾奇逊对于新缔结的中苏两国的伟大同盟关系，企图继续进行挑拨，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他的卑鄙的造谣污蔑，不过等于一只蜉蝣想去撼动世界和平的万里长城而已。艾奇逊在一月十二日不是就宣布过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四大地区“实行合并”吗⁽⁸⁾？他在三月十五日的演说中为什么不敢再提了呢？一切造谣者只能有一个前途，这就是彻底的破产。

艾奇逊恫吓说：中国人民和苏联结成了平等友好的同盟，而把美国侵略者的“固有友谊”漠视不顾，这就是

“敌视美国的利益”。他又恫吓说：亚洲的事务中国必须不加闻问，否则就是“不仅违反中国人民的每一种传统和利益，而且将违反他们的亚洲邻邦的、美国人民的、以及——真的——一切自由人民的传统和利益”，而且将“违反联合国的宪章”。我想，我应当代表亚洲最大的国家及其人民告诉艾奇逊：这些可笑的恫吓早已过时了，安静些，并且看看地图吧！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当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例如艾奇逊之流，来加以干涉！

中苏缔约后的国际形势和 外交工作*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日)

这次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9〕,大家都很高兴。由于斯大林和毛主席的直接会晤,顺利地签订了条约和协定〔10〕。文件大家都看过了,现在我只想讲一讲里面的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条约的目的和任务。条约中有反对和争取两个方面的任务。我们所反对的一方面,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由此烘托出另一方面,也是积极争取的一方面,这就是要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这两个方面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外交斗争和我们在和平阵营所从事的神圣伟大的任务。

这个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个国家七万万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八万万人民的团结。它不仅鼓舞了殖民地的国家和被压迫的民族,同时也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所以,这个条

* 这是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的报告节录。

约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帝国主义是不愿意看见也不愿意了解新世界和人民力量的，所以每次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象这次中苏缔约，都出乎他们的意料。这种情况说明，和平阵营的行动击中了帝国主义的要害。帝国主义不愿意看见革命，因为革命要消灭它，即使是改良，它也害怕，因此它不得不从战争中找出路。

战争究竟打得起来打不起来呢？这是我们大家要研究的问题。今天的世界形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是困难的。我们今天工作做得越好，战争就越打不起来；人民力量越强，打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国际上的斗争也是力量的对比。刚刚说过，现在已经有八万万人团结起来，这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所面临的情况已经不同了。那时苏联受十四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处境很艰难。而今天我们八万万人背靠着背，从柏林到上海，连结在一起，这样大的力量，是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可以打破的。这个力量只有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才表现出来。八万万人团结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再从帝国主义营垒来看，它们从哪里能动员那么多人力来打仗呢？美帝国主义最希望的是别的国家替它打。但是，今天的欧洲人是最不希望战争的。欧洲是工业发达地区，打烂了不容易恢复。欧洲人坐上一夜火车，醒来就出了国境，一打仗全国都被打乱了。所以他们希

望最好是不打仗。自卫战争是迫不得已，侵略战争是尤其不愿意。今天可以肯定地说，英法等西欧各国人民是不愿意打仗的，这一点美国人也是知道的。

美国是不是可以用武装德、日来进行战争呢？它同样要遇到困难。德国成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虽然才只有一年，但是它会不断地产生影响。这是在西方。

在东方，美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要控制日本。它企图单独缔结对日和约，而中国和苏联却提出要共同缔结和约。日本人民懂得，单独缔结和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美帝国主义单独缔结和约的企图不成功，就想拖延和约的缔结，而我们却希望迅速缔结对日和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以来，美帝国主义一直处在被动地位。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也不得不承认。因此，现在美帝国主义也在大喊要缔结和约，要求和平。当然这只是斗争的开始，事情还是要继续发展下去的。

美帝国主义也希望动员其本国人民来打仗，但这是很困难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占了便宜，而现在想要本国人民打先锋，这就要危害美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因为从美国人民来说，打仗将使几百万人丧失生命，大量财产遭受损失，这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美国人民过着和平生活，没有哪个国家要侵略他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没有那么大，以致有人要去打美国，和平阵营又是主张和平竞赛的，所以让美国人民打先锋，他们是不愿意的。

但是也有一个弱点，就是美国人民尚被控制在垄断资本之下，我们的消息不能进到他们国内去，垄断资本家还用低级文化来麻醉他们的人民，所以要使美国人民觉醒起来，这是世界人民的责任。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民责任也很大，我们要求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有这个意义。首先对美国人民会有很大影响。我们要影响美国人民，这种义务是不能拒绝的。

美帝国主义的企图，一是发动欧洲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的力量，二是武装德、日，三是欺骗美国人民，以便它发动战争。这三方面，我们都要揭露。我们争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其目的是要完成有世界意义的任务，这就是要使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客观条件已经有了，我们要努力去推动。

今天的每一个群众运动都是保卫和平的力量。为什么美帝国主义连几个和平代表都不允许进入美国呢？就是怕他们进去以后影响美国人民。因此，这也是一种战斗。毛主席说，战斗有两种，一种是武装的，一种是非武装的。我们必须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作才有意义。现在，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已经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人民的力量已经加强。我们八万万人团结起来，就是牢不可破的力量。恫吓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原子弹的恫吓破产了。我们要在目前可能的条件下加强保卫和平的工作。

毛主席说，考虑问题要照顾两方面，一方面要争取

好的，另一方面也要准备坏的。因为世界上总是有疯子的，例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当然，单是疯子也闹不起事来，必须有一批跟着跑的人。因此，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疯子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假如战争要打起来，就要准备力量，这就是既要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信念，也要有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力量。因为没有力量就不能保卫和平，而争取和平的运动也是为着增强保卫和平的力量，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从外交上说也是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争取和平，使各国人民觉醒，另一方面也要预防和抵抗战争，不能高枕无忧。帝国主义是会耍许多阴谋的。由于我们外交战线工作的开展，敌人更为敌视我们，艾奇逊⁽¹¹⁾无耻地叫嚣要过问亚洲的事情，就是证明。因此我们外交战线的同志，尤其是出国的同志，头脑必须灵敏些。到国外去要做争取和平和防止战争的工作，揭露帝国主义一切破坏和平的阴谋诡计。这种在国外的工作，就是一种触角。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很好地开展工作，这对保卫和平、防止战争是有很大帮助的。

这就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以后世界局势所起的变化。

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革命胜利的特点，是帝国主义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西方，因而我们在东方冲破了最弱的一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好比一头狮子，头在西方，尤

其是在柏林，而尾巴和脚却在东方，因此中国才会有胜利的可能。中国胜利以后帝国主义才大吃一惊，回头注意到了东方，这使得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受到的压力有所减轻。当然，帝国主义是不会放松西方的。艾奇逊最近的演说〔4〕，表示狮子的头已转向亚洲了。因此，我们是不能放松斗争的。

我们在外交战线上打了胜仗，就会鼓舞爱好和平的人民，这说明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的重要性。

我们外交工作者要增强自信心，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这对我们外交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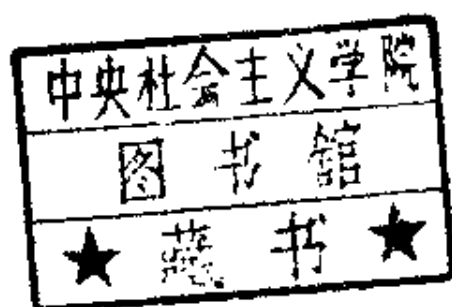
当然，我们今天的外交传统不是旧的，但将来外交工作开展了，还是要与旧的外交传统接触，也多少会受点影响。因此，我们要打破旧的外交传统，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媚外，否则不是狂妄便是自卑。不亢不卑才是我们的态度，在这方面必须掌握得体。

今天在国际战场上，我们的朋友是强大的，而我们则是后来者，但又是—一个大国。我们要向先进的学习，同时要做到不亢不卑，要有适当的分寸。在外交场合上，任何一个行动都不要随便。

另外，在国际战场上，有朋友，也有敌人。对于敌人，旧中国的外交传统容易流于自卑，而今天革命胜利了，却又容易流于骄傲。我们要不亢不卑，便不得不有一套统一的礼节。当然，这些都属于外交形式。为什么要照顾

外交形式呢？这是因为我们要争取外国人民，某些形式和制度是必须建立的。有时，形式是起很大作用的。这一点对某些从学校中出来的知识分子和从部队调来的同志来说，可能不习惯，但必须要重视。注意形式并不是迷信形式，而是为了完成外交任务。任务和形式是完整的，统一的，形式虽然要服务于任务，但形式还是重要的。从这点上说，外交机关就是不同于其他一般机关和学校。

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将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开展起来。老实说，我们的工作落后于形势的。外交战线上有许多任务等待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经验比较少，人才也比较缺乏。但是，我们要下决心完成任务。



关于美国武装侵略 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指使南朝鲜李承晚⁽⁶⁾傀儡政府挑起朝鲜内战之后,于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阻止我台湾的解放。美国第七舰队并已奉杜鲁门之命向台湾沿海出动。

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¹²⁾的彻底破坏。美国政府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中国人民许久以来即不断地揭穿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亚洲的全部阴谋计划,而杜鲁门这次声明不过将其预定计划公开暴露并付之实施而已。事实上,美国政府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傀

* 这是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就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而发表的声明,刊载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備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的进一步行动。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13〕、波茨坦宣言〔14〕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只要我们不受恫吓，坚决地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斗争，这种侵略是完全可以击败的。中国人民对于同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朝鲜、越南、菲律宾和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并坚信全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能把穷凶极恶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制造者，最后埋葬在伟大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怒火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

(一九五〇年九月三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明确地规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15]上。《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的问题上，《共同纲领》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中央人民政府一年来的外交，就是按照这些基本原则执行的。

-
-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报告节录，刊载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波兰、蒙古、德意志、阿尔巴尼亚、缅甸、印度、越南、丹麦、瑞典、瑞士、印尼等十七个国家，已与我国相继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巴基斯坦、英国、锡兰、挪威、以色列、阿富汗、芬兰、荷兰等八国，也已经表示愿与我国建立邦交，其中，英国、挪威、荷兰、芬兰四国尚在与中国进行建交的谈判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并且与苏联建立了最亲密的兄弟关系。在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中苏两国缔结了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9]。由于这个条约，欧亚大陆上的近七万万伟大的人民已经结成了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亲密同盟，使两国防御由东方来的侵略的力量大为加强。在这个条约的同时或稍后，中苏两国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专家协定，贸易协定等。在这些协定中，我们的伟大盟邦给了在恢复战争创伤期间的中国以许多慷慨的援助。全中国的人民，由于中苏之间的条约、协定的签订和实施，感到极大的兴奋，对于苏联领袖斯大林大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友谊，表示无限的感谢。

中国与波兰、捷克和朝鲜也已签订了关于贸易的合同和协定，与德国和匈牙利的贸易谈判正在进行。

中国与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也发展了贸易关系。今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估计是可以达到并超过预定计划的。

对于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比建立贸易关系的问题要复杂。在这里可以特别提起与英国进行了长时间而还没有结果的谈判。谈判还没有结果的原因就是英国政府一方面表示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继续非法地强占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这样，就使中英的正式外交关系难于开始。英国在香港和其他地方对待中国居民的极端不合理的非友好态度，也不能不引起中央人民政府的严重关切。

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间始终站在中国人民的敌人方面，用一切力量援助国民党反动派进攻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敌视有加无已。不顾苏联、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正当指摘，美国在联合国及其各个组织中间，顽固不化地阻挠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参加，并且无耻地庇护着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的席位。美国同样在阻挠中国代表参加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¹⁸⁾，并阴谋抛开中国和苏联缔结对日和约，以便决定重行武装日本和保留美

国在日本的驻军和军事基地。美国为着进一步扩大在东方的侵略，故意制造了李承晚〔6〕傀儡集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随即借口朝鲜的形势派遣海军空军侵略我国的台湾省，宣布所谓台湾地位问题应由美国所操纵的联合国解决，同时多次派遣侵略朝鲜的空军侵入中国辽东省〔17〕上空，实行扫射轰炸，并派遣侵略朝鲜的海军炮击中国的航海商船。美国政府由于这些疯狂横暴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已经证明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美国的侵略武力已经侵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并且随时有扩大这种侵略的可能。美国侵略台湾和朝鲜的总司令麦克阿瑟早已透露了美国政府的侵略计划，并且正在继续制造扩大侵略的新借口。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暴行，并决心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及其他领土。

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朝鲜人民和人民军是坚决而勇敢的。他们在金日成首相领导之下抵抗美国侵略者，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声援。今后朝鲜人民在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下，必能克服许多困难，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一亿二千万个中国人已经在斯德哥尔摩的庄严宣言〔18〕上签了名，这个签名运动还在中国人民中继续扩大。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

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煞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美军如越过三八线， 我们要管*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日)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 前天收到大使先生转来尼赫鲁总理的来函〔19〕, 谢谢。尼赫鲁总理所提的问题, 范围很广, 因此需要一些时间来研究。我们感谢他的好意, 对于他的努力表示赞赏。尼赫鲁总理所提的问题中, 有一个是比较紧急的, 那就是朝鲜问题〔20〕。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21〕, 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 我们不能坐视不顾, 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

潘尼迦大使(以下简称潘): 我曾经预料到这种局势, 因此于九月二十六日致电我国政府, 报告: 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 其后果将非意料所及。尼赫鲁总理于是致函阁下。据我所知, 他还以公函分致英美政府, 提出警告。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劳氏把阁下十月一日报告〔22〕

* 这是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谈话。

中有有关朝鲜的一段，在记者招待会、安理会以及联合国大会上宣读了。我国政府正在尽其所能，继续施加压力。

周：关于朝鲜事件，我们曾经交换过意见。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我在十月一日的报告中也声明了我国政府的态度，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尽管在三外长会议〔23〕中有了协议，不经联合国同意，不得越过三八线，但是美国政府不一定受其约束。

潘：有些迹象已经表明，美国政府有背弃三外长会议协议的可能，麦克阿瑟〔24〕对美国政府的压力很大。昨日有消息报告，南朝鲜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九英里。

周：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消息，据说是在东海岸。另一个消息说，沃克〔25〕将军指挥的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但是并未说明是南朝鲜军队还是美军。

潘：我当即刻报告尼赫鲁总理。除了以上阁下所述，是否还有其他需要我报告的？是否有任何建议？

周：其他一切，容我们研究尼赫鲁总理来函之后，于下次会面时再告。

潘：阁下所称朝鲜事件应该地方化，是否指朝鲜战事应该限于三八线以南？或是指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

周：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外国军队应该撤退，这

对于东方的和平是有利的。朝鲜事件地方化的意见，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

潘：朝鲜事件地方化在目前包含两个问题：第一，美军即将越过三八线，因此，朝鲜事件地方化，可能是指所有已经越过三八线的美军必须即刻撤回。第二，朝鲜事件必须和平解决，有关各国，如中国、苏联必须参与讨论此事。为了使我向尼赫鲁总理作报告时较为明确起见，任何可能被中国所接纳的建议究竟应包括哪种含义？

周：这是两个问题。第一，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以扩大战争，我们要管，这是美国政府造成的严重情况。第二，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潘：我必须郑重说明时间之短促。美军可能在十二小时之内越过三八线，而印度政府接到我的电报并采取有效行动，需要在十八小时之后。届时，任何和平方案可能为时已晚。

周：那是美国人的事情。今晚谈话目的是奉告我们对尼赫鲁总理来函中所提的一个问题的态度。

抗美援朝^[26]，保卫和平*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朝鲜反侵略战争胜利地开始，大家看到了朝鲜人民的英勇，同时也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残暴。

七月半以后，美帝国主义向南撤退，迅速地把军力集结在朝鲜半岛南方大邱地区，意图引诱朝鲜人民军向其进攻。年轻的朝鲜人民军是勇往直前的，要一直把美国兵赶下海去。当时的形势已表现出战争将长期化。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的国家，朝鲜人民军是一支年轻的部队，他们战斗非常英勇，真使我们感动。敌人依仗暂时的强大，有意制造阴谋。现在朝鲜是困难的，但他们英勇地坚持着，在南方打游击，在北方抵抗，斗争仍在继续，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生长出新的力量来打败敌人。朝鲜地方较小，所依靠的基础是九百万人口，以这样的力量，抵抗这么强大的敌人，下了长期抵抗的决心，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应当赞佩。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上的报告，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它同国际上的其他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朝鲜人民的长期抵抗，将更增加问题的国际性。同时，朝鲜要胜利，也必须得到国际的援助。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国际的援助。我们应该发扬革命的道义。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如果朝鲜这个缺口被打开，则其他方面要相继被打开。东方阵线门户洞开，敌人打进我们的大门来了，怎么还能谈建设？

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从八月二十七日到昨天这两个月间，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已侵入我国十二次。最近不仅在鸭绿江，而且已飞到宽甸来示威、侦察、扫射和轰炸。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

我们国家的建设需要有三年五年时间先恢复生产，我们也正在进行恢复工作。最近拟定了一九五一年的经济计划，总想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和文教费，把军费由今年占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三减为明年占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以全部概算的百分之七十投入经济建设、文教事业等，并考虑改善公教人员的生活，收购农民的余粮，发展日用品的生产。但敌人不让我们这样做。不久以前华莱士〔27〕给毛主席一封信，他说，愿中国造拖拉机，不要将

造拖拉机的力量造了坦克车。实际是敌人不许我们建设，逼得我们不能造拖拉机。

假如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那是不行的。消极防御也要花许多钱，例如改装一个飞机场就要一亿斤小米，东北修八个，关内修三个，就要十多亿斤小米，飞机场外还有许多设施，所费甚大。再有工厂搬家，许多工业无法按计划生产下去。军事上，除装备之外，还有兵力问题，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况且敌人如果将朝鲜侵占了，也不会就此罢手。所以，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

一个月前，就是说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前，我们曾经考虑过，美帝打到三八线〔21〕后是否会停止，而后转为外交的谈判。在敌人占领汉城以后，尼赫鲁〔28〕曾经对我们说，三外长会议〔23〕已经说好，不过三八线，如要过三八线也要提到联合国来决定。但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以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在九月三十日声明：对美帝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29〕。十月一日、二日的消息是美军已过三八线，南朝鲜军则在三八线以北深入很远。我们曾找印度驻华大使指出，以上情况与尼赫鲁所说不同，我们对朝鲜

问题不能不管，要他通过尼赫鲁转告贝文^[30]。过了几天，敌人的推进并不停止。不久，贝文通过尼赫鲁向我表示，过了三八线到距鸭绿江四十英里时即可停止。当时敌人已进到平壤。目前，敌人又由平壤北进。这显然是对我们第二次欺骗。如此下去，我们如坐视不救，敌人必然继续前进，咄咄逼人，直到鸭绿江边，然后再做第二步文章。

所以我们要理，要管。但如何理？如何管？要有进一步的决策。过去我们是管过理过的，例如向联合国控诉等。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应有新的决策。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一步步地制造并扩大战争。如果我们予以打击和斗争，它可能缩回去，否则它必然照计划继续推进。

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实行麦克阿瑟^[24]的政策，利用日本的基地，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着甲午战争^[31]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是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逐步进行的，而美帝国主义则要在四五年内来完成。

历史的教训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一派主抗，一派主让，让到七七事变^[32]，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抵抗，还抗不起来。甲午之战也是抗，不过那是在统治者中的抵抗，由腐败的朝廷领导，没有人民的支持，结果失败了。如果是人民的国家，就不会如此。

现在对美帝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给以打击，让它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甚至会影响它派兵到西欧的计划。这样，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会发生。总之，如果我们让，只会缓和敌人内部的矛盾；管，则会促使敌人内部矛盾加深。只有管，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不过，我们过去的管法现在已经无效，只有拿出力量来管，才能起作用。

朝鲜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帝国主义与我为敌，它的国防线放到了台湾海峡，嘴里还说不侵略不干涉。它侵略朝鲜，我们出兵去管，从我国安全来看，从和平阵营的安全来看，我们是有理的，它是无理的。

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军队必须退出朝鲜。如果解决得好，美帝国主义受到挫折，也可以改变台湾海峡的形势和东方的形势。我们力争这种可能，使国内外人民一致起来，动员起来。

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愈打愈眼红，打入大陆，战争扩大。敌人孤注一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美帝有疯

狂的一派，我们应该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并不愿意战争扩大，它要扩大，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不过我们绝不挑起世界大战。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前途，力争和平。但也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应付世界大战。

既然要拿出力量来管，那么我们的力量如何？

我们的陆军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空军海军不足，因为我们在去年春天才开始建空军和海军。那么是否要等到我们力量强大时再抵抗呢？不行。那样敌人就会把朝鲜压了下去，气焰会更加高涨，敌我力量对比会相距更远。所以我们必须全面地发展地考虑问题，到斗争中去增强自己，在狂风暴雨中锻炼自己。革命的力量有时看起来是劣势，在斗争过程中却会变为优势。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另外，我国大陆防卫的力量也要顾到。敌人可能来轰炸，或者用蒋介石的空军来轰炸，或登陆袭扰，我们应增强防卫力量。政治上，我们有同盟国家、友好国家的支援，力争和平。方式上，我们采取志愿军的形式，无须宣战。宣传上，我们应该广泛宣传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同时，我们在国内要镇压敌特的捣乱，巩固广大人民内部的团结，经济建设不能停止，重工业要有重点地恢复，水利、铁道、纺织这几方面的建设要不动摇地进行，并且要照顾到人民生活的改善。

民族解放运动 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民族问题在今天的国际地位与过去不同了，民族问题的国际地位不是降低了，削弱了，而是提高了，加强了。列宁曾经指出，十八世纪的民族独立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后备力量，二十世纪以后的便不是了。法国的革命，美国的独立，都属于前一范畴。那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民族革命在当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到了资产阶级已在许多国家取得胜利、建立了它自己的国家以后，它就对外压迫别的民族，把别的民族的国家降为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任意地去压迫和剥削别的民族。它不仅对外压迫和剥削别的民族，还对内压迫和剥削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少数民族，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形成尖锐的国际对立和国内对立，也就不可避免地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 这是在外交学会年会上的讲话节录。

的民族革命发生了密切关系。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上开始有了两个对立的营垒，从那时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不再是资本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同时，民族解放斗争在此期间也变得更加重要更加扩大了。

十月革命产生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国家苏联，它给进步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它在被压迫的民族中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斯大林同志在论述东方革命和西方革命的关系时说，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配合，便不能成功；反过来，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配合，也不能得到胜利。斯大林的话已被历史所证明，而且正被今天的实践所证明。中国人民的胜利，就完全证实了斯大林的预见。毛主席说，我们是在帝国主义国家比较不甚注意的地方取得了胜利的。因为在欧洲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力量的对峙，帝国主义国家把它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的问题上。它们忙于对付苏联和东欧的各人民民主国家，以为亚洲的问题并不严重。它们低估了我们的力量，以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值得注意的。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取得了自己的胜利。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配合，便不可能有我们在东方的胜利。也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我们在东方的胜利反过来又要影响到西方的革命。我们

的抗美援朝运动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中国人民的胜利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民族解放运动的比重大大地加强了。一方面中国人民的胜利正在影响着整个的世界，鼓舞着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发生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而且也使那些战败的和在战争中削弱的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了民族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一些大小国家，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在内，都不免或多或少要受到美帝的压迫。至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人民，包括劳动人民、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都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本国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对象。随着美帝国主义压迫范围的扩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美帝也越来越陷于孤立。它要作绝望的挣扎，扩充军备，武装德日，不断地扩大其侵略范围。帝国主义的这种行为，必然带来更多的更强烈的反对，一直到帝国主义垮台为止。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革命的成功使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增添了新的力量，给了它们以莫大的鼓舞，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当前革命的主要力量，我们不能低估这个力量，也不能认为这个力量只是辅助的力量。这个力量正在发展中，而且必然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个结论，历史终究会做出来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支持、推动民族

解放运动的发展。

帝国主义已逐渐认识到这一力量，它已开始注视这一运动。但它还没有彻底认识这一力量，它还以为发生民族解放运动的那些国家经济力量不够强，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它将会得到教训，这一运动的广泛性和坚定性将逐步地改变它的看法。帝国主义无法阻止这一力量的发展。假如这一力量好好地组织起来，将会所向无敌。问题是革命者常在重要关头低估了自己的力量，因而不能及时地作出正确决定，领导革命继续向前发展。他们常受历史的局限，容易根据旧的观点去观察和处理新的问题，对新的事物不敢接受也不敢发展，在新的事物面前表现出犹疑和踌躇，以致坐失时机，使革命不能顺利地前进。所以革命者要善于在事物的发展当中找出其中的新因素，并且应该有勇气去发展新的因素，使这种新的因素成为新的力量。新的力量生长起来，革命就一定能胜利。

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 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美英两国政府所提出的对日和约草案^[33]是一件破坏国际协定、基本上不能被接受的草案，而将于九月四日由美国政府强制召开、公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的旧金山会议^[34]也是一个背弃国际义务基本上不能被承认的会议。

美英对日和约草案，不论从它的准备程序上或它的内容上讲，都是彰明较著地破坏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的联合国宣言^[35]、开罗宣言^[13]、雅尔塔协定^[36]、波茨坦公告^[14]和协定^[37]及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远东委员会所通过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38]等重要国际协定，

*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二日，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在华盛顿和伦敦同时公布对日本和平条约草案，美国政府又于同年七月二十日发出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通知，准备签订对日单独和约。本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此事授权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的声明，由周恩来起草，刊载于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而这些协定都是美英两国政府参加签字了的。联合国宣言规定不得单独媾和，波茨坦协定规定“和约的准备工作”应由在敌国投降条款上签字之会员国进行。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曾完全同意苏联政府的建议，主张所有曾以武力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都参与制定对日和约的准备工作。但是，美国政府在长期地拒绝实施波茨坦协定原则以拖延对日和约的准备工作之后，竟由美国一国包办了现在提出的这一对日和约草案的准备工作，而将大多数对日作战国家尤其是中苏主要对日作战国家，排斥于和约的准备工作之外，并由美国一国强制召开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的和会，企图签订对日的单独和约。美国政府这一违背国际协定的行动，在英国政府支持之下，显然是在破坏日本与所有与它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缔结全面的真正的和约，并正在强制日本与某些对日作战国家接受只有利于美国政府自己而不利于包含美日两国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单独和约，实际上这是一个准备新的战争的条约，并非真正的和平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一论断，是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的基本内容上得到无可辩驳的根据的。

首先，由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是美国政府与其附庸国家进行对日单独媾和的产品，所以这一和约草案不仅无视中苏两国政府历次声明中关于对日和约主要目标的意见，并且最荒谬地公然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对日作

战的盟国之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是开始于一九三一年^[39]，至一九三七年，更发动了向全中国的侵略战争^[40]，至一九四一年，方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人民在抵抗和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经过了最长期的艰苦奋斗，牺牲最大，贡献最多，因之，中国人民及其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对日和约问题上是最有合法权利的发言者和参加者。可是，美英对日和约草案竟在它关于处理盟国及其国民于战争时期在日本的财产和权益的条文中，规定起讫日期，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起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止，而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以前中国人民独力进行抗日战争那一时期完全抹煞。美英两国政府这种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敌视中国人民的非法蛮横行为，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并将坚决反对到底的。

第二，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在领土条款上是完全适合美国政府扩张占领和侵略的要求的。草案一方面保证美国政府除保有对于前由国际联盟委任日本统治的太平洋岛屿^[41]的托管权力外，并获得对于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硫黄列岛、西之岛、冲之鸟岛及南鸟岛等的托管权力，实际上就是保持继续占领这些岛屿的权力，而这些岛屿在过去任何国际协定中均未曾被规定脱离日本的。草案另一方面却破坏了开罗宣言、雅尔达协定和波茨坦公告中的协议，只规定日本放弃对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对于

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的一切权利，而关于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将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交予和交还给苏联的协议却一字不提。后者的目的是企图造成对苏联的紧张关系以掩盖美国的扩张占领。前者的目的是为的使美国政府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得以长期化，但中国人民却绝对不能容许这种侵占，并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的神圣责任的。同时，草案又故意规定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和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而亦不提归还主权问题。实际上，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虽曾一度沦陷，但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此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威岛和西沙群岛之不可侵犯的主权，不论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有无规定及如何规定，均不受任何影响。

第三，对日和约的最主要目标，如众所知，应该是使日本成为爱好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国家，并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保证日本不再度成为威胁亚洲与世界和平安全的侵略国家。但是，美英对日和约草案不仅对此毫无保证，相反的，它还破坏了波茨坦公告及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关于这类问题的规定。草案在安全和政治条款上，对于日本军队没有任何限制，对于残存

的和复活的军国主义团体没有规定取缔，对于人民民主权利没有任何保障。实际上，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这几年的一切措施，已经竭力在阻止日本的民主化与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占领当局不是在毁灭日本的制造战争的力量，而是违反远东委员会的政策，扩大日本的军事基地，训练日本的秘密武装，复活日本的军国主义团体，释放日本的战犯，开脱大批被整肃的分子，尤其在干涉朝鲜的战争中已经开始利用日本的人力，恢复和发展日本的军事工业，来支援它的军事侵略。为了便利美国长期占领日本、不撤退它的驻军、并控制日本使之成为美国在东方的侵略前哨起见，草案更进一步地规定盟国占领军可以经过与日本的协定而在日本长期地留驻下去。美国政府这一显然违反国际协定义务的计划，是得到成为美国占领日本的政治支柱的吉田政府支持的。美国政府和日本吉田政府正在互相勾结，阴谋重新武装日本，奴役日本人民，将日本再度推上曾经使日本濒于毁灭边缘的侵略道路，并且是服从于美国侵略计划并为美国政府火中取栗的附属国和殖民地化的道路。这是阻碍日本人民走向另一条和平、民主、独立和幸福的道路的阴谋。根据上述草案的规定，美日军事协定⁽⁴²⁾正在秘密计议中。这一计议中的军事协定正象美英对日和约草案一样，它是敌视中苏两国，威胁着过去曾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和人民的安全的。由此可见，美英政府之所以急于签订对日单

独和约,决不是为的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推进日本民主,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而是为的重新武装日本,为美国政府及其附属国家准备新的世界侵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此不能不表示坚决反对。

第四,美国政府为了加紧准备新的世界侵略战争,就必然会更加紧对于日本经济的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曾一再声明,对于日本和平经济之发展及日本与其他国家的正常贸易关系,不应加以限制和垄断。然而,由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是敌视中苏和威胁亚洲国家的对日单独和约,所以它的经济条款也就是排除中苏的,并且是排除不能接受这一和约草案的许多国家的;同时,美国政府更可利用它经过美国公司在日本经济中已经取得的特权及它对于日本和平经济的各种限制,使这些经济条款更适应于它的垄断要求。因此,这一对日单独和约如被签订,日本经济依赖于美国的殖民地化的地位将更加深,不仅军事工业将依照美国的世界战争计划生产,就连一般工业也将为美国的亚洲经济侵略服务,而日本与中国及其他邻国为着发展和平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正常贸易关系,将受到更横蛮无理的限制。这将是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的灾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应该予以坚决的反对。

第五,关于赔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认为必须澄清美国政府在美英对日和约草案上故意造成的混乱。草案承认在原则上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之损害及痛苦给予赔偿，但同时又说如欲维持健全之经济，则日本缺乏赔偿能力和履行其他义务能力。从形式上看，好象美国政府最关心日本经济的健全似的，实际上，美国政府在占领和管制日本的六年当中，已经利用各种特权和限制，窃取了并仍在窃取着日本的赔偿，损害了并仍在损害着日本的经济。美国政府不让其他曾受日本侵略损害的国家向日本要求赔偿，其不可告人的隐衷，就是为保存日本的赔偿能力和履行其他义务能力，继续供给美国独占资本的榨取。如果说，日本的赔偿能力和履行其他义务的能力已经感到缺乏，那就是美国占领当局过分窃取和损害它们的结果。只要美国政府遵守国际协定的义务，在和约签订后早日撤退占领军，立即停止建筑军事基地，放弃重新武装日本和恢复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取消美国公司在日本经济中的特权，取消对日本和平经济及日本对外正常贸易的限制，则日本经济就会真正健全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看到日本能够健全地发展和平经济，并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间的正常贸易关系，使日本人民的生活不再受战争的威胁和损害而得到真正改善的可能。同时，那些曾被日本占领、遭受损害甚大而自己又很难恢复的国家应该保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根据上述各项，足以证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是完全破坏国际协定，损害对日盟国利益，敌视中苏两国，威胁亚洲人民，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并不利于日本人民的。美国政府及其附庸国家在这个和约草案中，只追求一个中心目标，即是重新武装日本，以便继续和扩大在亚洲的侵略战争，并加紧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所以这个和约草案是中国人民及曾被日本侵略的亚洲人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美国政府为了便于迅速签订这一对日单独和约，于是在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通知中，也公开排斥主要对日作战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它就彻头彻尾地破坏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联合国宣言关于不得单独媾和的规定。很显然，美国政府强制召开旧金山会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就是为了分裂对日盟国，组织新的远东侵略集团。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所谓“三边安全条约”⁽⁴³⁾及密议中的美日军事协定都将在这个会议中或会议后成立，它们将威胁着整个太平洋及亚洲人民的和平安全。因此，这个旧金山会议在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签订对日共同和约的，即使美国及其附庸国家径自签订了对日单独和约，也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承认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历来主张，应在联合国宣言、开罗宣言、雅尔达协定、波茨坦公告和协定及远

东委员会所通过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等主要国际文件的基础上，经过对日作战主要国家的准备和所有对日作战国家的参加，在尽可能的短期内，缔结共同的而不是单独的、公平合理的而不是强制独占的、真正和平的而不是准备战争的对日和平条约。为促进这一目的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曾授权本人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四日就对日和约问题发表声明，并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照会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先生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关于准备对日和约的具体建议。凡在那个声明和照会中所提出的关于对日和约的具体主张，中央人民政府认为继续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现在再一次声明：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为了真正有助于恢复亚洲和平及解决远东问题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坚决主张，应该根据苏联政府的提议，召开曾以军队参加对日战争的一切国家的代表的和会，来商定共同对日和约问题。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准备以联合国宣言、开罗宣言、雅尔达协定、波茨坦公告和协定及远东委员会所通过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为基础，与参加对日作战的一切国家，就共同对日和约问题交换意见。

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九日)

南非联邦约翰内斯堡信箱二九四八

南非印度人大会会议联合书记

加查里亚先生：
密丝特里

我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亚洲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与争取基本权利的正义斗争。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完全理解并深切同情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苦难，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在持久不渝的斗争中求得自由幸福与解放。我预祝大会对反迫害与反暴政的民族解放事业有所贡献，并获得成功。

周 恩 来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九日北京

* 这是致南非印度人大会电，刊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二集）。

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

(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

一、我们的外交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对外政策。我们坚持这一政策，相信以和平竞赛的方法来胜过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为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要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

我们在执行和平政策中的一些外交方针是：

(一)“另起炉灶”。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历史上，有在革命胜利后把旧的外交关系继承

* 这是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节录，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下来的，如辛亥革命后，当时的政府希望很快地得到外国承认而承袭了旧的关系。我们不这样做。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毛泽东同志宣告后，我们以外交部长的名义把这一公告送达各国政府，向世界各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为了表示外交上的严肃性，我们又提出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我们要看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在和平阵营方面，首先是苏联，然后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相继承认了我们。这些国家是真诚地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因此，我们同它们很快地建立了外交关系。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不能不经过谈判的手续，看一看它们是否接受我们的建交原则。我们不仅要听它们的口头表示，而且还要看它们的具体行动。例如，它们如果在联合国中不投新中国的票，而去赞成蒋介石反动政府，那我们就宁愿慢一点同它们建交；反之，如印度、缅甸等，能够真的同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那就可以在经过谈判之后同它们建交。

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二)“一边倒”。在一九四九年党的建立二十八周年纪念日,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宣布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之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七月七日发表了联合声明,拥护这一方针。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者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如司徒雷登^[44]在南京时还想钻空子。“一边倒”的方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

(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是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我们在美帝侵朝的时候,针对美帝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或冻结美帝在华资产,并接管美帝津贴的文化机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26]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

(四)“礼尚往来”。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开国后我们用“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手，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至于在具体事情上，是可以后发制人的。

(五)“互通有无”。我们开国以来就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不能象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消费品市场。美帝国主义对我搞禁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这对打破禁运是极有利的。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换回来的是工业装备。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大大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字。我们想扭转国民党时期的入超，变为出超，这是好的，但我们当前的目标是进出口平衡。现在我们入口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出口的东西如鸡蛋、猪肉，是人家所需要的，这种互通有无是互利的。

(六)“团结世界人民”。我们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以上一系列的方针就体现了我们坚持的和平外交政

策。

二、外交阵线

(一)建立什么样的外交阵线。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一点要搞清楚。

(二)要分清敌我友。在建国开始时，我们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和友是一方面，敌又是一方面。具体地分析一下，朋友方面以国家来分有两种：第一种是基本的朋友，第二种是一时的朋友。这后一种朋友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只能在某一时期内成为朋友，有的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朋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从国家的性质上来说，它们是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但对战争它们不参加，表示中立，这是可能的。这种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有过，那时苏联争取瑞典保持中立^[45]，这对当时的局势是有利的。假如那时挪威也被争取保持中立，对苏联会更有利，对欧洲的形势会更好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在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对我们是有利的。所以对这些国家，我们不能采取敌对

态度，不要把它们挤到敌人的营垒里去，我们可以和它们做朋友。当然在战争中，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但在战争爆发前，我们就要有预见，努力做争取工作。在战争一旦发生时，这些国家守中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站在和平阵营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可能性虽然极少，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要看我们和平阵营力量的增长，要看敌人阵营的分化情形。

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追随美帝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在朝鲜战场，和美国在一起的虽然有十五个国家，可是万一战争发生在中国，是否也有那么多国家参加对中国作战呢？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敢于坚决和我们敌对并走上战场的究竟还是少数。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同我们最敌对的国家，应该对它坚决斗争。

同我国未建交、关系又较坏的国家，不能把它们看成同美帝一样。它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应该给一些影响，使它们不过分同我敌对。

同我国正在谈判尚未建交的欧洲国家，它们不愿意同我闹翻，就悬在那里。

同我国已经建交的欧洲国家，对它们要分别对待，做好工作。

同我国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过去是殖民地，现在不仅形式已经改变，有自己的国会与政府，同时人民的觉醒

也使得帝国主义不能不改变过去对殖民地的一套办法，而由当地资产阶级来统治。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现在还有人说是殖民地，那是不切合实际的。即使是现在的日本也不能说是美国的殖民地。日本人民的主要斗争对象有时是美国帝国主义，有时是本国政府。由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才是殖民地。东南亚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要在战争时争取它们中立，在和平时争取它们同帝国主义保持距离。

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同它们关系较少，影响也小。工作可以逐步进行。

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们要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

三、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

我们的外交工作要绝对地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当然更不能允许这些思想占据领导地位。我们的立场必须十分坚定，思想必须十分明确。

(一)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对这个问题，大家在理论上也懂得，但是在工作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往往容易带着新中国胜利的骄傲，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思想。当然我们应该有民族自信心，可

是如果有自大、骄傲的情绪，那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了，即使有时是不自觉的，也不好。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要肃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确立国际主义思想。

(二)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46]。我们反对失去民族自信的、投靠大国的“世界主义”。美国所说的“世界主义”、“大国领导”，其目的是要小国永远跟它走，永远受它奴役剥削。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平等。

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的爱国主义。我们有些同志有时表现得失去立场，那是因为我们过去是半殖民地国家，羡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不审查其中有无毒素，盲目崇拜。说中国一切都好或一切都不好，都是不对的，应该批判地接受一切中外的文化。《大公报》有一栏叫“中国第一”。中国哪里有那么多第一，这样提就不对，后来这一栏也只好取消了。新中国当然比旧中国好，祖国是可爱的，但我们仍然必须向外国学习。

(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的，一切必须从集体出发，倘若从个人出发，就一定很危险。任何荣誉都是来自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努力，都是国家的荣誉。外交工作中不容许有个

人打算，不要因为人家一说好就沾沾自喜，应该想这是人民的光荣；如果人家说坏，就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错了，要把个人完全溶化在集体当中。

(四)坚持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强调高度自觉的、合乎党的利益的纪律性，丝毫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存在。乱说乱搞就会出乱子。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工作的一切都必须注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国家同国家办事，说了就得算数，所以多说不如少说。但是，是不是什么都不说呢？不是。已经宣布的事，已经办成功的事，已经决定了的事都可以说；尚未宣布的，经验还不成熟的不能说。因为这不是在一个党内，而是办国家同国家之间的事。在一定原则下可以有一定限度的机动，也就是临机应变，但对新的问题处理迟缓一些并不是错误。经验不足时，还是慢一些好。

(五)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我们大家对外交工作的经验都不多，还是要发扬民主。“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多听取大家意见是必要的，但是还要有集中。使馆内的民主一定要做到。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了。我们应该提倡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六)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政治空气首先要求有高度的党性，锻炼同志们的思想，一切从原则出发。政治化是多方面的。把原则变成教条来背诵不

是政治，轻一点说是书呆子，重一点说是教条主义者。要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平时谈生活、谈文艺都要注意从原则出发，这样，庸俗空气就稀薄了，政治空气就浓厚了。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叫做政治空气浓厚。

（七）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我们的外交工作中有不少浪费，这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们在生活享受方面处处想跟苏联比是不对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也是十分俭朴的。毛泽东同志主张不要去提倡那些形式的东西，因为不适合我们现时的经济情况。生活上同他们比是不对的，今天我们的生产还没有发展到他们那样的水平。

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 战争与和平问题*

(一九五三年六月五日)

经过三年朝鲜战争^[47]，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毛主席的估计正确。朝鲜战争已经有了三个年头，谈判也已经有了两个年头。三年战争两年谈判，扩大了世界和平运动，增加了美国的困难，推迟了世界大战。毛主席说过，美国连朝鲜战争都打不赢，还能挑起世界大战？这是简单的逻辑。三年战争的胜利，不但教育了中朝人民，而且教育了世界上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连美国本身也得到教训。朝鲜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上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朝鲜战场是局部性的，但是朝鲜战争的意义是世界性的，把我们对国际问题中许多不清楚的事情都解决了。

究竟世界主要矛盾是什么？两大阵营的对立当然是基本的，但是究竟具体表现在什么问题？美苏之间的

* 这是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对立已经是剑拔弩张了吗？不是的。当前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四个方面。

当前，世界和平运动和战争集团之间的对立，由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力量壮大而加强。我们的阵营是和平的大本营，统帅是苏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国人民以及反对美国战争叫嚣的人，都是和平的力量，都包括在和平统一阵线之内，连不好战的某些政府也包括在内，宗主国不能维持其统治的国家，将来也要包括在内。和平与战争对立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民主与反民主的问题不仅是美帝敌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美国人民反对本国政府，英、法、西德、日本等国人民要自由，而且是美国要干涉，同老牌帝国主义有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矛盾加深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都有利于和平民主方面。现在已经很明显，这些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将来会更加发展。

美国依靠什么发动新战争呢？这个问题摆在美国新政府的面前。艾森豪威尔⁽⁴⁸⁾一上台就想打，但是拿什么去打呢？他一直想这个问题，不得解决。艾克⁽⁴⁹⁾的政策就是要从朝鲜战场脱身，不当先锋队，要做后备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是预备队，发了财，得了许多殖民地。这次朝鲜战争它当了先锋，打了三年一无所得，其他国家早就想撤了。美国靠什么包围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从阿

拉斯加、冰岛、日本等地包围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也没有包围成。谁来当先锋？李承晚〔6〕、蒋介石、保大〔5〕可靠吗？菲律宾、希腊、土耳其可靠吗？西边的、东边的都不可靠。

美国第二个依靠的是西方的同盟国，但也不可靠。欧洲军始终组不成。朝鲜问题如果和谈成功，就更组不成了。东方无战争以后，欧洲更无战争了。法国人说过，历史上从来没有人从东方打过法国，但德国和法国是世仇，在普法战争〔50〕和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三次打了法国。因此，法国跟德国一起组织反苏，打苏联，不可想象。法国老太婆对德国是谈虎色变。法国贸易代表团中有个人曾说，他祖父参加普法战争，父亲参加第一次大战，自己在第二次大战中打断了一只胳膊。法国人民实在不愿意打仗。英国说它支持欧洲军，但自己不参加。这个欧洲军条约何时批准也很成问题，法国议会中恐一时通不过，杜勒斯〔51〕跑到伦敦、巴黎鼓吹一阵也不行。美国的同盟国靠不住。

美国也想搜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它卖命。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是摇旗呐喊，真正打大仗，就不来了。

最后，就剩下武装西德和日本。哪有那么容易？迄今西德还未武装，警察是有，但不是正规军。武装日本是以保安队的名义进行的，有十多万人，离真正武装还差得

远。“重新武装”，不是孙悟空一变即得的，要慢慢搞起来。武装德日是长期的事，夜长梦多，德日两国人民反对，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也有顾虑。即或五年后武装起来了，打谁还成问题。五年后我们的阵营更强大，铜墙铁壁，他们不一定敢打。“先打弱的”，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法则。因此，新战争可能被推迟。

如果新战争能够被推迟，也就可能被制止。美国想依靠傀儡和傀儡国家，但是靠不住。同盟国搞不到一起，殖民地仆从国家不干，德日武装起来是很远的事。这就同美国要使自己从战争中解脱出来的打算，发生了很大矛盾，因而在外交上政治上表现极大的动摇不定。我们看准了美国的这个本质。

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放空炮吓人，提出五条办法：（一）侧面进攻；（二）轰炸东北；（三）沿海骚扰；（四）原子弹恐吓；（五）进攻中国大陆。这五条都已经被我攻破。毛主席说过，我们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能接济上前线。朝鲜战争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奇迹。铁道交通运输不绝，在轰炸中仍然保证畅通。敌人暂时占了上甘岭，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事实证明我们能攻、能守、能接济。敌人想从东西海岸侧面进攻，我们加固了海岸阵地，比正面还坚固。到东北来轰炸，就把敌机打下来。如果勾结蒋帮沿海骚扰，我们有准备，可以消灭它。原子弹轰炸，我们不怕，而它的同盟国就会闹起来。前三条我们有

准备，后两条美帝的同盟国也不会同意，怕引起大战。

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对方则主张用战争来解决。如果战争来了，我们毫不畏惧，敢于抵抗，而且一定能够击败战争挑拨者。朝鲜战争的事实已证明得很清楚。这是因为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美国的战争威胁可能使美国与西欧的裂痕加深，亚洲、中东、北非的国家大都不愿意跟着它走，跟美国走的没有几个国家，和平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说过要在一九五三年开始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

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象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

* 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了谈判。这是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这五项原则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周恩来访问了印度、缅甸。在中印、中缅两个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文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 印度支那问题的发言*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

日内瓦会议〔52〕已经进入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就是要在承认印度支那人民的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停止敌对行为，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怎样才算承认印度支那人民的民族权利呢？那就是必须承认越南、高棉〔53〕和寮国〔54〕人民有充分权利获得他们各自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民主自由，并在他们各自的祖国的土地上过和平生活。

当我们在这里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时候，战火仍然在印度支那的土地上燃烧着。这一场继续八年的战争严

* 根据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八日在柏林召开的苏、法、英、美四国外长会议的协议，由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起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分别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本文是会议转入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后周恩来的发言，刊载于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重地破坏了印度支那人民的和平生活，同时也给法国人民带来了重大的灾害。现在，由于美国政府的加紧干涉，这个战争有更加扩大的危险，以致日益威胁着亚洲及世界的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目前正在它的邻邦进行的战争和战争扩大的危险，不能不加以密切的注意。中国人民认为：朝鲜战争^[47]停止了，现在，印度支那战争^[55]同样应该停止。

大家知道：印度支那九十年来的历史，正如亚洲许多国家的历史一样，是充满了反对殖民统治的长期斗争的历史。

自从九十年前法国侵入印度支那、建立殖民统治以后，印度支那人民就不断地进行了反抗斗争。后来，在日本侵略者进攻印度支那的时候，法国殖民政府没有抵抗，保大^[5]皇室同日本帝国主义合作，当时领导印度支那人民同各盟国军队并肩作战的，就只有以越南人民领袖胡志明为首的越南独立同盟^[56]以及高棉和寮国的爱国者的组织。

英勇的印度支那人民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五年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下获得了解放。越南人民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高棉和寮国人民也都先后成立了各自的抗战政府^[57]。然而，法国殖民主义者却不甘心于印度支那的丧失，重新侵入印度支那，并采取了大规模

的军事行动。这样，印度支那的战争就全面爆发，并一直继续到现在。

由此可见，印度支那战争是法国殖民主义者挑起的一个企图重新奴役印度支那人民的殖民战争，而印度支那人民所进行的抵抗，则是一个反对殖民主义侵略、保卫民族独立的正义战争。

对于这个战争，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本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印度国会中曾说过：“印度支那冲突就其起源和基本性质来说，乃是反殖民主义的反抗运动，以及用传统的镇压及分而治之的方法来对付这一反抗的企图。”

但是，法国代表团团长皮杜尔先生在本会议的发言中，却把法国政府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这显然是歪曲历史事实。

由于这个殖民战争的不得人心，法国殖民主义者不但没有获得他们预期的结果，却反而步步陷入窘境。美国政府就利用这种情况，加强对印度支那战争的干涉，以图逐步代替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但是，印度支那人民的力量，在反对法国殖民主义侵略和美国干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却日益巩固和壮大起来。印度支那战争八年的历史证明：为了自己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民是不可征服的。忽视或者低估印度支那人民的力量，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高棉抗战政府和寮国抗战政府的存在的事实，是注定要失败的。

印度支那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从战争开始以来，越南民主共和国屡次向法国政府提出经过协商途径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建议。但是，法国统治集团中的主战派却不肯放弃重新征服印度支那人民的腐朽的殖民政策。他们不肯停止这个被法国人民斥为“肮脏战争”的印度支那战争，或者故意提出为对方所不能接受的条件来阻碍停止这个战争。

毫无疑问，法国广大人民是希望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他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殖民战争的继续，使法国的民族利益和国际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许多有远见的法国政治人物，也都认识到了这一殖民战争的毫无前途，因而主张在印度支那停止战争，恢复和平。许多法国人都在问：既然在朝鲜能够停战，为什么在印度支那不能够停战呢？美国人自己既然在朝鲜接受停战，为什么又不容许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接受停战呢？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美国干涉者害怕和平。他们在朝鲜被迫停战后力图继续保持和加强国际的紧张局势。因此，美国干涉者就对印度支那战争采取了进一步干涉和扩大的政策，而法国统治集团中的主战派也一直追随着美国的这种政策。

人所周知：早在一九四七年美国就策划越南保大皇室的复辟运动。一九五〇年，美国政府在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和侵占我国台湾的同时，加强了对法国在印度支那

战争的军事援助，企图直接参加这一战争。在朝鲜停战实现后，美国不但进一步从各方面渗入印度支那，而且公开地派遣它的空军人员前赴印度支那直接参加作战。目前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战争的全部经费，已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系由美国担负。美国干涉者并不讳言他们企图接替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他们正在拉拢印度支那的三个所谓国民政府⁽⁵⁸⁾，要直接训练所谓国民军队。这种政策，既侵犯了印度支那人民的独立和自由，而且也是在排挤法国，以便最后将印度支那变为美国自己的殖民地。

不难看出：美国干涉者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目的决不限于夺取印度支那，它还企图以印度支那为基地来对整个东南亚进行侵略。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不久，美国国务卿竟公开号召对印度支那采取“联合行动”，并策动组织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军事集团。虽然美国这种威胁亚洲和平的政策已经遭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首先是亚洲人民的反对，但是，仅在几天以前，美国政府还在宣称关于组织东南亚军事集团的商谈正在活跃地进行着，并且说，这样的—一个组织正在形成中。这就表明：当日内瓦会议正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时候，美国还在积极活动，拉拢其他国家参加它所策划的军事冒险。

美国为了组织军事集团和扩大战争，照例要制造许

多借口，照例要把它说成是为了“巩固美国的国防安全”和“保卫自由世界”。大家知道，美国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它的安全也没有遭受任何亚洲国家的威胁，更没有受到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印度支那人民的威胁。然而，美国政府却一直策划在远东、东南亚、中东和近东建立一系列的所谓防御集团。这些区域中的任何一国都在远离美国国境数千海里以外。显然，美国的国防安全同这些区域并无关系。这就说明，这些所谓防御集团的组织，并不是为了防御，也不是为了所谓保卫自由，而是为了在亚洲扩大殖民战争，建立新的殖民帝国，以奴役亚洲人民，并强迫他们为了美国少数人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而互相残杀；同时，这也不是为了保护它的西方盟友的利益，相反地，却是为了排挤几个古老了的竞争对手以便取而代之。不用说，美国在亚洲组织侵略集团的活动是与美国准备世界战争、建立世界霸权的目的分不开的。

为了掩盖扩大殖民战争和建立殖民帝国的野心，美国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士最近不断制造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涉印度支那战争的奇谈，借此来对亚洲人民进行欺骗。这种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涉印度支那战争的诽谤，不过是他们想掩盖美国对印度支那战争的干涉和企图在亚洲各族人民中制造分裂的烟幕弹罢了。

还必须指出，美国这种在亚洲组织侵略集团的活动，与维护亚洲的集体安全毫无共同之点。事实上，它的这

些活动是背着亚洲人民和许多亚洲国家进行的。在亚洲组织一些国家反对另一些国家的对立集团，只能制造和加深亚洲的不安和分裂。这种计划的实质，是为了在亚洲进行“分而治之”的阴谋，以便把殖民主义的枷锁强加在亚洲人民的头上。当然，这是从未得到而且也不会得到亚洲人民和许多亚洲国家的同意的。

维护亚洲的持久和平和集体安全，需要亚洲国家共同努力。我在四月二十八日讨论朝鲜问题的发言中曾经说过：“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应该进行协商，以互相承担相应的义务的方法，共同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和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亚洲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不互相干涉内政；应该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和威胁；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的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容许歧视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亚洲国家避免新的殖民主义者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空前灾难而获得和平和安全。

中国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向来具有深厚的友谊。最近一百年来，由于同样遭受殖民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在各自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互相同情，这是理所当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就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时，两国政府又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建立了正常的经

济关系和文化关系。这种友好关系正在发展着。中越两国政府的共同的愿望就是互相尊重独立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和保卫亚洲及世界的和平。

为了保卫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极其希望印度支那的战争能够早日停止，印度支那的和平生活能够早日恢复。

不仅中国人民如此，亚洲各国人民同样地支持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要求印度支那停战的呼声从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巴基斯坦等国不断传来。最近在科伦坡召开的五个亚洲国家的总理会议^[59]，同样也对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表示了关心。

欧洲和其他各洲人民要求印度支那停战的愿望并不下于亚洲人民。就在美国的政治家中，也并非人人赞成在印度支那及东南亚进行军事冒险。

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和平政策。苏联政府和人民一贯坚持印度支那问题必须和平解决，并在国际会议上，始终维护着印度支那人民的民族权利。

主席先生：印度支那人民为了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已经奋斗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为了增进我们这次会议对于越南人民及整个印度支那人民的愿望的了解，我想请大家读一读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独立宣言。也许出乎某些先生意料之外，越南独立宣言是

引用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宣言中“一切人们生来就是平等的，他们应有这些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那就是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词句来开始的。接着，越南独立宣言又引用了一七九一年法国民权宣言说：“天赋人类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人们就时时都可以享受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然后，越南独立宣言就这样说：“一个八十多年来敢于反抗法国人的奴隶统治的民族，一个数年来敢于站在盟国一边共同去反抗法西斯的民族，这个民族一定要取得自由，这个民族一定要获得独立！”各位先生，难道越南人民这个要求是过分的吗？我想，曾经在一七七六年和一七九一年发表过这两个伟大宣言的国家的政府，应该承认印度支那人民同美国和法国的人民一样，是必须完全享受独立、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希望会议以最严肃的态度来考虑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范文同先生代表越南人民所提出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实现越南、高棉、寮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民主自由的声明和建议。我们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声明和建议真正表现出了印度支那人民为和平、独立、统一、民主而斗争的意志和他们的合理要求。这些建议，在中国代表团看来，已经为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开辟了道路。

但是，法国代表团团长皮杜尔先生在五月八日的发言中，却仍然采取了殖民统治者的态度，继续无视法国政

府曾经承认过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以及它的政府获得越南广大人民拥护的实际情况。他并拒绝高棉抗战政府和寮国抗战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他撇开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政治基础，而以战胜者自居，提出了停止敌对行为的片面条件，来要求印度支那人民接受，这是不现实的、不合理的，也是不符合于根据平等权利进行协商的原则的。

主席先生，我们大家既然坐一起来审查和研究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办法，那么，就应按照目前印度支那及亚洲的实际情况，在承认印度支那人民的民族权利的基础上来寻求对于有关双方都是光荣的、公平的、合理的条件，并采取有效措施，以便在印度支那能够早日实现停战和恢复和平。如果与会各国代表都具有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真正愿望，我相信，会议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范文同先生的声明和建议，并认为，他的建议可以成为本会议讨论在印度支那停止战争和恢复和平问题并通过适当决议的基础。

这些建议，我们认为，是符合于印度支那人民谋求和平、独立、统一、民主的愿望，符合于法国人民及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和平利益的。

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 朝鲜问题最后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

我在六月十一日的会上曾经说过，我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应该把已经一致和可以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因此我们认为，本会议没有理由不根据六月五日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先生的建议⁽⁶⁰⁾，继续讨论，以便对和平统一朝鲜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仔细地研究了反对莫洛托夫先生建议的各国代表的发言，但是，不能不指出，他们所持的论点是完全站不住的。

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先生在提出他的五项原则建议时就已经指出，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他决不低估这种形势的复杂性。正是为了解决这些分歧，才有必

* 本文刊载于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要把已经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这本是每一种会议所遵循的合乎常识的程序。但是，反对莫洛托夫先生建议的人们却采取了一种不合常情的态度，他们说在每一项已经协议或接近协议的原则下面，还有很多的分歧之点，如果关于这些分歧之点不同时加以解决，肯定这些原则又有什么用处呢？其实，正是为了更好地进一步解决这些分歧，才有必要将已经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只有根本反对达成任何协议的人和他的附和者才会反对这种程序。

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是怎样达到目前的状况的呢？四月二十七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南日外务相就提出了恢复朝鲜的国家统一和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的方案。在讨论过程中，多数代表们强调了对全朝鲜选举进行国际监察的必要。五月二十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由未参加朝鲜战争的中立国家负责此项国际监察。这本应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展开达成协议的广阔的可能性。但是，在同一日，大韩民国的代表却提出了由南朝鲜政府统一全朝鲜的建议。为了推动会议的进展，六月五日苏联莫洛托夫外长提出了五项原则建议。这是总结了与会各国代表，包括大韩民国代表在内所已经取得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而提出的。但是，这些建议竟又遭到美国代表和其他代表们的反对。由此可见，美国代表和追随美国的代表们是根本不愿意对和平

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任何协议的。事实上，早在本会议开始之前，美国政府某些有势力人士就已经公开宣布了不容许日内瓦会议成功的方针。日内瓦会议直到现在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阻挠政策是本会议至今不能达成协议的基本原因。

主席先生，我们坚决认为，六月五日莫洛托夫先生关于和平统一朝鲜问题的五项原则建议是完全合理的。与会各国对于经由全朝鲜的自由选举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问题现在还不能达成协议，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期待我们的会议能够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完满的协议。照目前会议的情形来看，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应该努力对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协议。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了巩固远东及世界的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日外务相今天提出了关于保证朝鲜和平的六项建议⁽⁶¹⁾，正好符合这种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南日外务相的建议。

朝鲜停战了，举世为之欢欣鼓舞，认为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开会，也就是因为朝鲜已经停止了战争和朝鲜的停战仍然有效的缘故。但是我必须指出，朝鲜的停战由于大韩民国政府不断叫嚣北进统一朝鲜，正在受到日益增长的威胁，而这种

叫嚣，又得到了某些美国当权人士的响应。他们正在企图利用每一种可能来破坏朝鲜的停战协定。同时，朝鲜虽然停战了，但是停战的状态究竟还不是巩固的和平。我们应该努力使朝鲜的停战状态转入和平状态。因此，当我们对和平统一朝鲜问题一时尚不能取得协议的时候，我们就有义务采取措施来巩固朝鲜的和平，以便为和平统一朝鲜创造条件。

为逐步解除朝鲜的军事状态，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武装力量是首要的条件。在朝鲜停战协定第六十款中曾经明文规定在停战后必须解决这一问题，有关各国负有执行这一规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完全同意一切外国武装力量于最短期限内按比例地从朝鲜境内撤退。由于战争的关系，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数量都有了大量的增加，这就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很重的负担。因此，为逐步解除军事状态并减轻朝鲜人民的负担，缩减双方军队的数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逐步解除军事状态并将双方军队恢复至和平状态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有必要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代表组成委员会负责考虑这类问题。同时，为了有利于促进朝鲜的和平统一，朝鲜的某一部分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军事条约，如“美韩共同防御条约”〔62〕，就不能被认为是可以容许的。

为了创造朝鲜和平统一的条件，要求南北朝鲜能够

互相接近起来，而不是继续对立下去。因此，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双方代表组成全朝鲜委员会来协商有关双方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的一些过渡措施是适当的和必需的。

鉴于朝鲜停战现在仍然不是处于稳定的情况下，本会议与会各国有必要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南日外务相的六项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没有理由不可能在南日外务相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我们希望与会各国代表对于这个建议予以郑重的考虑。

推进中英关系， 争取和平合作*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二日)

昨天，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我作了一个外交报告。今天我谈的一些问题，涉及日内瓦会议〔52〕的结果和我国的外交政策。最近英国工党代表团将来华访问，我们将同西方国家的一个主要党派进行接触，这就要接触到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因此，有几件事跟大家讲一讲。

去年年底，英国工党执行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要求来华访问。今年五月间，我们以外交学会的名义发出邀请，他们马上就决定组成以艾德礼〔63〕为首的代表团来访。他们答复如此迅速，是同推进中英关系有关的。表面看来，我们邀请的是英国政府的反对党，实际上工党代表团来华访问是得到英国外交部支持的。美国对工党来华一事很不满意，但英国对此不顾。这说明改善中英关

* 这是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系是双方的要求。英国对推进中英关系采取了主动的态度，在日内瓦，英国执政党通过艾登〔64〕跟我们接触，现在反对党又来访华，都是证明。我们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将首先从英国开始。这说明，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丘吉尔〔65〕、艾登都这样说过。中印、中缅联合声明〔66〕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7〕，迫使艾森豪威尔〔48〕也不得不说些和平共处之类的话。这是人民的要求，美国统治集团也不得不考虑这一点。

美国的政策表现得很矛盾，很动摇。朝鲜战争〔47〕失败的教训，使它不敢再打。美国人民不愿意打，国会有八十多个议员反对战争。日内瓦会议在朝鲜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并不是说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只是因为美国一意阻挠，想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在越南可以在选举、国际监督等问题上达成协议，为什么不能根据同样的原则在朝鲜达成协议？这是因为美国不愿意达成协议，但它也不能再打。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人说：“美国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美国的情况是动摇、困难、矛盾，这是它的特点。例如，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似乎有它一份，又似乎没有〔135〕，这样的外交真是世界奇闻！这样，怎能使西方的国家跟着它走？稍有见解的人都不会跟它走。世界上要求和平的呼声是普遍的。美国扩张军备的实力政策，到处不得人心，美国人民也反对。

我们并不要求英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和平则是对英国有利的。要和平就得跟美国闹别扭。西方国家跟美国闹一点别扭，就能提高一点自己的地位。但是，要闹，就得有点力量。英国的经济现在有些恢复，例如取消了配给制，依赖美国的倾向减弱了。法国要象英国一样敢于跟美国闹别扭，还得一个时期。法国是有生产能力的。它要恢复经济，就要找出路，找广大市场。东西方贸易就是出路。中国六亿人口的市场很大，同中国发展贸易很有前途，西方国家都懂得这一点。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美国害怕这两点，和平它怕，死抱住扩充军备和紧张局势不放；贸易它也怕，怕别人跟它竞争。我们可以根据这两条跟一些西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

我们应当重视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搞好接待工作，对推进中英关系、对世界和平都有利，并且能扩大日内瓦会议的成就。我们应当把这件工作看得很重要，从思想上重视起来。我们的方针和态度如何？工党不是执政党，我们不好用政府的名义邀请，因此用外交学会的名义邀请，但工党代表团访华是受英国政府支持的。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当然，不同的地方，双方都不能去掉，不能要求双方改变立场和放弃立场，那是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在哪里呢？第一，双方要和平；第二，双方要做买卖；第三，它要取得

政治资本，在国内多搞选票，就得推进中英关系。如果它用这个条件换取选票，对我们有什么不好？英国对新中国的舆论是比较好的，和美国的不同。在这三点上，我们是可以和它求同的。但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我们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我们这种立场、思想是不必讳言的。但是，也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讽刺、挖苦他们是不必要的。他们可能想混淆，说他们的国有化和我们是相同的，我们不要去混同，但也不要跟他们去争论。要向他们说明，我们不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革命不能输出，各国的社会制度是由本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总之，我们要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凡是属于立场、思想、生活方式不同的问题，不必争论，要互相尊重。属于挑拨性的话，要挡回去。我们要讲求实际，目的是为了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

关于内政问题，有什么说什么，根据实际情况讲。我们不要失掉立场，但也不必讳言我们的缺点。我们说，我们的制度是人民赞成的，但也有少数人不赞成。我们还有先进与落后的不同，小脚、辫子，抽大烟的人还是有的，但是少数。不要把我们说成十全十美。对反动分子，我们尽可能宽大，但也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人，这在任何国家革命时期是免不了的。经济、文化落后的现象，我们

要承认。如工业就比英国落后，文化虽然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但从近代水平来看，我们是落后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水平都很低，从质和量看都是如此。有人说我国的自然科学很落后，社会科学不一定落后，革命胜利了，又有毛泽东著作。不，社会科学的水平还是很低，革命胜利是由于政治觉悟，我们还很少把革命经验提高到科学理论水平上来。文艺也拿不出多少东西。总之，对我们的缺点、错误、毛病不必讳言，但是要有分寸，不要掩盖了主要的成就。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不要把进步说得过分，另一方面，讲缺点要实事求是。这样我们才能取得主动。我们应该抱着知错必改的态度，人家提出好的意见要接受，有缺点知道了就要改，“知过必改”是中国很好的一句古话。

我们大家在国家的大政方针方面是一致的，但容许各人见解有所不同，可以各抒己见，抱着一个诚实的、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属于国家机密的问题，不要去谈。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香港一百多年前是中国的，香港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至于我们是否要收复香港，如何收复，政府还没有考虑过，我们就不要谈。至于有人问，会讲英文的人能不能用英文讲话？在正式场合要讲中文，在个人交际场合能讲外国话的就讲，不必受拘束，有翻译反而不便。

我们应不应该提出解放台湾的问题？我们早就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提更是时候。远东有三个战争：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⁵⁵⁾，还有台湾战争。蒋介石在沿海进行骚扰性的战争，占据海岛十余个，空袭的架次很多，去年东山岛的战事⁽⁶⁸⁾，就是较大的一次，特别是袭击各国的通商船只，最近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这不叫战争叫什么？因此，战争实际上是存在的。只是因为前两个战争打得激烈，这个战争被掩盖住了。既然战争是事实，就应该提出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内政问题，我们现在提出来是否适时？是适时的。我在日内瓦会议的第一次发言中就提到了台湾问题，那时不被人们注意。现在朝鲜战争停了，印度支那战争也停了，剩下的就是美国加紧援助台湾进行骚扰性的战争。如果我们不提出解放台湾，保持不了祖国的完整版图，我们就会犯错误，也对不住自己的祖先。我们能不能收复？这要靠我们努力。等待胜利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是从斗争中取得的。因此，我们要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各方面进行工作，军事上、外交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要做工作。对于国际共管的主张，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美国要把台湾划在它的防线之内，那是更无道理的。在朝鲜，美国尚可动员十几个国家⁽⁶⁹⁾，在印度支那就很困难，在台湾就更孤立。我们主要是对付蒋介石集团，也指责美国的侵略。

在外交政策上，英国不会公开说反美的话，但我们适

当批评美国，他们听了也会高兴。我们和美国的斗争是：我们要和平，它要战争，我们要真正的和平，它叫嚣战争，我们要集体和平，它要搞对立的军事集团。我们主张根据五项原则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9]和美国所搞的侵略集团是完全不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纯粹是防御性的，它是对付世界公认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如果日本的情况变了，这个条约就会修改。在东南亚，艾登主张搞一个洛迦诺公约^[70]，印度主张集体和平，建立和平地区，我们都赞成。但是美国反对，它想搞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71]，目标是针对新中国的。现在已经有几个国家表示不愿意参加这个集团。我们愿意跟任何国家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如果菲律宾、泰国愿意，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订立，我们也可以跟英属马来亚^[72]订立这种条约。对于东南亚侵略条约，我们要彻底揭穿它。美蒋双边条约^[73]，完全是敌视中国人民的，要坚决批判。美国还想搞东北亚侵略条约，杜勒斯^[51]要把李承晚^[6]、蒋介石、吉田茂^[74]搞在一起，日本已经表示不干。对这个侵略条约也要批判。总之，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搞侵略集团的企图，都要揭穿它。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英国不能一面承认新中国，一面又在联合国投蒋介石的票。我们并不要求英国保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但英国应当投我们的票，这是合理和正义的要求。

关于做买卖问题，工党代表团可能要求我们多出口。只要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中英贸易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中日关系的关键 是和平共处*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

诸位先生可能会问,过去日本侵略中国,今天中国强大起来了,不会威胁日本吗?这一点,我可以向诸位保证,我们的确是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有如安倍能成^[75]先生所说的,这不是我们的一般政策,而是基本政策。从中日关系的历史来看,我们两千多年来是和平共处的。你们国家在海上,几千年都是独立的。如果说历史上中国有一个民族侵略过日本,那是元朝的蒙古族上层^[76]。但是,他们打了败仗回来了。六十年来,中日关系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历史不要再重演。我想这能够做到,因为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存在着友谊。同几千年的历史比较,六十年算不了什么。不幸的是,我们在座的人就处在这六十年的时期中。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应该受这种影响。我们不能受外来的挑

* 这是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的谈话节录。

拨，彼此间不应该不和睦。我们要从我们自己中间找到真正“共存共荣”的和平种子。我认为这个种子是有的，让我跟诸位先生说一桩生动的事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以后，日本军队放下了武器。在那一天以前，我们打了十五年的仗，可是，一旦放下武器，日本人就跟中国人友好起来，中国人也把日本人当做朋友，并没有记仇。最大的、最生动的一件事，就发生在东北。当时有许多日军放下武器之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和一部分日本侨民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昨天还在打仗，今天就成了朋友。中国人民相信他们，没有记仇。大多数的日本朋友，工作很好，帮助我们，我们很感谢他们。他们完全是自愿来的，不是我们把他们俘虏了强制他们来的。去年大多数都被送回国了，有两万六千多人。你们不信，可以回去问问他们。曾经打过仗的人，放下武器以后就一起工作，而且互相信任。很多中国人受了伤，请日本医生动手术，病了请日本女护士看护，很信任他们。在工厂中，中国人信任日本工程师，一同把机器转动起来。在科学院，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相信日本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可靠的友谊。方才改进党^[77]的先生说，我们是“同文同种”。所以我们要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所谓“同文同种”也好，“共存

共荣”也好，不是为侵略别人，也不排斥别的国家，我们为的是和平共处。这就是我们友好的种子。

诸位要问，我们工业化了，日本也工业化了，不会有冲突吗？事情是会变化的。假如永远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么关系是不能搞好的。日本朋友如何对待中国，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好，还是希望中国工业化好呢？这里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一条不好的路，是制造战争的路。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不少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中国的市场彼此打仗，我们有这种经验。六十年前的中日战争^[78]，日本打胜了。结果呢？西方来干涉了，他们也要在中国抢地盘。后来爆发了日俄战争^[79]，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划分势力范围，就在中国制造内乱，这就使中国人民越来越穷，市场越来越小。这种事，虽然在一个时候对军国主义和军阀有好处，但对人民是没有好处的，何况中国人民今天站了起来，再也不愿过这种日子，决不会让这种受苦的日子再回来。即使日本有极少数人想要复活军国主义，中国人民也绝不能让它再来侵犯。

另外一条路，是中国工业化。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这就要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让我们自己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市场扩大了，就更需要同外界互通有无，开展贸易，贸易额也就会增加起来。只要中国人民的生活

水平提高了,购买力大了,他们就不能只在国内解决问题,这就需要输入,也需要向国外输出。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你们对我们的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比任何外国都清楚,你们知道我们有什么东西,也知道什么东西你们最需要。今天,中日之间在贸易上虽然有障碍,贸易量很小,但是只要两国关系友好地发展起来,前途一定是广阔的。中国国土大,人口多,需要量大,生产数量也大。随便举个例子,如日本需要我们的煤,我们多开一点矿,每年即可以增产上千万吨的煤,这个数目是很大的。人民的需要也很大,中国六亿人口,每人多用一点东西,数目就很可观。和平共处,就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共存共荣”。文化交流更不要说了。历史上两国的文化往来很频繁,近八十年来,中国学西方文化,许多是通过你们那里最早学来的。中国还活着的老一辈人,现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很多都在日本留过学。在座的郭沫若先生,就是留日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曾经在你们的帝国大学学过医。日本文化给了我们这些好处,我们应该感谢。我出国留学也是最先到日本,住过一年半,可是日本话没学好。但是,我在日本生活,对日本的印象很深,日本有非常优美的文化。历史上,我们的文化彼此交流,互相影响。所以,按照正常的来往,中日的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关键就是要和平共处,谁也不要存别的心思。这就是方才安倍先生提到的问题,即不同的制度、两个阵营是否能和

平共处。我们认为完全有这种可能，只要双方有这种愿望。我们和印度就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在历史上，中国和印度从来是和平相处的，中国还受了印度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佛教，在座的也有佛教代表。中印两个民族互相信赖。印度虽然在经济上比日本落后，在政治上也是独立不久，但是它有信心，觉得两个大国可以和平共处。中国和印度虽然国家体制、社会制度不同，但两国知道彼此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倡导了五项原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我们和缅甸也达成了协议，发表了声明。我们认为，这五项原则不应该只限于处理中印和中缅关系，它也可以适用于全亚洲，甚至全世界各国。我想，我们和日本也同样可以根据这五项原则来彼此承担义务。去年，当郭沫若^{〔80〕}先生还是副总理时，曾和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谈到，如果日本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那么，我们愿意和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郭沫若这话是站在负责的地位上说的，现在他虽然不担任副总理了，可是这句话仍然有效。

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正如山口^{〔81〕}先生所说，不在中国方面。诸位都很清楚，旧金山条约^{〔82〕}不承认中国，而承认台湾，说台湾代表中国。中国人民很伤心。我们承认日本人民的日本，日本人民投吉田^{〔83〕}先生的票，

我们就承认吉田先生代表日本，如果日本人民投铃木〔84〕先生的票，我们也承认铃木先生代表日本。这决定于日本人民的选择，不决定于中国，日本人民投谁的票，谁得的票多，谁组织政府，我们就承认谁。但是，日本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不承认中国人民所选择的政府，中国人民不要蒋介石，日本政府却承认台湾代表中国，中国人民当然感到很伤心。是日本政府不承认我们，对我们采取不友好态度。我也知道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于日本政府，因为日本政府的头上还有个太上皇，就是美国。美国压在日本人的头上，这是很不幸的，阻碍了中日关系的恢复。

当然，诸位还会问，尽管我们这样说，一旦中国强大了，武装起来了，是否会给日本造成威胁？我坦白地说，中国的强大武装是为了自卫，也只能是为了自卫。我们不会侵略别人，我们宪法规定了我们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人民也不允许我们违背这个方针去侵略别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受罪受够了，我们不愿意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我们懂得这个痛苦，我们同情别人的苦难。因此，希望亚洲各国能够和平共处，恢复正常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有好处的。美国如果愿意和平共处，我们也欢迎，我们并不排斥美国，我们愿意同它和平合作，是它不愿意同我们合作。所以，我们可以向诸位保证，我们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尽管现在的主要困难不是来自我们方面，

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尽一切力量,消除这些误会以及可以被美国利用的口实。我们希望诸位回去以后,就象在这里所说的那样,使日本当局也能改变一些自己的看法。

坚决反对制造 “两个中国”的阴谋*

(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

杜维廉说，艾登〔64〕要他来转达一个有关中英一般关系的口信。他说，艾登外交大臣很失望地看到了周总理在对政协的报告中所说的，英国的态度在日内瓦会议〔52〕之后有所改变。艾登要他来向中国政府保证，英国的态度不但在日内瓦会议之前，而且在日内瓦会议之后，都没有改变，英国的目的仍然是缓和远东局势和改善中英关系。中国报纸指责英国政府不守信义，使艾登大为惊奇。五年来，英国政府只承认中国政府，而同蒋介石没有关系。艾登认为，现在不能用战争解决任何问题。英国不是美蒋条约〔85〕的参加者。在英国看来，如果那个条约对过去的情况有任何改变，那就是引致了约制。因此，英国政府

* 这是同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谈话纪要。此后，周恩来又于一月二十八日和二月二十五日两次同杜维廉谈话。这三次谈话，阐明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批评了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表示欢迎。英国政府了解中国的立场，但是不可能期望美国撤除它对蒋介石的保护，因为美国把蒋介石看作是它的同盟者。艾登相信，和平解决和和缓紧张局势的唯一希望，在于每一个人都根据实际情况来为此而努力。英国政府的真诚愿望，就是中英之间有很好的关系，即使中英在远东问题上有很分歧的意见。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同样欢迎和愿意改进中英关系和和缓远东及国际的紧张局势。改进中英关系当然需要双方的努力。两国的制度不同，想法不同，并不妨碍两国和平共处和改进关系。不过，如果在有关两国中一国的问题上存在着对立的看法，那么无论如何是要影响两国关系的。我可以直率地问杜维廉先生，如果中国对香港采取不同的态度，会不会影响中英关系？

杜维廉说，会的。

周恩来说，英国对台湾的态度就是不对的，这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英国不敢得罪美国，却来责备中国，这是不公正的。美国侵占台湾，美国海军在台湾海峡活动，美国帮助蒋介石占据我们的沿海岛屿并对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袭击，又劫夺来我国通商的船只，包括英国的商船在内。但是英国说这一切都是对的。中国去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打退蒋介石的骚扰性和破坏性的袭击。英国却说这一切都是不对的。这是不公正的态度，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如果美国占据北爱尔兰，并

且帮助北爱尔兰进攻英伦三岛，而又说英国无权打退这种进攻，这行不行呢？

杜维廉说，他不能同意周总理对英国态度的形容。英国不是始终支持一方和反对另一方的。英国是了解中国的态度的。英国反对的是加剧紧张局势，支持的是缓和紧张局势。刚才转达艾登的口信，其中心要点就是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期望美国撤除它对蒋介石的保护。英国的态度不是支持一方和敌视另一方，而是真诚地以实际情况为根据。

周恩来说，关于英国的态度是否不敌视任何一方的问题，可以看看事实。过去的事实证明是相反的。举例来说，卡祺亚^[86]先生对宦乡^[87]先生说，不要去论问题的是非，要承认事实。这句话代表英国政府态度中的可疑的地方和不公正的地方。

第一，台湾已经归还中国，是属于中国的。这是铁的事实，怎么可以怀疑？但是，英国政府的代表在议会中却表示怀疑。英国参加签字的开罗宣言^[13]、波茨坦公告^[14]和日本投降条款都承认台湾应该归还中国。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政府的代表陈仪^[88]在台湾接受了日本的投降。因此，台湾已经归还了中国。怎么能说台湾的法律地位还需要研究？杜维廉先生在北京已经很久，一定会了解这对于中国人民的感情有多大的伤害。英国政府简直已经不采取一个朋友的态度了。

第二，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伤害得更厉害的，是英国政府称赞美蒋条约，指责中国解放台湾。英国一方面说，如果中国使用武力去解放台湾，就会引致战争，另一方面，又要中国容忍蒋介石在美国保护下所进行的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比这更坏的，是英国外交次官纳丁在美国公然说，如果中国去解放台湾，英国将同联合国一起行动。甚至连美国舆论都不赞成这句话。这是完全敌视中国的态度。有这么许多事实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却要中国政府不去论问题的是非。中国政府怎么能这样做呢？事实上，是非就在英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之间。这样颠倒是非，是非常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

我在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对政协的报告〔89〕中提到英国，是非常慎重的，并且是站在希望中英关系改善的立场上提的。

除上边所说的以外，还有更令人愤慨的例子。美国强迫扣留了未经表达自己意志的朝中被俘人员，英国政府对此一句话不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我们曾提出这一问题。艾登外交大臣在同我谈话时说，这个问题还要去提吗？甚至在同我个人谈话时，艾登外交大臣都没有说过一句批评美国强迫扣留朝中被俘人员的话。但是，关于判处十三名美国间谍这样一个完全属于中国主权和内政的问题，英国政府的代表却在英国的议会里对中国政府说了很不礼貌的话，用了很坏的字眼。我建议杜维廉

先生去翻阅一下英国议会的记录。这种做法，已经不仅是不论是非，而且是颠倒是非。

几个月来，我们是很容易忍的，虽然同杜维廉先生见了多次，但是从来没有向你表示过我们的不满。杜维廉先生或许已经感到了我们的舆论所表现的情绪，现在我把中国政府的不满正式告诉你。

谈到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那就要问紧张局势是从哪里来的。英国说是从双方来的，甚至说是从中国方面来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紧张局势是从美国方面来的，中国是致力于和缓紧张局势的。朝鲜停战谈判拖延了两年，在快要达成协议的时候，美李⁽⁹⁰⁾又强迫扣留了两万七千多名朝鲜被俘人员。但是，我们仍然赞成停战，为的是和缓紧张局势。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美国也竭力破坏，但是我们仍然赞成停战。艾登外交大臣在伦敦谈到印度支那问题时曾建议缔结亚洲的洛迦诺公约⁽⁷⁰⁾，这是有利于集体和平的。我在新德里时曾对尼赫鲁总理说，我们赞成这个建议。但是等到我第二次到日内瓦以后，艾登外交大臣告诉我，英国已经不再主张缔结亚洲的洛迦诺公约，因为美国反对。日内瓦会议以后，英国同美国一起搞马尼拉条约⁽⁷¹⁾，这是我们反对的。英国不坚持我们已经表示赞成的建议，却跟着美国来制造分裂。现在，马尼拉条约的签字国又要在曼谷开会，加深分裂。这如何能说是为和缓紧张局势而努力呢？

在朝鲜战争⁽⁴⁷⁾和印度支那战争⁽⁵⁵⁾都停止了以后，美国就把力量集中在台湾，指使和帮助蒋介石对我们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从去年六月范佛里特⁽⁹¹⁾到东方来的时候起，美国就同蒋介石筹划签订美蒋条约。签订这个条约的目的就是要霸占台湾和澎湖列岛，第二步就是发动新的战争。这同日本侵占东北时的情形一样，同慕尼黑协定⁽⁹²⁾签订以前德国侵占奥地利的情形也一样。艾登外交大臣和丘吉尔首相当时都是反对“慕尼黑”的，但是现在却要中国承认东方的“慕尼黑”！说穿了，就是有人想在世界上制造“两个中国”，使蒋介石在美国的保护下得以反攻大陆，在大陆上复辟。这不是和缓而是加剧紧张局势。

中国政府一直到现在都在致力于搞好中英关系。两国的制度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同，这并不妨碍两国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但是不要彼此伤害，否则就会妨碍改进关系。如果对两国关系的伤害是由中国政府负责的，那么中国政府是勇于改正的，从不隐讳。例如，在海南岛上空我们误打了一架英国飞机以后，我们就道歉和赔偿。至于英国政府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使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事，我站在愿意中英友好的立场，认为值得英国政府深加思考。

中国政府赞成和缓紧张局势，并为此而努力。凡是英国政府所采取的合乎实际并且有利于和缓紧张局势的

步骤，都会得到我们的赞成。但是不能要求我们承认侵略，让美国肆无忌惮地制造紧张局势，放手准备新的战争。如果艾登外交大臣愿意和缓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劝美国政府把军队从台湾撤走，这才能和缓紧张局势。如果英国说劝美国有困难，美国不会听，那么如何能和缓紧张局势呢？我们不能犯这个历史错误，不能容忍美国的胡闹。美国好战分子蛮不讲理，中国人民是不能容忍的，也不会被吓倒。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艾登外交大臣曾经告诉我说，美国政府中也有人愿意和平的。如果这是确实的，那么同美国政府还可以说理，而英国就恰恰能够起说服的作用。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很清楚的。只要任何国家愿意同我们建立正常关系，愿意同我们和平共处，并且放弃对我们的侵略，我们是会首先伸出手来的，对美国也不例外。

我们欢迎并希望中英关系能按照去年日内瓦会议时候我同艾登外交大臣谈话的精神〔93〕，得到改善。

杜维廉说，感谢周总理所作的充分的叙述，一定如实地转告艾登。他感谢周总理在过去几个月中所采取的约制态度。但是他又建议，以后周总理有何不满之处，直接向他提，而不要通过报纸，他随时听候周总理召见。

周恩来说，我同意以后有意见时找你谈，但是，舆论是全国人民的事，况且中国舆论对英国的批评是由英国引起的，中国从不主动发起对英国的批评。自日内瓦会

议至艾德礼^[63]访华的一段时期中，中国舆论对英国的态度，杜维廉先生应当是知道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后发制人”。这就是中国的态度。

杜维廉说，对于周总理刚才所涉及的几点，他想作一些评论。第一，关于卡祺亚同宦乡的谈话，似乎有一些误解。英国政府并不是要中国政府不论问题的是非，而是建议按实际情况来寻求解决的办法。每一方对于问题的是非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英国的建议却证明了它是不敌视任何一方的。英国所作的积极建议是要求双方约制。这个建议不仅向中国提出，而且也同样向对方提出。

周恩来说，如果一个人打了另外一个人一拳，第三个人出来劝架，他不劝第一个人放下拳头，却要求第二个人不还手。这如何能说是要求双方约制？

杜维廉说，第三个人出来劝架，结果常常是自己挨打。

周恩来说，现在不是第三个人挨打，是第三个人不去劝第一个人住手，反而责骂第二个被打的人。

杜维廉说，周总理刚才提到，艾登曾说过在美国政府中也有人愿意和平。艾登当时曾加上一句：艾森豪威尔^[48]就是这样一个人。英国认为，中国把美蒋条约的目的说成是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那是错误的。英国绝对相信美蒋条约的目的是要起一个约制作用。因此英国政府表示欢迎。

周恩来说，如果一个强盗跑到你的家里，占据楼下的屋子，现在说用一个条约来容许他占据楼下的屋子，只是不让他上楼去。试问：即使他现在不到楼上去，你住在楼上会感到安全吗？

杜维廉说，他的意思只是要说明美蒋条约的约制作用，而这正是英国政府表示欢迎的。

周恩来说，一个外国用武装霸占了我们的领土，这怎么还能说是约制？

杜维廉说，英国真正相信美蒋条约是起约制作用的。至于蒋介石反攻大陆，那连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

周恩来说，暂且不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事。美蒋条约是要使美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侵占合法化。英国赞成，但我们是永远不会同意的。英国承认美国的侵略，这对中英关系是不利的。

杜维廉说，英国不是美蒋条约的参加者，因此不发生“承认”的问题。英国的意思只是要说，不能期望美国撤除它对蒋介石的保护。这是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

周恩来说，承认“慕尼黑”就是承认既成事实。但是，英国现在连慕尼黑的教训都拒绝接受了。

杜维廉说，他不能同意这种历史对比。接着，他转而谈另外两点。第一，关于纳丁所说的话，脱顿已经在下院作过解释^[94]，那就是，英国除了作为联合国一员对台湾所承担的义务以外，没有别的义务；第二，关于台湾

的法律地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只宣布了一个意图要把台湾归还中国，但是还没有一个国际协议来履行这个意图。因此，在法律上说，台湾还不是中国的领土。至于蒋介石接受日本的投降，那只是把日本人从台湾移走而已。但是，现在不是要从法律的观点，而是应该从实际的观点来寻求解决的办法。英国承认中国，不承认蒋介石。曾经有人说，英国外交部发言人用了“中国国民党政政府”的字样。经查询后发现并没有用过这种字样，即使用过这种字样，也是没有什么重要性的。

周恩来说，台湾的地位是毫无问题的，甚至连美国发表的白皮书^[95]和杜鲁门发表的声明^[96]都承认这一点。当时中国政府的代表陈仪既然接受了日本的投降，台湾就已经归还了中国。这是铁的事实。说台湾还没有归还中国，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极大伤害。过去英国政府并没有这样说过，这是最近的一个新论调，是为了替美国开脱，使美国有权侵占台湾。至于纳丁所说的话，那是不简单的。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中国去解放台湾，英国就要同中国打仗。英国舆论已经说明了这个含义。我们可以暂不争论，看看事情的发展。

杜维廉说，他不同意这种解释。纳丁的意思只是说，如果对台湾进行攻击，将会引致更广泛的战火，使联合国都被牵涉在内。

周恩来说，联合国至今对台湾并没有作过任何决定。

纳丁的意思是否要联合国通过决议，使台湾不属于中国，而归美国保护？

杜维廉说，没有这种打算。

周恩来说，既然没有这种打算，那么只要美国不再霸占台湾，中国去解放台湾，如何会引致更广泛的战火，如何会使联合国都牵涉在内？是不是美国无论作什么事，我们都要承认？

杜维廉说，英国只是要求承认事实。

周恩来说，美国懂得英国的弱点，因此，造成了事实以后，就要英国承认，然后英国又要大家承认。

杜维廉改口说，英国要求的不是承认事实，而是考虑事实。然后他又重复说，美蒋条约是有约制作用的，而另一方面又不能期望美国撤除它对蒋介石的保护。他又说，即使考虑了这个事实以后，仍然可以努力来缓和紧张局势。英国不感到悲观失望，而认为只有考虑了事实才能找到出路。

周恩来说，如果考虑事实的话，那么只有美国撤走武装力量才能和缓紧张局势。如果艾登外交大臣愿意和缓紧张局势，那么努力的方向就应该是劝美国撤走武装力量。不能因为美国造成了事实，就要大家容忍。如果英国劝美国撤走武装力量，美国不听，那么英国当然不能负责。不过，如果英国说美国是对的，中国是不对的，这就伤害了中英的关系。

杜维廉说，对英国来说，并不发生在道义上作判断的问题。艾登嘱他转告的口信，只是说明了改善情况的唯一途径。

周恩来说，英国政府代表在议会所说的话和纳丁所说的话显然是对中国的责备。

杜维廉说，他不能同意。他说，今天他所转告的口信才代表英国政府的意见。关于马尼拉条约，那是防御性的，正如中国同苏联之间的防御安排一样。

周恩来说，关于艾登外交大臣的口信，我们已经给予答复，请照我们所说的转告艾登外交大臣。马尼拉条约同我们建议缔结的亚洲洛迦诺公约不同，它是制造分裂的，因此许多亚洲国家表示反对。亚洲以外的国家用马尼拉条约来帮助某些亚洲国家造成集团，而许多亚洲国家没有参加，这是不能同中苏条约作同样解释的。亚洲以外的国家到人家的地区去，提供人家并没有要求的保护，在人家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这如何能解释成为是防御性的呢？美国正在越南南部破坏印度支那的协议。美国对保大⁽⁵⁾政府的援助和训练保大的军队，都是破坏印度支那协议的。

杜维廉说，周总理所谈的越南情况，他不熟悉。至于周总理今天所提出来的不满之处，他将转告艾登。

反对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

(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

昨天晚上接到哈马舍尔德^[97]先生的电报,其中说要请大使把三日的口信^[98]转告我。感谢大使这样做。虽然哈马舍尔德先生的意见是在我们已经发出了给联合国的复电^[99]以后才看到的,但是仍愿意回答哈马舍尔德先生几句,并请大使转告。

国际上一切为和缓并消除远东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的真正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总是给予支持的。现在的问题是,新西兰的提案^[100]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而是要达到一个相反的目的,那就是把中国和被中国人民唾弃和推翻了的蒋介石集团放在对等的地位,放在两造的地位来谈判停火。这就是要联合国来干涉中国的内政。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而且坚决反对的。这个主题就是不能接受的。这样的活动包含一个阴谋,那就是把属于中国内政的事情,把任何外国或联合

* 这是同瑞典驻华大使雨果·维斯特朗的谈话节录。

国都无权干涉的中国内政的事情，放在国际舞台上。这是要造成“两个中国”，要割裂中国的领土。这一点已经在英国、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地方公开讨论。想来哈马舍尔德先生也已经听到了。这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101〕的。哈马舍尔德先生在北京同我会谈的时候〔102〕曾经说他要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那么，我们就要提请哈马舍尔德先生注意：怎么能够把违背联合国宪章的事强加在中国政府身上？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参加关于新西兰提案的讨论，而且联合国也无权过问。同时，在安理会里有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这就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无法出席参加讨论。因此，我们不能应联合国的邀请，派代表参加这个议程的讨论。这是理所当然的。

至于要和缓并消除远东的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必须找出紧张局势的根源。根源就在美国。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是美国侵占了台湾，侵入了台湾海峡，是美国用强大的海空军来威胁中国大陆，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和战争挑衅。如果世界各国要和缓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就应该去劝美国。在这一点上，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谈判的。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张局势的问题的。如果美国有丝毫通过外交谈判来和缓并消除紧张局势的愿望，它就应该接受直接谈判的建议，放弃它的战

争威胁和战争挑衅的做法。如果哈马舍尔德先生愿意推动远东紧张局势的和缓，他在这方面可以劝劝他的美国朋友，要他们表示一下，他们的意愿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

如果美国政府以为可以用战争威胁来吓倒中国人民，来使中国承认“两个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侵入台湾海峡的行动为合法，那是梦想。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如果美国要进行战争挑衅，那么，就请它试试吧，它是有权利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可以预言，如果美国硬要把战争打到中国头上，我们是一定要抵抗到底的，我们决不屈服。

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四日)

敬爱的代办同志、同志们、朋友们：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9]签订已经五年了，今天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庆祝这个五周年纪念。我愿借此机会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您、代办同志，并通过您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祝贺和感谢。

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固定下来的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在过去五年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基于两国共同繁荣的愿望，给予了中国人民全面的、系统的、巨大的援助。这种援助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在短短的五年里不仅完成了经济恢复的工作，而且很快地进入了有计划的建设阶段，迅速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推动了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的顺利前进。中国人民

* 这是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宴会上的讲话，刊载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深切地感到中苏友谊的无上珍贵。

五年来的事实证明，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同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中苏两国一贯奉行的和平政策，得到了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由于中苏两国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努力，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战争停止了，远东的紧张局势有了一定的和缓。但是美国侵略集团却积极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准备原子战争，到处组织侵略集团和建立军事基地，来威胁和包围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特别是最近以来在台湾地区对中国人民加紧进行侵略和战争挑衅。这一切严重地威胁着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使一度缓和的国际局势又趋紧张。美国侵略集团的侵略行为和战争叫嚣，引起了中国、苏联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正义谴责和坚决反对。

我们要正告美国侵略集团：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同伟大的苏联人民结成了巩固的同盟的中国人民，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坚强地团结在一起的中国人民，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的中国人民，有决心也有力量来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和胜利成果。如果美国侵略集团敢于向我们发动侵略进攻，中国人民有决心使它失败到底。我们也要正告美国侵略集团的追随者和姑息者：过去的历史证明，侵略战争的结果不仅使侵略者自己招致了覆灭，而且也没有为侵略的追随者和姑息者带来任

何好的结果。争取和平、和缓国际紧张局势是中国的坚定不移的外交政策。但是，割裂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干涉任何一个国家的内政和侵犯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只能助长侵略和导致战争，是不能带来和平的。为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利益，中苏两国人民将继续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坚决反对侵略战争，支持一切真正加强和平和发展各国友好关系的努力。

请允许我建议，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繁荣，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永恒的友谊干杯！

在亚非会议全体 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

主要发言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

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103]已经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能同与会的各国代表团一起在这个会议上讨论我们亚非国家的共同问题，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会晤，首先要感谢缅甸、锡兰^[104]、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家的倡议和努力，我们还应当感谢这次会议的主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为会议作了很好的安排。

亚非两洲有这么多的国家在一起举行会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我们亚非两洲的土地上生活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民。亚非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

* 这两个发言分别刊载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代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代以来，亚非两洲的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我们的呼声受到抑制，我们的愿望受到摧残，我们的命运被旁人摆布，因此我们不得不起而反对殖民主义。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灾难和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使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容易互相了解，并在长期以来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关怀。

现在亚非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着殖民主义的束缚。殖民国家已经不能用过去那样的方式来进行掠夺和压迫。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已经不是昨天的亚洲和非洲。亚非两洲的许多国家，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把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会议反映了这一深刻的历史变化。

虽然如此，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不少亚非人民还在过着殖民地的奴隶生活，不少亚非人民还在受着种族歧视，他们的人权遭受着摧残。

我们亚非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过程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争取和巩固各自的自由和独立的意志是一致的。不管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何不同，我们大多数国家都需要克服殖民主义统治所造成的落后状

态，我们都应该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按照我们各国人民的意志，使我们各自的国家获得独立的发展。

亚非人民曾经长期遭受侵略和战争的苦难。许多亚非地区的人民曾经被殖民主义者强迫充当进行侵略战争的炮灰。亚非人民不能不痛恨侵略战争。他们知道，新的战争威胁不仅危害到他们国家的独立发展，而且还要加强殖民主义的奴役。因此，我们亚非人民更加深切地感觉到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可贵。

基于这些情况，保障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而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就不能不是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接着朝鲜停战〔47〕之后，日内瓦会议〔52〕曾经在尊重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得到科伦坡五国会议〔59〕的支持，达成了印度支那的停战〔105〕。当时，国际的紧张局势确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给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跟着而来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却和人民的希望相反。无论在东方和西方，战争危机都在增加。朝鲜人民和德国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受到阻挠。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106〕有被破坏的危险。美国在台湾地区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亚非以外国家在亚非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越来越多。他们公开鼓吹原子武器是常规武器，准备原子战争。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落在亚洲的土地上〔107〕，第

一个死在氢弹试验下的是亚洲人〔108〕。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不能不关切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

但是进行侵略、准备战争的人究竟是极少数。世界上不论是生活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中的绝大多数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对战争。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运动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发展。他们要求终止扩军备战的竞赛，首先各大国应该就裁减军备达成协议。他们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他们要求将原子能用于和平用途，为人类创造幸福。他们的呼声已经不能被忽视，侵略和战争的政策已经日益不得人心。战争策划者日益频繁地诉之于战争威胁，作为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但是，战争威胁是吓不倒任何具有抵抗决心的人的，它只能使威胁者自己陷于更加孤立和更加混乱的地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同世界上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决心维护和平，和平是有可能维护得住的。

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当然，我们要求政治独立并不是要对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采取排斥的政策。但是，西方国家控制我们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亚非国家的命运应该由亚非各国人民自己掌握。我们要努力实现各国的经济独立，这也并不是要排斥同亚非地区

以外的国家的经济合作。但是，我们要求改变西方殖民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剥削状态，我们要求发展亚非各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

在中国，自从人民作了自己国家的主人以后，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要消除长期的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五年以来，我们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且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些努力，我们在各个主要生产部门，例如钢铁、棉布、粮食的生产量，都已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但是，这些成就比之于我们的实际需要还微小得很，比之于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我们还落后得很。正象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

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更加珍视自己的民族权利。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受到侵犯。所有附属国人民都应该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而不应遭受迫害和屠杀。各族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都应该享有基本人权，而不应该受到任何虐待和歧视。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对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争取独立的附属国人民的暴力镇

压还没有停止；在南非联邦和其他地区进行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的迫害还没有制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还没有解决。

现在,应该说,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基本人权,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是觉醒了的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要求。埃及人民为收复苏伊士运河地区的主权和伊朗人民为收复石油主权而进行的斗争,印度对果阿和印度尼西亚对西伊里安恢复领土权利的要求,获得了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同情。同样,中国解放自己领土台湾的要求也获得了亚非地区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民的支持。这证明我们亚非各国人民是互相了解、互相同情和互相关切的。

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如果各国保证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就是在有关各方保证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对其内政不予任何干涉的基础上达成的。据此,日内瓦会议并规定,印度支那各国不参加军事同盟和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这就是为什么日内瓦会议能够为建立和平地

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却看到了一种相反的情况在发展，这是不利于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利益的，也是不利于和平的。我们认为，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应该严格地和忠实地予以履行，任何方面不得加以干涉和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也应该按照同样的原则予以解决。

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有助于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条件。我们相互之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应该以促进各国独立经济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我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抹煞任何一国的特长和优点，以便互相学习和观摩。

在我们亚非地区的各国人民日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今天，即使我们在目前经济和文化的合作规模还不可能很大，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合作是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我们深信，随着我们亚非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各国间贸易关系中人为的外来的障碍的消除，我们亚非各国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将会日益增进，文化交流也将日益频繁。

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处境大致相同的亚非国家首先应该友好合作，实现和平共处。过去殖民统治在亚非国家间所造成的不和和隔阂，不应该继续存在。我们应该互相尊重，消除互相间可能存在的疑虑和恐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同意南亚五国总理在茂物会议〔109〕联合公报中所确定的关于亚非会议的目的。我们并认为，为了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亚非各国应该首先根据共同的利益，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印度、缅甸和中国曾经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7〕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本着这些原则，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于两国侨民国籍问题的初步谈判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在日内瓦会议时，中国也曾表示愿意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印度支那各国发展友好的关系。根据这五项原则，中国同泰国、菲律宾等邻国的关系没有理由不能获得改善。中国愿以严格遵守这些原则作为它同亚非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并愿促进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正常化。为了增进我们亚非各国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我们建议亚非各国的政府、国会和民间团

体实行互相的友好访问。

主席，各位先生，任意摆布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决心维护世界和平，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拖入战争；如果我们决心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就没有人能够继续奴役我们；如果我们决心友好合作，就没有人能够分裂我们。

我们亚非国家所需要的是和平和独立，我们并无意于使亚非国家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对立，我们同样需要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

我们的会晤是难得的。尽管我们中间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所具有的共同愿望。我们的会议应该对于我们的共同愿望有所表示，使它成为亚非历史值得珍贵的一页。同时，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建立起来的接触应该继续保持，以便我们对于世界和平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阁下说得对，我们亚非人民必须团结起来。

让我们预祝会议成功。

补充发言

主席、各位代表：

我的主要发言现在印发给大家了。在听到了许多代

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之后，我愿补充说几句话。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去年，科伦坡五国总理会议，还有亚非其他国家，都曾经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

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现在，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前一类国家并不多。但是某些人所不喜欢的，就是六万万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治制度，而不再为帝国主义所统治了。后一类国家很多，象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亚非许多国家都是。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国家，中国也在内，不论在经济上或文化上都很落后。我

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次之，我要谈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

第三，我要谈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一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是数也数不尽的，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

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共四千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象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比如在缅甸边境就存在着蒋介石集团的残余武装分子，对中缅两国进行破坏。因为中缅友好，我们一直尊重缅甸的主权，信任缅甸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

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 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主席、各位代表：

昨天和今天我听到了许多代表发表的意见。我也读过了八个代表团所提出的议案。我现在愿意综合大家的共同意见，提出中国代表团的议案。

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拥护和平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在这里开会，一致呼吁和平，就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这种表示，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我们在这次会议中讨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问题，就应该根据这样的立场。我们彼此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参加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我们应该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

例如，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黎巴嫩的代表把对这一点的讨论引到对思想意识的讨论上去，那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我们应该能够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来谋求和平合作。

现在我们既然说要合作，那么二十九个国家就应该在亚非地区和平合作，就应该团结在一起，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这种和平不是反对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来参加，同我们一道，而只是说从亚非国家做起，来推动和平，反对战争。

拿中国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们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同盟，增加战争的危险。北大西洋公约⁽¹¹⁰⁾、马尼拉条约⁽⁷¹⁾和其他类似的条约，都是我们所不赞成的。如果世界象这样发展下去，就会迫使我们找一些国家来缔结一个对立的军事同盟。这将是不利于保卫和平和反对战争的。我们基本上是反对对立性的军事集团的，但是今天我们共聚一堂，讨论集体和平问题，可以把军事集团的问题撇开不谈，因为那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应该在我们中间先团结起来。

前天中午我曾去拜访巴基斯坦总理。他对我说，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并不是为了反对中国，巴基斯坦

也不相信中国有侵略的意图。这样，我们就取得了互相的谅解。巴基斯坦总理还保证说，如果美国在马尼拉条约下采取侵略行动，或者美国发动世界大战，巴基斯坦将不参加，正如在朝鲜战争⁽⁴⁷⁾中巴基斯坦和印度并未参加一样。我很感谢巴基斯坦总理所作的解释，因为那使我们彼此得到了谅解，使我们知道这个条约并不妨碍我们为集体和平而进行合作和达成协议。我想巴基斯坦总理不会反对我的这个意见。

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要替巴基斯坦总理作点解释。正如罗慕洛⁽¹¹¹⁾将军刚才所说的一样，巴基斯坦总理也对我说，马尼拉条约是防御性的。我不相信这点。刚才提到的美国在马尼拉条约下采取侵略行动或发动世界大战等等，是因为我先向他提出了这个假设性的问题，他才作了上述的回答。

至于所谓共产党的扩张和颠覆活动，在座的某些代表很客气，只讲苏联，而没有提到中国。但是中国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因此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些代表讲话的含义中也包括中国。对此问题就必需要有回答。

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遵守，不进行扩张，也不去颠覆别的国家。如果不确定一些共同的原则，我们如何能够彼此约束？中国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以后，就同印度和缅甸的总理共同提出并承认五项原则⁽⁶⁷⁾，彼此受此约束。这就消除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的

怀疑。从此，赞成五项原则的国家就一天天多起来。在座的许多代表的国家都表示了同意。尼赫鲁总理曾对我说，英国的艾登首相也表示同意五项原则，这使我很高兴。如果艾登首相愿意同中国总理发表关于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我将首先签名，支持五项原则并保证执行。当然，在座的所有国家的代表不会都同意五项原则的措词和数目。我们认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

还有一些代表提到了国际组织，例如伊拉克的代表提到了共产党情报局〔112〕。但是这不属于亚非地区的问题。如果要求人家解散国际组织，那么世界上还有许多国际组织。例如，我们不满意梵蒂冈对中国教民的控制，我们也不满意美国中央情报局，事实上中国正深受其害。但是，我们不在这个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因为即使这些问题同亚非地区有关，我们也不会讨论出一致意见来的。同时，这些是我们的议程以外的问题，也不应该提出来讨论。

现在我提出中国代表团的议案，并加以解释。

这一个议案的题目叫和平宣言，这是采用了日本代表团的建议。我们认为日本代表团的建议很好，采用和平宣言一词可以表示我们的团结。

这个议案的内容就是亚非会议宣布我们亚非国家决

心促进相互的和共同的利益，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和平相处”是引自联合国宪章的词汇，因此不会引起误会，可以取得大家的同意。至于在什么基础上来达到这些目的呢？我们采取了各代表团的提案中大家都能同意的东西，列成七条，而不是五条。我们希望这是大家都能同意的。

中国方面愿意保证实行这七点基础。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许多人感到中国要威胁别人，因此我们愿意在这里提出我们的保证，我们也希望别人作同样的保证。

第一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是遵守这一原则的。中国同缅甸的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始终尊重缅甸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中国没有，也不应该有领土的要求。中国同十二个国家接壤，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划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我们如果一次谈不好，就再谈，但不能超越现状。

第二点是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中国也是遵守这一原则的。我们的邻邦泰国和菲律宾对中国存在着恐

惧。对我们不了解的人，我们是容许他怀疑的。在这次同泰国和菲律宾的代表接触中，我向他们保证，中国决不向他们的国家进行任何侵略和威胁。我并告诉旺亲王〔113〕，在中泰两国建交以前，泰国也可以派代表团到中国的云南省来看看，特别是到傣族自治州去，看看中国有无向外侵略的意图。我也曾告诉吴努总理，我愿意同他一起到两国的边境去走一趟，可惜这次没有机会，下次再找机会。菲律宾同中国一海之隔，没有共同的边界。我们也欢迎在中菲两国建交之前由菲律宾派一个代表团来访问中国，特别是到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去看看中国有无威胁菲律宾的活动。

第三点是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这是印度支那的国家所担心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52〕时，我们曾向柬埔寨、老挝作过保证，并把这一点保证告诉过艾登外相和莫洛托夫外长，后来又告诉了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这次，我们又向柬埔寨、老挝两国的代表团继续提出保证，并再一次表示希望它们两国成为象印度、缅甸那样的和平国家。中国决不会有干涉这两个邻邦的打算，而且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我提出柬埔寨和老挝，不过是举例而已。

第四点是承认种族的平等。这一点无需解释。我们对于任何种族都是平等看待的。新中国没有种族歧视。

第五点是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

我们在人民中就经常提出警惕大国主义思想的问题。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到会的二十九国代表中如果有任何人觉得中国代表团对任何一国的代表不尊重，请指出来，我们愿意接受意见并加以改正。

第六点是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中国人民选择了新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不愿意受人家的干涉。中国愿意尊重别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例如美国人民选择了现在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我们是尊重的。我们也向日本代表团谈过，我们尊重日本人民，日本人民选择了吉田⁽⁷⁴⁾政府，我们就承认它代表日本人民，日本人民现在选择了鸠山⁽¹¹⁴⁾政府，我们就承认它代表日本人民。

第七点是互不损害。我们应该互相关心彼此的利益，不能仅是一方如此。我们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贸易，不能要求特权和条件。中国保证在同到会的国家和其他的国家互相来往和进行和平合作和经济、文化交流时，不要求特权和特殊条件，而是平等对待。

如果我们能在这七点基础上，彼此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就能使和平维持下去，而且首先是从我们中间开始。

此外我们在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

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这是能得到大家同意的。在这方面，我们要对印度支那协议〔106〕的达成感谢科伦坡五国〔59〕的推动和许多国家的支持。同样的，朝鲜停战也得到许多在座各位所代表的国家，特别是印度的促进和支持，而使战场上的敌对现象有可能逐步消除。

至于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是不愿意同美国作战的，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如果大家愿意推动中美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那就会大大有利于和缓远东的紧张局势，大大有利于推迟和阻止世界大战。

关于裁减军备的问题，中国同意许多代表团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对于这些问题所最后通过的决议应该放在和平宣言之内，使宣言成为一个完整的宣言。

我们希望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这个文件能够为我们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所接受，因为它是从各代表团的提案中抽出可以达成协议的东西拟成的，不伤害任何方面的立场。

主席、各位代表，我本来没有准备多讲，只是想首先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但是由于大家都注意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以不能不明确地说明一下我们的立场，这是有利于我们共同保障和平的。

请原谅我占用这么多的时间，谢谢。

中国愿就台湾地区问题 同美国进行谈判*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 参加亚非会议的缅甸、锡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的代表团团长在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举行会议,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这是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就台湾地区局势问题发表的声明,刊载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关于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侨胞感到困难的一个问题。但是侨胞们应该懂得,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已经逐步强大起来的中国,我们在国际关系上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过去侨胞所在的国家,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印度,都还不是独立的国家,都遭受着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那时这个问题还可以马马虎虎。现在,我们彼此都是独立的国家,而且是友好的、平等相处的国家,我们怎么能够不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在我们国内,有几百万外国侨民,他们也是双重国籍,我们政府好不好办事呢?凡事都要推己及人。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如果遇到这个情形,也不愿意,那么,我们在国外怎么能要求人家接受双重国籍呢?今天中国政府执行和平的、平等的外交政策,所以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解

* 这是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对华侨的讲话节录,原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决好这个问题,对双方都有利,也会提高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信誉。而且还要看到,过去中国弱,那时虽然也存在着双重国籍,但没有人拿这个问题来制造国际间的纠纷。现在中国强起来了,有的国家就会从中挑拨,说你们这样的人,有一千多万华侨呆在海外,是不是想搞颠覆活动?当然你们诸位可以证明,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代表政府也可以说明,我们绝不会干这种事情。可是,双重国籍问题如果不解决,人家还会感到有些不放心。

所以,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同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不论从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上,还是从消除误会、解除怀疑、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上,都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大道理,要跟侨胞们讲清楚。这就是我们缔结关于解决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根据。当然,这个条约实行的时候,还要做深入的宣传和解释,希望我们侨胞的领袖们好好地研究和推动这个事情。

在选择国籍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本人的意愿。但是,具有双重国籍的人总是只能选一个国籍,要么选印度尼西亚国籍,要么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这样,侨胞可能会发生一些波动和不安。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需要侨胞的领袖们去解释。特别是对年老的或者是在外地的,在农村的或者在工厂的,他们消息知道得晚,更需要侨胞领袖们到各地去宣传,在报纸上做解释。对于不识字的人,还需要别人读给他听,解释给他听。我们

认为,快一点解释,快一点选择,有好处。

侨胞如果根据自己本身的利益,选择了印度尼西亚国籍,中国大使馆、领事馆将无保留地予以支持,不会有一点为难。有些侨胞可能会担心,选择了印度尼西亚国籍,华侨就看不起他了,说他忘掉祖国了。不,不应该采取那样的态度。我们应该采取赞助和友好的态度。选择了别的国籍,朋友仍然是朋友,兄弟仍然是兄弟。我们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亲戚的国家嘛!哥哥是印度尼西亚国籍,弟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可以嘛,有什么不可以呀?有些人说,这样一家子分成了两个国籍,也不能来玩了。玩还是可以来玩,当朋友来玩。华侨总会,绍兴会馆,厦门、福建会馆,你可以作为印度尼西亚朋友,作为亲戚来玩。作朋友走亲戚照样可以,就是要把界限分清楚。这样,便于他工作。我今天跟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说,在印度尼西亚做部长的,做议员的,当然是印度尼西亚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承认他还是双重国籍。都做了人家政府的部长,都当选了国会议员,还是双重国籍,道理就讲不过去。如果还承认双重国籍,那就是不尊重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政府和人民。今天的新中国不能这样,要讲道理。

我们尊重人家,划清界限,是为了便于工作。因为他作为一个印度尼西亚公民,就要根据印度尼西亚的宪法办事。双重国籍到底根据哪一个宪法办事呢?把界限划

清楚，就便于他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便于他的一切。我告诉我们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对已经选择或将要选择印度尼西亚国籍的人，我们照样友好，尊重他们。只是一条，他到大使馆、领事馆来，我们以朋友相待，亲戚相待。

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属于中国的侨民。他们要尊重所在国的法律，不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保持一个华侨的地位。这样，便于我们华侨同所在国人民友好相处。

总之，我们先友好地伸出手去，人家一定也会对我们友好的。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投桃报李。就是说礼尚往来。我们对人家友好，一定也会得到友好的回答。所以这个问题虽然困难，但我们把它说透了就会很好地解决的。

我坦率地说，如果华侨有很多人选择了印度尼西亚国籍，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领事馆不会说一个“不”字或者跟他们为难，不会的。可是反过来我们也要说明，我们不能向我们侨胞说，我们不要他们了，绝对不能说出这个话来。选择国籍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印度尼西亚国籍，或者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条约上都许可。所以，愿意选择印度尼西亚国籍的，我们赞助他；愿意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我们欢迎他。

我们侨胞本身有许多事情，常常要找大使馆、领事馆，我们应该尽力帮助诸位解决困难。有的愿意回国参

观，有的愿意回国学习，凡是我们能够做的，我们都要做。但是，新中国的建设刚刚开始，要赶上世界工业发达的国家，大约还需要半个世纪。我们人口多，困难也不少，建设的任务是艰巨的。国家的财力，现在首先用于建设重工业，这是为长远建设打基础。建国以后，学校虽然增加了很多，但一时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有些事情要办得慢一点。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忍受和克服艰难困苦。我们遭受了帝国主义一百多年的压迫，奋斗了一百多年，特别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我们搞建设也要有这个耐心。所以，诸位侨胞对祖国的要求，一下子还不能完全满足，要逐步地实现。将来国内的条件好了，你们的子女回祖国去念书，还是有机会的，还可以学现代化的最新的科学，连原子能都可以学习嘛。

最后，希望诸位在海外要注意团结。不仅要团结侨胞，还要跟所在国家的人民团结在一起，跟他们友好相处。要尊重他们。要得到人家尊重，首先要尊重人家。我们丝毫不要骄傲。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要善于学习。要提倡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如果发生了一些困难和纠纷，我们应该首先批评自己，这样就会更加团结，就会得到所在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

多做和平友好工作*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周恩来总理 (以下简称周): 戈登夫人是否住了一个月了?

欧仁妮·戈登夫人 (以下简称戈): 因为世界和平大会延期,才得多住一些日子。

周: 看的方地方不多吧? 希望以后能再来中国。

戈: 愿意以后再来,但象我这样年纪无法假定,来中国后反觉得自己年轻了。

邓颖超^[115] (以下简称邓): 来一次年轻一次,希望你下次再来,更年轻些。

戈: 一定高兴再来。这次来本以为时间短不能看太多的东西,但是由于妇联的朋友们的热情,旅行组织得很好,看了很多东西。

周: 她们给你看了坏的没有?

戈: 没有。

* 这是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法兰西妇女联盟主席欧仁妮·戈登夫人等的谈话节录。

周：这样她们就隐瞒了一番。我们还有很多落后的东西，看了进步的再看落后的，才能全面，才能看出由落后到进步的过程。中国大，人多，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改变落后的状况。

巴朗蒂尼夫人^[116]：我们看到坏的了，但我们不觉得坏，因为我们相信明后天就会变好的。

周：也不一定。现在从发展水平说，同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比，我们的机械化水平距现代化还很远，不仅要十几年，要半个世纪才能赶上先进的国家。

戈：我这次来上了一堂很好的课，看到中国人民很勇敢，不等待条件齐全就进行建设，你们工地上机器很少，用人担土担水。你们还盖了许多大学。

周：中国人民是勇敢的、勤劳的。法国已经工业化，我们比起法国来是落后的。法国人民也是热情、勇敢的。

戈：你们克服了落后的因素，但法国还没有。

周：是的，因此你们的斗争更艰苦，中国人民是同情你们和支持你们的。

戈：中法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不仅法国的知识界，全体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都是同情的。

周：法国在西方是个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就象中国在东方一样。你们一方面工业很发达，这是有利条件，但在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困难，尤其是在今天的国际局势下。中国与法国比，在文化上、经济上是落后的。

戈：法国是有困难的，很多很多。

周：因此你们的斗争是艰苦的，但法国人民是勇敢的、热情的、智慧的，一定能战胜困难。

戈：我们也这样相信。我们现在还只有点滴的胜利，我们要争取世界母亲大会〔117〕在巴黎召开。

周：一切的泉源都是由点滴汇集而成。三十五年前我和蔡畅〔118〕同志到过法国，我们对法国人民有感情。章蕴〔119〕同志最近也去过法国，在法国交了许多朋友。

戈：和平组织和妇女组织要在法国开会，常会遇到困难，因为法国政府看到我们请了这么多好朋友感到不安。

周：不一定。世界母亲大会在法国召开，各国朋友到法国去，不但与法国人民做朋友，如果法国政府主张和平，对法国政府的和平主张也是支持的。

邓：昨天有消息说，七月七日在巴黎召开世界母亲大会。

戈：我到北京就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

周：开好这次大会，法国妇女的责任很重。母亲们的责任不仅是抚养孩子们成长，还要教育他们发挥大革命〔120〕的革命传统。

戈：我们把希望放在年轻的一代，近几年人口的增长比过去快。两次世界大战死人很多，很多优秀人物牺牲了，损失是很大的，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

周：法国在两次大战中损失很大，死人很多，所以法国人民更懂得和平的可贵，就象中国要建设，需要和平环境一样。

戈：总理先生，你对和平事业贡献很大，在日内瓦的努力，使和平事业一天天壮大。

周：我个人做得少，主要是中国人民的力量。

戈：怎样使人民能发挥力量，是你的工作。

周：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是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做的。

戈：现在中国、亚洲比任何时候都使人感到有力量。日内瓦会议^[52]是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开始。

周：在日内瓦，我们代表团接待了许多法国人民代表团，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法国人民在全世界都有朋友，从这一点看来，法国人民的斗争不是孤立的。

戈：我们几个人中的亚历山大夫人^[121]是法国西部省份的，她那里也派了代表团到日内瓦。为结束越南战争^[122]，法国人民做了很大努力，全国人民都叫它是肮脏的战争。

周：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满足了法国人民的要求，孟戴斯—弗朗斯^[123]在这件事上还是做得好的。

戈：就在那个时候好，到美国以后态度就大变了。

周：做一件好事也好。人民要推动自己的政府多做好事。维尔德美夫人^[124]是否认识赫里欧先生？他是里

昂市长，在议会里是主张正义的，我们常听到他的声音。

维尔德美夫人（以下简称维）：他年纪大了，不可能有很多时间为和平服务了，这是遗憾。

周：他是里昂市长，中国代表团到里昂参加博览会就是他邀请的，如看到他，请代我向他致谢。

维：我一定把你的口信带到。

戈：回去要庆祝他得到国际和平奖金。

周：他是个和平战士，也是法国的爱国者。

戈：我们很难过，失去了法奇^{〔125〕}，他来过中国，非常热爱中国。他说在中国的旅行给他留下了一生中最好的回忆，他是个坚强的和平战士。

周：失掉他是很难过的。法国人民有自尊心和自信心，一定会出现更多的和平战士和爱国者。希特勒侵略法国，法国人民没有屈服，进行了抵抗，包括了各方面的人物。八十多年中，德国人侵略法国三次^{〔126〕}，法国人民都没有屈服。不屈服的民族，敌人是压不倒的。中国有经验，我们一百多年受压迫，但我们没有屈服，终于站起来了。我们不象法国受敌人欺侮、压迫仅几年的工夫，而是一百年。凡是敢于抵抗敌人的民族都会胜利的。法国过去强大过，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更强大。

戈：我们也是这样希望的。法国妇女也和中国妇女一样，大家组织起来了。国际妇联^{〔127〕}成立起来了，我很荣幸担任主席，在这个大家庭中，在各国，我有许多女儿。

周：国际妇女组织如果把全世界大多数妇女组织起来，就不得了，男人就要听你们的话了，就打不起仗了。

戈：母亲们是可以做许多工作的。

周：妇女和儿童组织起来，就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少数的男人就打不起仗了。

戈：我们召开世界母亲大会要象亚非会议^[103]一样发扬求同存异的精神。

周：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比如妇女要和平，就是共同的。

戈：大家的许多要求是相同的，行动也是互相配合的。

周：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而去找共同点。相信这次母亲大会能开得更好，有您这位有才、有德、有经验的主席领导，一定能成功。

戈：全世界各地的妇女都在努力，国际妇联会有更大的发展，尤其我到了中国的几个城市同各地妇联负责人座谈了工作，参加了群众集会，使我体会到精神都是一致的。法国、意大利、德国的妇女都是以同样的精神在工作。

周：法国人民要多做德国人民的工作，法、德人民应该争取在一起保卫和平，这工作是很重要的。

维：我不同意。

周：为什么？

维：没有办法和德国人团结。

周：但是还是要争取团结。我来谈谈我们的经验吧。近百年来最欺侮、压迫我们的是邻国日本。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31]后，割去台湾，后来又搞了个“满洲国”，以后又侵占中国很大的一部分，中国人死的不是以万计，而是以百万计，人民对日本非常愤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人民被迫反抗。解放战争中有许多日本人在我们军队中从事技术工作，还有医生、护士等，受伤的战士请他们医治，我们很信任他们。日本工程师在工厂帮我们搞生产，帮我们科技人员搞试验，我们也都相信他们。七八年的工夫，由欺侮我们的人变成我们的朋友了。前年和去年经红十字会遣送回国的日侨有两万八千多人，许多人在报上写文章，开会演讲，宣传中国人民对他们友好。去年李德全^[128]访日，日本人民对她热烈欢迎，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气氛。不但人民要来往，人民还要影响政府，改变政府的态度，两国才能友好。

维：对他们都可以信任吗？

周：这些日本人大部分都可以信任，主要是要改变日本人欺侮我们的态度和中国人对日本人愤慨的态度，这样两国才能友好。我有两点意见：第一点，同意维尔德美夫人的看法，不是所有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第二点，如果政府态度不改变，那是危险的。人民的态度可以影响政府，政府不得不考虑人民的意见，因为它要争取选票。第

二次大战后的新情况是人民力量强大，世界性的工、青、妇组织都成立起来了，这是大战前所没有的。

戈：几年来德国人民的力量在发展着。

周：工作是艰苦的，会遇到很多困难，法国人民是勇敢的，你们两位老母亲⁽¹²⁹⁾为年轻人做了好榜样，将来后代会感谢你们的。

维：要改变他们，必须教育他们，但现在没有教育他们，反而把他们武装起来了。

周：武装他们，我们是反对的，我们要多做工作，即使武装起来，也要增加他们的困难。今天不会象希特勒统治的时候，现在即使发动战争，他们国内也会有人起来反对的。

戈：我举个例子。今年一月国际民主妇联日内瓦理事会邀请法国社会党一个议员的女儿参加，她的哥哥被德国人流放而死了，后来母女生活困难，一直对德国人很仇恨。开理事会时，她说：我的位子不要排在德国妇女旁边，我不会和她们打招呼的。但通过会议她的思想有了转变，表示过去一些年月白过了，希望我们今后吸收她参加保卫和平的斗争。

周：例子很动人。少想些个人悲痛，多想些对大家有益的事。死的人不会再活了，我们的努力是希望以后少死人。

戈：法国和德国的妇女交往很多，法国妇女开会，总

是请德国妇女参加，德国妇女也请法国妇女去，这样对彼此有好处。有一次开会，请了德国妇女参加，一个德国妇女一点也不知道德国人在法国制造了仇恨，她说，让我们把过去忘记吧。在座的好些法国妇女都表示不同意。她回去后，想了很久，写信来道谢，因为这次会议使她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她表示今后要努力争取和平。

周：法国妇女争取团结德国妇女并不是示弱，而是强大的表现，因为全世界人民都支持法国人民保卫和平的工作。如果德国再侵略法国，全世界都会起来反对它。

戈：我们很难过，我们曾为反对批准巴黎协定^{〔130〕}作了很多斗争，结果这个协定还是被批准了，这也许是新的斗争的开始。

周：如果批准前，我们斗争的任务在于阻止它批准，那么，批准后斗争就要采取新的方式，斗争是各种各样的。请戈登夫人将我们对法国人民的友谊、尊敬和热爱，转达给法国人民。

我将来如能到法国去，希望再见到你们。

戈：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把你对我们珍贵的鼓励告诉法国人民。

高举五面旗帜， 推进世界和平运动*

(一九五五年六月七日)

这次我们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阵容很大，到赫尔辛基要打开局面。过去我们有些缩手缩脚，这次要象万隆会议⁽¹⁰³⁾那样展开活动。参加国际会议，就是要积极展开活动。

今天我们要高举和平、民族独立、爱国主义、民主自由和宗教自由五面旗帜。美国现在的做法越走越窄，完全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在和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应该团结得越广泛越好。争取持久和平是我们的努力方向，这对于我们祖国的建设，对于各国人民的进步和繁荣，都是有利的。我们要在和平竞赛中前进，当然也要防止另一方面放松警惕的偏向。从今天整个局势来看，实现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很大，和平力量的影响日益广泛，好战集团是很被动的。正因为如此，和平运动要更加推广，

* 这是同出席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谈话节录。

扩大影响，使人民有所比较，看到和平力量是占优势的。改善生活是人类最基本的要求，也只有和平的环境中，在社会的前进中，才能做到改善生活，因此我们反对侵略战争。假如真正发生战争，最后失败的一定是战争的发动者。过去两次世界大战，失败的都是战争的发动者，这是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我跟尼赫鲁^[28]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131]总理都谈过这一点，他们也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强调和平，我们的真正目的是要争取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而美国怕持久和平。在这点上我们就占优势。和平、进步的力量是占上风的，我们对和平有信心。不管是政府间的会议，还是民间的会议，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大家要带着胜利的信心去开会，有信心就能打开局面。我们的信心不是从主观出发，而是建立在实际的基础上的。

从最近的国际局势来看，只要推广和平运动，局势就能开展。例如对奥和约^[132]的签订，就是和平圈子的扩大。亚非会议^[103]上我们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美国就害怕。苏奥会谈^[133]，苏南会谈^[134]，帝国主义很害怕。美国要造成对苏联和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包围圈，但现在从东到西到处是缺口。我们就是要争取打开更多的缺口。今天世界斗争最关键的问题是扩大和平地区。去年日内瓦会议^[52]后，中印两国总理发表的声明中就提出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一年来的发展，和平中立地区扩大

不少，而且还在扩大中，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战争集团很害怕，因为和平中立地区扩大了，就把它的包围圈隔断了。这样发展下去，就可以使战争延缓，甚至发动不起来。美国好战集团的政策是想把苏联和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以外的国家都拉入战争集团，造成包围圈。但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国家将首先遭殃。唯其如此，这些国家就可能考虑采取中立政策，以免遭殃。所以，好战集团的企图是不容易实现的。

从去年到今年，和平地区有扩大，但是还不够，主要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够。我们要善于抓紧每一个机会去开展工作，在每一次会议上都要使局面向前推进。

为此，我们在国际上要举起一切正义的旗帜，不要迟疑，这样才能展开活动。

（一）高举和平的旗帜。如果有人问我们要战争还是要和平，我们的回答是，要和平，坚决反对战争，反对搞对立的军事集团。美国搞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10〕}就是对立的军事集团，它不要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参加。美国在东方搞的马尼拉条约^{〔71〕}也是对立的军事条约，不要中国参加，只要东南亚国家参加。再如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美国对其中第十三条关于集体保证就有保留^{〔135〕}，其他国家都赞成，只有美国采取保留态度。这不就证明美国在搞战争集团，害怕建立集体安全吗？以上这些事实最能雄辩地回答是谁要战争这个问题。

我们是要和平的。和平是集体的事情，不应该排斥任何人。我们不排斥美国，相反是美国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的讲话影响很大。我们的国家热爱和平，男女老少都讲和平，到处是和平的旗帜，来华访问过的各国人士都可以证明。尼赫鲁、吴努〔136〕、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以及埃及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宁都亲眼见到过。今天“反对战争，坚持和平”的旗帜高举在我们手中，我们不是空喊口号，而是有具体事实证明的。苏联把宣传战争作为犯法行为，而美国却处处宣传战争。

（二）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在国际上，我们主张民族应该独立，应该有自决权。真正的民族主义者都有独立的要求。当然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在和平运动中并不反对民族主义者。现在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另一类是印度、缅甸等民族主义国家，是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发展起来的。尼赫鲁、吴努等自己也承认是民族主义者，我们是尊重他们的。但是，这些国家由于过去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还没有完全独立，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为争取完全独立而斗争的任务。就是我们中国，也可以说还没有完全独立。比如在经济上就不能算完全独立，我们正在为工业化而奋斗。只是政治上独立了，不再受外人干涉。其实政治上也还有人时时要来干涉，我们正在为反对这种干涉而

斗争。在讨论万隆会议宣言时，没有人反对其中关于亚非国家都在为争取完全独立而奋斗的提法。因此，我们要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同时，我们也尊重民族主义者的运动。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是好的，但也尊重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属于资本主义体系，我们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尊重它们，决不过问它们的内政。

亚非会议的召开证明了民族独立的趋势是势不可当的。长期没有独立的国家怎么会甘心永远不独立呢？

(三) 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世界上不仅是我们要发扬爱国主义，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要爱国。现在美国就是到处破坏其他国家的主权。各个国家的制度是由人民选择的，制度有所不同，但人民都要爱国。美国干涉别国内政，就要坚决反对。我们提倡爱国主义，每个人都有爱护自己国家的权利，反对别国干涉内政。爱国就是反对人家干涉内政。我和法国许多爱国人士谈过，如戈登夫人^[137]，法共蒙洛梭，以及前戴高乐派的贝蒂将军，他们都谈到美国生活方式侵入法国。访问法国回来的人也谈过，说法国现在受美国影响很大。今天的巴黎、东京受了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民族的文化受到摧残。我们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虽然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还有很大距离，但我们赞成爱国。和平运动要团结一切爱国人士。任何人来中国我们都欢迎。在亚非会议上我们主动邀请

了泰国、菲律宾等国代表来我国访问。有人说我们搞颠覆活动，我们不必怕讨论这个问题。所谓颠覆，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有组织的破坏活动，这种事情不是我们做的，恰恰是美国做的，我们就是要反对这种对其他国家施加的压力和干涉。至于思想上的来往，是不可避免、无法割断的。我们大家要敢于谈这个问题，要彻底揭露美国搞的干涉和颠覆活动。

(四)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即使是旧民主在旧世界也是好的，旧民主初期还有一点民主，如国会选举等。民主自由是要争取的。好战的国家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如美国的麦卡锡主义^[138]就是连这点旧民主也不给。当然，旧民主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只有少数人能享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才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民民主是最大限度的民主自由，最大多数人享有民主自由，只有极少数人没有民主自由。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有一些民主总比完全没有好。

(五)高举宗教自由的旗帜。我们承认宗教自由。信教的和不信教的要互相尊重，才能有和平。不然，如以前的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打起来血流成河，有什么好处？阿拉伯国家至今还受很大影响。帝国主义正想利用这个。宗教界各教派间也要互相尊重。宗教自由也就是各教派和平共处。当然，谁要是妨碍别人，那就不行。

以上这五面旗帜，我们都要高高举起来。

希望法国采取 同中国完全建交的方式*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

西方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存在着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北欧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它们承认新中国，割断了同蒋介石的外交关系，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支持新中国，特别是在联合国支持恢复新中国的地位、反对蒋介石的代表。这是一种完全的外交关系。瑞典、丹麦、挪威都派大使或公使驻中国，中国也派大使或公使驻对方。

第二种是英国、荷兰同中国的关系。它们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在联合国又支持蒋介石，不承认新中国的地位。这不是完全承认新中国。我们同它们就只有半外交关系，只有代办驻对方首都。这种半外交关系对处理某些事情不是十分方便的。去年我对艾登首相(当时是外交大臣)也说过。他说，他们承认

* 这是同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耶率领的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节录。

了中国。我说，不错，你们承认新中国，但在联合国又承认另一个“中国”，而我们只承认一个英国，所以我们不能互换大使。艾登也承认这种情况不好。现在世界上有人有这么一种想法，好象中国可以容许“两个中国”的存在，就象德国、朝鲜和越南那样。中国人民决不能接受这种情况。两个德国、两个朝鲜和两个越南是战争造成的，它们也要求统一。中国本来是统一的，中国内战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蒋介石被中国人民所抛弃。革命成功，新的代替旧的，不能有“两个中国”。法国大革命后，路易十六被推翻，新的代替旧的，法国人民不能容许有两个法国。所以我们要向你们说明，中国人民不能容许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实现。我们同英国朋友也说过好多次。

第三种是法国、比利时同中国的关系。它们只承认蒋介石。不但在联合国如此，而且蒋介石在巴黎、布鲁塞尔都驻有“使节”。因此，中法、中比关系只能在人民中先发展起来。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正常的，法、比政府承认蒋介石，而人民同新中国来往。但时机成熟了，法、比政府也会承认新中国的。我们只承认一个法国，法国人民选择哪一个政府我们就承认哪一个政府。无论是拉尼埃——皮杜尔政府⁽¹³⁹⁾、孟戴斯——弗朗斯⁽¹²³⁾政府、埃德加——富尔⁽¹⁴⁰⁾政府、也许将来是其他人的政府，只要是法国人民选择的，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承认。现在法国政府却承认

蒋介石，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

为了将来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中国承认一个法国，法国也应当承认一个中国。现在做准备工作，将来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不能既承认这个，又承认那个，搞得很尴尬。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法国走北欧国家的道路，同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这对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世界和平都是有好处的。如果法国政府、法国议会有困难，现在可多进行人民之间的来往，多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造成气氛，然后水到渠成，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割断关系。中国方面是可以等待的。

在过渡时期两国人民友好一定会加强，这在法国议会里有所反映，法国就可以采取北欧国家的办法而不经经过第二种形式。经过第二种形式没有好处。这就是说，两国人民要多来往，特别是政治活动家要多来往，法国议会派代表团来中国，我们希望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能派代表团到法国去。此外，可以增加文化、科学方面的来往，贸易方面可增进民间的贸易来往，甚至可以签订半官方的贸易协定。来往频繁起来就好。世界在变化，这种变化有利于我们和平相处。大家努力，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就不会太晚。说穿了，美国是阻挡不住的。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法国会走在美国前面，而且会走在英国前面。

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日)

从社会制度来说，我们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中间道路的。但讲到国际关系，就不能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好，非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不好。如果两种制度的国家再搞成铁板两块，互不来往，互相攻击，那就不是和平共处了，就会推动战争了。那样就会使国际局势紧张，而不是和缓。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这是一回事，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阵营一切都好，非社会主义阵营一切都不好。从社会制度来说，两种制度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世界的前途，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是说，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国家就没有可学的地方。因此，在国际关系上，还要有另一条，那就是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

* 这是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因为有这第二条，我们就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这样，我们的制度就会更优越，我们就能在和平竞赛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应该承认，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有短处才比出长处来，有缺点才比出优点来，有好的才有坏的，有白的才有黑的。任何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有不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应该有批判地学习，不是盲目地学习。有批判地学习，就是要学人家的长处和优点；不盲目地学习，就是不要把人家的短处和缺点也学来。应该说，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因为它首先是学人家好的东西，不会把自己好的东西丢掉，也不会盲目地学人家坏的东西。敢于提出这个口号，证明是最有自信心的，是自尊的、能自强的。

苏联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首先要向苏联学习。这一点是肯定的，不容许动摇的。我们并不因为这次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就说苏联也有错误，就不学了，那是不对的。我们只要读过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41〕}的文章，就会懂得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就会辩证地历史地看问题。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不犯错误，是不能设想的，犹如说革命可以不犯错误一帆风顺地成功，是不能设想的一样。

但是我们首先应该承认，苏联还是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了，把法西斯打败了，这些都是最大的胜利。而这些胜利，是在斯大林领导的时期取得的，斯大林是领导者，他也有份。所以我们肯定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同时也承认斯大林的确犯了严重错误。所以我们说他又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的错误，我们应该很认真地研究，避免重犯。所以，肯定地说，首先还是要向苏联学习，凡是我們不懂不会的，都要去学。但要有一条：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二十年来，我们所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或者说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性地运用它，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际中有发展。因为情况变了，环境变了，它就会有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共同的，基本的就是那么几条，具体化了就会有发展。这样认识才不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我们不仅要向苏联学习，向兄弟国家学习，而且要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学习，包括向和平中立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家学习。就是日本、英国和美国，它们也有长处，我们也可以学。除了它们的国家制度我们不学以外，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

法，我们是可以学的。过去，我们在学习中的确有过一些迷信。好象只能学社会主义国家的，不能学其他国家的。比如拿学李森科〔142〕作例子，就可以证明。听说国内外对李森科的学说是有所争论的。我们不能因为李森科的学说产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就认为一定不会有错。前天，我对科学院的同志说过，可以先把科学和政治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二者结合起来。这是怎么讲呢？比如李森科的学说，应该先从科学领域内研究一下，看哪一些是对的，哪一些是不对的；再把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学说研究一下，看哪些是对的，不应该否定的，哪些是不对的，应该否定的；然后再拿中国的科学家比如胡先骕〔143〕批评李森科的文章看一看，到底批评得对不对，或者是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这样就把科学和政治分开了。然后再把科学和政治结合起来，不使科学和政治脱节。在科学问题上，共产党应该服从真理。共产党不服从真理，那就不是共产党。如果共产党不服从真理，共产党会被推翻的。要有这个勇气和信心，对于凡是不合真理的，我们就承认是错误，这就解决问题了。如果李森科不对，批评他的人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要把我们共产党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贯彻到底。你的道理站不住，你就要修正它。一定要懂得我们是常常会犯错误的，我们的长处就是能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敢于承认错误，随

时修正错误，不断地改进。

在学习中，我们还要防止自卑，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行，那也不应该。我们虽然落后，但也有可以自信的地方。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但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是可以创造出智慧的。劳动产生智慧嘛，我们还是可以赶上去的。当然也不要有一点成就就骄傲。我们是一个大国，由于我们的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可能发展得更快一些，可以少走苏联的一些弯路，这就可能产生新的骄傲自满。如果现在我们还没骄傲，到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有几千万吨钢了，骄傲的危险就会来了。我们要时常看得远一些。骄傲自满总是危险的。而且我们国家这么大，容易有大国主义的倾向。我们在有的国家工作的同志，就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大国主义的倾向。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不会发生错误，事实上是发生过的。现在，国际活动增加了，人来人往很多，各部门就需要经常地检查这个问题。

支持和平中立政策， 争取和缓国际局势*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

当前，整个国际局势肯定是有利于和缓的。尽管美国政府中一部分人要阻止和缓，要继续“冷战”，但是要挽回总的趋势是困难的。基本的因素是，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越来越拥护和平，反对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愿意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首先在亚非地区是如此，甚至在欧洲、澳洲和美洲，这种趋势也在增长。这就证明，尼赫鲁总理所提倡的并且在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66〕中提出的扩大和平地区，已经肯定地占了优势。不参加军事同盟、坚持和平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7〕的国家所形成的和平地区，已经扩大，这就使战争难以打起来。我们对于尼赫鲁总理的这一政策一向是支持的，在万隆会议〔103〕上我们提到过，在我们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中也表

* 这是同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的谈话节录。

示过支持。

扩大和平地区的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就是坚持和平政策，坚持民族独立的政策，不参加敌对性的军事集团，反对在自己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主张国际经济合作，但是不容许要求特权和附加政治条件，主张各国平等友好地相处。实际上，这就是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以发展了。现在，许多亚非国家已经这样做，在欧洲也出现了执行这种政策的国家。这种趋势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增长，也影响了美洲国家。这种趋势使西方国家不得不考虑他们的立场。艾森豪威尔^[48]已经对中立主义作了解释，并且表示不那么反对。但是，美国国务院却因此惊慌起来，又出来作解释。这也说明了美国内部有矛盾。艾登首相也表示了同冷战政策不同的意见，而丘吉尔^[65]更早就发表了赞成共处的言论。正是因为如此，尼赫鲁总理估计军事同盟的作用会逐渐减弱，是合乎实际的。如果战争打不起来或者推迟，军事因素将会降低作用，这不仅对北大西洋公约^[110]来说是如此，对马尼拉条约^[71]和巴格达条约^[144]也是如此。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印度倡导的并且得到许多国家赞成的扩大和平地区的政策，对于阻止战争，起了极大的作用。对此，我们有足够的估价，同时，我们也热烈地支持。

西方国家处在一个矛盾的境地。它们看到，整个趋势是不可当的，因此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种趋势，另一方

而又怕这种趋势发展太快。正如苏加诺^[145]总统在美国和加拿大所说的，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运动已经高涨。对于这种趋势，西方国家想加以控制，这就发生了矛盾。它们想使和平地区不能扩大，或者使民族独立的政策受到限制，它们主张经济合作要有条件，军事同盟必须维持，它们要把殖民主义的各种表现保存下来，或者变换花样保存下来。

我们的态度，尼赫鲁总理是很清楚的。我们赞成印度的政策，我们不排除任何国家，甚至同美国都可以合作，同英国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赞成扩大和平地区。我们高兴地看到印度和其他国家走上了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的道路。正如苏加诺总统所说的，这些由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得到发展，对世界是有利的。如果西方国家看得清楚的话，它们会知道，死抱住老的东西不放，是不能维持多久的。尼赫鲁总理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建议^[146]，就是合理的。

摆在世界面前的事实很清楚。我们同主张扩大和平地区政策的国家，意见几乎完全相同。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147]，就是证明。美国不好表示反对，但是很恐惧。我们是不排斥美国的，我们照原则办事。我们曾经对西哈努克^[148]亲王说过，即使是美国的帮助，你们也可以接受。除了我们帮助以外，如果美国也能无条件地帮助，那么对于柬埔寨发展独立的国民经济，是有好

处的。但是，美国害怕这样做。如果使不发达的国家都发达起来，不仅对这些国家本身，而且对于世界，都是有利的。这是西方国家保持利润的可靠办法。进行军火投机是不可靠的。当然，这会影影响垄断资本榨取高额的利润。但是，榨取高额的利润只能使别人贫穷，结果自己也会垮下来。

总结一句，我们不排除同美国合作，我们只反对美国现行的侵略和冷战政策。但是，美国却至今在各方面排斥中国。

至于英国和同英国一个类型的法国、意大利、西德等国，它们希望维持既得利益。它们倾向于使形势和缓，倾向于东西方来往。但是，它们又担心既得利益不能维持。从一个角度来说，问题也的确是如此。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一定会挤掉这些国家的一些既得利益。但是，民族独立运动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发动的，而是民族觉醒的结果。英、法等国如果不同民族独立国家达成妥协，那就只好求助于美国，以便对民族独立国家施加压力。结果，把美国的力量引进来，美国就取代了英、法的地位。在南越⁽¹⁴⁹⁾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老挝和柬埔寨，虽然民族独立的要求比在南越强烈一些，但是，法国却还能够维持一部分利益。尼赫鲁总理向法国提出的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建议，也可以使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维持一些正当的利益。否则，把美国引进来以后，法国反而会被挤

垮。从这种情况出发，西欧国家应该认识到，它们必须善于同民族独立国家取得妥协，它们必须善于同东方国家取得妥协。这样，它们的情况才会好些。如果西欧国家善于同民族独立国家取得妥协，并且承认它们的独立，那么民族独立国家也不会对西欧国家怀有敌意。印度就是一个例子，印尼也可以成为一个例子。但是，如果西欧国家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施加压力，那么，这反而会增加民族独立国家对西欧国家的厌恶。

中日两国人民要多多来往， 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战后中日两国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已经站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日本处在一个和从前不同的地位，不再是侵略别人的国家，而是反过来受别人压迫。这就引起我们很大的同情。因为我们过去经受过许多困难，更能理解日本人民今天所面临的困难。这样，就使我们两国人民愿意站在同情的地位互相接近、互相友好。我们不但恢复了有二千年历史的友谊，并且在新的基础上增进了友谊，这种新的基础就是两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平等互利、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

过去说要“共存共荣”，我想现在我们才走到一个真正能够实现“共存共荣”的新阶段。我们两国在历史上是友好的，中间只在很短的一段时间有过不愉快的情况，现在应该把这一段忘掉，发展我们长期友好的关系。这次

* 这是同日本国营铁道工会等访华代表团的谈话节录。

中国政府主动地处理在押的日本战争罪犯⁽¹⁵⁰⁾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中国关押的一千多名日本战争罪犯，我们处理的办法是：对其中绝大多数由于罪行比较不是那么严重，而且在关押期间又有不同程度悔罪表现的，不予起诉，送回日本。这次是第一批，大概再有两批即可送完。另外一部分属罪行严重的共有四十五人，我们也从轻判刑，并且决定，如果他们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对年老、患病或身体不好的还可以考虑假释。为什么说是从轻处理呢？因为我们对这些战犯没有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刑期最长的只有二十年。大家知道，战犯在东京、纽伦堡的法庭上都有判死刑的。但是，我们考虑现在不需要这样做，可以从轻处理。而且我们还考虑可以邀请战犯的家属来中国访问，看看自己的亲人。诸位晓得，四十多人对一千多人来说，比例是很小的。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一小部分战犯判刑呢？这是因为对中国人民要有一个交代。

我向诸位谈了这些情况，希望诸位回到日本后向日本国民解释，因为他们很快就要看到一千多犯人回去，这四十多个判刑的犯人将来也是要回到日本的。中国政府也要向本国人民解释。我们结束这一案件，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结束了，再开始中日间全面的友好合作。

谈到友好合作，不能不考虑到目前我们两国的外交关系尚未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需要两国政府的

努力，但也需要两国人民的推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随时都伸出友谊之手，随时都愿意和日本政府商谈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问题。日本人民也具有同样的愿望，诸位便代表着日本人民的愿望，我们很感谢诸位的努力。日本政府在中日建交问题上有困难，困难不仅在内部，而且更大的困难是由于外来的干涉和压力。我们理解日本政府的困难，也愿意等待日本政府逐步克服这些困难。同时，我想我们大家为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而努力，也就是帮助日本政府克服外力所加的困难。

一个愿意反映民意的政府，一定会懂得如何运用人民的要求来抵抗外来的压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不隐讳我和重光外相先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说中日两国人民来往太多了不好，我看越多越好，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不同看法。

最近，我读到重光葵先生的声明，他对我国释放日本战争罪犯一事表示高兴，并且表示愿意尽量扩大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对这个声明，我也同样感到高兴。我认为，这说明日本政府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某种程度的积极态度。我们是愿意和日本政府进行接触的。我曾经说过，我们的北京机场随时准备迎接鸠山首相、重光外相的飞机降落。在我们两国政府能够进行直接接触之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是很有利于两国政府关系的改善的。所以日本朋友来得越多，我们的飞机场、火车站、

码头为你们开放得越多，那就越能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我们两国人民团体的来往，已经创造了新的纪录，这就是两国人民团体彼此达成了许多协议，并且由两国人民团体来执行。中日两国人民团体之间签订的协议，连同今天签字的铁路协议〔151〕在内，一共有十五个，涉及议会、渔业、侨民、文化、科学、贸易、工会等等方面。这些协议大部分都实现了，而且行之有效，对两国人民都有利。中日两国人民在两国政府尚未来往和签订协议的时候，直接办起外交来，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双方都有利。我作为外交部长也很感谢诸位，我可以少做些事，诸位多做些事，为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到那个时候，只剩下中国总理、外长和鸠山首相、重光外相喝香槟酒了。所以我带着这样的心情和希望，欢迎诸位到中国来访问。

争取外援,但不依赖*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

我们要争取苏联的帮助,但要去掉依赖思想。如果苏联有困难,或在某些方面还留一手,那就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主要是自力更生,但不放弃争取外援。过去我们党内一些同志有完全依靠苏联的想法,在党外朋友中这种思想也发展了。我们要靠自己,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当然很好,没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我们也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样说,并不是不尊重苏联,不团结苏联。苏联的帮助是重要的,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人民,这和尊重、团结苏联是两回事。有时我们的一些同志把苏联的帮助说成是决定的条件,这是不对的。

关于苏联的帮助,我同意陈云^{〔152〕}同志的意见,苏联基本上是帮助我们的。但是,有时帮助的方法有毛病,他们也有主观主义。批判斯大林不能不对苏联的领导群发生影响。苏联有些同志可能已有自觉,有些同志可能还

* 这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关于苏联援助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谈判情况的报告时的发言。

没有自觉，我们旁观者清。我们向苏联提出五十五个援助项目的要求是带有试探性的。苏联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需要各国党的支持，结果没有很好地考虑就答应了，现在一算又搞不了，不给也不好说，只好提出推迟时间。这次去苏联谈判，他们正开经济协作会议，苏联领导着眼于自己方面，东欧国家可以搞的，苏联就想少搞一些。这也影响到我们，苏联也让我们少搞一点机械等等。因此，现在答应下来的一百零九项也还会有变动。苏联同志不了解，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搞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成的。斯大林过去倒讲过这样的话。他对毛主席说，你们各种工业部门都要搞起来，要担负起保卫东方的责任。苏联帮助我们，从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互利的。赫鲁晓夫两年前来中国就说，苏联帮助中国不是无私的，就是为了自己。赫鲁晓夫虽然有时粗鲁，但这些话说得很好，很直爽。我们应该把苏联的主观、客观条件都分析一下。

我们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苏联现在也有困难，过去有些不该答应的答应了，有些项目推迟了，有时还有在某些方面留一手的情况，但总的来说，还是帮助我们的。我们也要考虑苏联的困难。他们有缺点，那是要改的，我们也可以把问题提出来。我们同意苏联来信的原则，但我们可以作一些调整。苏联来信中说，向中国提供最先进的独一无二的设备，那我们就要最先进的独一无二的。苏

联答应给我们的，还有些不是最先进的独一无二的，我们提出来，他就得考虑，但也要准备他不给。不给，也不要泄气，我们自己搞。

倡导在国际上建立和平共处 互相监督的制度*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 万隆会议⁽¹⁰³⁾以后, 世界局势变化很大, 中巴两国关系也有了很大进步。你对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 看法如何?

苏拉瓦底总理(以下简称苏): 亚洲的还是全世界的?

周: 亚洲和全世界的。

苏: 你出席万隆会议, 毫无疑问对会议的成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阁下参加万隆会议以前, 许多人不清楚中国的立场和目的, 不知道中国是要并吞世界其他国家, 还是要同别的国家友好合作。无疑地, 中国在重新统一和变得强大以后, 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之一。巴基斯坦是一个小国, 如果中国要并吞巴基斯坦的话, 那是可以办得到的。过去, 鞑靼、蒙古的侵略都是从这个方向来的。你出席万隆会议受到很大的欢迎。你的合作态度

* 这是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的会谈节录。

改变了会议的整个气氛。我这样说并不是恭维你，我不喜欢恭维人，我有自己的看法。如果不是由于看到你在那次会议上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也不会敢于到中国来。你使我们感觉到，中国真诚地和迫切地要同别的国家友好相处，并且共同求得发展。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不要再有恐惧和从这方面或那方面来的危险。如能避免这些，就会有和平的感觉，否则就会有侵略的危险。我对侵略所下的定义是：非法的、不合理的夺取。如果经常有侵略的危险，人们脑子里的恐惧就不会消失。

周：万隆会议取得成就，是所有与会各国努力的结果，这个成就不是一个国家的成就。在那次会议上，大家表现了团结和谅解，并且表示要为共同目标奋斗。中国人民的愿望是这样，政府的政策是这样，我作为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代表和发言人，表达了这一愿望。总的说，万隆会议也表达了亚非亿万人民的愿望，因此它的影响才能扩大和发展下去。中国的解放、胜利和发展，有一方面的理由可能引起周围的和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的恐惧。这我们是理解的。中国是大国，人口多，如果在一个相当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发展成为强国，人们很容易会联想起过去的某些国家在强大以后向外扩张的例子。也有人会回想起东方的历史，某些民族曾经向外扩张过，中国封建帝国向外扩张过。联想到这些就会有恐惧，特别是中国的邻国。两年前，我们同印度和缅甸的总理接触的时候，就

感觉到这一点。在万隆会议中接触到更多国家的领导人，我也感觉到这一点。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而且是主要的一方面，那就是时代不同了，中国的情况不同了。应该向有恐惧的外国朋友们解释的，首先是中国自己落后了一个世纪。不论是由于什么理由，中国过去被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过，没有得到发展。现在我们胜利了，摆脱了殖民主义，要求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发展。我们能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建立了依靠人民的制度，这就是人民民主的制度。我们主要地依靠自己，来求得政治的完全独立和经济的独立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工业化。我们曾受过殖民主义的祸害，我们也看到了殖民主义的失败，我们怎能走殖民主义的老路去侵略人家呢？这是不许可的。这是我们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所不许可的。我们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这足以让我们得到发展。我们认为，只有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才能得到发展；只有站在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不容许自己重蹈殖民主义的覆辙，才不致失败。这一点已经成为我们规定在宪法里的基本政策。现在时代也不同了。殖民主义的一切表现（这是万隆会议决议的用词）都是要失败的。正如阁下昨天所说的，西方殖民主义终归导致了自己的失败。如果殖民主义有一种新的表现，象你所说的非法夺取，那也必然会失败。我们的时代不允许殖民主义发展，殖民主义必然要死亡。

我们虽然这样说，外国朋友或许会想是不是真是这样？因此必须要有接触。我们欢迎同邻国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接触，并且同各国人民接触。通过接触就可以看到实际情况。凡是来我国的外国朋友，都看到中国人民在进行和平建设，愿意同各国友好相处。我们在万隆会议上邀请了所有与会国的代表来中国访问，尽管有些国家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我们所邀请的包括泰国的旺亲王⁽¹¹³⁾、菲律宾的罗慕洛⁽¹¹¹⁾将军和土耳其的外交部长。我们邀请他们到中国来看看，特别是到他们有兴趣甚至有怀疑的地方去看看。譬如，泰国的朋友可以到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去看看。菲律宾的朋友可以到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带去看看。将来同西藏的航线通了以后，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和阿富汗的朋友可以到西藏去看看，还可以到新疆去看看。到一切愿意去的地方以后，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从事和平建设，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也可以看到，中国国内各民族是平等的，中国人民享有民主和自由。一个在从事和平建设、愿意同世界各国友好、国内各民族平等、人民享受民主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殖民主义和侵略思想的，因为被制度和政策限制住了。朋友们也许会想，这只是现在，你们现在还不强，强大以后你们的制度是否能够保险？中国人民懂得，不仅要有目前的制度，而且这制度还要不断改进，这样就不可能发生那种危险。我们不但有了国内的

制度,而且主张在国际上建立一种制度,那就是各国和平共处,互相监督,国际间一切争端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用武力。我们在国际上主张和平友好的政策,各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7〕或者以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147〕来相互约束。这就是一种国际保证,使得国家不分大小都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发展而不附带任何条件。我们要把殖民主义只为自己发展而把别人搞穷的原则埋葬掉。这种政策是不排斥任何国家的,包括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内,大家平等相处。

国际上有两种约束,一种是法律上的约束。除了联合国宪章以外,国与国之间还可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者扩大成为集体和平公约,例如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可以签订一个集体和平公约。这种公约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军事集团,而是为了集体和平;不排斥别人,也不反对任何国家。各国以五项原则或十项原则为基础,互相保证长期和平共处,用条约形式把这种保证固定下来。另外,还有道义上的约束,各国通过彼此来往,可以发表声明,签订协议,发表演说,强调反对侵略和反对殖民主义。这样做不仅可以形成国际的道义上的约束,而且可以作为对国内人民进行教育的内容。我们不仅要保证这一代不发生战争和侵略,还要影响下一代,使得以后世世代代都遵守我们现在主张的原则。这样,人们就可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下去。我们这一代是发生重要变化的

一代，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好了，会对后代起重大的作用。我们常常对外国朋友说，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公开表示，不容许自己的后代走殖民主义的道路，中国强大了以后，也要同各国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如果我们的后代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外国朋友可以指责他们做了他们的前人所不愿做的事。

苏：那就太晚了。

周：你不了解我们的精神，我们是要用各种方法，用法律上的和道义上的方法来保证。

苏：我不这样看。

周：在这点上我们之间存在着思想意识的不同。

苏：不，我们都要和平。

周：那么为什么你怀疑我们的下一代不能保证呢？

苏：按照我的看法，那是由于人性。这是哲学。

周：在国际关系中，有法律上的约束，也有道义上的约束。人不能离群而生活，国家也不能没有朋友。互相尊重的问题已经包括在五项原则和十项原则里，因此我没有重复提到这个问题，既然你提到了，我想解释几句。五项原则的第一条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互相尊重，是完全对的，完全需要的。互相尊重首先必须不侵犯人家主权，不侵占人家领土，不干涉人家内政，不对别人进行侵略。彼此相处要平等对待，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不应该要求特权。在进行

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时候要互利，而不是只有利于一方。互相尊重不能解释为一方可以为所欲为，要人家尊重，因为这样就妨碍了另一方。

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 十一国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

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幕了。

从我们上次的全体会议到现在的一年多时间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更加巩固、更加扩大了。我们这次会议也反映了这个事实。全国委员会原有六百六十四位委员,病故十一位,新增补的委员有七十六位。出席这次会议的委员,除了请假的一百零八位以外,共计六百二十一人,比历次的会议都要多。

在我们这次会议开幕以前,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曾经被邀请参加了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刊载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人民日报》。

在我们这次会议的预备会议上，我们又听取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大家对于毛主席的讲话和李富春副总理所作的说明，都进行了分组讨论。在我们这次会议上，将有关于增产节约、农业问题、政法工作、教育工作等专题发言。这些都是目前我们国家工作中的一些迫切的、同时也是大家关心的重要问题。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将能够继续发扬人民政协的民主传统，对我们国家工作的各个重要的方面，充分而坦率地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并且提出积极而切实的建议。

最近，我和贺龙副总理受我国政府的委托，到亚洲和欧洲的十一个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我现在借这次会议的机会，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全国人民报告我们访问的结果，同时也谈一谈目前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政策。

(一)

中国政府一向重视各国之间的相互友好访问，特别是各国领导人员之间的接触对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各国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所起的重要作用。不久以前，中国政府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亚洲和欧洲十一国政府的邀请，委派我和贺龙副总理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柬埔寨王国、印度共和国、缅甸联邦、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

和国、阿富汗王国、尼泊尔王国和锡兰〔104〕十一国，进行友好访问。在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的期间，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还有外交部王稼祥副部长和我国在各驻在国的大使。这次访问的时间，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起，到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止，中间回国一次，前后将近八十天，全部旅行的路程大约有五万四千多公里。

在所有十一个国家，各国人民对我们的热情而盛大的欢迎，各国政府和领导人员对我们的隆重而亲切的接待，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亲自陪同我们到他们国内各地去访问和参观。在我们访问过的许多地方，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不顾酷热或者严寒，出来向我们欢呼，用富有色彩的民族仪式欢迎我们，悬挂着或者手挥着中国和他们本国的国旗欢迎我们，并且给我们各种崇高的荣誉。

我们在十一个国家所受到的这种欢迎和接待，绝不是仅仅给予我们个人的。这一切，实际上都表现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对解放了的中国的友谊，对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热爱。我们在这些国家所得到的一切荣誉，都应该归于我们伟大的祖国，归于我们伟大的人民。现在，当我向全国人民报告访问结果的时候，我首先要向六万万中国人民转达所有十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深厚友情，并且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再一次向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我们是抱着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和寻求知识的目的去访问这些国家的。我们可以说，这些目的已经实现了。我们希望，这次访问将有助于亚洲各国的团结，更好地为巩固各国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而斗争；将有助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将有助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更好地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我们同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员进行了亲切、诚挚和友好的会谈，并且同十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公报或者联合声明。我们在访问苏联的期间，还同当时在苏联进行访问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并且发表了联合公报。通过这些接触和会谈，我们更加体会到各国领导人员保持经常联系的重要性。我们参观了十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的许多方面，并且在同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和其他各界人士的接触中，结识了许多朋友。在访问期间，我们有多次机会同各国新闻界的人士接触，并且通过他们，向各国人民解释了中国政府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同各国人民和平友好的愿望。

通过在访问中的这一系列活动，我们不仅体会了所有十一国的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而且还体会到他们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的愿望。我们也体会了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要求进行和平建设、维护世界和平的意志。

我们还看到了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和平建设中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发现这些国家不论在他们优秀的民族文化方面或者在目前的建设成就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当然，在我们访问每一个国家的短短的时间里，进行深入的学习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相信，这次访问已经为我们今后继续向这些国家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应该指出，我们出国访问，正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发动了进攻、竭力制造新的紧张局势的时候，同时也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的时候。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匈牙利的颠覆活动和对埃及的武装进攻〔153〕，都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我们在占世界人口将近三分之一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七个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看到，人民强烈地反对战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颠覆活动，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而和平和进步的力量却日益壮大和巩固。尽管这些国家跟我们的国家一样，过去遇到过、将来也还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但是，这些是前进中的困难和挫折。冲破这些困难和挫折的社会主义力量和民族独立力量，将会更加强大起来；而帝国主义力量必然会继续削弱下去，他们彼此之间的利害冲突也必然会更加尖锐起来。历史的进程是扭转不了的。世界总的

趋势是走向和缓、走向进步的。

(二)

现在，我先谈谈我们对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访问。

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我们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河内进行了四天的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处在同帝国主义斗争最前线的一个兄弟国家。越南仍然处于分裂的现状不能不为越南人民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带来困难。但是，从战斗中成长的越南人民是从来不向困难低头的。我们在访问中看到，两年半来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在医治战争创伤、建设越南北方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土地改革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基本上的胜利，工作中的偏差正在加以纠正。经济恢复的工作将要在今年基本上完成。同时，新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也已经开始。尽管由于美国的破坏和南方当局的反对，越南人民还没有完成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正在向从北到南的越南人民指出他们祖国的独立发展的道路。最使我们感到钦佩的，是胡志明主席、越南劳动党和越南人民艰苦奋斗、勤劳朴素的作风，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河内，我们参观了工厂、学校和少年儿童俱乐部，

欣赏了越南的民族艺术。我们还参观了越南人民纪念他们的民族女英雄征侧和征贰⁽¹⁵⁴⁾的二征王庙。这两位女英雄曾经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抗击过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侵略。我们曾经向这两位越南民族英雄的塑像献花致敬。在我们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和其他领导人员的会晤中，在我们同越南各界人士的接触中，我们无时无刻不体会到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同志情谊。

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到一月十日，从一月十七日到一月十九日，前后在苏联访问了六天。我们拜会了伏罗希洛夫主席，同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员进行了亲切的会谈，并且发表了关于目前国际问题的全面的联合声明。

在访问苏联的期间，最使我们感动的，是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无限深厚的同志友谊。关于我们这次同苏联人民的聚会，赫鲁晓夫同志说得最好。他说，我们有权利把这次聚会“叫做春天的节日，叫做我们兄弟人民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加强和繁荣的节日”。的确，尽管我们在访问苏联的期间，自然的气候是在零度以下，但是，我们从苏联人民那里得到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使我们感到象在春天一样。通过这次访问，我们同苏联人民一起，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

亲密友谊和巩固团结，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两国人民分开。

我们在苏联参观了企业、农庄、学校和武装部队。我们亲眼看到，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苏联的国力正在变得更加强大，苏联的科学技术正在走向新的高峰。在我们同苏联领导人员和各界人士的接触中，我们体会到苏联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所进行的批评，对于苏联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起了推动的作用。我们在离开苏联以前，还有机会在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作了短时间的逗留。这个共和国由于在棉花种植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最近曾经荣获列宁勋章。在塔什干，我们曾经参观了一个集体农庄，并且具体地了解了这个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全面发展和繁荣的情况。这个共和国的成就生动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所执行的正确的民族政策的伟大成功。

从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一日到一月十六日，我们访问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在华沙，我们拜会了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同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和其他领导人员进行了亲切的会谈，并且参观了工厂。此外，我们还到了波兰的古都克拉科夫、钢铁制造业中心诺瓦胡塔、波兰西部的工业基地弗罗茨瓦夫和波兰的第二大城市著名的工人运动

中心罗兹。我们亲眼看到，在不到十二年的时间内，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的领导下，已经打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个基本的成就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低估的。

尽管过去在波兰的政治和经济的生活发生过一些错误和偏差，但是，我们高兴地看到，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以哥穆尔卡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正在纠正过去领导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同时也在反对修正主义的错误。他们正在加强国内和党内的团结，密切党同人民的联系，并且努力增进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同苏联的关系。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的波兰劳动人民，正在以极大的热情为维护和发展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

波兰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给了我们以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们现在还能够清楚地回忆起在波兰各地多次看到的动人场面。尽管下着大雪，人们万人空巷地出来欢迎我们。他们从四面八方围拢上来，争着向我们献花，同我们握手。他们唱着著名的民歌“让他在我们中间活一百年”，向我们表示欢迎。这种景象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已经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将在今年四月间来中国访问。

我们访问了波兰以后，从一月十六日到一月十七日

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布达佩斯进行了一天的访问。我们拜会了道比主席，同卡达尔总理和其他领导人员进行了亲切的会谈。在这以前，匈牙利、中国、苏联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及政府的代表曾经在一月十日在莫斯科进行过会谈，并且发表了三国会谈的公报。

我们访问布达佩斯，是在匈牙利人民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之下镇压了反革命分子的武装暴乱以后不久。但是，我们发现，匈牙利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正在迅速地恢复着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我们看到，绝大部分的工厂已经复工，市内的交通已经恢复，商店照常营业，人民生活正在恢复正常。

我们在布达佩斯参加了自从去年十月事件以来第一次举行的、由匈牙利各地的一千多名积极分子参加的大会，并且在会上讲了话。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集会。在会上讲话的，还有卡达尔总理、工人、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和小学教员。从他们的讲话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工农革命政府和以匈牙利工人阶级为首的一切健康的民主力量，丝毫也没有低估目前还摆在他们面前的许多艰巨复杂的任务。他们都很正确地着重指出，在目前的任务中，最重要的是实行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肃清反革命分子；加强思想教育，帮助人民分清敌我和是非，加强党和政府同广大群众的联系；进一步恢复和增加生产，克服暂时性的经济困难。

尽管我们在布达佩斯只停留了一天，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那就是，匈牙利人民正在坚决地纠正过去领导的一切错误，决心用全付力量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毫不动摇地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我们相信，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会从匈牙利事件中吸取深刻的教训，避免重犯匈牙利过去领导所犯的错误。同时，匈牙利人民不被严重的挫折所压倒而是坚强地站起来了，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为了推进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各国需要努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中国在许多方面还很落后，经验也很不够，因此更有必要继续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首先是向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我们这次访问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正是向这些国家学习先进经验。毛主席警告我们，决不应该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毛主席还提醒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我们对于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访问，使我们更加深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都在日益高涨。我们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互助关系正在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和加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坚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相信，在日益壮大和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面前，帝国主义侵略集团

的一切破坏阴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因此，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充分地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地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常说的道理，而实际情况也确实是如此。就我们访问过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每一国的社会生产力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果拿一九五六年的工业生产总值来同过去比较，那么，苏联已经达到十月革命以前一九一三年水平的三十倍，波兰已经达到二次大战以前水平的五倍以上，匈牙利已经达到战前水平的三倍以上，越南民主共和国已经达到一九四五年水平的四倍以上。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增长，而且还保证这种增长为满足整个社会不断提高的需要而服务。这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极不稳定和生产只是为社会上极少数的人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切正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当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不意味着我们在工作中没有困难，也不能保证我们在工作中不犯错误。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还短，有的只有几年或者十几

年,最多也不超出四十年。因此,要在工作中不遇到困难和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过去有过困难和犯过错误,今后也还会不断遇到困难,也还会犯错误。但是,从过去整个时期来看,在社会主义国家,成绩总是基本的。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的考验,社会主义国家将能够更好地调整人民内部的矛盾,使这种矛盾不致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减少工作中的错误。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才能够自觉地认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并且勇敢地揭发和纠正这些错误,使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健全地向前发展。这一切,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比任何旧的社会制度优越得不可比拟的地方。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看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困难和错误,就幸灾乐祸,就妄想利用这些困难和错误来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将是徒劳的。通过不断地克服困难和纠正错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一定会更加巩固和兴盛。

社会主义各国是由共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目标联系起来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各国又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各国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和利害冲突。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互相排挤、互相并

吞的关系相反，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互助关系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国际关系。苏联不仅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国力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给予最重大的援助。因此，苏联很自然地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中心。而中国和苏联的友好团结又是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团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我们常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亲密团结和友好互助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可靠的保证，是巩固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通过这次访问，我们对于这一点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中，团结和互助一向是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但是，正由于这种关系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还缺乏充分的经验，因此，在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中还不能说一切都是完满的、正常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所表现的大国主义倾向或者狭隘民族主义倾向，都曾经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隔阂和误解，现在，这些缺点和错误正在克服当中。苏联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发表了宣言^{〔155〕}，表示要根据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项原则，发展和进一步加强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这对于改正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方面的错误，对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发表了支持苏

联政府这个宣言的声明^[156]。在我们这次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访问中，我们又表达了对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深切愿望。我们这种愿望在我们访问过的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得到了共鸣。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除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访问以外，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谈，并且发表了与这有关的联合声明和公报。这些都表明，社会主义各国正在共同努力改进相互关系，加强团结。

社会主义各国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共同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一致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社会主义各国在原则一致的情况下，在有的时候，对所有的问题，都有一致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对于我们各国原则一致的主要方面说来，毕竟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且，这种不同意见是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逐步地求得一致的。即使暂时还不能求得一致，只要团结关系受到珍重，保留这种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

帝国主义国家惯于用它们自己的相互关系，衡量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它们企图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在相互关系方面的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不同意见，挑拨和破坏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并且加紧进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活动。它们在匈牙利所策动的反革命

暴乱，最彰明昭著地暴露了它们这种从匈牙利打开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社会主义国家的罪恶企图。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人民镇压反革命暴乱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以卡达尔同志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充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是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帝国主义国家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罪恶企图过去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今后还将继续遭到可耻的失败。

社会主义国家一向主张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而不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我们知道，既然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就意味着这些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和平竞赛。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敢于进行这种和平竞赛。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向外扩张，根本不会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我们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我们主张由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我们愿意同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保证互不侵犯，和平共处。我们深信，这种主张不仅在目前国际关系中指出了一条符合于全世界人民利益的道路，而且对帝国主义国家来说，也是最现实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不愿意走这条道路，竟敢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犯，那么，正如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的中苏联合声明所指出的，“中国和苏联同一切社

会主义国家都具有兄弟般的友谊和相互协助的义务，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挑衅行为，都将受到最坚决的回击。”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着世界上的新生力量，象征着人类的光明前途。正义和进步人类的同情都在我们方面，我们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尽管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帝国主义仍在用战争来威胁我们。我们必须经常保持警惕，在进一步发展我们经济的同时，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不断壮大的、团结一致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可战胜的。

(三)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对亚洲七个民族主义国家的访问。

在离开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后，我们就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了柬埔寨王国。我们是为了回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到中国的访问，作为柬埔寨国王和王后的客人去的。在那里，我们受到了隆重和盛大的接待。这种接待，以及在整个访问期间，国王、王后和西哈努克亲王对我们的亲切关怀，柬埔寨人民

向我们表示的巨大热情，使我们深为感动。

应当承认，我们原来对这个邻国的了解是很不充分的，通过五天的访问，正如在柬埔寨桑云首相和我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得到了进一步互相认识和互相了解的机会。我们看到，自古以来，柬埔寨人民就同中国人民存在着骨肉般的关系。现在，在五百万柬埔寨居民中就有三十多万是中国的侨民。我们十分高兴，殖民主义统治在我们中间造成的隔阂已经随着我们各自的独立而消除了，我们这两个亲戚的国家已经建立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友好关系。

我们到了金边、磅湛、暹粒、磅清扬，看到柬埔寨是一个风景优美、资源丰富的国家。柬埔寨人民在取得独立以后正在开始对这种丰富的资源进行开发。暹粒附近有一千年左右历史的吴哥古宫是一个世界艺术的杰作，它使人深深钦佩柬埔寨人民的创造才能。

柬埔寨王国政府执行着西哈努克亲王所制定的和平中立的独立政策。我们相信在维护和平的事业中，中柬两国的友谊将不断取得发展。

在从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的十二天内，我们访问了印度共和国。这是我们第二次到我们这个伟大的邻邦。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当时，因为日内瓦会议⁽⁵²⁾还在进行，我们只能在德里作了仅仅三天的停留，因而没有机会来了解印度人民各方面的生活。

在这一次的访问中，由于普拉沙德总统、尼赫鲁总理的关怀和妥善安排，我们参观了德里、浦那、孟买、班加罗尔、马德拉斯、阿桑索尔、奇特兰詹、辛德利和加尔各答这些可以说是遍及这个次大陆的南北东西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我们看到了印度人民在长远的历史中所创造的优美而丰富的文化，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印度人民在建设现代国家方面，在工业、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不少成就。中国人民在许多方面可以从我们的印度朋友那里得到教益。

印度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欢迎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也许我可以举出几个数字来作为一种简单的说明：在德里，有上百万人到市民大会上欢迎我们；在加尔各答，参加市民大会的有一百多万人；在孟买、马德拉斯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在印度东北部工业区从阿桑索尔到奇特兰詹到辛德利的一百五十公里的公路上，都连绵不断地站满了前来欢迎我们的密密层层的人群。不论到那里，我们都听到“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两国人民是兄弟）的亲切的欢呼声。

当我们在亚洲各国访问的整个期间，我们曾有四次路过印度，两次经过德里，两次经过加尔各答，每一次都受到了印度政府和人民的盛情接待，这种情谊使我们深为感激。

我们第一次路过德里的时候正是新年。尼赫鲁总理陪同我们去参观了印度最大的巴克拉——南加尔水电站

工程。这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水闸之一，工程的规模十分宏伟。当我们在今年一月底路过加尔各答的时候，我们又曾到了加尔各答附近的和平村，参观了伟大的印度文学家泰戈尔所创办的国际大学。

在我们三次到德里的时候，每一次都同尼赫鲁总理进行了会谈，对双方都有兴趣的许多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对许多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我们认为，这种友好亲切的会谈是十分有益的。当然，中国和印度之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在一切问题上都抱有同样的见解，但是，正如尼赫鲁总理在我们访问印度期间所说过的那样：“我们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是一种友好的不同意，并不妨碍我们的友好合作”。这种会谈加深了我们彼此的相互了解。这将能更加有利于我们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的共同事业中，从各自不同的地位发挥各自的作用。我们两国在这方面久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能够在今后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我们接着就访问了缅甸联邦，这也是我们的第二次访问。在从去年十二月十日到十二月二十日的十天中，我们到了仰光、曼德勒、眉谿、八莫、密支那、喜河、阳瑞、东枝和腊戍等缅甸的主要城市，看到了我们这个近邻的秀丽山川和各族人民丰富多彩的艺术，并且广泛地结识了缅甸各方面的人士，其中包括同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有亲戚关系的缅甸各少数民族的领袖们。缅甸人民对中

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到处给我们以热情的欢迎，并且叫我们作“胞波”，意思就是同胞兄弟。在我们访问缅甸期间，中缅两国总理和副总理曾经共同出席了在中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首府芒市举行的中缅两国边境人民联欢大会，这次大会生动地表现了我们两国人民在悠久的历史中结成的亲如手足的感情。

我们在访问期间曾经拜会了巴字总统，并且同当时的缅甸联邦总理吴巴瑞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以及其他领导人在和谐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就对两国利益有关的问题和某些具有国际重要性的迫切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这些问题中也包括中缅边界的问题。双方在讨论中进一步澄清了彼此的观点，我们相信，中缅边界的问题已经更加接近解决了。

随后，我们就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苏拉瓦底总理刚刚在去年十月间访问过中国，我们的这次访问是对他的访问的回报。这是一个年青的共和国，然而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丰富优美的文化。巴基斯坦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可以追溯到十分遥远的过去。

在到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为止的十天中，我们到了西巴基斯坦^{〔157〕}，访问了卡拉奇、海德拉巴、白沙瓦、拉合尔这样一些历史上的名城，我们也到了东巴基斯坦，访问了达卡和锡特拉基河上富庶的纳拉扬甘吉工业区。不论在

西巴基斯坦或者东巴基斯坦，我们都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十分热情的欢迎。我还记得，我们从拉合尔到达卡，因为飞机延迟了起飞的时间，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半钟了。但是在达卡机场上和通到城里的公路上仍然有十多万从东巴基斯坦各地远道而来的人在黄昏里欢迎我们。他们为了要和我们会见，曾经等候了七八个钟头。这种动人的情景，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我们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也曾经同米尔扎总统、苏拉瓦底总理和其他领导人进行了会谈。通过这些坦率的会谈，我们两国对于彼此的许多意见得到了更好的了解。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是不同的。例如，巴基斯坦参加了马尼拉条约⁽⁷¹⁾和巴格达条约⁽¹⁴⁴⁾，而我们是反对这些条约的。但是，我们仍然在促进世界和平和进一步发展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的问题上，表示了共同的愿望。

阿富汗王国是我们在离开欧洲以后首先访问的国家。我们在今年一月十九日到那里，在那里停留了五天。虽然我们是初次到这个帕米尔高原西南的邻国，但是这个国家对我们却并不生疏。中国古代和西亚、南亚以至欧洲各国的贸易和文化的往来大多要经过阿富汗。在这个长期是古代东西交通的中心的的地方，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许多标志着中阿友谊的文物。

我们在阿富汗受到了阿富汗国王、达乌德首相和王

国政府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待。当我们在阿富汗访问的时候，我们曾参观了喀布尔和坎大哈的许多历史遗迹，阿富汗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而坚决反击并且战胜了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历史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也曾经参观了喀布尔附近的沙罗比水电站工程和坎大哈附近的赫尔曼德河谷水利工程。阿富汗人民今天在艰难的努力下建设自己的祖国的坚毅的决心，引起了我们极大的敬意。我们衷心地祝贺他们的努力得到成功。

我们在喀布尔的时候曾经同达乌德首相和阿富汗王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会谈。达乌德首相已经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我们欢迎他早日到中国来访问。

从今年一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九日，我们到尼泊尔王国进行了访问。中国人民都知道尼泊尔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在两千五百年以前，佛教就是在这里发源的。虽然中国和尼泊尔之间横亘着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它也没有能够阻止我们两国人民从遥远的古代起就开始友好的来往。在我们到尼泊尔的三个月以前，尼泊尔阿查理雅首相曾经访问过中国。我们的这种来往，标志着中国和尼泊尔的古老的友谊已经有了新的发展。

我们在尼泊尔到了被称为光荣之城的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也到了被称为美丽之城的拉利特普尔和被称为虔信之城的巴克塔普尔。这是一个土地肥沃、风

景美丽的国家。我们相信，尼泊尔人民现在正在从事的建设事业是有美好的前途的。

尼泊尔人民给了我们兄弟般的热烈欢迎。尼泊尔国王和王后给了我们亲切的接待。尼泊尔阿查里雅首相和我们进行了友好而诚挚的会谈。我们重申了我们两国对促进中尼友谊、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愿望。

我们这次访问中最后到的是锡兰。这也是一个和中国有悠久联系的国家。近几年来，我们之间以大米换橡胶的贸易对我们两国的经济都曾经起了十分有利的影响，因而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同古涅狄莱克总督，班达拉奈克总理和锡兰政府其他领导人还是第一次会面，然而大家却感到象老朋友一样。锡兰人民给了我们最热烈的欢迎。我们在这个岛上进行的广泛的旅行中，到处都遇到了成千上万的人群向我们欢呼友好。

除了首都科伦坡以外，我们访问了锡兰的古都康提和波隆纳鲁瓦。我们看到这个富饶美丽的岛国是名副其实的印度洋上的一颗珍珠。锡兰人民在古代就有了令人钦佩的卓越成就；现在，在摆脱了四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以后，又正在以很大的热情创造自己的新的生活。他们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朋友。

我们满意地看到，锡兰政府和人民执行着维护和平的独立政策。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和我们举行的会谈

取得了十分满意的结果。我们主张促进五项原则的实施,主张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主张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主张国际争端应该和平解决,支持裁军,主张禁止核子武器,反对成立敌对性的军事集团,反对所谓“真空”的理论,反对强权政治。我们相信,这些主张的实现,将能有助于世界和平的加强。

我们感到特别欣慰的是,中国和锡兰现在已经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班达拉奈克总理也已经答应今年要到中国来访问,我们期待在北京再一次同他欢聚。

在叙述了我们在亚洲七个民族主义国家的访问的经过以后,我还想提一下,在大部分这些国家里,都有相当数量的华侨。他们以极其强烈的感情来欢迎我们这些从祖国去的亲人。他们过去同侨居国人民一样长期受到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方面的成就使他们感到高兴和光荣。我必须在这里向大家转达侨居在南亚各国的华侨对祖国的向往和敬意。我们也曾经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他们表示问候,并且勉励他们尊重侨居国的法律和习惯,加强同侨居国人民的友谊,为促进中国和侨居国的友好关系而努力。

同志们,朋友们:现在我想说一说我们在这些国家的访问中所得到的—些感想和意见。

当我们在这些国家访问的时候,不论到那里,我们都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我们在这些国家里并不感到自

已是在陌生的异国，而是感到自己象在亲密的朋友、亲戚和兄弟的家里。

产生这种感觉，不但是因为我们到处都受到了极其热烈和友好的欢迎，而且还因为我们亲身体会到了这些国家的历史遭遇同我们中国是大致相同的，这些国家的民族愿望同我们中国也是大致相同的。

我们在这次的访问中，在每一个国家都曾经参观了许多有意义的历史遗迹。它们告诉我们，我们亚洲人民是有光荣的历史的人民，是曾经对人类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的人民。同时，在我们访问所到的地方，也都可以看到，我们亚洲人民之间有悠久的密切的历史联系。在历史的黎明时期，我们之间就开始有了来往。但是，自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扩张到东方以后，苦难就临到了我们这个曾经以智慧的光辉照耀了古代世界的大洲。除了日本以外，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先后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者处于他们的势力控制之下。我们的民族受到了屈辱。我们的人民受到了奴役。我们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压抑和摧残。我们相互间在几千年来形成的联系受到了人为的破坏。这种共同的苦难培育了我们各国人民之间的同情，而我们为了反抗共同的敌人而进行的斗争，又更加加深了这种同情。

我们这种长期的艰苦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终于得到了胜利。殖民主义的体系在这种斗

争的反复的冲击下开始解体了。在亚洲和非洲，一个又一个曾经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取得了独立，一个又一个曾经处在外国控制下的国家摆脱了身上的枷锁。现在，当我们能够自由地站起来寻找友谊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把极大的热情寄放在我们曾经同过患难的兄弟的身上，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历史感情，它应该永远受到我们的珍爱。

当然，我们亚非国家取得独立的道路是并不相同的。中国人民，蒙古人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是在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取得了独立的，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他许多亚非国家的人民是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走上了独立和发展的道路的。我们并不讳言，我们各自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是不同的，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也有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所有已经取得独立的亚非各国的人民，都要求巩固自己的独立，都要求维护世界的和平，都要求增进我们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在这些方面，我们的愿望是相同的。

所有我们访问过的亚洲国家的人民，都曾经为争取自己国家政治上的独立而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十分珍视自己的独立，同时，同中国人民一样，他们也认为我们这些国家的独立还是不巩固的，因为殖民主义势力还在从各方面威胁并且损害我们的独立。我们还必须坚持

不懈地为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而斗争。同时，我们这些国家的独立也还是不完全的，我们都还没有摆脱殖民主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因此，我们都要求建设自己的祖国，赶上现代国家的水平。只有这样，我们的独立才能真正巩固。此外，现在亚非地区还有很多国家没有获得独立，这些国家的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还在受着殖民主义的残酷的镇压。我们已经获得独立的亚非各国人民都同情和支持他们的斗争。

所有我们访问过的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渴望和平，痛恨战争。亚非人民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已经吃尽了侵略战争的苦头。没有任何刚刚脱离了殖民主义压迫的亚非国家的人民愿意再被卷入战争。相反，只有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亚非人民才能建设自己的祖国，才能取得安定和幸福的生活。然而，今天殖民主义者还在亚洲和非洲用他们组织的敌对性军事集团和他们的军事基地，控制着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负担着沉重的军费，并且威胁着整个亚非地区的和平和安全。这种情况使我们亚非人民更加迫切地要求和平。正是因为如此，在这次访问中不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当千千万万的人们前来欢迎我们的时候，“和平”总是最突出、最响亮的口号。

所有我们访问过的这些国家的人民也都要求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友好合作。在每一个国家里，千千万万人

民对我们的热烈欢迎，决不仅仅是这些国家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的表现，而且也是亚洲各国人民要求加强彼此间的友好合作的愿望的表现。友好合作是亚洲人民的共同利益。殖民主义和战争势力至今并没有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而且还正在寻找每一个机会，企图对亚洲人民发动新的进攻。他们特别希望利用我们相互间的分歧来实现他们的野心。“分而治之”，“亚洲人打亚洲人”，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的阴谋。在这样的威胁面前，亚非各国只有团结起来友好合作，才能有力量保卫各自的独立，才能有力量维护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亚非国家之间并不是没有分歧和争端的，但是可以说，几乎所有这些分歧和争端都是殖民主义者在长时期内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所造成的，或者也是他们的这种政策所扩大化了的。殖民主义者现在还想以此在我们中间制造不和，为他们自己制造机会。我们认为，我们亚非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而决不应该让任何分歧和争端妨碍我们的团结。

在目前亚洲各国的关系中，存在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问题^{〔158〕}，引起了邻近各国的深深不安。我们曾经向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表示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来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和我在今年二月五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159〕}，也曾

经共同呼吁双方，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为了亚非团结的更广泛的利益，进一步争取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在这里，我们愿意再一次表示这样的愿望。我们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姐妹国家是可以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这个问题的友好的解决的，而在美国控制联合国的情况下，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只能够引起外国干涉的危险。

在许多亚非国家之间，都有由殖民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这类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比较难于解决的。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只要有关双方能够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和万隆决议的精神进行协商，这类问题也是可以求得友好的解决的。大家知道，在中国和缅甸之间存在着未决的边界问题，在我们开始这次访问以前，我们两国曾经利用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访问中国的机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友好的商谈。在我们访问缅甸期间，我们又曾经同当时的缅甸吴巴瑞总理、吴努主席和其他领导人谈到了这个问题。这些会谈的结果使我们深信，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缅边界问题是可以得到友好的解决的。随着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两国的友谊一定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不但是从维护中国民族利益出发的，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团结的利益出发的。

一九五五年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103]，第一次共同发出了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要求反对殖民主义、维护

和争取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友好合作的响亮呼声。现在，这个呼声已经越来越有力了。许多过去被分离被隔绝的亚非国家在那个历史性的会议上重建起来的友谊，在将近两年以来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们以亲身的体验证实，万隆精神决没有象它的敌人所希望的那样枯萎了，而是正在继续不断地繁荣滋长。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67〕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我们这次同许多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就是明证。在这些文件里，万隆决议〔160〕和五项原则一再得到了重申。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在首次提出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中曾经指出：五项原则的广泛适用，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并且将有助于创造和扩大和平地区，从而减少战争的可能，加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我们现在满意地看到，这种希望正在日益变为现实。

在我们开始这次访问之前不久所发生的埃及事件，最明显地表现了亚非团结的力量和作用。在我们所到的国家，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对埃及人民表示的同情和声援。在亚洲和非洲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支持下，埃及人民经过坚决的斗争已经击退了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他们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亚非地区和平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这个事实给了我们亚非人民极大的鼓舞。同时，我们也得到了

极大的启示：虽然亚洲和非洲国家在物质力量方面还不是强大的，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亚非各国的团结，坚持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团结，进行坚决的斗争，就没有什么殖民主义的侵略是不能打退的。

我们在亚洲访问中所看到的事实使我们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成立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努力促进亚非国家友好合作的主张，是完全符合于我们亚非各国的民族利益的，同时也是符合于维护亚非和世界和平的普遍利益的。我们决心继续在严格遵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我们这次访问过的国家和其他亚非国家，努力发展和加强友好合作关系。就是对于今天同中国还没有正常关系的邻国，例如泰国和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亚，我们认为也没有理由不能改善我们同它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同某些亚非国家之间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已经建立了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我还愿意特别指出，正如在中苏联合声明中所表示的那样，进一步促进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正常化是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我们愿意按照万隆会议的决议，尽可能地加强同亚非国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平等互利的合作，以促进彼此的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事实证明，虽然我们亚非国家之间在这方面的合作还开始不久，规模也还很小，但是已经产生良好的结果。随着我们各自的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的合作规模将会日益扩大。目前，中国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正在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然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这表示了我們帮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真诚愿望。我們同任何国家的经济合作或者对任何国家的经济援助都是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并不排斥这些国家同任何别的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或者接受任何别的国家的经济援助。我們愿意看到，一切对亚非国家的经济合作和援助都不附带任何条件，真正是为了帮助不发达的国家得到独立发展。

我们还愿意向我們在亚洲和非洲的各友好国家学习它們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它們在建设工作中的长处。我們在这次访问中亲眼看到了，虽然这些亚洲国家一般说来还是比较落后的，但是每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各有优点和长处。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互相学习，我们相信这一定能够有助于我們亚非国家的各自发展。

同志们，朋友们：通过这次访问，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亚洲和非洲正在觉醒和复兴。独立了的和正在争取独立的亚非国家已经作为一种新的强大的和平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万隆会议第一次证明了这个力量的存在，埃及事件又更加明显地证明了这个力量的发展。亚非人民自己掌握亚非地区命运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特征。尽管殖民主义的势力还在企图破坏我們亚非国家的独立，镇压我們这个地区

的民族独立运动，挑拨我们相互间的友好团结，但是，这决不能挽救殖民主义的死亡，也决不能阻挡亚非人民的前进。曾经长期是殖民主义侵略的对象的亚非地区，一定要成为独立国家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大家庭。

(四)

在我们出国访问的期间，中近东一直是国际局势的焦点。紧接着英法对埃及的侵略被击退以后，美国政府就宣布了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161〕，公开主张由美国来填补英法殖民主义者在中近东地区遗留下来的所谓真空，使中近东局势重新趋于紧张。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特别提出来谈一下。

中近东紧张局势的发展过程，充分地表现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特别是美国同英法的矛盾的尖锐化。去年，英法利用美国处于大选前夕的这一时机，勾结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突然的武装进攻，企图搞垮纳赛尔总统领导下的埃及政府，恢复他们在苏伊士运河地区的统治，抵抗美国排挤英法在中近东地区殖民利益的政策。但是，英法的算盘却完全打错了。英法对埃及的侵略，遭到了埃及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埃及政府在反抗侵略的英勇斗争中不是削弱而是更加巩固了。

同时，在同英法争夺中近东的殖民利益的斗争中，美国对英法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联合国中，美国支持了亚非集团要求英法停止对埃及的武装侵略和撤退侵略军队的提案。但是，难道美国真正有爱于埃及人民，主张维护埃及的主权和独立吗？不是的。正如我在出国访问的初期回答记者的问题中所指出过的，美国的目的是为了夺取和代替英法在中近东的殖民地位。艾森豪威尔主义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现在，从表面上来看，美国似乎是主张以色列撤军的。但是，难道美国真正反对以色列的侵略，维护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利益和中近东的和平吗？不是的。美国的目的是为了排挤英法对以色列的控制，并且利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继续维持中近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以便在联合国的名义下侵犯埃及的主权和扩大它自己在中近东地区的殖民势力。

美国政府这次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又是用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口号做烟幕。其实，所谓苏联或者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近东形成威胁的话，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贯主张尊重中近东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主张由中近东人民自己决定中近东的事务。我们这次在民族主义国家中的访问更加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同民族主义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合作得很好。事实上，目前威胁着中近东各国的正是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它集中地表现了美国政

府进行扩张和侵略的惯技，那就是，以反共、反苏为借口，以制造紧张局势为手段，来达到镇压民族独立运动、排挤英法殖民利益和扩大自己殖民势力的目的。这就是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实质。

美国政府这种不断制造紧张局势以便进行扩张和侵略的政策，不仅受到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也不可避免地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在国际局势紧张到了一定的程度，在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断加强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有时也不能不同意一些和缓局势的措施。但是，美国侵略集团是害怕国际局势真正有所和缓的，因为这将使他们失去在所谓自由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使他们的军事集团日趋松懈，而亚非各国人民在和缓的国际局势中会愈加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每当国际局势真正有所和缓的时候，美国侵略集团就迫不及待地制造新的紧张，竭力阻挠局势的进一步和缓。这就是美国政府追求紧张而又不能过分紧张、被迫和缓而又不肯长期和缓，因而在和缓和紧张之间不断摇摆的根源。

但是，美国政府这种政策是不能持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不再为美国的反共反苏的口号所欺骗，不再为美国所制造的紧张局势所吓倒，也不再愿意使自己的利益不断地受到美国的侵犯。另一方面，就美国来说，继

续执行这种政策，也只能使它自己越来越陷入孤立的地位。

公开宣布要夺取英法殖民利益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对于参加美国军事集团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很有益的教训。为了扩张自己的殖民势力，美国不惜公开侵犯它的主要盟国英法的利益。象英法这样的主要盟国，美国都可以抛弃，那么又有什么所谓盟国，美国不可以抛弃呢？追随美国的国家，一方面要经常冒着被抛弃的危险，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使自己受到美国的控制。而他们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些剩余的军事物资和倾销的商品，因为从美国看来，正如洛克菲勒^[162]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所说，“已经是上钩的鱼儿用不着诱饵”了。但是，这些国家自己却不得不担负着沉重的军费，使国民经济日趋破产。这些事实不能不使这些国家的当局重新考虑他们自己的政策。

如果说，有些国家曾经对艾森豪威尔主义抱有一定的幻想，认为可以把其中的军事部分同所谓经济援助分割开来，那么，上述的洛克菲勒给艾森豪威尔的信提供了有益的教训。洛克菲勒就是主张把军事同盟同“经济援助”分别开来的。但是，正象他自己所说的一样，这是为了“在稍后的一个阶段……加紧提出政治上的代价和军事上的要求”，为了使接受这种“援助”的国家“陷入过分庞大的工程上，从而长期需要美国的支持”。

对于那些曾经希望美国主持公道、支持民族独立运动的国家来说，艾森豪威尔主义也提供了有益的教训。美国政府的目的是，就是要控制中近东地区，绝不会真正支持阿拉伯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人们应该记得，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正是美国首先提出了所谓国际管制的“集体侵略”计划〔163〕。事实上，正象洛克菲勒给艾森豪威尔的同一封信中所说的，美国决不能让“要求独立的愿望”发展成为“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以致于不仅老殖民国家不能控制，而且美国也不能控制”。

英法两国也应该从埃及事件中吸取应有的教训。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使用武力，决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任何的好处。依靠美国的力量也决不能维持他们的利益，而只能更加便利于美国夺取这些利益。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必须由新的互相尊重主权和独立的关系来代替。这样的平等互利的关系，也只有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英法两国的人民对于他们的政府追随美国而日益成为美国的附庸的现象，已经愈来愈加不满。最近，在这两个国家里，组织国际上“第三种力量”〔164〕的呼声又有了新的高涨，这也决不是偶然的。

随着美国政府的扩张和侵略的政策暴露和破产，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了和平中立的道路；事实证明，这个道路是符合于有关各国的民族利益的。根据和平中立的

政策，它们有可能维护自己的独立而不受美国的控制，它们有可能把自己的军费减少到最低的限度，把自己的资源用到发展国家建设的方面。在和平中立的政策下，它们没有必要使自己同社会主义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受到限制，而且有可能从多方面争取到不附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因此，就是在参加了美国组织的军事集团的国家里，也出现了走向和平中立的趋势。即使在仍然受着美国控制的日本，和平中立的倾向也有了发展。

虽然如此，人们仍然不能忽视战争威胁的存在，因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会自动地放弃他们的扩军备战政策。因此，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如果帝国主义者竟然不顾世界人民的反对，冒险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在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联合力量的面前，可以断言，帝国主义一定会遭到最后的失败。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已经清楚地证明，不仅发动战争的国家一定失败，而且整个帝国主义体系都遭到削弱。在今天的时代里，对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战争都不可能再是发财的机会。另一次世界大战只能导致帝国主义更快、更彻底的失败。

社会主义国家一贯主张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应该和平共处，民族主义国家的和平中立政策应该得到尊重，殖民地人民民族独立的愿望应该得到实现。中国政府完全

支持苏联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关于裁军问题的建议〔165〕和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一日关于中近东问题的建议〔166〕。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建议不仅获得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支持，而且也获得了印度和其他许多民族主义国家的同情。我们还特别高兴地看到，最近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的四国首脑会议〔167〕重申四国坚持民族独立和中立的政策，主张阿拉伯世界的防务应该处于外国公约的范围之外。这是符合于各大国不干涉中近东地区国家内政的原则的，也是符合于世界和平的利益。

在我们这次访问的期间，不少国家对于中美关系表示关心，好意地希望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人民是愿意同美国人民友好的，但是，中美关系长期没有能够得到改善，责任并不在我们方面。正是美国政府利用中美间的国际争端作为制造远东紧张局势中的一环，阻挠着中美关系的改善。

为了改进中美关系，中国方面曾经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早在万隆会议期间，我们就建议，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两国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中美两国大使的日内瓦会谈〔168〕中，我们还建议消除目前存在在两国贸易、两国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在中美两国大使级的会谈长期没有获得进展的情况下，我们还建议举行中美两国外长会议，解

决中美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中国方面的这一切努力都没有从美国方面得到应有的反应。

相反地，美国政府坚持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朝鲜停战以后，美国就破坏了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169〕，把大批的中国被俘人员送到台湾。美国不仅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还阻挠其他国家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美国继续在国际事务中排斥中国，在联合国中继续阻挠中国合法地位的恢复。美国继续对中国实施着禁运，并且还在加紧阻挠其他国家同中国发展平等互利的贸易。尤其严重的是美国不仅拒绝对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而且还加紧它对台湾的军事控制，扩充它在台湾的军事基地，并且计划在台湾设置导弹，蓄意加剧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不仅如此，美国还企图通过中美会谈使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制造所谓两个中国的形势。我们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国际争端，但是，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解放台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美国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的。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的居民，包括一切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内，都是中国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自从我们号召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以来，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中愿意促进和平解放的人越来越多，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了。但

是,对于这种情况,美国政府却表现了极端的恐惧,不惜采取一切办法进行破坏。最近,美国策动一批标榜所谓自由中国的分子和所谓台湾独立的分子,进行推翻台湾当局的活动,企图把台湾变成象檀香山一样的美国属地。其实,美国政府这种手段只能使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更加认清美国政府企图奴役中国的真面目。今天美国既然可以发动一个推翻台湾当局的运动,明天美国又何尝不可以抛弃那些标榜所谓自由中国和台湾独立的分子呢?卖国求荣不仅无荣可得,而且还将遗臭万年。一切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粉碎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美国政府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丝毫不能影响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已经屹立在世界上,而且还将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起来。美国政府把台湾变成美国属地的企图,不仅将受到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也将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不许。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大势是不可阻挡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中国人同中国人永远分割开来。

同志们,朋友们:世界总的趋势是走向和缓,走向进步的。和平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壮大,战争的势力已经越来越加孤立。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斗争,世界的持久

和平是可以争取得到的。中国人民将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担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继续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打破恢复中日邦交 的困难局面*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

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来华,是一件大事,我很高兴,我表示欢迎和感谢。在座的许多朋友到过中国,我们都熟识。但社会党派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还是第一次,有的朋友是没有来过中国的,象团长浅沼^[170]先生等。这次能见面,我特别高兴。自从会见铃木^[84]委员长后,日本社会党的朋友们不断来华,同我们接触,我们彼此谈过许多话,也单独谈过,可以说和社会党不是新交,而是有几年的关系了。对许多政治问题也已经多次交换过意见。今天,又承团长代表日本社会党正式把社会党的外交政策,首先是对华政策,以及中日关系前途的展望,都告诉了我们,我们表示钦佩。

我们的看法和办法跟团长所说的大体相同。我想在此谈谈我们的看法和办法。过去也说明过,中日关系在

* 这是同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的谈话节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起了根本变化。其原因是：中国已经独立了，日本的情况也已和过去不同，而是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没有殖民地了。但是，日本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军还没有从日本撤退，即处在半被占领的状态，日本的处境比中国更加困难。这就使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起了根本变化。如团长所说，过去两国人民受国家政治的影响，有对立情绪，但是，近来恢复了几十年前的友好关系，恢复了以往的亲善、近邻的关系。最近几年的来往也说明了这一点。旧的友谊恢复了，新的感情产生出来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两国人民感情上的接近、友谊的加强，是亲善的最可靠的基础。我特别高兴地看到，日本人民要求和平友好的愿望在一天天增长，而贵党是反映了日本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中国人民愿意和日本人民友好，从中国人民对来访的所有日本代表团、来访人士以及对社会党朋友们的欢迎情况，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种感情还会一天天发展。所以，我相信中日亲善友好、共存共荣，是有确实可靠的基础的。我对贵团的来访再一次表示谢意，它标志着在两国关系上增加了新的内容。

我对团长所说的贵党在一月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对华外交的决议〔171〕，表示钦佩。这基本上和中国的主张是一致的，它不但代表了日本人民的呼声，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想法。因为中国人民一向明确地主张中国只有一个。

旧中国也是一个。旧中国有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政权，但我们主张实行民主、国家统一。蒋介石曾经召开过政治协商会议，后来他又破坏了协议，打起了内战，使中国人民不得不和共产党一起打倒了旧政权，建立了人民政权。在新政权下，中国也是应该统一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根据国际协议，把台湾归还了中国。日本人做得对。蒋介石现在盘踞在台湾，受美国的保护，如果没有美国，蒋介石是没有办法站住脚的。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应该由中国自己解决。解决的办法是力争和平解放，现在正在努力。贵党主张只有一个中国，要同中国缔结和约，恢复邦交，这是完全正确的，和中国人民的主张是一致的。我相信，贵党的主张是一定会实现的。不过也应该看到日本的现实。日本方面是有困难的，日本政府同蒋介石缔结了“条约”，有“外交关系”，互相派有“大使”。日本参加了联合国，蒋介石的代表也在联合国。另一方面，美国又拿旧金山条约⁽⁸²⁾、日美安全条约⁽¹⁷²⁾来束缚日本，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干涉你们。在这方面，日本人民遇到了困难，贵党的外交政策也遇到了困难，日本政府则处在更困难的地位。我们相信，日本人民是会为日本完全独立而奋斗的。贵党主张采取独立外交政策，这不但合乎日本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合乎亚洲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实现这个目标是需要时间和采取一定步骤的。一方面应该摆脱美国的干涉，另一方面，要恢

复中日邦交，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要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两三年来，我们几次和日本朋友谈过，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这种工作做到适当的程度，总会发生对台湾的关系问题。至少在中日来往中，要使日本人民了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有权利解决而且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不能象今天美、英那样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迷惑世界舆论。日本人民应该帮助中国人民，因此，希望社会党做出努力。这样，中日友好就会大大促进进一步。正如团长所说，日本和我们是近邻，又是朋友，中国人民的感情日本人民也了解，正如日本人民反对原子弹、氢弹的感情我们也能体会一样。贵党从事这两件工作是有有利条件的。过去我们之间订了很多协定，基本上都能实现，贵党也起了一份作用，而且是主要的作用。如文化、贸易、渔业、经济、青年和工会等协定，实际上都超过了国民外交的范围，已经属半官方性质。贵党又指出不承认“两个中国”，这是和中国的主张一致的。我们是知心朋友，我们之间可以完全理解，我们一定支持贵党的政治要求。我们互相配合，不仅可以打破两国的隔阂，也可以促进世界人民的了解。总有一天，日本外交的独立性会更加加强，水到渠成，日本撤消对台湾的承认，中日会恢复邦

交。至于哪一天实现，这要看我们工作的进展情况。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日本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撤消对台湾的承认，恢复与中国的邦交；另一个是中国解放台湾，蒋介石“政权”不复存在，水到渠成，日本就很容易同中国建交。如方才团长所说，前者是贵党应该勇敢承担的责任，后者是日本现政府的想法。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各位代表：

中缅边界问题是我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因此，政府认为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专门报告。

在我国和许多邻国之间，都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定界问题，而中缅两国之间的未定界问题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由于英国在过去统治缅甸的时期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制造了长期的纠纷，而近几年来，帝国主义势力又经常利用中缅边界问题，挑拨中缅关系，企图造成紧张局势。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悬而

* 这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刊载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根据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经过我国政府和缅甸政府的不懈努力，双方在一九六〇年奈温总理访华时于一月二十八日签订了《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并在同年吴努总理和奈温总参谋长访华时，于十月一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

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由来已久，问题本身也很复杂，因此，政府从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就采取了审慎从事的态度，有准备、有步骤地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

在我们国家成立的最初几年，政府需要把全部力量用来处理国内国外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事务，因此不可能同时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进行全面的和有系统的准备工作。但是，自从中缅两国总理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会谈公报中提出“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以后，我国政府就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必要的准备。政府的各有关部门会同云南省当局，对有关的历史文献和实际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和详细的调查研究。

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当中缅双方为边界问题的解决分别地积极进行准备的时候，在两国的边境上，双方的前哨部队由于误会曾经发生过一次不幸的武装冲突事件。这次事件，经过中缅双方的努力，得到了适当的处理，同时也使中缅两国政府体会到及早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必要。

从一九五六年年初起，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开始了频繁的接触。同年十一月，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吴努主席应邀来北京同我国政府商谈。我国政府根据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对中缅边界问题调查研究

的结果，通过吴努主席向缅甸政府提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第五十次会议同意了这项建议。

中缅两国的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三段还存在着未决问题。我国政府针对这三段边界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并且认为建议中的各点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现在，我说明一下政府提出的这项建议的内容。

第一是关于在阿佤山区的一段。中英两国在一八九四年和一八九七年签订的两个关于中缅边界的条约中，对于这一段边界都曾经有明文规定。但是，由于有关的条文自相矛盾，这一段边界长期没有划定。为了造成既成事实，英国在一九三四年初派遣军队进攻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所管辖的地区，遭到了当地佤族人民的英勇抵抗，这就是有名的“班洪事件”。一九四一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同国民党政府于六月十八日用换文的方式在阿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它片面有利的边界。这就是所谓“一九四一年线”。由于不久就发生了太平洋战争⁽¹⁷³⁾，在这条线上并没有树立界桩。一九五六年，在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进行商谈的过程中，缅甸的领导人员曾经表示能够理解中国人民对于“一九四一年线”的不满情绪，但是鉴于这段边界已经通过当时负责的中英政府

以换文划定，因此要求我国政府予以承认，并且要求我国政府把在一九五二年由于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而进入“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的中国军队撤回。我国政府认为，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来的要求，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商谈求得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促进这种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替这种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我国政府在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表示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地区。同时，我国政府要求，在中缅两国政府没有对“一九四一年线”问题取得最后协议并且树立界桩以前，缅甸军队不进驻中国军队自“一九四一年线”以西所撤出的地区，但是缅甸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

第二是关于在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区，又名南畹三角地区，面积约二百五十平方公里。这个地区是中国的领土，过去英国在条约中也明文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在一八九四年中英两国签订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以前，英国就不经中国的同意，强行通过这个地区兴修由八莫到南坎的公路。到一八九七年，中英两国再一次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的时候，英国又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中国的这块领土的管辖权。缅甸独立以后承继了对这个地区的“永租”关系。我国政府在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指出，由缅甸继续对中国的一块领

土保持“永租”的关系，是同中缅两国目前的平等友好关系不相称的。我国政府表示愿意同缅甸政府商定如何废除对勐卯三角地“永租”关系的具体步骤。

第三是关于尖高山以北的一段。这一段边界过去始终没有划定。英国曾经在这个地区不断地制造纠纷，借机扩大它的殖民领域。最严重的就是一九一一年初英国对片马地区的武装侵占。“片马事件”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全国各地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在一九一一年四月十日给当时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正式承认，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各寨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却毫无道理地继续侵占这个地区。根据对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結果，我国政府对于这一段边界的划定，向缅甸政府提出以下的建议：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可以按怒江、瑞丽江（又名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我国政府同时要求，在中国军队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的同一时期内，缅甸政府也把军队从片马、岗房、古浪撤出。在这一段最后划界以前，缅甸政府可以保留在片马、岗房、古浪地区的行政管理，而中国政府保证，在这一段边界最后划定以前，中国军队将不进驻这个地区。

在我国政府提出了以上的建议以后，吴努主席表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在吴努主席同我国政府领导人员会谈后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又宣布，中缅两国政府取得谅解，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到一九五六年年底，中国军队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在一九五六年年底以前，中缅两国政府分别完成了撤军的工作。这就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去年十二月在仰光和今年三月在昆明，中缅两国政府的领导人员又有机会对两国边界问题继续进行友好的商谈，进一步澄清了彼此的观点，在总的方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全国各界人士都很关心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了广泛地征求国内各方面的意见，我曾经代表政府在今年三月中旬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在北京的人大代表、政府成员和特邀的专家也出席了那次会议。今年三月底，我又在昆明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召集的由云南省各界和各兄弟民族代表参加的会议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在这两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会议上，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使政府有机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且对有关问题作了解答，这就进一步统一了全国各方面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看法。

以上是我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大

致经过。现在，我要说明一下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中所遵循的基本政策。

我们的国家自从开国以来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也正是这个基本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缅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正象其他亚非国家之间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样，都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政策所造成的。现在，中缅两国都已经取得独立，都在努力为本国的和平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缅两国又是同印度一起首先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7]的国家，我们都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我们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才能更好地维护我们各自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从来没有停止利用亚非国家的分歧在这些国家之间制造紧张和不和，竭力企图重新对这些国家实行“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政府在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这样，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不仅会使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且还将有利于亚非国家的团

结。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

中缅边界问题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因此，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如何对待历史资料，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正象封建时代的许多国家一样，四至疆界是不十分明确的。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同边沿地区各个民族的关系也有各种性质和程度的不同。因此，要确定中国封建帝国的疆界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近六十多年来，国内和国外出版的地图中，先后出现了对中缅未定界的许多很不同的画法。这些情况不能不在广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对中缅未定界的混乱看法。政府认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同时，更要注意到中缅两国已经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变化，那就是，中国和缅甸已经分别摆脱了原来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和互相友好的国家。缅甸政府继承了原来受英国统治的地区，不同民族的自治邦同缅甸本部组成了缅甸联邦。我国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些历史变化，同时也要按照一般国际惯

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只有把以上各点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够正确地运用历史资料,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的解决。

中缅边界问题直接地关系到聚居在中缅边境的各民族的利益。因此,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就特别需要照顾这些民族的利益。我们知道,两国之间的边界把聚居在边境的同一民族划分为二,是常见的事。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中缅已定界的各段,在我国和许多其他邻国的边界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同一个民族分居边界两旁的情况。我们在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的时候必须事先估计到,有关民族被边界线分隔是难以避免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更加需要同缅甸政府协商采取措施,使将来划定的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进一步发展两国边民之间的亲密联系。

各位代表,中缅两国政府根据友好的精神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对中缅边界问题进行了多次的接触和商谈以后,已经在总的方面取得一致意见。我们相信,通过继续的协商,把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加以协调以后,中缅边界问题就将得到全面的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同美国青年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五七年九月七日)

华伦·麦肯纳^[174]团长(以下简称麦): 首先我们要向总理表示十分感谢,您昨天见到我们以后,今天下午还愿意见我们,并且同我们进行友好的和不拘形式的谈话,这是对美国人民的一种友好的表示。我们来自美国各地,具有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观点,但是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尽量了解新中国,同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向我们所遇到的人解释美国。我们有很多问题要问。我们有大多数人相信,和平事业不仅是职业外交家的事情。因此,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个事业里也有合法的权利。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 你说得很对。

中国人民很欢迎美国朋友来中国访问。我们两国人民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彼此来往得很多。最近这个时期中断了。这次你们一来就来了四十一位,你们做了打开两国人民来往的先锋。因此,我代表中国人民非常欢迎你

*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会见第一个来我国访问的美国代表团的谈话记录。原载《中国青年》1957年第20期。

们,同时,中国政府也欢迎你们这种友好的访问。刚才你们的团长说得很对,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去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因此,你们在中国访问期间,不仅在北京,还可以在外地,跟中国人民、首先是和青年朋友接触,这对于打开两国人民来往的关系是一件好事情。你们将要从直接接触中,看到很多事情,听到很多事情,知道很多事情,这些直接接触比我跟你们诸位谈什么恐怕更为有益。而且你们会从直接的接触中,用你们自己的智慧和良知来加以判断,比我来向你们诸位介绍要好得多。可是今天既然约诸位来了,接见诸位了,那么你们有问题,还是问吧。

麦: 我们事先有个协议,每人只可以问一个问题,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机会。

周: 这是机会均等。

麦: 对。

史蒂·泰勒⁽¹⁷⁵⁾: 二十四个美国记者是否被允许进入中国?

周: 关于记者问题,就适用你们团长刚才说的在你们当中达成协议的原则,就是机会均等,彼此互惠,就是说,有来有往。你们诸位会问,为什么去年中国政府批准很多美国记者来。我们去年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愿望:先从中国方面主动打开这个局面,先让美国记者来,然后,我们相信会引起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的同等的回答,就是

给中国记者开门，让他们到美国去访问和报道消息。但是，我们去年的这个努力没有达到我们的希望。不仅中国记者不可能去，而且美国记者也不被允许来中国。

今年美国国务院改变了一个花样。虽然答应了一定数目的通讯社和报纸派记者到中国来，但是规定他们来中国的任务，而且肯定地是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来搜取情报。并且更进一步把门关起来，使中国记者得不到互惠去美国。这样一来，就把文章作死了，作绝了，就如同我开始所说的，你们团长所提的精神——机会均等和彼此互惠就不可能了。因此，我想这件事情还应当经过新的努力，要使双方能在互惠的基础上交换记者。这是一种正规的办法。今天在座的虽然没有记者，但是听说也有几位朋友兼作记者职业，这等于说美国记者先到了中国。并且，在今天以前，也确实有三位美国记者到过中国。从你们的接触中，可以看到中国是不是愿意对外国新闻记者开放，并且在互惠的基础上开放。

博布·威廉逊⁽¹⁷⁶⁾：我们大多数人同意世界和平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最基本的是要中美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为了促进这种良好关系，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步骤，特别是中美两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步骤？

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在人民方面的来往，我们一向是积极支持和赞助的，

诸位的到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希望以后还能发展这种访问。你们诸位知道，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还没有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可是中日两国人民的来往，两国团体的来往，在最近三年来非常发展。这种发展无疑问地对两国关系的友好是有很大的推动力的。在这一点上，也影响了日本政府。这个经验可以提供给你们诸位，并且通过诸位提供给美国人民参考。

至于谈到政府方面，我们希望在日内瓦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168〕当中，能够达成一些初步的协议。虽然这个会谈已经经过两年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失掉希望。即使达成的协议是微小的或者是在个别问题上的，但是也可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协议都应该是平等的，对等的。

杰克·罗森〔177〕：今天我有机会去访问了在中国的一个美国犯人，你知道，在华美犯问题是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论的问题。中美两国正常关系的建立对这些美犯的地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有的话？

周：你能够见到美国犯人很好，可以看到他在中国的情况，生活情况。请经过你转告他的和其他五位的家属。中国政府历来说，如果他们的家属愿意到中国来探望他们的亲人，我们是愿意接待的。

你说得很对，美国人民很关心在中国监狱里的六位犯人的情况。同时我也希望在座的朋友知道，中国人民

也同样关心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特别是在美国留学的五千多学生。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家属都在大陆上，他们很困难和家属通信，因为我们两国还没有直接的邮电来往，他们更得不到机会回来看望他们的家属，他们也很难得到机会把他们从美国学到的知识带回到祖国来用于工作。这些事情是中国人民和这些人的家属经常关心的。所以从两方面的事情来比较一下，诸位就会晓得。中国的犯人在美国有三十多位，绝大多数都还在美国的监狱里。这个问题就更加重了中国人民的关心。这样的问题我们希望总可以逐步地得到解决，但是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建立正常关系的障碍，就是说我们两国关系的恢复不应该拿这样的问题来作为先决条件。因为诸位可以想一想，如果拿这样的问题来作为先决条件，那么中国就要等五千多名留学生回来以后才承认美国。这不能成为条件，这样的条件怎么能够提出？

盖·卡勒万^[178]：在什么情况下，美国犯人才能得到释放？这样的释放是不是会改善中美的关系？

周：我刚才已经说过，中美关系的改善不应该拿这个问题作为先决条件。六个美国犯人在中国将要根据中国的法律处理，正如美国国务院所说的，中国在美国的侨民和留学生回国的手续也是根据美国的法律办事一样。当然，中国的法律还有一条例外，就是在监狱的犯人，如果表现良好的话，就可以提前释放。这样的规定不仅对美

国犯人，而且对本国和其他在中国的外国犯人一样适用。

埃尔·威廉逊^[179]：我们两国之间更加密切的关系，对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周：如果中美两国友好起来，毫无疑问，对两国经济的发展都会有好处。不言而喻，中国是在建设当中，诸位已经看到一些，将来还能看到一些。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这对我们中美两国，也不例外。当然，这种友好来往，经济来往，也是要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正是亚非会议^[103]二十九个国家所通过的原则。

帕提·泰勒^[180]：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些美国犯人没有公审？为什么没有发表关于他们犯罪的确切性质和他们的辩护论点的详细新闻报道？

周：关于在中国犯法的美国人，我们是经过法庭判决的，判决以后文件是公布了的。他们审判的程序是根据中国当时的法律手续进行的。这是我们的内政。这种程序不可能在每个国家都相同，正如同美国有许多审判的程序和办法跟别的国家不同一样。

乔安妮·格兰特^[181]：总理认为继续扩充军备，继续发展核武器，特别是苏联试验洲际导弹成功，对世界和平有什么影响？

周：扩充军备，制造各种原子武器，各个国家试验氢

弹、导弹这类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这当然对和平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赞成裁军，停止制造和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包含导弹在内，也主张从外国撤退军队，取消在别的国家的军事基地。如果都能够这样做，那对世界和平是一个重要的保证。但是要做就要大家一道做，首先是大国一道做，不能要求哪一个先做或者单独做，这是无法保障和平的。在这方面，苏联提议大家一道裁军，一道停止制造、使用和试验原子武器、氢武器，但是也赞成首先停止试验。遗憾的是苏联的这种提议，在裁军会议上没有得到一致赞成。所以，到现在仍然成为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要求各个国家、首先是各个大国来实现的一个任务。如果你们在座的诸位是主张所有国家一起这样作的话，我们中国人民，包含中国政府在内，是支持你们的。那就是说，要求大家一起作，不是要求哪一个单独作。

希勒·格林堡⁽¹⁸²⁾：既然现有情况是扩充军备，继续制造和试验核武器，中国是不是也要自己制造和试验氢弹？

周：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没有。我刚才说是遗憾，但是也可能是幸运。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可以不担心这类事情。

拉里·莫耶⁽¹⁸³⁾：毛主席和周总理是不是愿意在个人基础上和艾森豪威尔⁽⁴⁸⁾见面，来调整两国的关系？

周：为改善两国关系，我个人自从日内瓦会议⁽⁵²⁾、

万隆会议一直到现在都在努力，并且也愿意这样做。但是象你提的那样的具体问题，现在很难回答。

夏格·阿维迪亚恩^[184]：既然知道如果用武力把台湾拿下来，就会引起一个普遍战争，我想问一下总理，为什么不在台湾问题上声明不使用武力？

周：台湾是中国的，中国要怎样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你可以想一想，假使有一个国家拿武力占据了美国的火奴鲁鲁（檀香山），然后跟美国朋友说，你收复火奴鲁鲁不许使用武力，假使你使用武力，就要引起世界大战，美国人民会怎样感觉呢？中国如何能够在日内瓦中美会谈中，在美国的武力威胁底下，答应美国说中国在台湾不使用武力？

朱迪·柯林斯^[185]：你认为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对世界和平有什么影响？

周：我首先要说明，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现在坐在联合国的是不能代表六万万中国人民的台湾蒋介石集团，它不是真正的中国政府。所以放在联合国面前的问题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联合国没有新中国参加，要解决世界上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远东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很困难的，是不可能的。因此，新中国不在联合国是联合国的损失，并不是中国的损失。象你们已经看见的一样，新中国是要继续存在下去的，不管在不在联合国里面。

丹·奥康奈尔^[186]：你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曾经说，美国人民是要求和平的。你是不是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并不能代表美国人民的意志？可是在上次的选举中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投了两党的票。而中国政府说这两个党遵循着同样的政策。

周：这个问题是美国内部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是要你来回答的，而不是我能回答的。你自己来回答比我更恰当。

丹·奥康奈尔：不。

杰里·菲迪勒^[187]：美国国务院对我们说，我们来中国和中国青年接触并且亲眼看看中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违反美国最大利益的。我知道周总理不愿意干涉美国的内政。可是，你是否能够对这件事情评论一下？特别是对今后美国人民到中国来旅行的问题。

周：你问我个人，我是看不出美国青年或美国其他的朋友到中国来有什么违反美国最大利益的。诸位既然来了，大概诸位也是这样感觉，来看看对美国的利益有什么违反，如果违反，诸位就不会来了。我看诸位都是爱护美国爱护祖国的嘛。但是美国国务院说不是，说你们来中国是违反美国最大利益的。这不是矛盾吗？但是这位先生说不是。虽然我们两人见解不同，但是这不要紧。

李却特·兰恩^[188]：目前的反右派斗争^[189]是否与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一致？

周：是一致的。因为百花里面有好花，也有坏花。坏花大家就评论它一番，说它不好。花以外，还有毒草，长出来以后，就要把它锄掉。

尤金·布朗斯太因^[190]：你是不是认为共产党中国不久的将来会被吸收进入联合国，如果不是这样，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周：我希望把这个名字更正一下。中国国家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好象美国叫“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不能把美国叫做艾森豪威尔美国，或者共和党美国。那样说是不那末恰当的。不错，艾森豪威尔领导美国，但只能说美国是在艾森豪威尔、共和党的领导之下，正象中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一样。国家是人民的，人民选举代表来领导这个国家。这个思想不仅中国人民有，美国的先哲林肯^[191]说得很好：国家应该是属于人民的。至于问到联合国能不能恢复新中国的地位，障碍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要我直接说，现在就是美国政府在阻碍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

佩吉·西格尔^[192]：是不是能够评论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联合国关于匈牙利问题的报告采取什么政策？

周：简单地说，我们是反对这个报告的，因为这个报告是站在干涉匈牙利内政的立场上，是片面的，而且歪曲了当时匈牙利的事实。

劳勃脱·寇因^[193]：我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支持各国，特别是中东、非洲和亚洲各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的。如果有这些运动的国家在国内镇压共产党，不给本国人民充分的政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还支持？

周：我们支持这些国家，就是这些被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国家的独立的愿望，是根据万隆会议的原则，也是根据我们过去曾经遭受同样的遭遇而给以同情的。至于这些国家内的一些措施，好的或是不好的，那是他们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只要这些国家为着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为着和平，反对战争，我们都应该支持。

拉里·施瓦兹^[194]：我听人说，现在在中国领导人员中对于国内政策有很大的意见不一致，特别是关于“百花齐放”的政策。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不一致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是否能够取得协调？你是否认为现在有人争权夺利的问题？

周：很遗憾，我都不晓得，你倒晓得了！我完全可以向你声明，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流言或是挑拨。如果有人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员之间发生他们所希望的这种事情，那他会落空的。

拉里·施瓦兹：请你不要感到遗憾，你的话使我感到很高兴。

苏珊·基德^[195]：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允许进入联合国的时候，如果国民党在那里还有代表，你们是不是会

同意去？

周：不，我们不会去的。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不能同意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宁肯不去，这是肯定的回答。谢谢你提这个问题。

迪恩·霍赛^[196]：美国国务院曾经说过，不能同中国作大量的生意，因为中国不能提供美国所需要的商品，我想问一下中国能够提供什么商品来换取美国商品？

周：中美两国已经八年没有作买卖，我对美国市场的需要不很清楚。美国国务院是根据一种假定。我不能再根据假定来回答。我们要根据实际的接触。经过直接的接触，这种可能就会增长起来。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是在建设中的国家，一个是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当然是有贸易可以互通的。我在开始已经讲过，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孤立的。

诺埃耳·卡勒万^[197]：到底谁决定哪些花是有毒的？

周：人民。这很容易，经过大家识别就能够看出来。所以我们开展大辩论，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单位，工厂、学校、农村、机关都是全体人民参加辩论，开大会、小会辩论。大是大非在广大人民中是看得很清楚的。

埃地·霍克曼^[198]：美国国务院曾经说过，在中国发生过各种暴行，被清除的人以百万计，这就作为不承认中国的理由之一。他们又说，在西藏发生了什么事，你是否愿意评论一下？

周：一个革命的国家，当它初建成以后，总有一些反对新政权最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国家要清除一些，镇压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美国和法国的历史中也有过这样的事。总之，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政。我在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对待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消灭其肉体的人数只占极少数。

至于说到西藏发生的什么事情，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相反地，倒是美国有一部分人通过西藏的几个坏分子，进行西藏“独立”的活动，这被西藏领袖达赖喇嘛^{〔199〕}所拒绝了。这件事情倒可以提一提，这就是世界上常说的在别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这是一种敌视中国人民的行动。

麦：总理在四点钟还有一个约会，如果我们再问更多的问题，那就太打扰了。我代表大家感谢总理给予我们来华以后的一个特殊的光荣。我们的问题提得很直率，回答也很直率。这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到中国来以后，学会了一句中国话，虽然我们说的中国话很不好，但是我们的精神是好的。这句话就是“和平万岁”！

周：谢谢你们大家。正因为美国人民是热情而直率的民族，所以我也就用直率的语言来回答各位提出的问题。我过去也曾经认识许多美国朋友，我们也是这样彼此交谈的，所以今天我用对待过去的美国朋友的态度，来

对待新的美国朋友。因为这样可以把我们中间彼此不了解的问题弄清楚一些。当然，不可能一次谈话就可以帮助诸位了解全部的问题，但是，我希望这种谈话你们还可以在其他的场所找别的朋友谈得更多。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接触。

祝大家愉快和健康。

新中国坚持反对 制造“两个中国”*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现在,我要说说美国为什么要转到制造“两个中国”上来。问题的焦点就是美国要把台湾掌握在它手上,以便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新中国总要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式承认的,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中国是存在和发展着的,而且要永远存在、发展下去。美国就想在这一天来到之前搞成“两个中国”,把台湾掌握在它手中。

但是,对美国很不幸的是,不仅新中国不承认“两个中国”,就是蒋介石现在也不承认“两个中国”。为什么蒋介石不承认呢?因为蒋介石如果承认台湾是独立小国,那么,他要代表全中国的幻想就破灭了,跟随他从大陆去的军队和其他人员也就要散伙了,只会剩下一小撮他的追随者。美国就可能随便找另一个人代替他,或是胡适〔200〕、李宗仁〔201〕,或是其他人。正是考虑到这种情

* 这是同各国驻华使节的谈话节录。

况，蒋介石就要反对“两个中国”，他叫嚣反攻大陆，就是要表示他代表全中国。但是，美国怕蒋介石反攻大陆，把它拖下水。蒋介石要派军队反攻大陆，我们很欢迎，正好消灭它。美国如果跟着他干，就会引起大战。在这种情形下，美国要搞“两个中国”，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这就在台湾和美国之间发生了争吵。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正在压蒋介石接受“两个中国”的主张，要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上制造“两个中国”的客观形势，特别是想让新中国默认这种形势。如果新中国默认了，美国就可以向蒋介石说：“新中国都承认了，你还不承认？”如果蒋介石那时还不接受，美国就要换掉蒋介石。

从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168〕到这次国际红十字大会〔202〕，都可以看到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在日内瓦会谈中，美国要跟我们发表共同声明，其目的是要我们承认美国在台湾的“合法”地位，这是我们决不能同意的。美国提出的声明草案的要点是要中美两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针对这句话我们就问：是不是美国将从台湾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它不能作这个保证。既然不作保证，它的军队留在台湾地区，我们又不能使用武力，那美国就永远呆在台湾了。因此，如果我们同意发表这个共同声明，那就等于承认美国在台湾的地位为合法，我们不能上这个当。

在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里，美国的代表公开说，这

个国际组织中既然有两个越南、两个朝鲜，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据十一月九日美联社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说：既有北越、北朝鲜、东德，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这都是举例。最直接的证明是美国在国际红十字大会上把蒋介石代表带进会场。这种情形我们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为中国问题同越南、朝鲜、德国的问题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朝鲜、两个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结果，而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也一直在为和平统一而奋斗。越南分为南北的暂时现象是由日内瓦协议〔108〕承认的，越南人民也在为和平统一而奋斗。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胜国，是反法西斯侵略最早的国家。过去是蒋介石代表中国，但是他挑起内战，人民把他推翻了，新中国代替了旧中国。蒋介石逃到台湾，如果没有美国保护，问题早就解决了。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六十年前中日战争〔78〕后被割给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表的《开罗宣言》〔13〕规定，台湾应还给中国，日本投降后已经归还中国。这个事实就连美国政府也不能否认。美国著名的艾奇逊白皮书〔95〕（一九四九年八月）上说，根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开罗宣言》，台湾应归还中国，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国军队从日本人手中将台湾的行政管理权接收过来。这是在中国大陆已经解放之后，美国政府所承认的。那时中国政府派去接收的是陈仪〔88〕，后来他被蒋介石杀掉。陈仪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台湾发表的广播声明中说，“从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又宣布，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14〕}，“台湾已经交给蒋介石委员长。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在同一天，艾奇逊又对杜鲁门的声明作解释说：“中国人已统治台湾四年。美国或任何其他盟国从未对该项权力及占领发生过任何疑问。当台湾被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曾对此提出过任何法律上的疑难。此举经认为是符合各项协定的。”所以拿美国政府的声明都可以证明台湾已归还中国，并且已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的一个省，这是无可怀疑的。

中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是个内政问题。是美国政府违背了自己的声明，要来霸占台湾，干涉中国内政，这是一九五〇年六月的事。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美国霸占台湾这一非法的行为。美国要把台湾变成它的保护国，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

应当区别两件事：我们愿意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这是

一件事；但是我们不能接受美国的威胁，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保护”台湾，这是另一件事。如果美国要以侵占台湾来威胁我们，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被威胁的一方。这个问题僵下去，美国要负责任。我们相信这个问题越僵下去，时间对我们越有利，因为台湾总要被解放，台湾总要回归祖国。正因为如此，我们绝对不能容许在国际活动中出现“两个中国”。

我们愿意在此声明：任何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活动中，如果出现“两个中国”，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还有其他“中国”，不论是用“中华民国”、“台湾中国”、“台湾政府”、“台湾当局”或其他的名义出现，我们宁可不参加。参加了就是默认，默许其存在。

我们懂得，在座的诸位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友好国家，都希望新中国能参加更多的国际活动，共同致力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共同致力于和平和国际合作事业。这一点我们很理解，很感谢。但是，我们应当说明：参加国际活动的方法很多，我们不一定要同蒋介石代表坐在一起参加国际活动。我们可以同蒋介石的代表或同蒋介石本人坐在一起会谈，或者是他派人到北京来，或者是我们派人到台北去，那是为了解决国内问题。这是我们国内的事。但是在国际场合中不能出现“两个中国”的情况。我们应当向在座的亲爱的朋友们说清楚，我们愿意尽一切力量为国际和平和合作而努力，甚至我们也不拒

绝和美国代表坐在一起会谈。三年前在日内瓦，我们和美国代表就在一起开过会。现在我们的王炳南大使每月一次在日内瓦和美国代表见面，感谢瑞士政府给我们这个和平的场所。虽然两位大使的会谈打破历史上的记录，已有两年多了，但还是要谈下去。美国大使说要谈多久就谈多久，我们的大使也说要谈多久就谈多久。我们说，两年不够，也许要谈十年、二十年，可以长期谈下去。致力于和平，我们是决不落人之后的，但如果国际场合中有蒋介石的代表在，我们就决不参加。这一点希望在座的尊贵的朋友们会了解并转告你们的政府。

这里有个问题要讲清楚。我们是否会提出要求，希望你们的政府也不同蒋介石的代表坐在一起呢？不是这样。因为这同承认是两回事。承认新中国当然不能又承认蒋介石，承认“两个中国”是不友好的。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只能承认有一个政府，我们是遵守这一原则的。我们还是承认美国政府是美国的政府。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中支持新中国还是支持蒋介石，也是对新中国友好不友好的问题。比如：这回印度政府代表团留在会上斗争到最后一分钟，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这是友好的态度，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现在向在座各位说清楚，在国际活动中如果有蒋介石的代表，我们就不去，但是我们不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要求在座各位的政府的代表也不同蒋介石的代表坐在一起。我们

只要求各位所代表的国家在会议上支持我们，不支持蒋介石，这就是友好。我们在国际会议上只支持你们的政府，决不会支持你们国内别的政府。诸位所代表的国家参加的会议，如果蒋介石的代表在，我们就不能去。要请诸位了解我们的情况，也请各位所代表的政府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不是不跟诸位所代表的政府合作，而是我们不能同蒋介石的代表坐在一起，让“两个中国”出现。我们原来打算在去年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比赛，一听到蒋介石的代表去，我们就不去了。考尔夫人^[203]说得很好，她说如果知道蒋介石的代表会出席，她就不会让会议在印度召开了，因为印度只承认新中国。我们不参加某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我们还可以用别的方法参加国际活动。比如我们可以参加地区活动，单独的往来。诸位在北京看得很清楚，我们各种国际活动往来很多，包括在经济、文化、政治、科学等方面的活动。当然，最好全世界各国在一个国际组织里共同努力，从裁军、禁止核武器开始实现持久和平，这是最理想的。所以印度尼赫鲁总理和梅农^[204]先生也说，联合国不恢复中国的席位是联合国的损失，这是一个真理。但是，既然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只好采取别的方法。

附带说一下，有些友好国家担心中国同美国搞得太尖锐，能不能和缓些？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为和缓紧张局势作了不少努力，比如在日内瓦会议^[52]上，在万隆会

议^{〔103〕}上，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我们都作了不少努力。但得到的结果却是美国要制造“两个中国”。我们必须明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妥协，不能含糊，也不能默认。希望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使我们为难。反过来说，也就是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影响我们的友好关系。这个问题是美国挑起的，因为美国要搞“两个中国”。毛主席常引用中国古代人说的话，叫“后发制人”，这是老子的哲学。就是说，这一切事情是美国挑起来的，既然来了，就不能不回答，“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两千年前《礼记》上说的。我们是不向人挑衅的，但是对别人的挑衅我们非回答不行。你不回答，他就会说你默认“两个中国”。

今天我在“两个中国”问题上谈得特别多，是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有了国际红十字大会生动的东西，所以向诸位把我们的立场说明。我们可以预料这类性质的事情今后会一天天多起来，不仅是国际奥委会的会议、国际红十字大会，还会出现在别的国际场合。以后在别的场合我们采取同样的态度时，诸位所代表的政府就不会感到突然，就会理解我们的立场了。

另外，我还要说一句，新中国坚持反对制造“两个中国”，而美国则向蒋介石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蒋介石承认“两个中国”，这将有助于把蒋介石推回到祖国来。这个情况是很微妙的。

我占的时间太多了，很感谢诸位光临。希望在座的大使、代办和朋友们转告各位的政府，我和外交部同仁不胜感谢。

台湾海峡形势和我们的政策*

(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

现在，整个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九月三十日杜勒斯^[51]发表的答记者问说明美国的态度起了变化。杜勒斯的讲话虽然没有那么明确，但仍含糊地表明：如果中国方面实行停火，美国可以劝蒋军撤离沿海岛屿。显然，美国基本上是想执行一项从金门脱身的政策。

杜勒斯作出这种表示以后，蒋介石十分生气。蒋介石事先知道杜勒斯的讲话内容。因此，他在九月二十九日就讲了话，后来又在十月一日讲了话，再三地骂美国对不住他。最近，他向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发表谈话时还要英国劝美国不要上当。这是很滑稽的。

昨晚印度大使紧急地告诉我说，梅农^[204]认为目前局势发生的变化已促成一种趋势，因此，他打算在联大作一个一般性的发言，其中建议蒋军撤离沿海岛屿并要求我们不打它。过去英国想过问，我们拒绝了。联合国的

* 这是同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的谈话节录。

哈马舍尔德^[97]想通过挪威过问,我们也拒绝了。美国本来不愿意请印度出来,但这次只好请梅农出来了。美国如果不作表示,梅农感到没有把握时,他是不会愿意出来的。现在正因为美国找到他,他感到有把握,才打算提出这个建议。设想的情况是,梅农提出这个建议后,得到联合国内各国的赞成,也得到其他各国的赞成,这样就可以借联合国来压蒋介石并要求我们让步,美国在这中间就可以讨价还价了。

我们估计,美国手中有三张牌:

(一)保卫金、马。九月十八日美国提案^[205]要求我们对金门停火,我们立刻予以反驳。美国侵占台湾,我们一直反对。现在进一步要侵占金、马,我们更坚决反对。美国不敢单独为金门而参与战争,因为国内人民反对,其他同盟国家也反对。同时,如果美国要为金门而战,我们是准备同它打的,站在我们后面的还有苏联。美国在第一方案中要保卫金、马,经我们一驳,它收回了这张牌。

(二)搞“两个中国”。九月三十日美国提案^[206]的中心意思是把中国和苏联列在一边,把蒋介石和美国列在另一边,抛出“两个中国”的阴谋,要求我们在事实上承认。我们坚决反对,并且将继续反对。

(三)冻结台湾海峡。美国想劝蒋军撤离沿海岛屿,用来换取冻结台湾海峡的局势,要我们对台湾不使用武力,即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合法化和“两个中国”的“事实上

的存在”。美国还不会马上打出这第三张牌。杜勒斯答记者问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杜勒斯赶紧写信给蒋介石进行解释和安慰。同时，艾森豪威尔〔48〕又向民主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表示，美国不能在武力面前屈服。可是接着又说，如果中国共产党停火，还可以考虑。这说明，美国想从金、马脱身，但还是摇摆不定的。

根据上述情况，昨天我告诉印度大使，我们不要梅农提这个建议。我们不能因为只谈金、马，而换来一个美国占领台湾的合法化，换来所谓“两个中国”的存在。

此外，近日亚非国家正在酝酿由八国委员会〔207〕起草一份有关台湾局势的声明。昨天我告诉印尼大使，我们认为，亚非国家中存在两种不同立场，难于通过一项共同声明，最好还是不要搞这种共同声明。如果声明中提到停火，这有利于美国，我们反对。如果声明中既批评美国，又批评中国，是非不明，反而不好，我们也不赞成。如果声明公正，那就应当包括：确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准外国干涉，美国应当撤离台湾海峡地区，不许制造“两个中国”，中美应当继续谈判等要点。可是，一些追随美国的国家是不会赞成的。与其不能通过这种公正的声明，不如亚非国家不发表什么共同声明。

另外，今天早晨陈毅〔208〕同志接见了同我国建交的八个有关的亚非国家的驻华使节，就酝酿发表上述声明的事情，表明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并作了解释。

九月三十日我向你谈过，我们本来准备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收复沿海岛屿，第二步是解放台湾。后来，金门炮响后，这对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民起了动员作用。全世界各地都掀起了反美浪潮，其范围之广超过黎巴嫩事件〔209〕。现在的情况已经弄清楚了。美国知道我们不准备同它打仗，美国掩护了蒋介石的船只，我们并不打它，我们也不打算马上解放台湾。我们也知道，美国不准备为金门而同我们打仗，并且严格约束它的海空军不要侵入我沿岸三海里到十二海里。现在，美国只是想如何劝蒋军从金、马撤走，不使自己的兵力陷在这个地区。

正如九月三十日我向你谈过的，我们初步认为，把蒋介石留在金、马比较好。现在通过党中央讨论后，我们还是认为，最好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沿海岛屿上。蒋介石留在金门、马祖，美国继续干涉，有极大好处。可以教育各国人民，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民。美国想从金门、马祖脱身，我们不让它脱身，我们要美国从台湾撤军。这样，我们要紧张时，对金门、马祖打一下，要和缓时，松它一下。象少奇同志向你所说，在金门可以小打、中打、大打。我们可以谈谈打打，也可以打打停停。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暂时不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我们争取一下子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澎湖列岛和台湾。

为此，我们决定由我们国防部长发表一个告台湾同

胞书。从十月六日一点起，我们停止炮击七天，允许蒋军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此外，还建议同蒋介石直接进行谈判，和平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因为我们对蒋军采取的是惩罚性的行动，所以只要蒋介石听话，我们可以和缓，如果不听话，我们将继续惩罚。这样，我们一直处于主动地位。

我们发表这个告台湾同胞书是要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现在在金门岛上八万蒋军是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是陈诚⁽²¹⁰⁾唯一的力量。蒋介石想要死守金门，拖美国下水，陈诚则愿意保住这些部队。如果我们围死金门，美国将更便于动员陈诚劝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撤走。如果我们让这些部队留在金门，蒋介石、陈诚可以用来与美国讲价钱。在告同胞书中，我们警告他们，美国是会抛弃他们的，没有必要为美国利益而互相打仗，要再打三十年也是可以的，但最好还是谈判解决。

当然，蒋介石也许会立刻举行记者招待会，骂我们想挑拨美蒋关系，说根本不可能同中国共产党人坐下来谈判，等等。但是，他心里会暗自觉得这里有文章可做，可以向美国进一步讨价还价。这是蒋介石一贯的手法。另一方面，美国人也会评论，说中国共产党想挑拨美蒋关系等，可是心里会怀疑，为什么金门快被我们封死而忽然又放松了，是否蒋介石同我们有什么默契。蒋介石叫得越厉害，美国的怀疑也会越厉害。

这样，我们在美国面前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使它很难处理的问题。美国本来准备劝蒋军撤走，现在就为难了，如果再劝蒋军撤走，蒋介石就会说美国要抛弃它了。美国不劝蒋军撤走，我们就达到了目的。

西藏问题与中印关系*

(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

我想讲一讲西藏问题和中印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迅速前进的新社会要代替停滞不前的、落后的旧社会。在西藏一百二十万人中,绝大多数人要求以新社会来代替黑暗的旧社会。反对这种变革的统治阶级只是极少数的人,他们害怕自己的统治被推翻。当然,这些人的态度也不一致,有的坚决反对西藏改革,有的不坚决,有的不反对。尼赫鲁^[28]和印度上层人士很怕西藏改革,反对改革,甚至说改革不可能。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但他们却反对西藏的改革,这就发生了他们干涉我国内政和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7]的问题。他们希望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这是

* 这是会见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等十一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的谈话节录。

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的争论中心。

我先谈谈西藏的历史。世界人民对西藏历史有神秘之感，尤其是近一百年来，英帝国主义把西藏历史歪曲了，在世界人民当中制造一些虚假的传说和错误的概念。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世界上还有一些人不完全懂得，不完全承认，尤其是资产阶级，他们不承认，并制造一种传说，好象西藏一直是独立的。西藏在古时候曾是一个独立王朝，但七百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大家庭的一员了。十三世纪时，元朝蒙古族上层统治中国，西藏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现在盛行的喇嘛教派（黄教），就是在蒙古族上层统治中国时成为主要的教派的。达赖成为西藏的统治者是十七世纪时清朝册封的。“达赖”这个词不是藏语，而是蒙古语，是大海的意思。七百年来，西藏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新疆划给沙俄帝国主义，西藏划给英帝国主义。但俄国革命以后，列宁取消了不平等条约。可是印度一部分上层人士还继承英国过去的政策，把西藏说成是一个“独立国家”，说中国只有“宗主权”，或把西藏说成是“保护国”。

知道了历史背景，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用什么借口来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是说西藏曾经是独立王朝，因此现在也应该保持独立。这个论据如果能成立，世界上的国家就要四分五

裂，天下就要大乱。七百年前，就是英国本土也不是统一的，印度更是四分五裂，有许多土邦。那么，现在是不是应该恢复原状呢？

二是说凡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就要保持完全的自治，照英国的解释，就是独立、半独立，也就是保护国。这个论据如果能成立，凡是多民族的国家都要分崩离析。印度、英国、美国也统统要分裂。印度的民族也很复杂，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语言，没有一种语言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使用的。那么，印度是否要分裂成许多国家呢？

三是说宗教相同就可以干涉别国内政。印度说西藏和印度都信佛教，而且佛教是从印度去的，因此印度对西藏要干涉。这个论据如果能成立，东南亚许多国家，印度都可以干涉了。那么，天下岂不要大乱了吗？如果说佛教发展不发展，别人都要干涉的话，那么中国也可以过问印度的事情，因为中国信佛教的人比印度信佛教的人多。印度信印度教的人多，但印度教并不是佛教。如果这样，亚洲又要大乱。当然，我们对此毫无兴趣，决不过问。

这些论据都不能成立，都是站不住脚的。印度一部分上层人士，按照尼赫鲁的说法是同情西藏人。实际上是同情农奴主。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西藏停滞不前，不改革，作为“缓冲国”，置于印度势力之下，成为它的保护国。尼赫鲁说，这是印度人“本能的反应”。这很对，的确是他们阶级本能的反应。

我再谈谈西藏叛乱和我们平息叛乱的问题。西藏叛乱是因为西藏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存在着最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农奴制残余。农奴主包括三部分人，一部分是大官僚，一部分是寺院的管事大喇嘛，一部分是贵族，总共六万人左右，他们拥有全部土地和绝大部分的牲畜。农奴没有土地，世代代为农奴主耕种，子子孙孙都是农奴。不仅生产的东西要送给农奴主，而且还要服差役和兵役。农奴主可以互相赠送农奴，稍不如意，就对农奴打骂杀戮，割耳朵、割鼻子、剜眼睛，其残酷是骇人听闻的。这是中国土地上一个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的社会制度。旧中国不可能改变这种制度，不管是蒙古族、满族或汉族的统治，都不能使西藏起变化，只能使黑暗制度继续下去。英帝国主义者侵略西藏，更利用这种落后制度，通过一些农奴主残酷地剥削农奴，把羊毛、皮张和矿产搜刮出去。所以，这些农奴主同时又是大买办。现在跑到印度去的就有一些大农奴主，同时又是大买办。这些农奴主在西藏掌握实权，达赖喇嘛只是他们的工具。自从清朝册封五世达赖掌握政权后，不到三百年，一共十世达赖，其中一个被废掉，四个暴死，这一个被劫持去印度。达赖要到十八岁才能管事，他身边的人往往不等达赖大了，就把他废掉或搞掉，另找一个。这些反动的统治者最怕改革，在中国反动政府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西藏的黑暗统治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加深。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

军和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员进入西藏以后，那里就起了根本变化。党和军队正确执行了民族政策，不能不使停滞不前的社会起某种变化，那里的阶级斗争有了新的变化。农奴敢于起来反抗农奴主，并且要求推翻农奴制度，一个静止的高原变成了一个要爆发的火山。这就使得农奴主中一些最顽固的分子极端反对改革。另一方面，有一部分开明的人看到变革不可避免，也向我们提到要设法改革，但主张用温和的办法，避免严重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原可采取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发动群众改革，这样快一点。一种是等待上层分子更多地觉悟以后再进行改革，这样慢一点。达赖^[199]也表示要改革，但要求慢一点。尼赫鲁见了达赖以后也说，达赖表示西藏社会经济落后，需要改革。所以，我们就采取慢一点的方针。这是西藏的内部情况。

外来因素也妨碍西藏改革。印度一部分上层人士希望西藏落后制度不变，保持使西藏成为“缓冲国”的想法，在西藏反动集团中起了很大作用。西藏反动分子纷纷到噶伦堡去，他们同蒋介石、美国、英国的特务来往活动，没有印度的许可是搞不成的。所以我们说，多少年来噶伦堡就成为西藏叛乱分子在外国活动的中心。西藏上层统治阶级要维持剥削，反对改革，这是西藏叛乱的主要原因，但没有外来的鼓励、煽动，也不可能发动这样的叛乱。这些叛乱分子在印度听到和当年从英国听到的相类

似的话，因此，他们就把希望寄托于印度。另一方面，他们对我们的等待政策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不敢搞改革，会继续退让，甚至可能把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当他们搞起叛乱后，我们还是责成西藏地方政府平叛。这当然不可能，因为叛乱就是他们搞起来的。但是，这样可以暴露他们，使广大人民知道他们反对改革。所以，从三月十日到三月二十日之间，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多数人参加了叛乱，达赖被劫持，写了三封信〔211〕。在他们充分暴露并向当地驻军开枪以后，我们才还击。这时西藏人民都清楚了，我们一还击，两三天内拉萨的叛乱平定了，俘虏了四千多人，然后调兵去山南。我们等待了七八年，他们一叛乱，很快就平定了，所以如此快，是因为广大人民支持。全西藏的叛乱分子将很快肃清，因为一共只有两万多人，反动头子只是极少数人，被俘虏的人很快觉悟。现在，一部分人回家生产了，另一部分人跑到印度去了，大约有九千人。

西藏很快掀起一个民主改革的高潮。西藏的改革，前途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西藏人民的大喜事。对于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都是一件喜事。当然，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则是一个悲剧，他们幻想的“缓冲国”幻灭了。这样，印度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首先是大资产阶级就和我们对立起来，在报刊上大肆污蔑煽动，使印度一部分人受到蒙蔽。历史上英帝国主义者的胡说八

道，在印度的知识分子中散布得很广，影响还远没有肃清。因此，前一个时候从印度发出的对我们的攻击、挑衅和干涉的消息非常多，帝国主义对此很高兴，到处传播散布，民族主义国家也有一部分人出来说话，似乎乌云蔽日了。但是，分析一下，说这些话的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国家中的大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只占极少数，但宣传机构掌握在他们手里，就可以兴风作浪。他们说同情西藏人，实际上是同情连他们自己国家里也已经不存在的那种最黑暗的农奴制度。这次斗争，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在国内，我们是行使主权，我们站在西藏广大人民一边，要推翻黑暗制度，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进行改革。在国际上，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把西藏问题向全世界人民说清楚，把反动阴谋揭穿，把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干涉者的真面目揭露出来，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过去所不清楚的事和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当然，揭露需要时间，也要有准备。如果干涉者攻击我们一百年，我们也就准备回击一百年。真理越辩越明，印度的借口已经在一天天破产。印度想搞“缓冲国”，要西藏不改革，要解放军撤退等等打算，是不好公开说的，只好在幕后活动。他们公开还得说不干涉我国内政，对西藏没有领土野心，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巩固中印友好，等等。

对这些好话，我们当然欢迎。尼赫鲁最近说，他们对西藏没有做什么事，只是接待了达赖和一些难民。印度当然有权力给予避难，我们并没有说它不能这样做。尼赫鲁一方面说印度报刊上发表的对我国诬蔑、攻击的话是同印度政府无关的，因为印度有言论自由，但另一方面又说他们各方面是一致的。这就自相矛盾了。印度有言论自由，难道中国就没有言论自由吗？对于这类冷战的攻击，我们一定要回答。不仅印度，对于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也要回答，因为英国怂恿印度，坐山观虎斗，供给印度子弹。对于全世界反动报纸的攻击也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回答，这是政治斗争。尼赫鲁也懂得，他们的做法并不能改变西藏的平叛，改革一定要进行，“缓冲国”也幻灭了。剩下来的就是冷战。他们想用冷战和政治压力搞一个印度、中国、西藏的三角会议，来干涉中国的内政。他们现在已从各方面透露这种消息并且开始进行试探，这是英帝国主义者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搞西姆拉会议〔212〕的翻版。当时中国的袁世凯政府对西姆拉条约也是不接受的，怎么能设想现在的新国会接受呢？就连这种会议的方式也不能接受。班禅〔213〕说得很对，西藏问题只能在中国解决，怎么能到外国去解决呢？印度这种想法不可能实现，但它并未死心，还在试探。我们必须把这条路堵死。剩下来就只是达赖和一群难民，这就是它的资本。达赖如能摆脱劫持，是会回来的，但很困难。

我们同印度广大人民并无冲突。中印两国人民过去友好相处，今后还会友好相处。印度人民要维持中印友好，尼赫鲁不能不反映这种情绪，这也是他每次声明中的矛盾所在。我们对尼赫鲁还是采取留有余地的政策，又争取，又批评，又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在新德里答记者问*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日本新闻辛迪加印籍记者萨保华：阁下已经邀请尼赫鲁总理访问中国，尼赫鲁是否已经接受了邀请？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他将根据双方官员进行工作的情况来考虑。

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拉加凡：在印度，你给尼赫鲁总理的信已经全文发表了，但是尼赫鲁总理给你的信，中国报纸却没有发表。讲到言论自由，你是不是准备让中国报纸全文发表这些信？

周：这位先生可能没有读过中国报纸，中国报纸早就把尼赫鲁总理给我的信和我给尼赫鲁总理的信全文发表了。

* 周恩来于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在印度进行友好访问，并于四月二十五日晚十时半到二十六日晨一时在印度总统府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参加这个招待会的有一百五十多名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记者。周恩来首先发表了书面谈话，然后回答了记者所提出的问题。这篇答记者问刊载于一九六〇年四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印度《政治家报》记者钱德拉：我想问一下，是什么阻碍你回到边界一两年以前的情况，因为行动是在一两年以前采取的。

周：在中国这方面，这一两年同过去一样，中国政府从来没有采取行动改变边界现状。

《印度教徒报》记者兰加斯华米：在谈判当中，两国总理认为哪一段分歧最大？

周：东段和西段都有争议。中段争议比较小。

在东段，我们的地图所画的边界线在印度地图所画的边界线南边，在印度地图上划入印度的这块地区，是久经中国行政管辖的地区。印度在独立以后逐渐向前推进到它目前在地图上画出来的这条线。印度政府要求我们承认这条线；有时候，印度政府甚至公开说这是麦克马洪线⁽²¹⁴⁾。我们绝对不能承认这条线，因为这是英帝国主义在它同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的秘密换文中非法画出来的，中国历届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这条线。虽然如此，我们愿意在中印边界问题解决前维持现状，不越过这条线，并且在谈判边界问题时，我们也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由于我们采取这样一种谅解和让步的态度，所以东段边界的讨论就显得时间用得少。

在西段，中国的地图关于边界线的画法和印度的地图是不一致的。历来中国地图关于这一段边界的画法虽然小有出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可是印度地图却变动

了许多次。中国一直按照中国地图的界线实施行政管辖，即从喀喇昆仑山口，向东南大体沿着喀喇昆仑山脉的分水岭到空喀山口，再从空喀山口向南直到帕里河附近处，这一条线以北和以东的边界地区，历史上从来就属于中国管辖的。其中大部分，包括阿克赛钦地区，是中国新疆管辖的，小部分是属于西藏管辖的。这种历史上的行政管辖，我们有很多的历史文件和资料作为证明。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就管辖这个地区，把它作为连接新疆南部和西藏阿里地区的主要交通要道。关于这个地区，印度地图的边界画法，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是跟中国地图相接近的。一八六五年以后到一九四三年这个时期，印度主要的地图对这段边界的画法模模糊糊。一九五〇年印度官方地图用颜色涂出印度现在主张的这段边界的轮廓，但仍然标明这个地方是未定界。最后，直到一九五四年正和东段边界一样才变为诸位现在在印度报纸上所看到的那个地图的正式画法。因此，就是从一百多年来印度自己的地图的演变，也完全可以证明这个地区的边界是没有划定的。我们要求印度政府对这个地区采取同中国政府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即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场，同意从事谈判，并且不越过中国地图上所标出的中国行政管辖线。印度政府对这个问题不完全同意。因此，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两国总理在这方面讨论时间也特别用得更多。

在中段,也有争议,但那是属于个别地方的问题。

《印度时报》记者维尔吉斯: 中国对不丹有什么要求?

周: 很对不住,我们对不丹没有要求,也没有争议。你会记得,中国政府在给印度政府的信中,两次提到中国同锡金、不丹没有边界的争议,而且也很尊重印度和锡金、不丹的正当关系。

《巴基斯坦时报》记者罗伊: 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说中国要求珠穆朗玛峰,情况怎样?

周: 谢谢你提醒这个问题。明天我们就要到尼泊尔去了,我相信,我们会很友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的。

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特朗: 我是说,中国认为这个山峰是中国的,是否是真的?

周: 事情的经过并不象诸位所知道的那样。因为这是属于外交问题,我们两国总理会谈的详细内容我不打算在这里宣布。

英国《每日邮报》记者阿特金森: 你对你在德里的会谈,是否感到高兴? 因为中国没有放弃一寸土地给印度。我愿意提醒阁下,印度在这次会谈的基础,就是要中国洗刷侵略。

周: 中国从来没有侵略任何国家的土地,而且在历史上一向被人侵略,现在中国还有土地被别人侵占,例如台湾。我很高兴,中印两国总理在会谈中完全同意双方不提领土要求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证明会谈是在友好

的基础上进行的。至于说到侵略别人的土地，这位先生代表英国报纸，当然会知道，英国到现在还占领着中国的什么地方。

印地文《今天报》记者查图维迪：印度政府在提请中国政府注意中国地图的时候，中国政府曾经说这是国民党时代画的，没有经过有系统的仔细勘察，一旦仔细勘察以后，就要进行订正，这是否是真的？为什么你在跟尼赫鲁第一次会晤和第二次会晤的时候，都没有提出地图问题，而现在你却要根据中国历史坚持中国的要求，而要印度忘掉在英国时期发生的事情？

周：中国的地图是根据历史延续下来的情况画的，这当中有些地方与实际管辖情况有出入，对于这一点我们历来就是这样说的。不仅跟印度有这样的情况，跟别的邻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反过来说，别的国家的地图同中国交界的地方也有这种情况。因此，我们才多次跟尼赫鲁总理说，中国地图在双方经过勘察和划定边界以后，我们将根据双方的协议来修改各自的地图。关于这一点，先生可以从中缅边界协定中得到证明。这就是说，一旦我们签订中缅边界协定后，双方都要修改自己的地图。但是绝不能在勘察和谈判划定以前，单方面地把自己的地图强加给另一方，要对方按照自己的要求修改地图，这不是友好的态度，也不是对等的态度。因此，我们不能这样做。

《联系》周刊记者贝迪：朗久情况如何？

周：朗久是在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这是历史材料证明了的，但是印度政府却把朗久说成是在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

《印度斯坦时报》记者斯瓦鲁普：你跟印度领袖会谈，是否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在印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信任正在变化，阁下是否采取了一些很激进的步骤来改变这种形势？

周：我不是象你那样看的。我在书面谈话中已经说过，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边界问题的争议是暂时的。在两国政府交涉解决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一时的隔阂，但是，经过这次会谈，双方进一步增进了了解。我相信，这一时的乌云是会消除的，因为中印两国人民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我们不仅过去友好，而且会千年万年地友好下去。我愿意向在座的各位，特别是向广大的印度人民表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于印度和中国周围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我们绝不会侵略任何国家的一寸土地，当然我们也不容忍人家侵略我们。至于中印两国关系，我坚决相信边界的一时纠纷能够得到解决，两国人民会永远友好下去，印度绝大多数人民愿意对中国友好的观念也没有改变。不久前，在德里的中国农业展览得到广大印度人民的欣赏和重视，就说明了这一点。我愿意借此机会通过各位向广大的印度人民致谢。

我和我的同事们自然可以在促进中印友好方面做一些工作，但是最重要的是两个伟大国家十亿人民的团结，这是任何反动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北美新闻联盟和妇女新闻社女记者谢巴德（以下简称谢）：你可否考虑邀请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北京，但并不因此约束美国要承认红色中国？

周：你的好意却被你提出的条件打消了。因为既然美国不承认新中国，中国如何能够邀请美国的元首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北京呢？

谢：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代表妇女新闻社提出的。你作为一个六十二岁的人看来气色异常好，你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是否经常运动？或者有特别的饮食？

周：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英国广播公司驻德里记者惠勒：在你同印度领袖的会谈中，他们是否提出了中国侵略了印度的问题？对这样一个基本分歧，两国在会谈中如何解决的？如果这个问题在两国总理会谈中没有解决，官员们会谈又如何能解决呢？

周：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想法。在这次会谈中，我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印度政府的首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仅不合乎客观事实，而且是不友好的。我只能说，我们两个友好的国家不愿意在这一点上满足西方

国家的希望。

《阿萨姆论坛报》记者夏尔马： 鉴于关于乌热这块小地方的谈判还拖了三年时间没有解决^[215]，两国政府是否给了他们的官员特别的指示，使将来的会谈加速进行？

周： 乌热问题尽管争议了很久，但是并没有引起冲突，而且总会解决的。关于两国官员会谈的职权范围，联合公报已予发表。当然为了便利他们的工作，两国政府还要进一步分别给他们以指示。公报已经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希望两国官员的工作有利于两国政府进一步考虑解决边界问题。

《印度时报》记者英德捷特： 你说一个国家不应把它的地图强加于另一个国家。为了保持你所说的永恒的友谊，你能否同意把拉达克地区中立化，就象尼赫鲁总理所建议的那样？

周： 在这次会谈中，尼赫鲁总理并没有坚持这样的要求。如果尼赫鲁总理提出要中国从阿克赛钦地区就是你所说的拉达克撤出，那么，中国政府也可以同样地提出要印度从东段地区就是在中国和印度地图在东段画法有很大出入的那个地区撤出来，这印度政府如何能够接受？当然中国政府并没有那样提出。

《联系》周刊记者贝迪： 可否认为，你的立场已经从开始谈判时有了改变？

周： 中国的立场就是友好地、公平合理地解决两国

的边境争议，首先达成原则的协议。这个立场没有改变。至于具体问题，这次会谈没有能够接触很多。

印地文《新世界报》记者萨克森纳：除了边界问题外，两国总理曾否提出了一些埋怨的问题，如西藏问题，达赖喇嘛⁽¹⁹⁹⁾政治避难问题，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⁶⁷⁾问题？印度人民和政府是否做了一些事冒犯了你们的感情？

周：提到西藏问题，达赖、主要是他的追随者为了维持在西藏的农奴制度而进行叛变，但失败了，他们逃到印度来。在印度，他们得到政治避难。这是国际上通常惯例，我们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是他们到印度以后的活动超过了这个范围。印度政府曾多次对中国政府说，将不让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在印度进行任何反对新中国的政治活动。但是达赖及其追随者在印度国内和国外进行的反对中国的活动，已有不少次。这是我们感到遗憾的。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印度政府所承认了的。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绝大多数西藏人民现在已经从农奴制度下得到解放，他们分得了土地，进行了民主改革。西藏经济将不断发展，人口也将会增加，它将永远成为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行为本身就违背了中印两国所共同倡议的五项原则。

《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弗里登贝格：你在今晚的书

面谈话中谈到，双方在解决问题以前，可保持一条实际控制线。假如不能获得解决，你是否也会建议这样做？

周：这条实际控制线，不仅存在于东段，而且存在于西段，存在于中段。对双方来讲，保持这条实际控制线，并且在边界各段都停止巡逻，就能够避免边境冲突，便利谈判的进行，这是我们所坚持的。

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记者鲁佩耳特：在联合公报中曾提到，双方讨论了国际形势。你可否告诉我们一些在这方面的会谈情况，特别是中国对于大国会议的态度？

周：公报上已经提到我们对即将举行的大国会议寄以希望，希望它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禁止核武器，促进裁军。至于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全面裁军问题、柏林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的主张。

《巴基斯坦时报》记者罗伊：你这次来，发现尼赫鲁同上次一九五六年时是否一样，还是有些不同？

周：尼赫鲁总理和我个人都一样表示了维持中印友好的共同愿望。关于边界问题，我们各自阐明彼此的意见和立场，在这方面谈得多些。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麦克法尔加：达赖喇嘛来到印度时，中国政府的声明说他是他的随从者劫持下被迫来到印度的。由于这种想法，当你们成立新的西藏政府的时候，给达赖保留一席的位置，但在你刚才回答问题

时，你说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进行着某些反对中国的活动，好象达赖在印度是一个自由而独立的人，因此我要问：一、什么使中国政府改变了以前的看法？二、你们采取了什么行动来告诉中国人民，达赖喇嘛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三、西藏自治区领袖的职位是否还给达赖保留着？

周：达赖在离开拉萨以前，当时写给中国当局的三封信^[211]，证明他是被他周围的人劫持的。这三封信，达赖到印度后也承认了。中国人民对达赖是留有余地的，不仅给他保留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位，并且还保留着他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位。但达赖周围的人，却使达赖越走越远，拖他背叛祖国，尽量阻挠他回到祖国的怀抱。至于现在达赖的自由意志究竟有多少，因为我没有见到他，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泰米尔文日报《每日新闻报》记者库尔卡尼（以下简称库）：你除邀请尼赫鲁总理外，曾否邀请其他部长访问中国？

周：我们在同印度政府其他部长们见面时表示过邀请他们访问中国。当然，正式的邀请还有待于政府发出请帖。

库：你是否邀请了所有部长？

周：我们并没有邀请所有部长，如果他们愿意去访

问中国，我们是欢迎的。

《组织家报》记者马尔加尼：如果双方官员也象两国总理一样达不成协议，那将怎样？

周：我不愿作这种悲观的想法。我们是抱有中印友好的信心的，事情总会向有利方向发展。当然这需要一些时间。如果我们没有真诚愿望和信心，我们不会到德里来。如果需要的话，为了伟大的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我，或者其他人，还会再来德里的。

关于促进中日关系的 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日本人喜欢用三原则,现在我也说一个三原则,这就是中日贸易的三原则。这个三原则是在同岸信介^[216]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过去中日双方曾经搞过民间团体协定,想通过民间协定来发展中日贸易。经过岸信介政府这一段时期,证明这种做法行不通。岸信介不承认、不保证民间协定的实施,并且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来破坏它。我们不能容忍这种行动,只好将中日贸易来往停了两年多。根据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中日贸易如果能够逐渐恢复起来,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但是,池田^[217]政府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现在提出贸易三原则,就是:一、政府协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

首先,一切协定今后必须由双方政府缔结,才有保

* 这是同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的谈话节录。

证,因为过去的民间协定,日本政府不愿给以保证。至于政府协定,总要在两国政府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并且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才能签订,否则不可能签订。关于两国政府的关系,还是坚持过去我们说过的政治三原则。过去的政治三原则并不是对日本政府有所苛求,而是很公平的。这就是说:第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并不敌视日本,并且承认日本的存在,高兴地看到日本人民的发展。如果双方进行谈判,当然以日本政府为对手。但是,日本政府对日本并不如此,不承认新中国的存在,而且相反地敌视新中国,承认台湾,说它代表中国。日本政府也不以新中国政府为谈判的对手。第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国这样做,日本追随,我们当然反对。第三,不要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我们这个三原则是很公道的,反过来看就清楚了。第一,中国政府并不敌视日本,愿意同日本友好;第二,中国政府只承认一个日本,并不搞两个日本,而且要谈判总会以日本政府为对手;第三,总是鼓励、支持和帮助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为什么日本政府不该这样做呢?新的日本政府,最近有些讲话是不好的,我们还要看一看。一九五七年我当外长,一九五八年陈毅副总理当外长,两次谴责岸信介政府的对华政策〔218〕,都是根据岸信介很多敌视中国的言论和活动才这样做的。所以现在对池田政府也要看一看。基于上述

情况，我们得出结论：两国任何协定都要通过政府来签订，民间协定没有保证，这包括贸易、渔业、邮政、航运等等。

其次，是不是没有协定两国之间就不能做买卖呢？不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是可以的，可以签订民间合同。比如日本某企业同中国某公司双方表示友好，又根据双方需要，就可以谈判签订合同，做一笔定期的生意。如果合同履行得好，双方关系也好，两国政治环境又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把短期合同变成比较长期的合同。这是从前途方面着想的。

再次，是个别照顾。这样做已经两年了。中小企业有特殊困难，日本总评〔219〕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斡旋，这是对的。今后还可以继续照顾，并且根据需要，数量也可以增加一些。

日中贸易促进会可以根据上述中日贸易三原则，对你们认为友好的、有可能做的、对双方都有利的生意，可以进行介绍。可以同我国的国际贸易促进会接洽，他们懂得这个三原则。个别照顾，中华全国总工会也知道，可以找总工会谈。铃木〔84〕先生回去以后，也可以同日中贸易促进会〔220〕的有关公司的朋友们谈谈。

通过和平协商解决 中美之间的争端*

(一九六〇年八月三十日)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 我在瑞士驻华使馆国庆招待会上提的建议〔221〕并不是新建议, 是中国政府几年来一直提的。就在今年四月, 我在人大的报告〔222〕中也提到同样的建议。但是, 八月份再提这个建议, 就有了新的意义。西方舆论正在造谣说, 中国已经放弃和平共处的政策。因此, 我们再来重申这一主张就更能引起亚洲和世界人民的注意, 揭穿帝国主义的谎言。你作为注视一个国家政治事件发展的人, 不能不注意到我们今年已跟三个亚洲国家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一月, 跟缅甸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四月, 我访问尼泊尔时, 跟尼泊尔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八月, 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访问阿富汗时, 跟阿富汗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已经是三个了, 还不算过去跟也门签订的友好条约, 跟

* 这是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节录。

印度、印尼、柬埔寨、锡兰〔104〕等发表的共同声明。

今年签订的这三个条约都是根据我们历来的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你知道，五项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要在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地区这样一个大的范围内签订和平公约，就需要有更长的时间来为此而奋斗。这不象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问题那么简单，特别是其中包括了中美两国的关系。但是，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们重新提出这个建议后，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亚洲许多国家的支持。在东京召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全面裁军世界大会也很支持这个建议。这就说明，现在再提这个建议就有了新的意义。

（火车抵达怀柔水库后，总理和斯诺下车参观水库，回到车上后又继续交谈）

周：建议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各国缔结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这牵涉中美两国的问题，也牵涉中、苏、日、美四国的问题。不能设想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就会签订和平公约，也不能设想不解决中美在台湾地区的争端，两国就可以建交。这是两个重要的事实。所以说，要实现这个建议得经过长期的奋斗。既然需要长期奋斗，我们为什么又要不断地提出这个建议呢？这就说明，中国人民和政府愿意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反对以武力或武力

威胁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

你可能不同意说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侵略政策，但是我首先要证明这一点。中国解放后，美国政府曾经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这是艾奇逊^[11]在白皮书^[95]中说的，杜鲁门^[223]后来也说过。而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内政，台湾确实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归还了当时的中国政府，是被当时台湾省省长陈仪将军接管的。这位将军后来被蒋介石杀了。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47]开始，杜鲁门改变了政策，对中国采取了侵略政策。在出兵朝鲜的同时，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并对台湾实行了军事控制。从那时起，美国开始了对中国新的侵略，中国政府不得不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侵略台湾和陈兵台湾海峡。不久，我们又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21]，直逼鸭绿江，中国不能置之不理。这个警告是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转告美国的。美国政府不顾这个警告，中国人民只好采取抗美援朝^[28]的行动。但那是在美国陈兵台湾海峡和对台湾实行军事控制的四个月以后，并且是在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之后才采取的行动。这四个月内，杜鲁门发表了好几次声明，为他的侵略行为辩解。但是，他无法为侵略台湾、陈兵台湾海峡的行为辩护，他也没有听我们经过印度大使转告的警告。

经过两年半的谈判，朝鲜战争终于停止了。一九五八年，中国志愿军已经全部撤出朝鲜，而美军至今还留在

南朝鲜不撤，美国至今仍然以海陆空军控制着台湾和台湾海峡。这岂不是美国对中国继续采取侵略政策的最好证明吗？更不要说美国在亚洲建立了那么多的军事基地，签订了那么多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侵略性的军事集团条约了。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我们和亚洲国家签订的都是和平友好条约。

既然美国对中国采取了这些侵略行动，我们是不是要用武力来解决中美争端呢？不是。我在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103]期间就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两国之间存在的争端，虽然我们两国还没有互相承认和建交。经过英国的斡旋，我们的提议导致了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168]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

为了创造良好的气氛，在会谈前，经过印度的克里希纳·梅农^[204]的斡旋，和哈马舍尔德^[97]来北京的访问，我们释放了十一个所谓美国战俘。为什么叫所谓战俘呢？因为他们不是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在朝鲜战场上俘虏的战俘，除了一些自愿要求留下的，在停战后已经全部遣返回去了，而要求留下的人中后来又回去了一些。这十一个所谓战俘是驾驶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飞机被打下后被俘的。中美两国都曾宣称朝鲜战争只限于朝鲜，没有扩大到中国。这些侵华飞机是在中国被打下来的，我们不承认他们是战俘，但是为了给日内瓦大使级会谈

创造良好的气氛，我们释放了他们。

埃德加·斯诺（以下简称斯）：从那时候到现在，你们还释放过没有？

周：所谓战俘问题到此就结束了。中国监禁的其他美国犯人属于性质不同的范围。这些美国犯人分两种。一种是美国公民在中国搞破坏活动、间谍活动或在其他方面违反了中国法令而被捕的。还有一种是很特殊的，是美机空投下来的特务，如唐奈和费克图。你如有兴趣，我可以指定专人告诉你，他们如何和先前空投下来的中国特务进行联系，如何被捕，连飞机也被打下来了。这是个很有趣的事。

斯：我愿意知道。

周：我指定我办公室的人告诉你。

哈马舍尔德和梅农也不敢提这两个人的问题，因为这两个人跟朝鲜战争毫无联系，他们完全是特务。

斯：唐奈和费克图是在朝鲜战争时期被俘的吗？

周：是在朝鲜战争时期，但他们不是军方派的。艾伦·杜勒斯⁽²²⁴⁾大概知道这件事，他可以提供详细情况，但他也许不愿意象我们这样详细地告诉你。

自一九五五年八月到现在，中美会谈已经五年了，下一次会谈是第一百次。

斯：一百周年纪念。

周：第一百次。一百周年太长了，你愿意中美关系

问题等那么久才解决吗？

从会谈开始，我们就提出应以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美国拒绝了这项建议。一般人不能理解杜勒斯⁽⁵¹⁾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建议。你记得这个建议吗？你懂得为什么杜勒斯要拒绝吗？

斯：我不记得了。

周：这是个最重要的建议，美国封锁了它，后来我们公布了。为什么杜勒斯要拒绝呢？因为他知道，达成这样的协议就意味着下一步要讨论美国武装力量如何和何时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问题。

斯：我想起来了，美国没公布这个建议，报上没发表，后来我听说了，我在《当代历史》杂志上看到了，后来又在《人民中国》上看到。我在作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时提到过建议中的几句话。

周：后来，我们在华沙大使级会谈时又提出一项新的建议，保留了原有建议的原则，但进一步具体化了。美国当然更不同意，美国不愿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因此会谈拖了这么久。

我们认为，中美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端是国际问题，新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台湾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军事行动则是内政问题。美国说两者不能分，我们说可以分开，必须分开。既然中美两国可以在日内瓦、华沙进行大使级会

谈，那么，中国的中央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也可以同时进行谈判。一是国际问题，一是国内问题，两者可以平行进行，分别解决。

中美谈判总要先达成原则协议才能解决具体问题。原则协议应当包括两点：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应当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第二，美国必须同意将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至于什么时候撤以及如何撤的具体步骤是下一步讨论的事。只要美国政府不采取侵略中国的政策和不以武力相威胁，就必然会得出这个合乎逻辑的结论。

斯：撤走武装力量，是否包括自沿海岛屿撤出？

周：美国政府根本不承认它有军队在沿海岛屿上。

美国武装力量是否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这是中美之间争端的关键。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活动方针是为了制造“两个中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是这样。鲍尔斯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重新考虑中国问题》的文章。文章发表后，不仅引起大陆中国人民的反对，而且也引起了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反对。受台湾影响的香港报纸说，对“两个中国”的问题，共和党采取消极等待的态度，民主党则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这话有一定道理。鲍尔斯自己也说，他这个建议大概不仅会受到大陆中国的反对，而且会受到在台湾的国

民党的反对，还会受到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反对。可见这种做法是没有前途的，而且是在解决中美关系问题上打了个死结。

斯：也许可以说是个试探气球，这比说死结更为合适。

周：应该这么说：如果只是试探，不行就改，那就可以叫试探气球；如果试探不行，还要坚持，那就是死结。

如果美国坚持侵华政策，不去解决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如何能得到解决？这就使问题复杂化、长期化了。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总是要得到解决的，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有一点，美国如不放弃侵华政策，不放弃战争威胁，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我们不相信美国人民会允许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永远继续下去。中美两国人民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他们终究是要友好起来的。

斯：刚才提到的两个原则问题，在华沙谈判中是否谈了很久了？

周：很久了。第一个原则是一九五五年底在日内瓦提出的，第二个原则是一九五八年秋天在华沙提出的。

斯：第二点是否也包括什么时候和如何撤出台湾？

周：美国必须首先同意撤军的原则，才好谈具体的问题。

斯：一九五八年以来，中美谈判就一直讨论这个问题。

题吗？美国政府坚持说，中国政府如果不宣布不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就不能达成协议。

周：美国政府坚持美国和蒋介石在台湾地区有“单独和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225〕。

斯：换言之，这是承认台湾是一个政府。

周：换言之，也就是要使美国侵占台湾和台湾海峡合法化，并造成“两个中国”的客观现实。这是全体中国人民都反对的。如果中国侵占檀香山而且派军舰到檀香山和美国大陆之间的海洋上去，或者中国去侵占长岛并派军舰到长岛和纽约之间的海峡中去，美国人将如何感觉？这样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中国人的情感了。

斯：长岛的例子更恰当。

周：当日本人进攻珍珠港时，美国人不是都起来反对了吗？

这是我要答你提的问题的主要部分，你还可以问，看完水库回来再谈。

（午饭参观了密云水库，回到火车上吃晚饭时继续交谈）

斯：今天不可能谈完所有问题了。

周：不限于今天一次谈话，你从西北回来还可以谈。

斯：那时候我提的问题也许会聪明些。

周：中美关系方面，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斯：关于中美关系问题，大体上都谈到了，只是有些

不具体之感。我想了解，在实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缔结和平公约的具体做法上，总理是否有什么新建议？从午餐谈话来看，有些问题你们认为是属于具体外交谈判范畴的。

周：总要根据形势的发展，才能决定具体外交政策，今天只是跟你谈原则问题。

斯：我大胆地设想，当前总理不打算提出新的具体建议。

周：首先要就原则问题达成协议。原则问题达不成协议，就很难谈具体问题。美国人有一种想法，原则问题达不成协议，先解决具体问题也好。谈判初期，我们也试过这个办法，先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引导到主要问题的解决。但是行不通，不解决原则问题，具体问题达成协议也无效。例如，关于提早释放在监狱里的双方侨民的问题。中国监狱里现在只有五个美国人，其中包括唐奈、费克图。但是在美国监狱中的中国侨民有多少，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将数目和名字通知过我们。表现良好的，他们也没有提前释放。美国的借口是，这些人愿意回台湾，不愿意回大陆，有的人不属于大陆，而属于台湾。这样，问题就复杂了。据我们了解，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从大陆去的。如果让美国按自己的意愿将中国人分成大陆的和台湾的，这就造成了“两个中国”的局面，把具体问题又引导到原则问题上来。这就证明，原则问题不先解决，具体

问题就无法解决。即使解决了，也解决不好。留学生的
问题也是如此。留学生绝大多数是从大陆去的，家也在
大陆，但他们很多人回不来。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必须
先解决原则问题，然后才能解决具体问题。

中日双方都应该向前看*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解放以后,中国只进行了十一年的建设,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努力,还要进行几十年工作,把中国建设得更好。因此,中国需要国内国外的和平环境。中国过去长期处在战争中,经过几十年的战争,人民取得了胜利,实现了国内和平。现在正努力争取国际和平,这一点凡是来我国参观的外国朋友,包括日本朋友都可以看到。

山本⁽²²⁸⁾先生说了一些告罪的话,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必再提,双方都应该向前看,中日两国人民要永远地友好下去。不错,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灾难。这个事情教育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懂得如何抵抗外来侵略者,使中国人民懂得一切侵略者必然会遭到失败。新中国是反对侵略的,也不会侵略别人,因为我们知道,侵略者必定失败。同样,日本人民在战争中也得到了教训。日本

* 这是同日本山本熊一率领的经济友好访华代表团的谈话节录。

在战争中遭到原子弹的破坏，损失很大，日本人民接受了教训，反对侵略战争的运动正在日益高涨。中日两国人民都应该以历史为鉴，努力消除近几十年来的不愉快事情的影响，使中日两国几千年来的友好关系在新时代的基础上，永远地发展下去。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地友好下去，这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共同的，没有冲突的。

经济界朋友是讲实际的。讲实际的人可以从近处看，也可以从远处看。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建设好了，强大了，是否会侵略别人？关于这一点，陈毅副总理已经答复过，我也想说几句。

我们只要想到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过去所受的灾难，中国人民是会汲取教训的，决不会走国家强大了就向外扩张的路。这不仅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制度所不允许的，而且从利害关系上看也不允许，因为凡是侵略别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凡千年来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发动侵略战争必定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也是如此。诸位会问，中国政府负责人讲的话用什么方法来保证呢？将近十年来，我们对许多日本朋友说过，中日两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87〕}改善关系，恢复邦交，签订和平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用法律来保证两国关系。实际上我们已经同亚洲许多国家，如缅甸、柬埔寨、阿富汗、尼泊尔建立

了这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的范围正在扩大。从长远来看一定会这样。中日两国人民需要通过往来不断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有了成效，今后继续这样做下去，成果会更大。

中日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在两国人民友好的基础上。因为这个原因，尽管中日邦交还没有恢复，日本政府承认蒋介石集团代表中国而不承认我们，在这样不友好的情况下，我们就特别加强两国人民的往来。有一个时期，到我国来的日本朋友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岸信介破坏了中日贸易协定⁽²²⁷⁾以后，双方往来曾经遇到困难，最近有了改变，往来又多起来了，这是可喜的现象。这次你们来，即使一笔买卖不做，也有收获，因为关系密切了，认识也接近起来了。两国人民的往来，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各方面的往来都可以增加。

中日两国经历了战争以后，出现了新的因素。不少日本人从中国回去，也有不少日本人留在中国。战争本来使人对立，但也增加了相互的接触和了解。诸位知道，五千多日本妇女同中国人结婚了，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两国已经有了亲戚关系。战争带来不幸，但也带来新的因素。当然，往来和婚姻是为了促进两国人民友好，而不是干涉内政，进行敌对宣传。例如在中国的战犯，绝大多数回去了。大多数回去后表现好，个别敌视中国的也有，他在中国犯了罪，当时在中国表现好。释放回去后，又在宣传不

利于日本人民的東西，宣傳法西斯思想，給你們造成了麻煩。釋放回去的人，一般說是好的，壞的是個別的。當年日本軍閥利用嵯峨浩^[228]，跟偽滿皇帝的弟弟溥杰結婚，企圖使滿洲徹底殖民化。這次溥儀的弟弟被釋放了，他的妻子要求回來。她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我們準備讓她回來。時代變了，人受到教育是會改變的，這種人還是多數。

諸位很關心中國的發展前途，同樣中國也很注意日本的發展前途。兩國是近鄰，自然會互相關心。日本正處在大變動時期，日本經歷了戰爭的災難，經歷了十五年的恢復時期，經濟有些發展，人民有些覺醒。日本前途如何，在日本人民中成為新問題。我們認為，廣大日本人民是爭取走和平、獨立、中立、民主道路的，幾年來國民運動的發展說明了這一點。但是，我們也看到另外有一小部分人想復活軍國主義，走日本的老路。前一條道路中國人民是支持的，因為和平、獨立、中立、民主的道路不僅對日本人民有利，對遠東和世界和平也有利。作為鄰邦，我們應該充分支持。後一條路對遠東和亞洲的安全是個威脅，對中國也是個威脅。過去軍國主義給亞洲造成災難，給中國人民造成災難，也給日本人民造成災難。因此，這後一條路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諸位會說，想走後一條路的是極少數人，實現的可能性很小，甚至沒有。在我們看來，這種可能性不能說完全沒有。日本統治階

级已经有人这样想，美帝国主义也想培养这部分势力作为它侵略亚洲的先锋队。美帝国主义想利用日本人流血，使亚洲人打亚洲人，让日本为它火中取栗。今天，作为友好邻邦我们愿意指出这一点，日本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是没有前途的。

假如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将会引起五个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

第一，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之间的矛盾。日本广大人民是要求和平的，不愿意再遭受战争灾难，不愿意再走战争的危險道路。因此，军国主义者要从战争中寻找出路，必然会引起日本人民的反对。

第二，旧军国主义首先向西侵略，九一八、卢沟桥两次炮声⁽²²⁹⁾，战争就开始了。今天时代变了。今天的中国是新中国，我们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外来的侵略，我们一定要进行抵抗，坚决击退这种侵略。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就会制造新的矛盾，同新中国不但不能友好，反而变成对立，这样对日本也不利。

第三，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后，向哪个方向发展呢？如果向南方发展，南亚的形势也和过去太平洋战争时期不同了，一些国家先后独立，都要争取发展，遇到侵略它们必然要进行抵抗。

第四，日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会加深。日本一旦复活了军国主义，要么听美国的话，但日本人民不同意；

要么不听，这样美国就要加紧控制日本。这个矛盾是解脱不了的。

第五，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经济界之间的矛盾也会发生。因为军国主义复活就要增加军费。对军工生产会暂时有利，但会给日本带来经济危机，这不利于广大的经济界，只有利于少数军工企业一时的发展。

如果选择和平、独立、中立、民主的道路，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上述五个方面的矛盾就不会发生。走这条道路，日本人民赞成，中日两国可以很友好，日本跟广大南亚国家也可以友好，日本可以摆脱美国的军事控制，而同样跟美国友好，日本经济可以在国内和平发展，也可以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上跟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这种发展比较正常，不会招来突然的重大损失，例如象战争所带来的损失。

山本先生说日本是太平洋的岛国。“日本可以对太平洋沿岸国家采取和平、友好、中立的政策，使太平洋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太平洋”——这是我国和平委员会主席、也是你们的朋友郭沫若说的。经济界人士要有远大的眼光，这样才能发展事业。从长远着想，这条道路不仅对日本人民有利，对亚洲、太平洋各国人民有利，而且对全世界各国人民也有利。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和政府向来支持日本人民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无论政治三原则⁽²³⁰⁾还是贸易三原则⁽²³¹⁾都是从中日友好的愿望提出

的。在一个时期内中日邦交不能恢复，不能签订政府间的协定，我们就进行民间往来，以促进友好。

致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电*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贝尔格莱德

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值此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232〕召开之际，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会议表示祝贺。并愿会议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 本文刊载于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

支持蒙哥马利元帅 关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 的三项原则*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蒙哥马利元帅(以下简称蒙): 我想问, 总理对当前世界局势的看法如何? 我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每次战后政治领袖们都说今后再也不会发生战争了, 但是两次大战、革命、民族运动又使得世界陷入纷乱之中。西方的政治领导人无法摆脱这种纷乱局面。在陈毅元帅举行的宴会上我提出了三点主张^[233], 我认为这可以导致世界摆脱这种纷乱局面。这三点主张过去我分别都说过, 但没有一揽子提出来, 那天晚上我一揽子提出来了。这当然不会受美国人欢迎, 我的很多主张不受美国人欢迎, 我并不在乎。我相信, 西方多数人, 普通的老百姓是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许多政府是同意我的意见的。英国政府也同

* 这是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节录。

意，只是不敢说，怕得罪美国。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动员世界舆论来赞成这三点。在外国军队撤退之前，我不相信会有持久和平。只要还有军队留在别国的领土上，并且随时在准备采取军事行动，那就会毒化东西方关系，只能增加东西方的相互怀疑和不信任。一些政治领导人想实现裁军，但他们不懂得只有把军队撤回本国去以后才能实现裁军。他们的做法相反是向国外增派军队，这样就加深了相互怀疑和不信任。我认为这完全是缺乏常识。我相信一般人会同意这一点的。我有这样一个信念，就是只有撤退外国驻军，放弃准备军事行动，才会有持久的和平。如果维持现状，则僵局将继续下去，僵局持续很长，那是危险的。虽然不致有核战争，但也会有其他威胁。总之一句话：他们准备用世界的财富来破坏世界财富，而不是用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教育和卫生水平。我认为这简直是发疯。但是，政治领袖们无法走出这种僵局，也许没有那些政客会更好一些。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我很高兴地看到你在陈毅元帅的宴会上的讲话，我也看了你写的文章，你归纳成为三项基本原则，我们完全同意和支持。明天晚宴上，我要表示支持你的三项基本原则。

这三项基本原则互相关联，可以分别实行，也可以同时实行。第一，只能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公正的主张，是与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舆论的呼声一

致的。联合国第十六届大会^[234]一开始就遇到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两个提案。新西兰提案代表美国的意见，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把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重要问题”，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其目的是把这个问题挂起来，或者推迟一年，或者交给一个小组委员会去研究，结果仍是拖延。这是适合美国需要的。另一个是苏联的提案，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我认为苏联的提案与你的主张是一致的。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是个程序问题。谁能代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只有如你所说的北京的政府，而不是台湾的蒋介石。如果接受了美国和新西兰的主张，把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当作“重要问题”来讨论，那就是讨论中国的存在与否，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联大讨论的“重要问题”只能是国际问题，而不能是一国的内政。内政问题怎么能在联大讨论呢？这次联合国的斗争是个考验，考验有多少国家是对中国友好的，站在你的这个主张的立场上的，有多少国家是站在反对你的这个主张的立场上的，有多少国家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

第二是两个德国问题。现在只能是两个德国，不可能出现一个德国。现在只有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既成事实。这是要造成一个和缓的局面所需要的。

第三点更带有关键性，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回本国领

上。这是一个更公平更彻底的主张。不仅我们赞成，赫鲁晓夫〔235〕七月八日在对苏联军事学院毕业生的演说中也赞成你的主张。

蒙：我读到了。

周：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回本国领土，我们不仅赞成，而且是这样实行的。我们未等美国同意从南朝鲜撤退军队，就从北朝鲜撤出了志愿军。美国军队现在还在南朝鲜。我们没有一兵一卒在国外。相反是美国军队驻在中国的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所以，我们举双手赞成你的主张。

美国最不愿意接受撤退国外驻军。美国在大半个世界建立了军事基地，派驻了军队，如果撤回去了，它对这些地方的控制就垮了。其实，我看不撤退反而会把当地人民得罪了，结果会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所有的基地都变成了绞索，使美国动弹不得，最后还是被赶走〔236〕。

美国如果接受你的主张，倒是可以摆脱被动局面，出现有条件的和平共处。如果双方都撤退了国外驻军，也许美国不放心，他们担心一下子撤得很远。他们说，中国离北朝鲜近，只隔条鸭绿江。美国要撤的话，最近也必须撤到日本，或者是撤回太平洋东岸美国本土。我们认为，这也有办法解决。大国可以订立和平公约，安理会有五大国，还可以加上中立国，召开大国会议来讨论、来解决。我们曾经提议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订立互不侵犯的和

平公约。所以我们非常赞成你的第三项主张，它可以作为实现全面裁军的前提。

当前世界局势的特点*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国际形势的发展,一天天有利于我们,这是可以肯定的。肯尼迪⁽²³⁷⁾上台以来,其所作所为的结果,反而不利于美帝国主义。今年四月三日,我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面临着五大矛盾,这就是它同本国人民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它同它的同盟国的矛盾,它同民族独立运动的矛盾,以及它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这五大矛盾,它都是无法解决的。

肯尼迪上台之后,想解救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但他是始终走不出死胡同的。因为他发展军火生产,扩军备战,企图从战争中找出路,但是现在还不可能打世界大战。最近肯尼迪在联大的演说,尽管有战争威胁的成分,但是也可以看出,敢于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还小。军火不能吃,也不能穿,又不能用,生产的军火技术水平

* 这是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提高了，原来的东西就成了废物，这不是最大的浪费吗？现在美国国内五百万失业大军仍在继续增加，人民的购买力仍在继续降低；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独立运动一天天发展壮大，美帝国主义的世界市场越来越狭窄，它是无法逃脱经济恐慌的。美国垄断资本之间，军火垄断资本同和平工业财团，也是互相竞争的。它同它的同盟国的矛盾也在发展。美帝国主义同亚非国家乃至拉美国家的矛盾也在一天一天发展。它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是两个阵营、两种体系之间的根本矛盾。以上这些矛盾，它都不能解决。

现在矛盾的主导方面是世界各国人民，这是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谁掌握了矛盾的主导方面，矛盾就要由谁来解决。当然，要彻底解决这些矛盾还是长期的事情，斗争还会有起伏，但是可以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解决。两个阵营斗争的胜负，决定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团结。其他矛盾的解决也决定于人民力量的强大。在今年四月三日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在讲话中曾经指出，四种力量的汇合，就是社会主义力量、民族独立运动力量、人民革命斗争力量和和平运动力量的汇合，决定着世界的命运。这也是去年莫斯科会议声明中所说的。这是现在世界局势的第一个特点，不管有任何起伏和挫折，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当前世界局势的第二个特点，是美帝国主义玩弄反

革命的两手。这次肯尼迪在联大暴露得更清楚了，公开表明，美国是假和平、真备战。但是，从肯尼迪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十年以前就说过，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还是进攻呢？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防御不是进攻。当然，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削弱了，帝国主义觉得有机可乘，它会是进攻的。如果我们的阵营是牢不可破的，是巩固的，强大的，它就会是防御的了。所以，马尼拉条约〔71〕也好，中央条约组织〔144〕也好，北大西洋公约〔110〕也好，都是防御性质的。肯尼迪最近在联大的讲话就是带防御性的。他承认核战争不能打，他说要么核武器结束人类，要么人类结束核武器。他这种讲法，当然有讹诈的一面，但是也不能不产生另外的影响，因为他的讲话，他本国人民首先读到，这就不能不影响美国人民。前些年，美国的国防部长福莱斯特不就是因为害怕核武器战争而跳楼自杀了吗？肯尼迪在联大的演说中，说了一连串骗人的话，他说要停止核武器试验，要全面裁军等等，但同时他又要搞有限战争。西柏林弹丸之地，美国非占不可，对老挝也在争。这是因为它把中间地带看做是自己的防线。毛主席说，美国的这种做法，是想把我们社会主义阵营“钙化”起来。这当然是它的梦想。我们说它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的，当然，并不排除它可能冒险。帝国主义终归是帝国主义，总有一批冒险分子，想在战争中找出路，尽管世界在变，但是他们

却仍然想走老路。美帝国主义有冒险性，也有软弱性，我们必须认清它的两面性。美国的软弱性，是由于人民的力量大于统治阶级的力量，而且在某些技术方面美国落后于苏联。杜勒斯^[51]搞边缘政策，打到边缘就不敢再打了。肯尼迪比杜勒斯进了一步，要打局部战争，但是世界舆论一反对，国内人民一反对，就停一下，这说明美帝的软弱。

当前世界局势的第三个特点，是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五年就说过：如果原子弹发展起来，许多国家都有了，原子武器战争就打不起来了。这次蒙哥马利⁽²³⁸⁾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向我说：如果核武器不是由少数国家垄断，大家都搞，核战争就打不起来了。他还问我们核武器到底什么时候能搞出来。我说大家都在搞，我们当然也要搞。如果能够禁止核武器，我们很高兴，但是在禁止之前，我们还是要搞的。至于什么时候搞出来，我回答他：日子很难算，你也很清楚，这不是下个命令就能限期搞出来的。但是我们总是要搞的。现在美国要和苏联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议，美国的盟国法国就不听它那一套，跟它闹别扭，因为法国不是核俱乐部的成员。现在日本、西德在搞，印度也要搞。大家都搞，核武器战争的可能性就小了。美国有人说，可以搞一种干净的核武器，将来打起来，只杀伤人，物质仍然存在。这是笑话。人不存在了，垄断资本家剥削谁呢？怎样取得超

额利润呢？谁来创造剩余价值呢？垄断资本家也要计算计算。因此，搞核武器的国家越多，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就越大，推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就越增长。打世界大战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核武器战争，一种是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战争，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禁止使用毒气一样。现在看起来，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因此，我们有争取一定时间进行和平建设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努力争取。

肯尼迪上台后主张打有限战争，这一点同杜勒斯不同，杜勒斯认为局部战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肯尼迪则宣传局部战争有可能避免世界大战。阿尔及利亚打了几年⁽²³⁹⁾，到现在也没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在台湾、老挝、古巴都试过了，确实没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炮声在世界上从未间断过，但是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肯尼迪政府主张打有限战争，是为了增加美国的军火输出，为了刺激军火生产，为了扩大军事条约。不管它找出多少理由来说明有限战争如何对它有利，但是有限战争的结果总是壮大了人民力量，削弱了帝国主义力量。因为局部战争总是在中间地带⁽²⁴⁰⁾打，将来也可能发生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间接的局部战争。在刚果、阿尔及利亚、老挝和古巴都发生过或正在打局部战争，这些地方都是中间地带。中间地带受到局部战争的破坏，人民就要起来反抗。因此，局部战争总是要削弱帝国主

义力量,增强人民革命斗争力量。老挝的局部战争,结果是谁的力量发展了?还不是爱国战线党的力量发展了?苏发努冯〔241〕逃出来的时候,寮国战斗部队只有一个营,那时如果美国不发动局部战争,美国的影响可能大得多。但是,美国发动了局部战争,结果壮大了爱国战线党的力量。不仅如此,在东南亚还壮大了南越人民革命斗争的力量。肯尼迪现在着急了,这怨谁呢?还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总起来说,当前世界局势的特点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在各国人民,五大矛盾的解决在于四种力量的汇合;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的;不排除帝国主义可能冒险,同时又要看到它的软弱;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推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避免。

同阿尔及利亚 驻华使团团长的谈话要点*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日)

(一)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谈判〔242〕，是英勇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七年半的武装斗争的结果。没有这样的武装斗争，法国政府就不会同意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对手是法帝国主义。正象当年在印度支那一样，这个帝国主义在阿尔及利亚被搞得疲惫不堪，遭到国内广大人民的反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困难重重。因此，象戴高乐〔243〕这样的人，也被迫考虑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进行谈判，而不采取极右派和法西斯分子所主张的办法。后一种人的主张是对美帝国主义有利的，也是美帝国主义所希望的。美帝国主义甚至企图利用这些极右派和法西斯分子把戴高乐也搞掉。

(三)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是完全正

* 这是同阿尔及利亚驻华使团团长基万谈话后，应基万团长的要求，经周恩来阅后送给阿方的谈话要点。

义的，你们赢得了全世界人民，首先是阿拉伯人民、亚非人民、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而法帝国主义进行的殖民战争在道义上遭到了完全的破产。它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孤立，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严厉谴责和坚决反对。

(四)正如团长所说，阿尔及利亚人民在谈判期间并没有停止武装斗争，在条件允许的地方还加强了这种武装斗争。阿尔及利亚人民在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的基础上同法国进行谈判的做法，是正确的。

(五)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在谈判中采取了直接同法帝国主义谈判的方式，而不要联合国来过问，不要其他国家参与，这样做是正确的。

如果让联合国和其他国家来过问，那就势必象中国俗语所说：“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也就是说，赶走了老殖民主义，引进了新殖民主义。本·赫达总理在来信中说得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还需要进行反对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艰巨斗争。

(六)正如团长所指出的，即使谈判有结果，达成了协议，那也只是一个新的斗争阶段的开始，而不是斗争的结束。这是很对的。

(七)根据中国人民同国民党谈判的经验，谈判的进行有时是顺利的，有时遭到挫折；有时破裂了，破裂了再谈，谈了再破裂；停了战再打，打了再停，最后大打。总之，

谈判和战争需要多次的反复的长期的斗争，才能引导到胜利。

经验证明：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同法帝国主义的谈判中也需要多次的反复的长期的斗争，也需要有耐心。戴高乐是很圆滑的。法帝国主义有长期的殖民统治经验。要估计到它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对付阿尔及利亚人民。因此，阿尔及利亚人民要准备应付各种可能性。在谈判中要对每一个问题扣死，使法帝国主义在法律上无空子可钻。即使在谈判中达成了协议，停止了战争，组成了“临时执行机构”，法帝国主义还有可能不执行协议和进行一切可能的破坏，最后还有可能撕毁协议，致战争再起。

总之，人民对帝国主义必须准备两手，争取最好的可能，准备对付最坏的可能。

(八)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放下武器，解散和改编武装队伍。谈判顺利的时候，要以武装力量作为后盾；谈判不顺利的时候，更需要以武装力量作为后盾。

不管是现在正进行着的谈判斗争，还是将来关于组织“临时执行机构”和举行公民投票的斗争，阿尔及利亚人民都不能放弃武装斗争。武装力量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取得完全独立的工具，也是一切革命政府和人民政权的工具。

(九)在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各种复杂的斗争赢得了初步的独立以后，他们在一定时期内让法国继续保持特定的军事基地和经济上的某些特权，同时利用这个时期壮大自己力量，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迫使法帝国主义逐步退出阿尔及利亚，这种策略是对的。

换句话说，宁可让法帝国主义暂时在阿尔及利亚保留一些势力，而决不让美国新殖民主义在阿尔及利亚取法国而代之。我相信，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领导人今后将会继续运用这种策略。

法帝国主义好对付，美帝国主义不好对付。例如在刚果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南越和南朝鲜也是这样。当然，说美帝国主义不好对付也是相对的，觉醒起来的人民最后一定要把美帝国主义赶走，只是斗争的时间要长一些，斗争就要更加艰巨和复杂一些。

四五年前，我曾对一些法国政界人士象孟戴斯—弗朗斯⁽¹²³⁾、富尔⁽¹⁴⁰⁾等说过，法国承认了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独立，为什么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尽管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更多的经济利益，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法国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法国的正当利益还是可以得到阿尔及利亚有条件的承认的。现在，关于阿法谈判的实际情况正是这样。

(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亚非人民的共同胜利。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十分关

心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每一个胜利和每一步发展。我们一贯支持你们的正义斗争，支持你们在武装斗争的同时采取不拒绝谈判的立场。我们衷心希望你们的武装斗争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谈判斗争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实现阿尔及利亚的完全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人民的统一和团结。

中国人办外事的 一些哲学思想*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

(一)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主席阁下同我讲过,埃叙合并为阿联⁽²⁴⁴⁾,当时是有错误的,后来又分裂了。现在再搞统一,已经接受了过去的教训。这说明,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纳赛尔总统在埃叙分裂时采取的态度,我们很欣赏,表明纳赛尔总统吸取了经验。

(二)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可以先对我不好,我们决不会先对人家不好。

(三)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

* 这是同埃及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谈话的节录。

(四)“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这时候,将发生两种可能:一种是有远见的人会考虑,这不是软弱可欺,应该谨慎;另一种是有人可能视我可欺,逼我到墙角,我只好还击。其实,我们早已用这种做法来对付美国了,例如抗美援朝^[26]。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245],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21],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246]。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247]。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去年轮到印度身上^[248],它却忘记了这条经验,竟也以为我们的忍让是软弱可欺。我可以告诉阁下,只要印度不挑衅,我们决不主动出击,即使印度挑衅,我们也一定象我致班达拉奈克夫人^[249]信中提到的那样,在行使我们自卫权利以前,先通知他们^[250]。

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致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电*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亚的斯亚贝巴

非洲国家首脑会议：

值此非洲国家首脑会议〔251〕召开之际，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会议表示祝贺。愿会议对促进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以及加强亚非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新的贡献。祝会议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 本文刊载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倡议建立拉丁美洲 无核武器区*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一日)

周恩来总理 (以下简称周): 你们国家的形势很好, 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受外国的控制比较少, 这在拉丁美洲是不多见的。

我想向议长先生提一个问题。我相信你们国家也是爱好和平, 不愿战争的, 更不愿受外国武装干涉, 也不想干涉别国内政。朝鲜战争^[47]时, 哥伦比亚出过兵, 但停战后就撤了, 实际上已经没有关系, 因为停战十年了。从这里设想, 哥伦比亚人民当然不愿接受核威胁, 也反对核战争了。是不是?

何赛·安西萨·洛佩斯^[252] (以下简称洛): 对的。

周: 从这点出发, 我们有一个想法: 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区。在拉美不使用、输入、储存、制造、试验核武器, 保证拉丁美洲不受核武器威胁, 那不是很好吗?

* 这是同哥伦比亚议员访华代表团的谈话。

不知道议长先生和其他先生有何想法？

洛：哥伦比亚是一个传统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在这个世纪，只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间因为边界问题同秘鲁有过小小的冲突。后来派兵到朝鲜，在朝鲜停战后，马上就撤回了。说到核武器问题，四个月前，智利总统曾写信给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和总统，要使拉丁美洲避免核武器的影响。哥伦比亚政府还没有给以回答，但同意就此问题根据智利总统的倡议进行商谈。

周：你个人怎么看这个问题？

洛：我们拉美人都不希望拉美成为原子弹的试验场所，也没有一个人愿意作原子弹的牺牲品。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场原子战争能把一切变成废墟。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对大家都更美好的世界，提高人民的生活。利用原子科学研究的成就，作为发展生产的手段，生产水平就能提高，生活水平也会上升。要把原子能用来为和平服务，而不是用来发动战争。

周：这一点没有问题。应该使拉美变成无核武器地区，把原子能用在和平建设上。

洛：当然，这是我们渴望的。我们拉丁美洲人都希望将原子能和原子科学的成果用在和平上。如用在医疗上，可增强人体健康；用在农业上，可增加作物产量；用在工业上，可促进生产发展。

周：很对。

我们反对用核技术来制造原子武器。当然，和平利用原子能是另一回事。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说，一下子就销毁所有核武器有困难，而需要一步一步来进行。说这种话的是核大国。那我们现在把核威胁限制一下好不好呢？

几个核大国应当承担义务，使拉美地区不受核武器和核战争的威胁，不对这个地区使用核武器，不在这个地区生产核武器，不在这个地区试验核武器，不在这个地区储存核武器，不向这个地区输入核武器。这样，岂不是缩小了核战争的危险？不但核大国要承担这个义务，那些将来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要承担这个义务。如果拉美、非洲都这样做，那核战争的威胁岂不是缩小了吗？你们可以首先得到和平。拉美、非洲可以首先繁荣起来。

洛：很明显，在拉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把本国变成核试验的场地，也没有一个政府愿意自己的国土成为原子战争的场所。特别是哥伦比亚，宪法规定，如果没有得到国会参、众两院的同意，不能从外国输入武器，不能让外国驻扎军队。此外，我们也没有足够的钱买这些原子武器。我们要把钱用来买更急需的东西。

吉列尔摩·费尔南德斯·鲁那^[253]（以下简称费）：我们也没有侵略别国的野心，不会去制造，也不会去试验核武器。我们不要侵略别人领土，我们能够自足。

周：这是两件事。我完全相信哥伦比亚不会使用和

制造这些武器。你们介绍的政治，经济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我说的是，核大国要承担义务，在拉美不使用、不输入、不储存、不试验核武器。而且不仅是现在的核大国，将来有可能成为核大国的也应当承担义务。这样才能首先在拉美、非洲建立起和平地区，把核威胁缩小。那不是很好吗？核大国不是说不能一下子都解决吗？我们主张全面禁止和坚决销毁核武器，你们不是已经看过我国政府的声明〔254〕了吗？核大国说不能全部做到，但这两件事为什么不能做呢？可以把核威胁缩小。不是说使用核武器会使很大数目的人死亡吗？那么先把拉美和非洲保障起来，使它们能很好地发展，过和平生活，不受核威胁，核大国好反对吗？

洛：这是所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共同愿望，不愿意成为核战争的牺牲品。

周：我们希望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也这样理解。这点我同索马里总理谈的时候，我们两人的意见完全一致。他说要在非洲各国首脑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而他们原来也是这么想的。我回答他，如你们向世界提出这个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先响应。虽然我们没有核武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核武器，但我们希望全部、彻底、干净、坚决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可是，核大国说一时做不到。因此，我们希望拉丁美洲和非洲先成为无核区。

洛：索马里总理的建议同智利总统的建议是相仿的。

周： 请把我的讲话带回去，作为你们参考。希望你们把我的想法向贵国总统和外交部长、参议院议长做非正式的转达。

洛： 我们将很高兴这样做。

费： 不但我们哥伦比亚人民希望拉丁美洲不受原子弹的威胁，而且全世界人民都要和平。

周： 这一点我们完全一致。最好是全部、彻底销毁核武器，让全世界避免核威胁。现在一时做不到，那就先在拉美、非洲实现。只要你们发出呼吁，我们首先响应，而且也愿意承担义务。因为中国也是一个大国，很多人都在看着我们。

有人说我们要发动战争毁灭世界，而留下一半中国人，这完全是造谣诬蔑。我们愿意拉美、非洲三亿人民首先享有和平，并且愿意为此承担义务，怎么能说我们要毁灭别人保存自己呢？让我们看核大国干不干。

我们为什么反对 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一九六三年九月五日)

(一)

目前,美国又用三国条约〔255〕同苏联联在一起,几个大国垄断核武器。大气层核试验本来就已经停止了,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反对,事实上它们已经不需要大气层核试验了。为什么?因为主要的资料它们已得到了。除此以外,其他的统统保留。也就是说,允许使用核武器,允许地下核试验,允许继续生产,允许大量储存,允许向外输送扩散,允许美国把制造核武器的资料给它的盟国和受它控制的国家。本来这些事全世界人民都反对,都要求全面禁止核试验,彻底销毁核武器。签订三国条约,除了大气层核试验暂时不搞外,其他统统合法化。凡是在条约上签字的国家都受条约的束缚,这就等于凡是签了字的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没有拥有核武器的权利,但仍要

* 这是同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的谈话节录。

遭受核讹诈和被核武器毁灭的危险。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的盟国仍然可以得到核武器和生产核武器所需要的资料。如美国对法国说，你不用在大气层试验了，我可以给你资料，你可以变成一个核大国。这点它们三国都承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10〕的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说要在这些国家中组织多边核力量，使每个国家都得到核武器。三国条约没有禁止这些，而只是把我们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们却可以更肆无忌惮地进行核讹诈。可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这个权利，因为苏联已经承担了义务。英美取得这么大的让步才签了字，这还不是欺骗！签字后，美国马上就说话了，从肯尼迪〔237〕、腊斯克〔256〕、哈里曼〔257〕、麦克纳马拉〔258〕、副国防部长、各军种参谋长，直到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有一系列的发言。中心问题是说，这个条约并不禁止美国使用核武器，不禁止继续生产核武器，不禁止储存核武器，不禁止把核武器输出给盟国和它控制的国家，并且还要扩大地下核试验。果然，八月五日签字后就进行了三次地下核试验。美国副国防部长说，要把地下核试验的范围扩大，凡是禁止的核试验都要尽可能地在地下进行，还要增加国防经费，为生产核武器建立更多的核基地，还准备在需要时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并公开指定在太平洋建立大气层核试验场地。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这怎么能不增加核战争的危险呢？世界

和平不但没有得到保障,而且受到了更大的威胁。过去世界人民反对这些,现在变成凡是签字的国家都不能反对。首先苏联不开腔,因为它是签字国。签字后仅一个月,美国就更嚣张,从来没有这样过。英国不说话,因为它是美国的追随者。但苏联是对立的国家,它也一样不开腔。美国更自由了,继续进行核讹诈,却把我们爱好和平国家的手足束缚起来,所以我们反对。

(二)

为什么不全面禁止核试验呢?他们说要分步骤走。听起来好听,但这是骗人的。签字以后美国如此嚣张,哪有什么全面禁止的意图。既不打算打,又不肯禁止,目的何在呢?目的是拿这个进行核讹诈。对谁呢?对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特别是弱小国家,亚、非和拉美国家。办法有两个:一是听话,签字,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一是不听话,它就用核武器来对你进行讹诈,因为你没有。如果你不签字,它就说你好战,是“战争贩子”。你们看,中国什么地方有战争的气氛?世界上还是有一些讲事实的人,西方资产阶级的报纸也有说真话的,说找不到中国人的文章和讲话表明中国要发动核战争,造成世界一半人口的死亡。不仅法国、日本、北欧、英国有说真话的,甚至美国也有。这很有趣。苏联说我们是这样的好战,西方说

不是这样，难道西方对我们特别好？不是。西方是利用中苏矛盾。我们不上西方的当，不受挑拨。我们得出结论，三国条约是一个大骗局，它不是禁止核武器的第一步，而是很危险的一步。

(三)

我曾给各国政府首脑一封关于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信〔259〕，并提出四项具体措施。

一、撤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撤回在国外的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二、建立包括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和沿太平洋地区的无核武器区，建立中欧无核武器区，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建立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每一个无核武器区都承担相应的义务。

三、不以任何形式输出和输入核武器和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资料。

四、停止一切核试验，包括地下核试验在内。

(四)

至于是否可以在免除核威胁方面采取什么步骤，我们同非洲的朋友和一些非洲国家的首脑谈过，可以采取

这样的一个步骤，就是非洲可以要求各大国保证，承认非洲为无核武器区。世界上有两个地方可能首先建立无核武器区，一个是非洲，一个是拉丁美洲。应该把这些地区变成不能使用、不能试验、不能制造、不能储存、不能扩散核武器的地区。这几件事情能够全部做到。因为非洲的主要任务是民族独立，发展经济，哪有力量搞核武器？只要求别人不进来，法国不来试验，美国不来建立基地、不搞核讹诈，要求核大国来保证，也要求可能制造核武器的国家如西德、日本来保证。如果说，中国能制造核武器的话，中国也愿意承担义务做出这种保证。各国首脑如果同意，这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非洲提出这个建议，中国首先同意。

这是对核大国的考验。拉丁美洲也可以这样做。他们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没有力量制造核武器，他们也在为民族独立和完全的经济独立而斗争，包括古巴在内。苏联向古巴运进了核武器，后来又从古巴撤出了核武器，还不如把拉美保持为无核武器地区更好。首先让美国和几个大国保证。如果非洲和拉美建立无核区，那就等于五亿人免除了核威胁。这样，你们首先得到了安全。如果大国同意，对这两个洲的国家都很有利，你们可以很快地取得独立，并发展自己的经济，让大国在军备竞赛中增加负担，你们可以真正得到安全。没有核讹诈，民族运动就更容易搞了。

以积累渐进的方式 推进中日邦交*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

石桥湛山先生⁽²⁶⁰⁾(以下简称石桥):今天我有许多问题想同周总理谈。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日和约问题。这个问题好象有希望,但具体做起来,困难又很多。周总理认为如何?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美国搞了个单独对日“媾和”⁽²⁶¹⁾,日本又搞了个日台“条约”⁽²⁶²⁾,这就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签订和约造成了最大的障碍。

第一种方式,从我们这方面想,日本最好废除日台“条约”,和我们正式缔结和约,这是最好的方式。但是,现在的日本政府这样做有困难。因为旧金山条约⁽⁸²⁾是在美国控制下签订的,美国对日本的压力很大,日本要废除这个“条约”,就牵涉到美国的问题,困难很多。

第二种方式,如果日本不废除日台“条约”,另外又和

* 这是同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的谈话节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和约，这对我们来说也有困难，会造成“两个中国”，而且比“两个中国”更坏。这里有个很大的矛盾：台湾说它是代表整个中国的，我们说我们代表整个中国，当然我们才是真正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怎么能同时存在两个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呢？这是极大的矛盾，中国人民决不同意这样做，就是蒋介石也不同意这样做。国际法上也找不出这种例子，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

另外还有第三种方式，就是日本现政府的负责人，首相或者外相，来访问新中国，并且发表声明，明确指出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这样，两国之间虽无和约，但可以友好相处，为促进亚洲的和平而努力，战争状态也就等于不存在了。这是最勇敢的做法，但是日本现政府的负责人没有这种勇气。

第四种方式就是前任首相来访问中国，发表声明，承认新中国。前任首相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是前属社会民主党、现属社会党的片山哲⁽²⁶³⁾先生。其次就是阁下次访问中国。阁下不仅是前首相，而且是执政党的议员，代表着自由民主党的一个方面，只承认新中国而不承认台湾，为恢复中日关系、推进两国邦交的正常化而努力。这是间接的方式，也是积累、渐进的方式。现在我们实际上是采取第四种方式，彼此采取第四种方式而争取第一种方式。期待阁下也为此而努力。

石桥：日本国民当中，特别是在基层，有些人对台湾有感情，反对和阻碍我们和中国友好。右翼势力就是这些人的代表，杀害浅沼〔170〕先生的也是他们。当然我们并不害怕这部分人，但是既然国民中间有这样一种感情，我们就不能忽视。片山先生和浅沼先生主张中日友好，但他们没什么力量。要真正形成一股力量，必须采取其他方法。这样做虽有困难，但我有这种愿望。

周：日本有一部分人对台湾有感情，这种感情要分析，要看它是什么样的感情。冷静地分析，有三种感情。第一种是过去的殖民主义的感情。他们认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曾经把它割让给日本，同日本有五十年的关系。今天日本仍有一部分人抱有这种殖民主义的思想，希望台湾从属于日本，认为台湾既然没有直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下，就应该仍然回到日本的手里。这种想法是不正义的，是帝国主义思想，凡是有正义感的人都不会赞成这种想法。廖文毅〔264〕一派所以能一直在日本活动，就是因为有极少数的日本人在支持他们，当然主要还是美国搞的。这种感情，不是大多数日本人的感情，大多数日本人已经改变了过去的看法。中国人当然反对这种感情，就是蒋介石也反对。美国人想利用，也有矛盾。美国人并不想把台湾交给日本，而是想使台湾“独立”，实际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第二种感情是军国主义的感情。如冈村宁次〔265〕，

他本来是头号战犯，应该受国际法庭的制裁。但是蒋介石却有意识地把他留在中国，后又放回日本。这些老军国主义分子对蒋介石有好感，对中国人民没有好感，他们要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蒋介石也想利用他们过去侵略中国的战争经验。他们互相勾结在一起，至今仍有来往。有这种思想的人只是日本极少数的右翼分子。他们仍想复活军国主义。制造长崎国旗事件〔266〕的，暗杀浅沼先生的，在你们来中国之前给你们写恐吓信的，都是这些人。这种感情，中国人民当然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重新回到大陆来，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的。在日本，有这种想法的也是极右派，在野党反对，劳动群众反对，自由民主党内有见识的人也反对。这是把日本拖向战争灾难的道路，日本人民绝不能接受。

第三种感情是经济来往的感情，日本和台湾有几十年的经济关系，贸易关系十分密切，日本从台湾进口糖，向台湾出口货物也很多。这种感情倒容易理解，我们并不反对。全世界都要做买卖，我们不反对日本和台湾做买卖，我们决不象台湾反对日本和中国做买卖那样。所以这种感情并不妨碍中日友好。但是做买卖，并不一定需要在政治上搞得那样密切。就是政治上不密切，台湾也要和日本做买卖。

上述三种感情中，前两种是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正象先生所说，那是极少数人，不是绝大多数。任何国家，

人们的感情不可能都百分之百正确，总会有一些不健康的感情。拿中国来说，也有一小部分人觉得日本过去长期侵略中国，看到和日本讲友好，也觉得接受不了。但是，政府要区别多数和少数，特别是要区别绝大多数和极少数。中国政府是能够区别的。十几年来，我们一直主张，不仅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两国政府也要逐步走向友好。先生两次访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日本的绝大多数爱国志士也是愿意促进中日友好，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不仅在野党如此，执政党也如此。

先生说，在野党和民间团体虽然支持中日友好，但起不了决定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执政。但是，在野党和人民团体却代表了日本人民要和中国友好的愿望。执政党能起决定作用，它有权力签订和废除条约，也有权力搞相互往来。执政党有这种地位，问题要看领导人的见解是否英明。比如鸠山^[114]先生和石桥先生就想排除万难，不顾少数人的反对，促进中日友好，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遗憾的是，因为两位先生执政的时间短，愿望未能实现。

还有一种相反的道路，它们不愿意促进中日友好，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比如吉田茂^[74]政府和岸信介^[216]政府。因而使我们不能不对它们采取批判的态度。

第三种是摇摆的态度。如池田勇人政府一方面容许石桥先生、松村^[267]先生和高碕^[268]先生到中国来活动，

特别是这一年来，签订了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备忘录贸易的议定书^[269]，最近还决定要恢复民间渔业协定，并且在中国举办了日本工业展览会。诸位作为执政党的代表，为推进中日友好而努力，这是正义的行动。另一方面，池田政府中也包括了执政党中反对中日友好，倾向台湾，害怕美国，拖着池田后退的一部分人。当然，我们对池田还是期待着和等待着的。但是，经常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就会成为促进中日友好的障碍，就逼得我们不能不说话。这是我的看法。阁下有什么办法？

石桥：这是国际关系上的一个复杂而难办的问题。台湾问题本来是中国的国内问题。可是，它却给日本带来了麻烦和困难。我们希望中国能用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同美国商量。可以在中、美、台之间解决，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解决它。不知道中国对此有何方案？

周：石桥先生的话有些矛盾。因为既然先生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国内问题，问题就不复杂。日本政府如果把台湾问题看成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和新中国建立关系，让中国自己去解决台湾问题，问题就不复杂了。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我们了解日本的处境。日本是战败国，旧金山会议^[34]是在美国控制下召开的，日本不能不同美、英和其他国家一起签订“和约”。但是这是不平等的，特别是美国要控制日本，日本完全是被动的，因而也不得不

受美国控制的台湾缔结了“和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被排除在外。当时去缔结“和约”的是吉田政府的代表，吉田政府追随美国，对中国不友好。但是，我们理解日本的处境，虽然日本和台湾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我们仍然愿意和日本人民友好往来，不仅是人民之间，政府之间的非正式来往也在进行。国际关系如此复杂是美国造成的，是日本追随美国造成的，不是中国造成的。是我们难处，不是你们难处。我们一直主张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国内问题，是美国把它搞成了国际问题，并且有些国家追随美国。也有另一些国家，它们不承认台湾而只承认新中国，这样做问题就不复杂，这种国家有四十多个。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心里愿意承认新中国，现在还没有承认，因为要敷衍美国。对于这些国家，我们希望它们逐渐摆脱美国，寻找同中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的出路。中国的方针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记得在第一次见到阁下时也谈过，不过没详细谈。我们的办法是：美国霸占台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作为国际问题来处理，中国人民如何解放台湾则是国内问题。可是美国总想把这两个问题搅在一起，我们坚决反对。中美之间的华沙会谈^[168]，已经谈了八年多，我们的方针也是公开的。我们认为中美两国人民要友好，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可以和平协商解决，不要诉诸武力。这是符合联合国宗旨的。这句话美国代表也赞成。我们的态度是，这句话也要适用于台湾海峡。

在台湾海峡，我们没有和美军冲突过。但是，美国要把台湾和台湾海峡除外，其他地方可以和平解决。美国要保留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保留在台湾的军事基地。他们说，美国应该撤走。他们说，因为和台湾有条约关系，所以要“保护”。台湾问题本来是中国的国内问题，蒋介石是被中国人民赶跑的，如果美国不“保护”蒋介石，我们可以自己解决，美国插进来才把问题搞复杂了。美国人怕我们和蒋介石谈判，怕蒋介石抛弃美国。同时美国也不愿意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怕打起仗来对美国不利。美国的做法是要保留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队，保留军事基地。蒋介石反对美国这种做法，他怕自己的军队、干部都老了，不用反攻大陆来号召他们，总有一天自己要被遗弃，美国人要自己控制台湾。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和我们一样，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这和东德、西德等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台湾的现状是由中国的内战形成的，后来美国插了进来，问题才复杂化了。但是有些国家不理台湾，它们在等待局势的发展，总有一天台湾会摆脱美国的统治，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日本朋友也应该有一种信念，台湾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没有美国扶持，台湾政权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日本政府、日本执政党应该看到方才先生所说的那种感情是少数人的情绪，是殖民主义，军国主义思想，不能把它当作重要因素。日本和台湾的关系今后还要继续，我们可以理解。但是

日本不要台湾一恐吓就照顾。台湾驻在日本的“大使”张厉生，是我的同学，我和他很熟，一道去法国留过学。台湾只管叫得凶，实际上台湾的立法院已经承认他们没有办法。美国管的事太多，全世界的事它都要管。我相信，具有独立传统的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摆脱美国的日子肯定会逐步接近。我们不要管其他方面，只要逐步推进中日关系，关系就可以改善。但是，自由民主党内有一部分人士想利用这个问题做买卖，压我们。譬如，日本在联合国的代表主张不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作为程序问题，而提议作为重要事项，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来通过。这种做法是给美国当先锋，对我们是不友好的。自由民主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此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至少应该弃权。更坏的是使新中国和台湾互相牵制，忽而和新中国好，忽而和台湾好，这种做法不会有好结果，对双方都不利。我们欢迎石桥、松村、高碕等先生的那种单刀直入的态度，有问题应该全部谈出来，我们诚恳地交换意见。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是要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的，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是只要我们推进，采取积累方式，就可以解决。大平外相到美国去说，中日两国有亲近感，日本不能参加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我们欢迎他这种话。

同出席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连中国在内,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聚会在一起,是很难得的一次盛会。人数虽然只有几十位,但代表了相当大数量的佛教徒。

中国佛教徒在寺庙里的人数不少,但更多的是在家里。中国佛教徒人数没有完全统计,我们估计是上万万,有佛教信仰的人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日本也不少吧?

金剛秀一(全日本佛教会常务理事): 大致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九。

周: 越南呢?

释善豪(越南南方六和佛教徒联合会主席): 越南南方是百分之八十。

周: 柬埔寨呢?

雷·拉摩斯(柬埔寨佛教协会主席): 占百分之九十

九。

周：老挝呢？

马哈坎丹（老挝佛教徒联盟协会主席）：占百分之九十二。

周：泰国呢？

马哈奥帕·奥帕梭（泰国法师）：占百分之九十三点四。

周：尼泊尔呢？

凯谢尔·巴哈杜尔（尼泊尔驻华大使）：占百分之四十。

周：印尼不多吧？

苏马多诺·麦尔罗约（全印尼佛教徒协商会副会长）：百分之一。

周：主要是信奉伊斯兰教。

巴基斯坦呢？

德瓦卜里亚里·巴瓦（巴基斯坦佛教文化宣扬协会秘书长，以下简称巴瓦）：五十万。

周：主要是信奉伊斯兰教。

佛教出在印度，但印度佛教徒却很少，他们信奉印度教。对越南南方佛教徒的同情，在座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是最强烈的。佛教最发展的地区是在亚洲东部和南部。在欧洲、美洲佛教徒就少了，有一些居士。非洲有没有？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有一点。

金刚秀一: 日本向欧洲派了一百多人去传教, 现在也派人到南美去, 还没有派人去非洲。

周: 信仰佛教主要是在亚洲东部和南部。这次会议, 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参加, 代表了亚洲广大佛教徒。南越吴庭艳政权〔270〕对佛教这样摧残, 引起十几个国家佛教徒的震惊是很自然的。佛教徒总是与人为善, 主张和平的, 这是佛教教义上讲的。吴庭艳连这样的佛教徒也不容, 要压迫, 迫使佛教徒不得不走到街上去游行示威, 甚至焚身自杀。他们以焚身来抗议,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流血斗争。这说明吴庭艳政权的残暴, 连佛教徒都不能容, 这是反动政权中少见的。

吴庭艳这样残暴, 有外来力量的支持, 广大人民不满意他。从反对吴庭艳政权压迫南越佛教徒的事件中,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亚洲不管哪个国家, 都要求独立, 不愿受外人的干涉。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 已成为亚洲人民共同的呼声。我们要求民族独立的各个国家, 彼此要互相尊重, 互相同情。道义的力量是伟大的。从一个时期看, 反动武装力量是强大的, 但从长远来看武装力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靠的是人心, 是人心所向。你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 手无寸铁, 但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一致地发表了《告世界佛教徒书》。这是一股道义上的力量, 是会得到人心的。在座的虽然只有几

十位，但是有几万万人民作为后盾。这说明南越人民和佛教徒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吴庭艳集团的残暴统治一定要失败，外国力量的干涉也一定要失败，只是迟早的问题。这在中国已经得到证明。过去统治中国的蒋介石就同吴庭艳一样。蒋介石现在同吴庭艳是好朋友，彼此经常来往。蒋介石统治中国人民有二十二年。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在一些人心目中他好象成了民族英雄似的。但他挑起内战，依靠美国力量，美国给他钱、飞机和其他武器，因此他失掉人心，结果发动内战不到四个年头就被中国人民从大陆上赶出去了。如果没有美国武装保护，他就不能统治台湾。失掉人心、勾结外力、出卖民族的任何势力，最后总是要失败的，中国的事件是最好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蒋介石手中有很大的武装力量，比吴庭艳的力量大得多，结果还是失败了。

另外，我们还看到，就是外国的代理人同他们的主子矛盾重重，是不会合作到底的。听主子话就用他，稍不听话就不要他。朝鲜朋友很清楚李承晚〔8〕的下场。李承晚很听美国的话，打了很久的仗，后来美国不喜欢他了，就把他换掉了。南朝鲜不是不断地发生政变吗？这引起吴庭艳、蒋介石的警惕。昨天不要李承晚，今天不要吴庭艳，明天就可能不要蒋介石。所以，作为外国的代理人，出卖人民利益，不仅本国人民不要他，外国主子有一天也会不要他的。

为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曾经签订了日内瓦协议^{〔106〕}，但是吴庭艳引进美国势力，闹成这样。有外国武装干涉，就会引起抵抗。流血斗争，佛教徒是不希望有的。但已经出现了外来力量的干涉，连佛教徒也不能袖手旁观，不能不参加斗争。如在日本召开的反对原子弹氢弹大会，佛教徒参加了，赵朴初居士也去了。收复冲绳的运动，佛教徒也参加了。南越的例子很值得我们想想，外国干涉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越南北方、朝鲜北部、印尼独立了，日本、老挝正在为反对外来干涉而奋斗，巴基斯坦、尼泊尔、柬埔寨也在为反对外来干涉而斗争。中国的情况虽不完全一样，但基本方面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容易相互理解，容易相互同情，容易达成一致。这次会议号召世界佛教徒同情、支持南越佛教徒的斗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聚会一起，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愿意接待诸位，给诸位提供便利条件。可惜时间太短了，明天有不少位要回去。希望再有这样聚会的机会，不一定在北京，可以在东京、河内、金边、雅加达、加得满都、卡拉奇、科伦坡、仰光、平壤……大家多来往。还有些朋友不马上走，光在北京也不好，杭州佛教徒比较多一点，可以到杭州看看，五台山路不大好走，不通铁路，只通汽车，气候冷，要爬山，那就很辛苦了。广州六榕寺很容易看到，看过吗？扬州去了吗？

金刚秀一：由于中国佛教协会的关怀，我们参加了

在扬州举行的鉴真和尚^[271]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了共同声明^[272]。

周：我读了声明，很钦佩。谢谢你们很愿意纪念这位高僧。鉴真是中国的一位高僧，曾六次东渡，很有毅力。中日友好就要象鉴真那样，具有排除万难，越过千山万水的毅力。一千二百年前的人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做？这次南越高僧就是克服许多困难到中国来的。

其他朋友可以多留一些时候看看其他庙宇。

释善豪：我们可以多留些时候，到南方看看。

周：巴基斯坦有多少庙宇？

巴瓦：五百多个。

周：很抱歉，我去访问时没有来得及看，下次去一定看。

巴瓦：非常感谢。佛教在巴基斯坦受到很高的尊重，政府拨给很大一块土地，作为修建巴基斯坦佛教大学用。

周：佛教的遗迹在巴基斯坦很多吧？

巴瓦：我正想说，中国的佛牙就是从西巴基斯坦来的，佛教的历史很长，佛教历史同巴基斯坦历史一样悠久。

周：我知道一些，但对此认识比较晚。玄奘^[273]去印度经过巴基斯坦？

巴瓦：是的。

纳瓦布扎达·阿迦·穆罕默德·罗查（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西巴基斯坦曾是佛教中心，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佛教徒都曾到过巴基斯坦。

巴瓦：玄奘在巴基斯坦住过好几年，几乎到过所有的寺庙。

周：玄奘不只是到过印度，还到过巴基斯坦、尼泊尔，法显〔274〕到过锡兰〔104〕、印尼。

巴瓦：西藏的佛教也是从巴基斯坦传过去的。有一个巴基斯坦佛教徒越过喜马拉雅山到了西藏，后来成了活佛。巴基斯坦佛教徒很希望取回他的一部分骨灰。

周：葬在什么地方？

巴瓦：离拉萨不远，从拉萨一天可到。

周：请中国佛协帮助寻找。

巴瓦：我们也正式向中国政府、佛协提出这个要求。中巴友谊从古老的佛教传播就开始了。

周：佛教方面的联系，过去不仅中印间有，在中巴、中日、中越、中蒙、中柬、中老、中泰、中锡、中缅……之间也有。著名的玄奘、法显在这方面作过贡献。现在交通便利了，要有更多的玄奘、法显、鉴真。我们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希望常会面，可以换个地方会面，扩大一些。要把中日佛教界共同声明中表示的愿望变成各国佛教界的共同愿望。中国保存不少庙宇，日本也保存不少，进行研究有便利条件。佛经在印度已经失传了，但在中国、日

本、尼泊尔、锡兰保存不少。尼赫鲁总理和我谈过，在印度佛经失传很多。我们在经典研究方面可以互相来往，丰富知识。在日本有个创价学会，据说他们也是信佛教的。

金刚秀一：是佛教的一个派系。

周：他们明春准备来。

大西良庆（日本大本山清水寺贯主）：很高兴听到总理的话，很感谢。我们力量很有限，希望在加强各国佛教界友好往来方面，中国方面拿出更大的力量。

周：谢谢。道义的力量决不是微小的。朋友们希望我们多做一点，我们也应该多做一点。

大西良庆：你们中国有个赵朴初先生，他好象是一位佛爷。我们认为由中国担任亚洲佛教徒的联络工作最合适。

周：主要靠大家努力。赵朴初居士可以为大家服务，作个小沙弥。

阿弥尔·拉玛（尼泊尔佛教代表团团长，以下简称拉玛）：总理对佛教有何看法？

周：佛教是唯心论，共产主义是唯物论，两者在思想上不一致。但从政治上看，信教的和不信教的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如在共同反对外来干涉、争取民族独立、爱祖国这些方面是可以一致的。至于思想上的不同，是长期的问题，这也是自由的。

拉玛：我们了解这个。我代表全世界的佛教徒，感谢中国对宗教的宽容。但马克思曾经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总理阁下是否认为，佛教在现时代也总是鸦片？

周：这个问题要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来看。列宁这样说过。当时帝俄沙皇利用宗教麻醉人民，要人民不反抗。西方的统治阶级也利用宗教麻痹人民的斗志。但在中国，统治阶级未能达到利用佛教麻醉人民的目的，情况不同。

拉玛：阁下是否认为宗教不是坏的？

周：我们不隐讳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可以作朋友。

拉玛：你说宗教和共产主义在思想上是对立的，那么，中国的佛教将来是发展还是缩小？佛教徒都相信了共产主义，就没有佛教了。

周：可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中国的共产党员有一千七百万，但信佛教的有万万人以上，不可能一下就把万万人变成共产主义者。

拉玛：佛教徒信仰共产主义，是否必须放弃佛教信仰？

周：从原则上讲是这样的。从具体的人来说，有些人接受了共产主义，但还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对佛教的信仰。

拉玛：是否可以说中国佛教徒都不是共产主义者？

周：当然，有些人思想转变了，可以成为共产主义者。思想问题是长期的。佛教徒只要反对外来干涉，要独立，爱国，就能成为好公民。至于思想上的不同，可以保留，你不要认为共产党员就一点也不唯心了。不要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家庭，也有各种不同信仰的人。如我的父母信佛，我是共产主义者，这方面是不一致的。但是在反对外国干涉、要求民族独立等方面则是一致的。当然，在各方面也都有坏人，他们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欺压人民。我们反对这样的人。

拉玛：总理阁下，是否可以这样说：佛教在中国就不是鸦片了？

周：政治上要具体分析。从一些佛教徒的政治行动上，可以这样说。地方、环境不同，情况也不同。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反对迫害，争取自由，比如释善豪法师，从他来看，佛教就不是鸦片。至于意识形态问题，哲学上的问题，这就说不完了，一下子是辩不清的。

关于中法建交问题*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富尔(以下简称富): 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象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由于两国间没有外交关系,过去只是有一些来访的人带回去一些零星的消息,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他认为,我这次访华的使命不宜公开。这并不是想掩盖他对中国的感情,而是因为一旦公开出去,报界就会大做文章,那就不能安安静静地深入讨论问题。不过,此次访华还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戴高乐将军有一封亲笔信给我,信中授权我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富尔念信,并将副本递交周总理)

我来中国的任务是进行接触,没有一个特定的问题作为会谈的中心。因为长期以来两国没有接触,现在应

* 这是同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的谈话节录。

该恢复接触。正如戴高乐将军在信中所说，会谈将涉及各个方面。这就是说，不仅是经济、文化方面，而且涉及政治方面。因此，他选择了一个政治家来中国。我了解戴高乐将军在很多问题上的想法，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我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向戴高乐将军报告。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愿望，阁下上次来华时，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但是，当时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我们愿意等待，并做些推动工作。这几年，戴高乐将军当政，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因为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

法国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根据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的意志得到解决，法国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想必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谈过这个问题，我也同孟戴斯—弗朗斯^[123]谈过，觉得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可以通过和平谈判求得有利于双方的解决。结果还是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法国解决了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件好事。我们很重视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另外，阁下可能也有兴趣，那就是莫斯科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255]，你们没有签字，我们也反对。可能双

方看法不尽一致，我们虽然并未交换过意见，但表现出来的行动是一样的。因此，世界舆论，特别是某些大国，把中法两国拉在一起。实际上我们两国事先没有进行任何商谈，也没有任何默契，而且两国社会制度完全不同。这件事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只要彼此没有互相侵犯的意图，并且互相尊重主权和独立，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即使两国没有正式往来，即使你们还继续承认台湾蒋介石集团而尚未承认中国人民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我们的行动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共同性，我们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愿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和侵犯，我们都赞成在国际上应该维护世界和平，不允许几个大国垄断世界事务，因为这样不能维护世界和平，反而会增加战争危险。只有世界所有国家取得平等地位，大家都有权过问世界事务，才能真正达成协议，才能真正维护世界和平。

好，我就开这个头，请你谈谈，不受拘束。

富：我很注意地听了总理的谈话。首先你谈到法国的独立的政策。戴高乐将军对此很重视。你知道他一直很关心这个问题，即使在抵抗运动时期⁽²⁷⁵⁾，法国很弱，戴高乐将军仍然要保持法国政策的独立性。现在法国的政策完全独立自主，我们同某些国家有防御性的联盟关系，但这只在遇到侵略的时候才起作用，因而是有限的。除此以外，法国在政治上是完全自由的，可以独立处理问

题。戴高乐将军对此非常注意，来华前他在同我谈话时也提到，要我就这个问题向你们作一些说明。

第二点，总理提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我还记得上次的谈话。先是孟戴斯—弗朗斯，接着是我自己，让摩洛哥、突尼斯独立。总理知道，阿尔及利亚问题比摩洛哥、突尼斯问题复杂得多。在这个问题上，戴高乐将军具有历史性的远见。这是一贯的。一九三九年戴高乐将军主张抗德，一九四四年他试图同苏联接近，一九五八年他开始实行全部非殖民化政策。现在法国已经不再有任何殖民关系，他不阻止过去法属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阿尔及利亚就是一例。

至于莫斯科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两国所处的地位相同，两国都有能力建立核力量。正如戴高乐将军比喻的那样，三国条约等于劝告一些疲惫不堪的人不要去游泳横渡英伦海峡。一些象微生物那样小的国家，根本不可能有原子弹，但是签了字，就说这是胜利，可笑之至。

周：勇敢的柬埔寨，国家虽小，但也没有签字。

富：是的，有些国家没有签字。正如总理所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些不同的看法，但主要方面是一致的。在策略上我们都拒绝签字，但我们承认必须进行裁军以维护和平，而莫斯科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则同裁军无关。有些意识形态和历史方面的问题，我不想详细谈。

法国是第一个进行大革命的国家，法国所遇到的问题不同于中国。法国大革命时，还未达到工业化，马列主义也还没有。而你们革命时，需要打倒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外国干涉三大敌人。如果你们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避免外国重新干涉中国。这是我自己对历史的解释。两国情况不同，法国很早就推翻了封建主义，没有外国干涉，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此外，法国的经济和制度正在向温和的社会主义发展，很多部门国有化了，很多地方有农业合作社，国家能全部掌握财政、金融、货币。美国就不是这样，在美国，如果没有得到大银行的同意，政府不能采取任何措施。

现在谈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保持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不愿意象一个商人那样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要提出来，因为目前的局面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但是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是奇怪的，因此，我们愿意同你们交换意见。上次来中国时谈过这个问题，当时的结论是：时机尚未成熟，需要等待。同时，那时我也没有受法国最高当局的委托来谈这个问题。从那时以来，情况变了，现在可以根据各自的看法来研究这个问题。戴高乐将军的信中用了“各个方面”这个字眼，因此，我们可以全面研究两国关系。如果现在建立正式关系还有困难，可以研究

如何发展现存的关系。我这次访华表明了加强两国关系的愿望。因为两国长期未接触，不能带来各方面的具体问题。总之，无论中国或是法国都没有迫切的利害问题要解决，但双方都愿意会谈。因此，根据戴高乐将军的指示，采取现在这种办法，对外是私人访问，准备在中国停留足够的时间，即两星期。希望总理考虑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希望见毛主席、刘主席，请总理安排。会谈的方式也请总理决定。

周：我了解你的意思。可以不只谈一次，可以谈几次，自由交换各种意见。除了你要我考虑的问题外，今天还想问一个问题。中法建立正式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我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困难，还有什么困难？上次我说过，我们可以等待，要解决总要有个合理的办法。

富：坦白地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台湾问题，我们愿意建立正式关系。这是戴高乐将军授权我表示的态度。作一点个人的解释，作为你的朋友，我认为总统是以勇敢的精神、历史的眼光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作出这个决定一定会受到苏、美的指责，只有象他这样的历史人物、政治人物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没有自私的利益。要恢复关系，必须使这种做法不使中国为难。如果法国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要避免过去复杂的办法，交换大使的作法是很正常的。这种事情应该使中

国愉快，而不是使中国为难，应该是对中国表示友好，而不是使中国难堪。你们方面，在戴高乐将军采取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时，也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或丢脸的条件。在世界舆论面前，中法关系的恢复不能被看作是一项交易，而是友谊的表现。我个人认为，直到现在还不能利用这些条件是很可惜的。明确地说，我访华的直接目的不在此，我的任务是开始接触，讨论各种问题。但如你们有此愿望，我们愿意作有利的答复。

周：第一句是戴高乐将军的话，其余是你的解释。如果我记得不错，法国政府过去曾经表示，承认中国要经过国际协商，要西方一致。

富：总统授权我说，如果你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愿意作有利的答复。这就是说，我们不从自己的利益提出问题，也不必管其他国家的意见，愿意考虑。我个人意见，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戴高乐将军的想法是要迎合你们的意见。如果你们表示意愿，我有权表示法国的意愿。

周：可能我对你上面的谈话没有了解确切。你刚才谈要照顾两点，第一点是法国同新中国建交不能不考虑到苏、美的态度。

富：不，我只是说，如果总统这样做，势必引起苏、美指责，借此证明总统作出的决定是有历史意义的。

周：这也是客观事实。

富：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苏、美的意见，自己可以作出决定。我认为总统这种决定是勇敢的，因为要受到某些国家的指责。希望总统这种立场能使我们达成协议。协议不要包含使你们为难或不满意的条件。

周：第二点是，也不要使法国为难或丢脸。对这两点，我说一说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态度很清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象英国、荷兰，双方都不大愉快。英、荷承认中国十三年，但同中国一直是半建交的关系，没有互换大使。因为英、荷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这使双方都不大愉快。与其如此，不如等待。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帮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这是友谊的表现，而不是交易。我愿意说明，如果阁下、戴高乐将军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困难，我们愿意等待。

富：你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不成问题，我们不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要么交换大使，要么维持现状。第二个是台湾问题，希望知道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如果承认中国，法国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席位将是合乎逻辑的。台湾问题则是个微妙的问题。我们的想法不是迁就“两个中国”的主张，如果法国承认中国，那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会涉及一些同台湾的关系的程序和措施问题。法国应该如何做，希望了解中国方面的意见。

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且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在战时他同蒋介石站在一边，不愿意突然切断关系。

周：这就困难了。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的意志表现的结果。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国人民选择的，并且已经存在十四年了。没有台湾，就没有蒋帮，而蒋帮之所以能留在台湾，完全是由于美国的庇护和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全世界人民都清楚。蒋帮之所以还留在联合国，还作为安理会成员，也是由于美国的操纵，这是现实的也将是历史的笑话。

说到法国过去在反法西斯时期同蒋介石的关系；这应该从国家关系来说，而不应该从个人关系来说。德国占领法国时，成立了贝当傀儡政权⁽²⁷⁶⁾，法国抵抗运动受到了戴高乐将军的支持和领导，当时中国是蒋介石当权，同戴高乐将军站在一边是自然的，当时任何中国政府都会这样做。现在蒋介石被推翻了，新中国政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所以世界上不少国家承认了新中国。英国、荷兰在承认新中国方面说是西欧国家中最早的，英、荷两国没有蒋介石的代表，因此本国没有出现“两个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蒋介石代表中国同代表法国抵抗运动的戴高乐将军有关系，也同英国保守党政府有关系，这是历史上的问题，不能把个人关系掺杂到国家关系中来。反

过来说，如果法国处在中国的地位，将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现在法国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如果外国势力在法国本土以外扶植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权，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呢？比方说，这个傀儡政权同中国有关系，那么中国要承认法国也只能承认戴高乐将军的政府，而不能承认傀儡政权。你们不存在这种情况，但你们可以设想一下。我可以举出一个不存在的甚至是可笑的设想。孟戴斯—弗朗斯领导过法国，日内瓦会议⁽⁵²⁾上我们合作得很好，据知他同戴高乐将军的关系是好的。假如说，他反对戴高乐将军，在外国势力的扶植下，成立反对派政权，我们不能因为一度同他合作得很好，而承认他这个外国势力扶植下的政权，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还可以举一个更可笑的设想。皮杜尔⁽²⁷⁷⁾是反对戴高乐的，如果他在外国势力扶植下成立流亡政府，中国是否能因为一度与他有关系，就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这个流亡政府或者两个都承认。你一定说这个设想很可笑。法国是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何况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一百多年的国家，现在美国还占领着台湾，欺侮和干涉我们。

现在世界各国同中国的关系有三种类型，也许还会出现第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不仅在国家关系上承认中国，而且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可以交换大使，社会主义

国家如此，不少亚非国家和拉美的古巴是如此，北欧四国和瑞士也是如此。第二种类型，英国、荷兰，同中国建立半外交关系。第三种类型，象法国同中国现在的关系，法国愿意促进同中国的关系，但由于在台湾问题上有困难，还未能建立正式关系。日本的情况类似，但不能说同法国一样，因为现在日本受美国控制，不象法国那样，是一个独立的、维护主权和拒绝外国干涉的国家。还可能产生第四种类型。刚才所说的第三种类型，与其长期等待，不如促进关系。台湾问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如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这个问题请阁下考虑。

富：回到开头谈的问题，如果能够找到建交的办法，要找前进的办法，不要先前进一步，又后退一步。如果其他问题都解决了，只剩下台湾问题不能解决，可以讨论贸易机构问题。总之，我的意思是：第一，先讨论建交、交换大使，台湾问题应如何处理。第二，如台湾问题不能解决，不能建交，可以考虑设立贸易机构。无论如何，这些问题都可以研究，我们可以研究各种方案。正因为如此，我们将采取秘密讨论的形式。因为如果消息传出去，说法国提出要求，中国拒绝了，或者是相反的情况，这都不好。可以考虑两种方案：第一，如何交换大使，也许在台湾问题上有困难，我不知道戴高乐将军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会作出什么决定。

周：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不会改变的，即使不叫“中华民国”，叫台湾政府，也不能接受。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最近在日本召开的奥运会上，蒋介石要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国际奥委会只准他用台湾名义参加，蒋介石拒绝参加。蒋介石也说台湾同大陆的关系是内政问题。这就是说，他承认他所挑起的内战至今尚未结束，直到今天，他还是这样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意见一致，只有美国不同意。现在我再举一个恰当的例子，美国南北战争〔278〕的时候，有林肯〔191〕政府，有南方政府〔279〕，世界各国只能承认一个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两个。我们认为台湾同大陆的关系是内政问题，这一点不能动摇。上次已经谈过，你是了解的，希望不会有什么误解。

富：我的意愿不是推动中国同法国建立使中国不愉快的外交关系，如果没有台湾问题上的困难，我们准备建交。明确地说，我们有可能现在就在建交问题上取得协议，也许还要等待一个时期。戴高乐将军知道你们的全部看法以后，有可能作出完全符合你们意愿的决定，也许戴高乐认为要等待一个时期，再交换大使。但在这方面应该作出安排，时机成熟时就可以实行，因此要详细了解你们的意见。第二个方案，在建交前能做些什么，我可以把这方面的各种可能性报告戴高乐。今天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排除英国式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要采取行动，

那就交换大使，如果要发展经济、文化关系，我们可以研究最好的办法，如派遣常驻机构，政府的或者民间的。

周：是贸易机构吗？

富：可以包括经济、文化、交换大学生等。你们如何考虑第一个方案？如果明天法国承认中国，可能台湾主动同法绝交，这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困难的是我们不能肯定蒋介石会采取什么态度。

周：对，他不是一个人，背后有美国。

富：如果明天法国承认中国，法国需要通知台湾。如果台湾不作任何表示，照中国的想法，法国应该撤回驻台湾的人员。这样，你们会完全满意，但法国为难，因为这是突如其来的，不愉快的措施。戴高乐没有授权我表示这样的态度，但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中法建交后，可否在台湾保留一个人，降低级别。

周：这不可能。英国承认中国政府为唯一的合法代表，在英国没有蒋介石的代表，但是英国在台湾有领事，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所以造成目前的半建交状况。如果法国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对双方都不愉快。

富：困难的是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十三年，如果法国没有蒋介石的代表，可以承认新中国，不承认台湾。你们提出的理由都对，而十三年前同现在的情况一样。这就是说，法国在十三年前就犯了一次错误。我个人很愿意承认这次错误，但作为一个大国，很难承认这种错误。我

愿意同你们共同找出一个办法，使法国不致对过去的错误表示忏悔。

周：第二个方案呢？

富：象你所建议的那样，在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之前，比较全面地发展两国关系，建立贸易机构。

周：今天就谈到这里，关于两国关系，我们初步交换了意见，以后还可以继续谈，也可以谈其他问题。

在开罗答记者问*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 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能在阿联^[244]的首都开罗同各位会见。时间不可能很多,大概是一小时。希望大家提问题简洁一些,以便多回答一些问题。最好每位在第一轮中最多只提两个问题,以便机会均等。同意吗?

记者们: 同意。

阿联《金字塔报》记者: 能不能请阁下谈一谈这次访问的意义?

周: 这一次是我和陈毅^[208]元帅以及我的其他同事们第一次访问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第一个国家就是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周恩来和陈毅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十个非洲国家(中途曾在阿尔巴尼亚作短暂停留);接着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到二月二十六日访问了缅甸和巴基斯坦;从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又同宋庆龄一起访问了锡兰。这次亚非十二国之行,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是即将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在开罗共和国宫答记者问的记录。

到了阿联。在这个地方，我们获得了很深的印象。我们访问了开罗、塞得港、阿斯旺，参观了一些工厂。我们看到了塞得港人民英勇战斗的痕迹和在帝国主义制造的废墟上兴建起来的英雄城市。在开罗郊外，我们看到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五千年前的金字塔，又登上了开罗高塔，观赏了现代的建筑。在阿联，我们受到了英勇热情的人民的欢迎，看到了勤劳智慧的人民正在积极地建设自己的新国家。阿联有着有能力的领导人纳赛尔总统阁下，有着团结的力量，所以能够在短短的期间出现了新兴的气象。这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印象。

纽约《生活》和《时代》杂志记者：阁下，是不是考虑把旅行延长到地拉那和莫斯科，以便同赫鲁晓夫^[235]会面和讨论问题？

周：我们是准备去访问地拉那的，因为已经接到了阿尔巴尼亚政府的邀请。但是，在这次出访计划中没有莫斯科。你们知道，我已经到莫斯科去过很多次了。

记者：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不是全心全意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并且积极帮助南越^[149]的共产党？

周：没有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就是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我们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有着共同的遭遇。因此我们就必然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中

国是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有义务支持那些正在取得胜利和将要取得胜利的国家。至于说到越南南方，他们的组织是民族解放阵线〔280〕。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的镇压，因此起来反抗。越南南方人民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无比艰巨的斗争，而且不断地取得胜利。

记者先生，你会知道，一个民族受到外来压迫的时候，自然会生长出不可战胜的反抗力量。记者先生也一定知道，华盛顿〔281〕当年领导美国人民起来进行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是何等的英勇。现在，这种情况正在越南南方重新出现。这使得白宫、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很为头疼。但是，我们独立了的人民是高兴的。我们同情他们，支持他们，这是没有问题的，正如同在华盛顿的时代，法国人民同情和支持美利坚人民的革命斗争一样。

英国记者：一、阁下，你这次出访的行程是怎样安排的？二、你同纳赛尔总统这次在会谈中达成了什么协议？

周：我们的行程，下一个国家将是阿尔及利亚，然后到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在这之后要访问西非几个国家，即加纳、马里和几内亚。然后有可能访问苏丹。在回程中，还将访问南亚国家。

我在阿联访问期间，同纳赛尔总统阁下和阿联政府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一共谈了三次。今天我又去拜访了纳赛尔总统阁下。我们双方会谈的主要成果，将在联合公报中发表。

记者：我的问题是，有否同阿联政府达成什么协议？

周：我现在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加利福尼亚报纸记者：阁下，我想了解你对肯尼迪^{〔237〕}被杀害有何反应？

周：肯尼迪总统的遇害是你们国家的内部事情。当然，暗杀本身是卑鄙可耻的。你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任何这类行为，尽管被暗杀的人是敌视我们新中国的。

印尼安塔拉通讯社记者：阁下，你同纳赛尔总统是否讨论了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282〕}和中国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232〕}的问题？如果讨论了，能否告诉我结果是什么？

周：我们讨论了这两个问题。第二次亚非会议召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都同意要进行很好的准备，因为有充分的准备，才能开好这个会议。

第二个问题，中国是结盟国家，所以不可能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高举反帝反新老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支持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旗帜。我相信，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如果开成，也会遵循这个方向前进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不结盟国家会议了。

伦敦《泰晤士报》记者：阁下，你对阿联政府对中印冲突^{〔283〕}的态度有何意见？

周：自从科伦坡六国进行和平调解^{〔284〕}以来，我们一向欣赏和支持阿联和其他五个科伦坡会议国家为调解

中印边界争端和促进中印直接谈判所作的努力。现在，科伦坡六个国家仍然坚持这样的态度。因此，我们仍然支持六国继续同样的努力，以促进中印早日直接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

印度《时报》记者： 人民中国政府能否放弃对科伦坡建议的保留意见？

周： 我不认为这里有什么放弃保留的问题。因为科伦坡建议只是科伦坡会议六国进行调解提出的建议，而不是仲裁国家的裁决。六国的首脑都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们是调解的机构，不是裁决的机构，他们的建议只是推荐，不是裁决。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态度是，在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中印直接谈判的基础，中印双方应当不提任何先决条件，一起坐到谈判桌上来，和平协商，解决边界争端。

事实上，中国方面所采取的主动措施，已经大大超过了科伦坡建议的要求。举例说，科伦坡建议要求中国根据自己的声明，只从中印边境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西段中国一侧后撤二十公里。而中国方面则根据自己的声明，从中印边境全线，即西段、中段、东段都后撤二十公里。这就超过了科伦坡建议的要求。中国方面的主动措施，保证了中国的边防部队同印度军队和民政人员脱离接触，为避免中印边境冲突创造了条件。因此，一年来，中印边境一般说来是平静的，边境局势和缓下来了。不

仅如此，中国还进一步把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曾经被印度侵占的地区以及双方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其他地区空出来，连民政点也不设立，以待同印度方面谈判解决。

我们的这些主动措施，都是为了创造良好的气氛，促进两国直接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这样做，照顾了双方的尊严。中国主张双方都不提任何先决条件，坐到谈判桌上来，寻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在谈判中，双方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可以讨论科伦坡建议的细节问题以及双方对科伦坡建议的不同解释。

美国电视台记者：阁下，你这次出访，要离开办公桌两个月。请问，你访问非洲有什么目的，以致你认为有必要离开办公桌达两个月之久？

周：记者先生，你一定知道，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而新中国建立已经十四年了。我们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因为已经有许多非洲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部长和民间团体的代表多次来中国访问。从我个人来说，万隆会议^{〔103〕}以后，阿联纳赛尔总统就曾不断地通过阿联驻中国大使邀请我访问阿联。今年春天，萨布里^{〔285〕}主席来中国访问时，又当面提出邀请。所以，我这次来到阿联首先要向纳赛尔总统表示我来晚了的歉意。这就是我访非的第一个重要任务。

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们都是亚非国家，根据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147]，是应当经常彼此往来的。这次来了，开了端，以后就会经常地来了。我们自远东来到非洲，路很远，不容易，既然已经来了，就多访问一些国家，以表达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友好愿望。所以，一次出访计划就包括了七八个国家。

记者：你这次出访，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都是非共产党国家。你认为，如果这些国家没有经过共产党的革命是否能得到发展？

周：我开始就说过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压迫之下，所以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独立，以至完全独立。我们不仅要得到政治上的独立，而且也要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并且还要拥有足够的自卫力量，这样才能保证完全的独立。所有这些都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毫无疑问，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是可以使民族独立国家克服落后，得到发展的。当然，有些亚、非、拉美国家，在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后，继续进行革命，一直导向社会主义革命，这种例子也是有的。例如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古巴。但是，目前亚、非的绝大多数国家还处于民族民主革命的阶段，他们的领导人都还是民族主义者。

我相信，只要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继续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些国家是一定能够得到发展的。

巴黎电台记者：你刚才谈到第二次万隆会议。从第一次万隆会议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八年来有很多变化，世界力量对比有很多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会议能讨论什么？能做些什么？

周：第一次万隆会议离现在虽然已经八年多了，但它的影响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深远。八年前，第一次万隆会议确定了十项原则，这些原则今天在亚洲、非洲以至拉丁美洲仍然适用，仍需要为实现这些原则而努力。万隆会议后，三十多个亚非国家取得了独立，这种趋势继续在发展。第二次亚非会议还没有召开，仍需要为实现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而奋斗。第二次亚非会议还在准备，还没有进入安排具体议程的阶段。但我相信，第一次会议确立的两条原则仍适用于第二次会议。

第一条原则是求同存异。我们亚非国家，有许多共同的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反对侵略和干涉，要求撤退外国军队和外国军事基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保卫世界和平，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友好相处。我们相互之间的个别争端，可以放在一边。第一次亚非会议正是采用这条原则取得了成功。诸位可以回想一下，参加会议的有参加军事条约的国家，有

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71〕或当时的巴格达条约组织〔144〕的国家,甚至还有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10〕的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民族主义国家。从这种情况来看,自然会有很多分歧意见,但是我们找到了共同点,那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7〕和十项原则。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十项原则的起草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是由纳赛尔总统担任主席的,我也参加了。我们找到了共同点,取得十项协议,成为我们亚非国家为之奋斗的十项原则。所以,可以设想,第二次亚非会议如果召开,一定也会根据求同存异的原则解决问题。不管亚非各国之间有多少争端,都是可以放在一边的。

第二条原则是亚非会议不要殖民主义者参加,不论是新的或者旧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日本。日本是战败国,被外国军队占领,它也是受外国控制的。同其他亚非国家有共同的遭遇。邀请日本参加,收到很好的效果。诸位先生知道,代表日本政府参加万隆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是高碓达之助〔268〕。高碓参加后,同我们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在日本政府内,他是主张中日友好的领导人之一。他也常来开罗,同纳赛尔总统保持着友好关系。所以,万隆会议没有西方国家参加,我们亚非国家完全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原因就是我们有共同的遭遇,有共同要解决的问题,有共同的奋斗目标。

美联社记者：听说一位英国大臣在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会议上说，中国一年内就要试验原子弹。是否真的？如真的，是否要在大气层试验？

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我还不知道此事。请你去问问那位英国大臣。这对我来说还是新闻。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你的政府为什么反对部分核禁试条约〔255〕？你的政府为什么反对苏联主张东西方谈判的政策？

周：你的问题是两个。部分禁止核试验这样一个条约，表示三个大国要垄断核武器，所以我们要反对。我们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制止核战争。因为发生一场核大战，对人类是个大灾难。既然如此，世界各国都应该过问，应该有权来讨论如何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制止核战争的问题。世界上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在政治上应该一律平等。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问题应该由大家来共同讨论，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垄断这种讨论，甚至把有利于少数垄断者的决定强加给没有参加讨论的国家。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个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以后，美国就不断进行地下核试验。美国总统和政府官员不断声称，要继续核试验、生产和储存核武器，把核武器交给它的盟国，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美国政府在预算中增加了进行地下核试验、制造核武器的拨款。美国许多将军们在国会作

证时，强调要发展新型核武器，特别是战术核武器。这证明，三国条约的签订，并没有减少核战争的危險，而是增加了核战争的危險。对于这样一个欺骗性的条约，中国政府不能不加以揭穿。这是我们对人类命运所负的神圣责任。有些好心肠的先生们、朋友们，包括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天真地相信，这个条约有助于防止核战争。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你们就可以看到，究竟核战争的危險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三国条约签字还不到五个月，世界舆论对于这个条约已经不是那么感兴趣了。时间会作出最后的判断。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中国为什么反对东西方和平协商？

周：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晓得。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因为中国政府反对部分核禁试条约，人们设想，中国反对缓和东西方关系的小步骤，反对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

周：这是两回事。我们就是不相信这个条约能够一步一步地禁止核武器，如我刚才所说的。但是，绝不能认为，由于中国反对部分核禁试条约就说中国政府反对东西方谈判和缓局势。这位记者先生是美国人？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不，我是埃及人。

周：噢，你是代表美国杂志的。美国应该说是西方大国吧！中国也应该说是东方人口众多的国家吧！当然，

我们同阿联一样都是东方国家。你想想，如果中国反对东西方和缓局势，为什么中国大使在华沙同美国大使进行了八年多的会谈呢？谈判次数达一百一十八次。我的历史知识有限，在现代史上，这样长的谈判恐怕是空前的。会谈八年多，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还在继续谈。现在美国还继续霸占着中国领土台湾，美国第七舰队继续在台湾海峡威胁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同美国谈判解决中美争端的途径，而没有诉诸武力。怎么能说中国不要和平协商呢？我希望通过你的美国杂志，向美国人民致意，告诉美国人民，中国人民愿意同美国人民友好，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是要反对到底的。必须把这两件事区别清楚。

开罗《消息报》记者：阿联同中国和苏联都是朋友，我们对中苏分歧感到遗憾。现在这种分歧是思想意识分歧，还是已发展到政治分歧？

周：谢谢你的好意和关心。中苏两党在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但我们相信，这种分歧终究会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286〕和一九六〇年声明〔287〕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得到解决的。我们对两国友好的阿联朋友放心。至于某些国家想利用中苏分歧从中渔利，是一定要失败的。中苏两大国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美国电视台记者：是最近签订的条约？

周：你还不知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9〕是一九五〇年二月签订的。我同维辛斯基〔288〕签的。遗憾的是他已经去世，但条约还存在。所以，一旦有事，中苏两国人民会肩并肩、手拉手地站在一起的。亲爱的阿联朋友们，以及和阿联同样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放心，我们是你们可靠的朋友。

美国电视台记者：我可否搭你的飞机去地拉那？

周：你可以乘自己的飞机去。

美国电视台记者：我自己去，他们不会给我签证的。

周：那是人家主权国家的事，我不能干涉。

中东通讯社记者：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对巴勒斯坦问题如何看法？第二，你们对阿拉伯人民争取统一的斗争如何看法？

周：这两个问题，公报里都提到了。中国人民一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为争取他们的正当权利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我们的外交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对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联合和统一的行动，我们也是一向支持的。

《金字塔报》记者：法国是否准备承认中国？

周：现在还没有到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路透社记者：在你同纳赛尔总统的会谈中，是否提出了中国向阿联提供贷款的问题？

周： 亚非国家之间经常有这种事，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事。

法国电视台记者： 你对于法国有什么要谈的吗？

周： 我和陈毅元帅四十年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我们是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我愿借此机会，向法国人民致意。我和陈毅元帅都希望有机会到法国访问。我们对法国热情的人民印象很深。

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国一贯主张并且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7]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47]。正是从这些原则出发，中国政府在处理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时，一向坚持不渝地采取以下的立场：一、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五、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这一立场也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同所有非洲国家关系时一贯坚持的立场。

* 这是周恩来在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期间会谈时所表明 的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中。公报全文刊载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 的八项原则*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以下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

* 这是在访问加纳共和国时答加纳通讯社记者问的节录。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中国同马里共和国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中正式写入了这八项原则。

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在塞古·杜尔总统举行的 文艺晚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尊敬的塞古·杜尔总统阁下，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带着中国人民对几内亚人民的真挚友谊，前来访问你们的共和国。以塞古·杜尔总统为首的几内亚政府和几内亚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在促进亚非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一向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现在，我们有机会同总统阁下，同几内亚各界人民的代表欢聚一堂，感到亲切和愉快。几内亚政府对我们的殷勤接待，几内亚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欢迎，使我们深受感动。在这里，我以陈毅副总理和我个人的名义，向我们慷慨好客的主人表示诚挚的感谢。我还要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总统阁下、几内亚政府和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三年多以前，塞古·杜尔总统带着几内亚人民的友

* 这是访问几内亚期间的一次讲话，刊载于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谊访问了中国，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这次访问中，中几两国缔结了友好条约，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支付协定。几年来，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地得到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相信，我们的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几内亚人民是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传统的人民。你们的民族英雄萨摩里·杜尔的光辉名字，几内亚人民在十九世纪末叶抗击殖民主义入侵的不朽业绩，不仅为非洲各国人民所传颂，而且也受到中国人民的钦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内亚人民在塞古·杜尔总统和几内亚民主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终于在一九五八年取得了民族独立。几内亚的独立自由的旗帜，在非洲大陆的上空骄傲地升了起来，对于整个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

几内亚人民在独立以后，警惕地捍卫着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一再粉碎了帝国主义所策划的颠覆阴谋，几内亚人民在塞古·杜尔总统的领导下，在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进一步肃清殖民主义势力、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事业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几内亚，第一批本国的民族工业企业已经诞生。几内亚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建立和发

展了本国的商业网。几内亚政府在文化教育部门逐步清除殖民主义的影响，大大地发展了民族教育事业。几内亚的文化艺术、体育、卫生、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事业，都比独立前有了显著的进步。

中国人民为几内亚人民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特别可贵的是，几内亚人民并没有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他们挺起了胸膛，以主人翁的姿态，不断地克服着帝国主义所制造的重重障碍，显示了管理自己国家的才能。几内亚自己的干部担负了国家的军队、行政、经济技术和文教等方面的组织工作和领导工作。这是几内亚人民值得引为骄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瞧不起亚非人民，说我们根本不会管理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已经用事实证明，我们不仅有本事管理自己的国家，而且会一天比一天管理得更好。

几内亚共和国是富饶和美丽的，几内亚人民是勤劳和富有才干的。正如塞古·杜尔总统所说，几内亚是一个没有被打开的“百宝箱”。我们深信，几内亚人民一定能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把这个“百宝箱”打开，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

几内亚共和国一贯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亚非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作了积极的努力。几内亚政府在全面禁止核武器问

愿上所持有的正义立场，充分地表明几内亚政府和人民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命运抱有巨大的关怀和高度严肃负责的精神。世界上的国家不论大小，都能为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有的国家虽小，在国际事务中却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立场，发挥积极的作用。几内亚就是这样的国家。

今天，新兴的亚非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亚非国家的发言权是帝国主义者抹煞不了的。目前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席位分配，对于亚非国家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中国政府完全支持亚非国家要求增加它们在联合国主要机构中的席位的一切努力。

亲爱的朋友们，自从一九五五年第一次亚非会议〔103〕召开以来，亚非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非洲的五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中，现在已经有三十几个国家取得了独立。在还没有独立的国家里，也正在燃烧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怒火。几世纪来受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和奴役的非洲人民已经觉醒起来、站立起来了，他们决心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亚非十七亿人民的团结，已经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一支伟大的力量。去年五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251〕，为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为非洲国家团结反帝

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面临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威胁，我们亚非国家应该进一步团结起来，互相支援，并肩前进。

亚非各国人民深深地懂得，独立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自己的斗争；独立以后发展民族经济，建设自己的国家，也首先需要依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这是一条信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完全独立的道路。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力更生，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进行友好合作。尤其是亚非国家在各自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应该互通有无、互补短长、互相援助。一切援助都是相互支持的，都应该完全符合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决不允许利用援助进行控制、掠夺、干涉甚至颠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几内亚共和国都是热爱和平、热爱独立和自由的国家。中几两国人民过去都遭到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都经历过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在我们两国人民相继取得胜利以后，我们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在各个方面互相支持，互相援助。几内亚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现在，总统阁下又就此发出了正义的呼吁。我们对此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几内亚人民可以相信，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

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将永远是几内亚人民可靠的、忠实的朋友。

我现在祝几内亚共和国繁荣昌盛,
祝中几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万古长青,
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关于非洲国家的独立问题*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六日)

我们对非洲总的印象是，那里存在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大好形势，非洲人民迫切要求建设自己的国家。同亚洲相比，非洲的觉醒迟了一步。但是，在二次大战后，特别是在万隆会议^[103]以后，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性空前提高，都要求站起来。当时，参加万隆会议的非洲国家仅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可是，万隆会议在整个非洲的影响却很深。作为亚洲国家的成员，中国代表团在非洲受到很热烈的欢迎。非洲人民对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印象是，认为亚洲比非洲先走一步，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增强自卫能力等方面，亚洲是他们的榜样。亚洲和非洲人民之间存在着兄弟的友谊、战斗的友谊、革命的友谊，休戚相关。当然，我们相信在拉丁美洲人民中也会有这种情绪，但我们没去过，不好说。

* 这是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的会谈节录。

在非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受所谓西方文明压迫和剥削了四五个世纪的非洲人民比亚洲人民受到的苦难更多更深。举例来说，恩克鲁玛〔289〕总统现在住的城堡是过去英国总督住的。城堡建筑在海滩上，是十五世纪时葡萄牙殖民者开始修的，后来接着修建的是西班牙、荷兰，最后是英国。他们修这样的城堡干什么用呢？就是作为掠夺、贩卖黑奴的滩头阵地。西方殖民者通过收买当地酋长，用酒、布换人，把黑人当货物，贩运、骗往美洲。象这样的滩头阵地，从西非海岸的摩洛哥，沿海岸直到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每百十公里一个。这种城堡，就是为了在黑人反抗时进行镇压而修建的。据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290〕的统计，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由于殖民者贩卖黑人，非洲损失了一亿左右人口。西方殖民者为什么要掠夺这么多的劳动力呢？因为居住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反抗殖民者，殖民者就将他们消灭殆尽，剩下一点跑到山上去了。西方资本主义不仅压迫、剥削本国人民，而且基本上消灭了美洲土人，奴役了非洲人，剥削了亚洲人。陈毅副总理为此做了一首词〔291〕，其中有一句就是“两洲血”，两洲指的是非洲和美洲。因此，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在非洲人民中印象最坏，一听到就讨厌，这已经变成了非洲的民族感情。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先贩卖黑人，后掠夺农产品、黄金、钻石和各种矿产，这些原料大部运往欧

洲，他们从沿海起逐渐深入内地。到十九世纪末，西方各国发生争吵，结果开了会议〔292〕，他们不顾民族情况，瓜分非洲，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其他国家都被瓜分。因此，许多非洲国家的国界都象刀切的一样，是直线的。这次杜尔〔293〕总统对我们说，亚洲是在根据民族系统形成国家以后，西方殖民者才入侵的，因而他们不得不照顾当时的实际情况。而非洲就不一样，许多国家是人为划分的，不是按民族系统划分的。现在独立了，又不能不按西方殖民者人为划分的国家独立，否则各民族就会争吵不休。这些话是有道理的，如几内亚、葡属几内亚〔294〕、塞拉勒窝内〔295〕和利比里亚都是一个民族，却分成四个国家。马里也是如此，西边的塞内加尔、南边的象牙海岸〔296〕、北边的毛里塔尼亚的一部分都是同一民族，但都被法国分割。加纳、多哥、达荷美〔297〕也都是一个民族，但加纳被英国占领，多哥和达荷美被法国占领。历史上，非洲有加纳帝国，存在了七八个世纪，后来又有马里帝国。这些帝国直到殖民者入侵后才瓦解。黑非洲的情况如此，北非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

因此，这里就有两个问题：第一，先按帝国主义划分的地区取得独立，然后，逐步争取全部非洲国家独立。已独立的国家要支持未独立的国家争取独立，最终要争取全部非洲国家的完全独立。如果不这样做，而要求依照民族系统独立，那就会纷争不已，正中帝国主义的诡计。

对于这点，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首脑和人民都有觉悟，但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挑拨，发生边界纠纷。总之，要根据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首先是争取本民族的独立。第二，争取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非洲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愿望是并存的。关于这一点，这次我们访问非洲之后才了解。一九六三年五月，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上顺利地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争取非洲的统一和团结，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总口号是非殖民主义化。这个会议是成功的，这些原则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相同的。

亚洲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日本发展得快，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还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中缅两国都受过它的侵略和压迫。日本属于西方国家的行列，当然它也是一个亚洲国家。非洲各国的发展也不平衡，但大体上是平衡的。北非稍发达一些，南非有些工业，东非、西非、中非落后一些。因此，它们的共同任务是要推翻殖民主义统治，建设自己的国家，建立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建立民族自卫武装，加速非洲统一。这次我们在非洲的讲话中就有一条是，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我们这些讲话，得到了非洲人民的支持。

非洲有两类国家，一类已经取得独立，一类尚未取得独立。在非洲有五十九个国家和地区，已独立的有三十

四个，未独立的二十五个，现在只能这样分。

已独立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认识，即单是政治独立是不够的，还要求得经济独立。对于这一点，非洲有见识的首脑也认识到了。当前非洲还是贫穷落后的，几乎没有象样的工业，城镇过去是为殖民者享受建设的。既然这些地区如此落后，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否可能呢？

我们认为非洲遍地是宝，有广大未开垦的处女地。矿产虽被殖民者掠夺了一些，但大部未被开采，有石油、煤、铁等丰富的矿藏。撒哈拉的油田脉向四面伸延。科纳克里就在一个大铁矿上。煤少一些，但还未勘测。有色金属如铀、铬、铜都有，还有黄金、钻石，加纳原来就叫黄金海岸。这是地下资源。地上物产更多。缅甸出产的农产品那里都有，有些国家粮食能自给，如马里。蔬菜四季都有，冬季供给欧洲。水果产量最大，欧洲的热带水果大都是非洲运去的。还有枣类、木材等。畜产比亚洲多。马里四百七十万人，每人平均两头羊，一头牛。这样的水平，中国在本世纪内是办不到的。索马里每人平均一头半羊，两人一头牛。苏丹也是如此。总之，农、林、牧、渔资源都很丰富。非洲的面积比亚洲、美洲小，但比欧洲大，比中国大三倍多。人口仅两亿六千万，可耕地两亿公顷，比中国多一倍，每人平均的耕地也比中国多。现在他们耕作粗放，有的还刀耕火种。只要有水利灌溉，并稍加施肥，产量即可大增。经济作物有棉、烟、糖料、油料、麻

等，苏丹在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交叉的三角地带种的棉花，是高产长纤维棉花。

只要非洲开发起来，农业发展起来，就能自给自足，从而打下可靠的国民经济基础，再逐步发展工业。未来的非洲一定是一个繁荣富强的非洲。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殖民主义者是无孔不入的，要彻底消灭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是长期的。因为他们的统治不仅在表面，而且还深入到非洲社会的各个方面。

要把非洲民族民主革命贯彻到底，还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建立民族自卫武装。殖民者培植自己的军队，并加以控制。本地人只能当兵，军官都为殖民者所掌握。英、法、比、葡殖民者都是如此。因此要保卫独立，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实行武装斗争的国家，这个问题解决得快一些，如阿尔及利亚、阿联。几内亚和马里已经赶走了法国军官。加纳正在斗争中，英国控制不了军队，就想控制警察。最近，在桑给巴尔^[298]、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发生的事就是这样。在东非国家，英国不肯放弃对军队的控制。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三国首脑请英国军队回来，现在被动了。本月十二日非洲外长会议^[299]决议建立非洲民族军队，看来还有一场斗争。我们这次推迟了对桑给巴尔、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和布隆迪五个

国家的访问，因为我们不能在英国军队保护这些国家的情况下去访问。布尔吉巴〔300〕总统和摩洛哥国王都对我说，要设法排除外国军事基地，突尼斯已收回比塞大，索马里赶走了英国军事教练。阿尔及利亚正在争取排除法国的导弹基地和海军基地。

第二，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民族的国家机器。……一些国家虽然独立了，但国家机器仍在殖民者手里。这次纳赛尔〔301〕总统和萨布里〔285〕主席都同我谈过这个问题，纳赛尔在推翻法鲁克王朝〔302〕后，改组了旧的国家机器。对于这个问题，非洲有见识的首脑，都如此认识。

第三，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除埃及古文化外，非洲一般的民族的文化比亚洲民族的文化更落后。殖民者不但不帮助，反而摧残民族文化，有的民族迄今没有文字，只有语言，因此只好用外文。亚洲值得欣慰的是，在殖民者入侵前就有了自己的文字。文字是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工具。阿拉伯国家的文字能一直流传下来，是有利于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也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非洲各国首脑都已意识到这一点。当然，他们在过渡时期，还要借助于外文。这次我们去访问，各国都给我们看民族文化，从摩洛哥国王请我们吃的抓饭，到其他非洲国家的音乐、舞蹈，都是民族式的。

友好当先 抵抗在后*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 听说双方对具体问题已经谈得差不多了。我想主要从大的方面跟各位谈一谈向前看的问题。

松村谦三(以下简称松村): 我们从到达北京的时候起,直到今天,同中国朋友进行了坦率而友好的谈判。一些具体问题大部分已经谈妥,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这些天来,我是游玩闲逛了。但是,代表团的各位朋友和孙平化^[303]先生、王晓云^[304]先生进行了象外交一样的谈判,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达成了协议。所以,我想这些协议应该是稳妥可靠的了。

周: 问题总是多辩论几次好,不但外交上的事情如此,其他事情也是如此。辩论在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

松村: 冈崎嘉平太^[305]先生继高碕达之助^[268]先生

* 这是同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国会议员松村谦三等日本客人的谈话节录。这次松村一行来访,双方达成互设民间常驻机构和互派常驻记者的协议。

之后负责高碕办事处的工作，希望今后得到您的关照。

周：我们希望冈崎先生继续同我们合作。我记得前年冈崎先生曾同高碕先生一同来过，去年又来过，冈崎先生已经有两次同我们合作的经验了。事务问题总是要复杂一些，麻烦一些。原则商定了，到具体化就复杂了。廖承志^[306]同高碕达之助商定的原则要付诸实践，问题就会多起来。

我想就松村先生和永井道雄教授对谈中的一些问题谈一谈我的看法，也就是如何向前看的问题。我看了《世界杂志》四月号刊载的这篇对谈的中译文，引起了我想谈的问题。的确，这些问题存在于中日两国关系之中。

我想，不论是促进两国关系也好，维护远东和平、促进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也好，首先要从两国本身的利益来看，然后再从世界角度来看。

中国解放后十五年来，采取了独立自主的立场，所执行的国内外政策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座的朋友中，有的多次来过中国。你们能不能找出具体例子说明中国的内外政策是听人指挥、受人控制、依赖别国的，是卫星国而不是独立国的政策呢？如果有，我愿领教领教。

冈崎嘉平太：没有。

松村：我根本没那样想过。中国解放后执行了完全独立的政策，这一点我很了解，甚至可以说中国坚持独立

过分了。

周：如果不是坚决贯彻独立自主的立场，就会成为卫星国，仰帝国主义的鼻息，就会成为从属国家。因此，在坚持独立自主上不能放松。松村先生所说的“独立过分”是不是说要把自己孤立起来，不跟人合作的意思？

松村：是这个意思。我是想，日本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发动了战争，结果战败了，日本垮了台，亚洲各国获得独立。我希望这些受压迫的国家获得独立，成为非常繁荣的国家。我认为独立、繁荣和世界和平联系起来才有意义。

周：对松村先生谈的意见，我稍有不同的看法。松村先生说日本垮了台，我认为日本并没有垮台，是日本军国主义垮了台，而日本人民根据自己的意志，独立发展起来了。

松村：我也是这样想。灭亡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军国主义使日本国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和牺牲，一时连吃的东西也没有。军国主义垮台后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我们才搞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周：战争的祸害是军国主义造成的。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都遭受了痛苦。但是军国主义的罪恶也教育了人民，使他们起来反对军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把它强加在人民头上。

刚才松村先生说的中国会不会独立过分的问题，我

的看法是，独立并不排斥合作。在现代，每个国家都不能闭关自守、孤立起来。真正的独立并不排斥国际合作，即同真正的友好国家合作。前年，松村、石桥〔260〕先生来访时我也谈到了我们的独立自主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这样的：凡是对我们友好的国家，我们就以更友好的态度对待他们；如果敌视我们，我们就以同样的态度进行抵抗。也就是说，我们在推进友好方面是积极主动地以友好的态度求得同人家的友好相处的；如果谁敌视我们，我们将进行抵抗，但是敌视不为人先，这是我们的原则。这些原则用两句话来说，就是友好当先，抵抗在后。对各国人民来说，我们这些政策是丝毫不成为问题的。因为绝大多数人要和我们友好，只有极少数人敌视我们。当然，反动派要在人民当中制造敌视气氛，有少数人会受到影响。不管是什么肤色、什么种族、什么信仰的人，总是应该友好相处。即使对过去同我们敌对过、作过战的日本，在战后，我们也主动伸出友好的手，日本人民接受了，友好关系就发展了起来。这是好事，证明我们可以友好相处。我们对美国人民也是这样，我们一向表示愿意同美国人民友好。我想，绝大多数美国人也愿意同中国友好，不过由于形势如此，现在美国人民不容易表达他们的愿望。

目前，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独立起来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亚非国家在全世界国家中要占一半，现在非洲还

有些国家尚未独立，如果独立了，亚非国家将超过一半。九年以前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103〕的国家只有二十多国，今年光是参加在雅加达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307〕的国家就有二十二国，估计明年第二次亚非会议正式举行，参加的国家就不会是二十几国，而是更多。这些国家基本上是要友好合作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相同，彼此没有争端。争端是会有的，但总的说来可以求同存异。为了民族独立、建设自己的国家、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些国家总要进行友好合作。不仅亚非国家如此，就是拉丁美洲、北美洲、欧洲、澳洲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中，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的是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国家，有的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愿意世界和平，就是后两种国家也总是要维护世界和平的。只有少数帝国主义国家要用战争来威胁人民，敌视世界人民，企图维持原来的统治，或者重新控制世界。不过，现时的特点是这些占少数的国家掌握着强大的武力，用核武器来吓唬人，要控制全世界。从表面看，好象它们很强大，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绝大多数国家是要和平友好、反对压迫和侵略战争的。

中国反对少数人用战争、核武器来讹诈世界人民、欺负人，表示了独立和反抗的精神。中国为了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在这个问

题上，松村先生不要担心中国独立气概太盛，同美国闹翻了，会在亚洲引起世界大战。中国就是有这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气概。我们受了一百多年的压迫，深深懂得不仅要使自己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也要使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要为此而奋斗。这就要坚决抵抗最顽固的帝国主义，即表面上强大实际上是极虚弱的战争势力，说穿了就是美国。对它我们就是要顶下去。不要看美国手里有核武器，似乎很了不起。世界人民要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大多数的国家要和平友好，反对核战争，美国人民也不愿意打仗。如果美国敢于发动战争，那么失败的将是美国。

如果亚非国家团结起来，美国怎么敢在亚非地区发动世界大战？松村先生刚才也说过日本人民蒙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祸害，我不相信受过祸害的日本人民会替美国去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少数人愿意打，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不愿为美国去火中取栗的。美国人民愿意不愿意打？这一点美国政府很清楚，美国人民是不愿意打仗的。

蒋介石要拖美国下水，妄图进攻大陆。实际上美国不赞成进攻大陆。美国警告蒋介石不要闯祸，如果蒋介石闯祸，美国不愿意参战。最近，腊斯克〔256〕跑到台湾去了，也没有谈出什么结果。蒋介石要美国提供船只和军火，美国知道这是要把美国拖下水，美国不干。美国有另

外的打算，它要蒋介石把精锐部队派到南越去干涉越南内政，参加镇压南越人民的战争。美国不愿派自己的人到南越去送死，因为每死一个人，家属就要闹，说不值得去送死。蒋介石知道美国的打算，他也不干。因为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在南越损失了，美国就可以在台湾换人。蒋介石懂得，一旦他的主力部队没有了，他就会变成李承晚^[6]和吴庭艳^[308]式的人物。象这样，美国连南越都搞不到手，它还想在亚洲发动世界大战？

最近，东南亚条约组织^[71]国家在马尼拉开了会，这个会开得毫无结果，可是还要发表联合公报。这是什么样的联合公报？这是最不联合的联合公报。公报本身就写明美国和法国有不同的意见。会上意见纷纭，可是腊斯克还自我解嘲地说意见不一致也可以行动。在这一点上，应该称赞日本记者的眼光，他们说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作用在一天天减弱。在马尼拉会上，菲律宾的代表嚷得很凶，不赞成法国承认新中国。可是菲律宾派到雅加达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的代表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的团长与陈毅外长拥抱，庆贺亚非会议筹备会议的成功。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所依靠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也靠不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敢在亚洲发动世界大战？中国懂得，也看清楚了这种情况。美国并不可怕，这话并不是我们在事后才说的，二十年前毛主席就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并不那么可怕。

朋友们也许会担心，中国会不会因为独立精神太盛，在亚洲闯起乱子？我看日本朋友是最了解中国的。十多年来，日本朋友们来得最多。几十年来，大约有三四千日本妇女，入了中国籍，她们已成为我们的和平家庭的成员。她们很了解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愿意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平相处。中日关系的现实就证明了这一点。日本政府承认蒋介石代表中国，不承认我们代表中国。如果从形式看问题，你们的政府是敌视我们的，但是，我们还是邀请了你们。我们相处已有六七年了。我们把你们当做朋友看待，没有当敌人看待。我们要透过表面看实质。日本人民愿意同中国友好相处。日本执政的党和政府中的多数人也愿意恢复两国邦交，不过因为形势的关系还不能实现，目前还保留着承认台湾为代表中国的政府的状态。你们代表着日本执政党和政府中的多数。岸信介〔216〕被池田〔217〕政府代替，不是表现了这种趋势吗？松村先生对我的这一点评价如何看？

松村：在这一点上，情况大体如此。只有一点，需请您谅解。因为我们是自由阵营中的一员，同贵国情况不一样，把问题提交到国会上去讨论，要费很大周折。但是我相信您所说的那种局面终究会出现，我们正在努力促其实现。

周：正是因为日本的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所

以我们才不看表面现象而看实质。如果只看形式，看表面，台湾的大使馆就在东京，我们的代表团为什么还进去？因为台湾的大使馆在东京，这是一种临时现象，终有一天，东京的蒋介石大使馆会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所代替。这也是大多数日本人的愿望。上一次我也谈过，我们赞成用积累的方式改进中日关系，为建立中日邦交而努力。

中日经济合作应当 把眼光放得更远些*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诸位访问中国不过几天，团长先生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日两国应该如何友好相处，如何进行合作的问题。确实如此，中日两国如果真正友好相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的完全独立，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这对于我们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都是一个远大的理想。因此，诸位先生提出的问题是具有远见的。

我们知道，日本经济的发展，不光是靠国内，同时也靠国际市场，而诸位是从关西来的，那里的对外贸易占日本整个对外贸易的很大比重。所以你们是很重视对外贸易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诸位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要使经济技术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这就是说，根据以上的情

* 这是会见日本关西经济访华代表团的谈话节录。

况，我们互相有这个愿望和需要。团长先生刚才提到友好合作问题，所以我想多说几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依靠国际合作。为了实现国际合作，就需要确立几个比较长期有效的原则。

第一，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包括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等，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来进行。刚才团长先生提到平等互利这一点，这是很好的，确实如此。中国过去是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使中国遭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现在中国解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处于大国地位，但是出现了军国主义，使日本受到战争的灾难。战后日本处于战败国的地位。团长先生刚才说日本战后得到美国的一些好处。但是，同时也带来坏处，就是在若干方面受到美国的控制，日美之间不是完全平等互利的。特别是最近美国遭受经济危机，想把它转嫁给日本，对日本的商品进行限制来保卫美元。日本企业家当然要考虑怎样才能独立和平等互利。对于日美政府谈判，日本的舆论也反映了这一点。我刚才谈到中国过去已经有过教训，现在日本也有同样的处境，因此，今后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应该真正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第二点，中日两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发展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据我看来，这一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尽管

中日贸易现在还是有限的,例如,今年的中日贸易额即使达到两亿美元以上,在日本整个对外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也还是很小的,比起日美贸易的规模就更小了,同日本与台湾的贸易相比较,也仅仅超过一点点。但是,这是眼前的开始的现象。今后在真正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几十年以后,就一定会大大超过现在。这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的。日本需要的原料,中国基本上都有。日本可以供应中国技术设备的种类相当多。中国有六七亿人口,日本有一亿人口,彼此有很大的市场,中日经济力量发展了,需要就会增加,互通有无的可能性就会更大。现在美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饱和点,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进口日本的商品加以限制,以防止美元外流。如果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美国在日本的军事支出会减少,这也会影响日本的经济。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这就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发展。我们的关系不应当是一方依靠另一方的,而是相互的、根据彼此需要进行合作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中日两国发展经济合作是不是可靠?是不是冒险?团长先生刚才提到两点:一、日本企业界是有信用的,也就是重信用的;二、有人担心发生类似长崎事件那样的事,从而取消合同。

长崎国旗事件不是孤立的问题。这个事件反映当时的中日关系。当时中日贸易是根据贸易协定进行的。贸

易协定虽然不是官方的,但实际上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也就是半官方的。因为每年有一个半官方的贸易协定来维系双方的贸易活动,所以政治上如果发生问题,就会影响合同的执行。当时,中日贸易关系是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两国互办商品展览会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我上一次同松村^[267]先生也谈了,我说日本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来北京举办展览会的时候,村田省藏^[309]先生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我出席了。北京饭店大厅挂了很大的一面日本国旗,横跨整个舞台,给我的印象很深。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日本国旗。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日本政府承认台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友好地处理这个问题,没有提出意见。这件事说明中国人民是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对日本国旗是尊重的。当时,我参加招待会,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国的总理出席的。但是,一九五八年中国在长崎举办了一个很小的手工艺品展览会,会场上挂了一面很小的中国国旗,却遭到日本暴徒的侮辱。日本政府对这个事件不负责任,也不道歉。这两件事情对比起来,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很大的愤慨。同时,日本政府对第四次贸易协定中几个关键性的问题^[310]也不给予批准,使贸易协定不能成立,因此相应地使有关协定的合同和钢铁合同也不得不取消。以上当然是直接的原因,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那就是岸信介^[216]内阁不仅在经济上,还在政治上敌视中国。

例如，岸信介访问台湾，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到南亚进行反华活动，到华盛顿支持美国对华政策。这是不友好的，是敌视中国的。因此，岸信介政府的行动使中日经济贸易关系不能发展。后来，松村、高碕^[268]、石桥^[260]等几位先生相继访华，要求改变当时的情况，他们做了努力，并取得了结果。同时，池田勇人^[217]先生执政，日本的内阁也起了变化。我把过去的实际情况向团长先生说明，不是中国方面不守信用，错误不在我们这一方面。

但是，不管日本政府对新中国表示友好或不友好，总遇到一个问题：这就是日本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而不承认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是最根本的矛盾。我想，诸位也会想到这个问题的。现在，当池田政府对中国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诸位就可以放心一些。但是，如果明天岸信介再出来组织内阁，或者岸信介的兄弟佐藤荣作^[311]上台的话，诸位就会担心起来。我们也觉得需要给予不同看待。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不管政府是否换人，政策是不会变的。假如今年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不再选我当总理——假定我不当总理，而由别人来当，也不会因此影响外交政策，别人照样执行现在执行的政策。但是日本政府如果换了人，就有这个问题。因此，难怪池田先生想出这个办法，就是“政治和经济分开”。我们说，政治和经济是不能分开的，基本上是不能

分开的,但是,有时也可以分开。诸位知道,自从岸信介政府撕毁了贸易协定,我提出了政治三原则^[230],是强调政治的。政治三原则对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日本人民愿意同中国友好,不敌视中国,承认新中国,为恢复中日邦交而努力。诸位先生来中国访问,正是代表了日本人民的意愿。所以,政治三原则主要是对日本政府说的。由于松村、高碕、石桥等几位先生的奔走,我又提出贸易三原则,作为我们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根据。贸易三原则就是:第一,最好是由两国政府在彼此承认之后,缔结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以前的贸易协定不要再恢复了。但是,这一条现在还做不到。因此,第二,可以通过两国的民间团体,或者与政府有关的团体,建立若干关系,签订全面的或个别的贸易协议和合同。这种协议和合同是个别的,互相交流物资,也有一方买另一方的,例如广州的交易会。自从一九五八年贸易协定失效^[312]以后,这种小额的、民间的友好贸易一直发展到现在。第三,由比较负责的团体或人士代表双方签订长期的议定书,例如前年签订的高碕达之助和廖承志的备忘录^[269],范围比较广泛,其中有易货贸易,成套设备的分期付款和某些商品的延期付款,将来还可以广泛发展技术合作。这是通过负责人士来签订的,例如,高碕达之助和廖承志都代表一个方面。高碕先生不幸去世了,但是还有人接替他,就是冈崎嘉平太^[305]先生。为了纪念高

碓先生，日本方面仍然用高碓办事处的名义，同廖承志办事处来处理备忘录贸易事宜。有时候，用人物来作代表，比团体的作用大。它的好处是：日本政府即使改变了，也不致于受到影响。对中国友好的日本政府会支持这个办事处，而对不友好的政府就可能不支持或限制这个办事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影响到贸易。如果岸信介再出来组织内阁，是不是会取消这个办事处呢？这我不能保证。你们是不是也不能保证？不过，我有一个信心、一个认识：一九六四年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同一九五八年不一样了，即使岸信介再次上台，下令取消办事处，也是不可能的，日本广大的产业界是不会赞成的，因为双方的生意越做越大，影响就越来越广了。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有这个需要；从日本方面来说，日本广大的企业界也有这个需要。这样，在两国经济上都有了根基，任何人也不能随意把它取消。形式上备忘录是非官方的，实际上是半官方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为什么只能是非官方的呢？因为现在日本政府承认台湾代表中国，而实际上它也知道台湾是不能代表中国的，这是滑稽的，但是现实中就存在这个笑话。如果中国政府在东京设立办事处，就会产生“两个中国”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也到北京设立办事处，同样也就等于日本政府承认“两个中国”。这是从形式上来讲的，也就是从法律上来讲的，因为一般地总

要从法律上来考虑问题。但是，如果讲政治，就要讲实质。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说与官方有关。高碕先生也好，现在的冈崎先生也好，都是自由民主党的人士，能说他们同日本官方没有关系吗？廖承志先生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说他同我没有关系呢？所以，实质上是半官方的。目前按照这第三个原则，双方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正在向前发展。

我提出了贸易三原则，高碕先生很高兴，因为解决了他的困难。池田首相说的“政治和经济分开”，基本上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同意了，就等于承认日本政府所谓中国只是在经济上代表大陆。这样就形成“经济中国，政治台湾”，不但中国人民不赞成，日本大多数的人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日本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主张日本同台湾断绝关系。如果是“政治新中国，经济台湾省”，那倒还讲得通。但是，我晓得池田先生不会作这样的解释。因此，对“政治和经济分开”的说法，我基本上不赞成。这是我们的立场，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立场。但是，经济问题是不是有时候也可以单独加以解决呢？这还是可以找出办法的。所以我提出贸易三原则。第一条现在还办不到，就摆在那里作为目标，现在不能实现，要在恢复邦交以后才能实现。现在能够实现的是第二条和第三条，主要是第三条。

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是可靠的，有保证的。这一点，不但中国方面要努力，还要靠诸位来努力。我们之

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越发展，关系就越巩固，也就越能推动政治状况的改变。因此，高碕先生曾强调采取积累的方式，也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要互相促进。

第四个问题，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发展下去，中国是不是有支付能力？中国过去的商人做买卖是讲信用的，这是诸位所知道的。而现在中国是作为一个国家来同日本的企业做买卖的，所以中国方面的支付能力是很雄厚的。对于延期付款的商品和一般商品，国家是有支付能力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新中国成立十五年以来所欠的外债，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还清了。这就是欠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的债务，总金额接近三十亿美元，其中包括苏联的贷款三亿多美元。这笔帐接近三十亿美元，是包括利息在内的。剩下在明年要还的，有多少呢？只剩下两千万美元，其他的都还光了。不但是外债，解放后发行的内债大部分也还清了。五年前我们停止发行公债，那是一九六〇年，正是我国经济遇到困难时期。中国有一句老话说：“无债一身轻”。现在跟日本进行经济贸易往来，我们是“轻装上阵”的。我们是有支付能力的。

以上就是我们两国发展经济贸易往来的四个问题：第一是平等互利，第二是有发展前途，第三是关系可靠，第四是有支付能力，而且这个支付能力日益增长。如果说，过去十年我们支付了三十亿美元，那么，今后十年，我们支付三十亿美元以上也没有问题。

我看,关于中日经济合作的问题,我们还应当把眼光放得更远些。我们两国都是亚非国家,九年前,我们两国都参加了万隆会议⁽¹⁰³⁾,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我们所尊敬的高崎达之助先生,他当时是日本政府代表团团长。他是我们所尊敬的朋友。高崎先生虽然同我们永别了,但是我相信在日本还会有几百个几千个新的高崎先生出现。现在已经决定在明年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²⁸²⁾。第一次亚非会议曾经通过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平宣言⁽¹⁴⁷⁾,第二次会议将更具体地把这些原则发展和扩大起来。中心问题是亚非的团结,更好地进行经济合作。首先是各国要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真正在平等互利、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亚非地区有十七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有广大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大多数的国家还不发达。如果我们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⁶⁷⁾、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那么,发展前途是无限的。不发达国家的开发,国际市场上的需要,将超过现在好多倍。当然,这不是几年的事,而是需要几十年。但是,这是很有前途的。我们希望亚非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过去殖民主义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中国自己遭受过殖民主义的灾难,决不会用这种做法对待别人。日本人民也遭受过军国主义的灾害,不同意日本再采取旧的态度。这样,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大家就可以平等相处,友好合作。

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同日，中国政府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详细地阐明了中国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之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继续争取通过国际协商，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且为此，在自己的声明中，提出了以下建议，即：

“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

* 这是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名义发出的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电报，刊载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防止核战争，消灭核武器，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将得到贵国政府的有利考虑和积极响应。

我们期待 中菲两国关系的发展*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很高兴能见到你们。我们两国都是亚洲国家,都是参加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103〕的国家,都是在二次大战后取得独立和解放的国家。在那次会议上,我们两国代表是在取得各自独立和解放后第一次见面的。在参加万隆会议以后,我们就常想,如何促进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方面没有困难,而你们方面是存在一些困难的。

有一种困难现在正在逐渐打破。我们双方都是结盟国家,而且,这种结盟有一个时期是相当对立的。我们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9〕,菲律宾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71〕,这个组织是在美国领导下用来敌视中国的。因此,就使中菲处在对立的地位。但

* 这是同菲律宾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节录。

是，结盟国家的情况和性质最近有变化，而且大有变化。你们诸位是新闻记者，可能很清楚。

就以东南亚条约组织来看，巴基斯坦是其成员之一，可是，巴基斯坦在很久以前承认中国后，就一直对中国表示友好，中国对巴基斯坦也一直友好相待。特别是近几年来，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两国并未因为参加了对立的集团而相互对立和不友好。相反，我们两国的友谊更密切了。

诸位都知道，印度是不结盟国家，中印关系开始时期很好，但是，最近几年来比较紧张。所谓关系紧张，指的是政治方面，至于边境的局势，实际上已经和缓下来，没有什么紧张。

从这两个国家的例子可以看得出来，结盟和不结盟的情况已经大有变化。

从这一情况来看，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是可以改善的，而且应该改善，因为我们两国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我们两国都分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了独立和解放，现在还在为争取完全的独立而奋斗。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政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独立。我所说的经济上完全独立，并不排除经济往来和贸易上互通有无，这在当前的世界上是必需的，特别是我们亚非国家更应该实行经济合作，贸易往来，但是决不能侵犯任何国家的主权。我们两国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并不妨

得双方关系的发展。自从万隆会议以来，我们就有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我很高兴，罗慕洛^[111]先生能够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307]，他在雅加达同陈毅外长的第二次会面，提供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的机会。接着就有两批记者先后来华访问。听说第一批菲律宾记者回国以后，对中国作了客观、友好的报道。这两批记者来华访问以及他们客观、友好的报道，为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再一个困难是，菲律宾与台湾蒋介石集团还保持着外交关系。但是我们认为，这也不能阻挠两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例如，日本与台湾蒋介石集团也保持外交关系，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同中国建立和发展一般往来关系。近几年来，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了，日本是亚洲国家中跟中国往来最频繁的国家。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战败国，曾经是一个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国家，是一个曾经对外侵略过的国家。菲律宾和中国都被日本侵略过。现在日本被美军占领，还有一部分领土被美国霸占，而且同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172]。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仍然跟我们发展友好关系，特别是民间的友好往来更是日益频繁。这一切说明，情况是复杂的，但不是无所作为的。日本在复杂的情况下，排除种种困难，发展跟中国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是给予大力支持的。

当然，日本跟中国发展关系，受到美国很大的压力。因此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一时不能发展官方的往来，但是实际上已经存在着半官方的往来。

日本如此，何况是菲律宾呢？正如刚才所谈的，我们两国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独立和解放的。中菲两国人民愿意友好往来。菲律宾的客观条件比日本要好。因此，自从万隆会议以来，我们一直期待着两国关系的发展，首先是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发展。

正是由于有了日本这个例子，我们相信，中菲两国的关系，特别是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终有一天会得到发展。

中国记者现在还没有机会访问菲律宾，而是由你们，菲律宾记者首先来我国访问，开始了中菲友好往来，因此值得我们庆贺。同时，我也愿意通过你们向菲律宾人民致意，预祝我们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时期的到来！

索利文团长（以下简称索）：我想请菲新社编辑桑托斯先生提个问题。

桑托斯：请总理阁下谈谈对美国在菲律宾设立军事基地一事有何看法。

周：当然我们对美国在菲律宾设立军事基地是不高兴的。

美国政府曾经宣布，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是针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的重要一环。但我们的看法不完

全如此。我们认为，美国在菲律宾设立的军事基地主要是用以对付菲律宾人民，它借口保护菲律宾，侵犯菲律宾国家的主权，加重菲律宾人民的负担，伤害菲律宾的独立和人民的自尊心。不言而喻，美国这种做法必然会影响菲律宾政策的独立性。在我们东面和西面，凡是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地方，都有这种情况。美国在全世界设立军事基地的地方都同样有这种情况。

也许美国向菲律宾提出了一个设想，即新中国强大了，会威胁菲律宾。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刚才说过，中菲两国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中国去威胁菲律宾干什么？早在万隆会议以前，我们就宣布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根据五项原则实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中国已经根据这五项原则，同许多亚非国家签订了和平友好或互不侵犯条约，我们不但这样写在条约上，而且也见之于实际行动。我可以举例说明，一个是跟缅甸的关系，一个是跟尼泊尔的关系，这两个国家同我国都有领土接壤。我们不仅跟这两个国家签订了和平友好或互不侵犯条约，而且还解决了边界问题，签订了边界条约。缅甸政府的领导人，不论是过去的吴努^[136]、吴巴瑞^[313]还是现在的奈温^[314]主席，跟我们一直很友好，虽然在这个国家里还存在着内战。这就是说，政府当局和本国的共产党以及其他的武装集团是对立的。但

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两国的友好往来。尼泊尔国内存在着共产党，但不是执政党，处在半合法的状态。尼泊尔是国王亲自执政的，这也没有妨碍我们两国友好往来。同我们接壤的国家对我们很友好，很放心，认为我们对它们不是威胁，而同我们并不接壤的菲律宾，更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我们没有必要对菲律宾进行威胁和侵略。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我们的信仰决不允许我们威胁和侵略其他国家。

索：有一个微妙的问题，我想请总理阁下谈谈，有些菲律宾人害怕中国会利用友好往来，输出革命，支持当地的共产党？

周：革命是不能输出的，我们一贯坚持这个原则。革命要靠本国人民自己来进行。大多数人民选择什么制度，这个国家就实行什么制度。这决不能由别国人民的意志来决定。尽管各国人民都希望世界进步，但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各国人民如何实现进步，这条道路还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走。我刚才列举了缅甸和尼泊尔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关于禁止核武器和裁军问题*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日)

你转达了首相阁下希望听取中国政府意见的愿望，我愿意直率地告诉阁下，使你们的新政府知道中国政府关于禁止核武器和裁军问题的意见和态度。当然，如果阁下愿意提出意见交换，我也愿意。首先，关于禁止核武器的问题，中国政府的意见已经在中国政府十月十六日发表的声明⁽³¹⁵⁾和第二天写给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信⁽³¹⁶⁾中说得很全面、很清楚了。我们进行核试验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我们提出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建议，是满足全世界人民要求禁止核武器、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望的。关于我们爆炸原子弹的政府声明和中国政府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信同我们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几乎是同一天。这说明我们的目的是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

* 这是同英国贸易大臣贾埃的谈话节录。

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为什么我们不仅是这一次，而且去年就主张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第一，我们认为，既然全世界舆论认为核武器破坏力相当大，威胁着世界人民的安全，应该让所有的国家参加，而且应该不分大国、小国。大国、小国都有权发表意见。第二，为打破核垄断，应该让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有机会发表意见。第三，正是要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受到限制，保证不使用核武器，然后才能达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的。只有无核武器国家参加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才能促使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

当然，有人会说，为什么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不可以在联合国讨论，而要另外召开会议？阁下懂得，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被剥夺了，而且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也还有一些国家一时不能被联合国接纳。禁止核武器是同全世界人民利益攸关的问题，应该使全世界各国都有权参加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应该在联合国以外开会。阁下说，这么多国家参加的会议是很难召集的，是不是先召开有限制的会议，少数国家参加的会议，象日内瓦会议^{〔52〕}一样的会议先进行协商呢？关于日内瓦裁军会议的经验，阁下比我更为熟悉。少数几个国家开了多少年，每次都没有结

果。裁军会议交给联合国大会，大会又交给裁军会议，在程序上不断轮番重复。这说明关系到全世界人民利益的问题应该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参加讨论，促使确定一个方向，首先是不使用核武器。另外一种日内瓦会议，象讨论有关印度支那问题或老挝问题那样，只讨论局部问题，只由有关国家参加。这种会议如经过参加国的努力，是容易达成协议的。这种会议也是在联合国以外召开的。

阁下的另一个论点是如果战争不停止，不论是世界战争、局部战争或者是美国说的特种战争，就很难禁止使用核武器。如果阁下的政府的想法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种想法很危险，因为这同美国的想法一样。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255]在莫斯科不论是草签还是正式签署以后，美国首脑和官员一再声明三国条约的签订不会减少核战争的危险，也不会禁止核武器的生产、储存、扩散和地下试验。如此，三国条约有什么用处呢？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去莫斯科签字后就公开宣称多边核力量还要继续搞下去。我们认为，三国条约的基础是错误的。问题关系到全世界人民，应该让全世界人民参加讨论才能解决。三国条约的签订是把既成事实摆在人家面前，强迫人家签字。在国际关系上是不平等的，这是强权政治，不是国际平等。

三国条约不但没有达到它所宣传的效果，而且适得其反。正如我刚才说过的，三国条约签字之后，美国官员

发表的连篇累牍的讲话就是证明。至于说到空气污染的问题，美国进行了将近四百次大气层核试验，它对污染世界的空气应负很大责任。只有当美国不需要大气层核试验时，它才搞协议。它是在大气层试验够了以后才转入地下试验的。更不要说，三国条约协议的草案根本是美国几年前提出的，几乎没有改动就通过了。中国现在才试了一次，就有人叫起来。真好笑！如果中国没有试验，也没有人来谈禁止核试验，但我们一试验，就有人要中国参加裁军会议，说中国参加了核俱乐部。当然，美国说中国不够资格参加。美国需要地下核试验，它尽量进行地下核试验，特别是改进战术核武器。它的目的很清楚。三国条约就是要束缚社会主义国家的手足，束缚民族独立国家的手足，而允许美国试验和扩散。多边核力量就是核扩散。地下试验是它需要的试验方式。一旦它需要大气层试验，它就可以恢复。

我们主张普遍裁军。裁军会议是否真裁军？美国国防预算每年增加。他们自己承认去年到今年年度的国防预算是历来最高的。我说的包括对外军事援助和在国外的军事基地开支在内。但美国垄断资本家并不以此为满足，要求增加军事订货，取得更高的无限制的利润。现在美国大选正在投票。两个候选人不论哪个当选，国防力量都会增加。所谓国防力量增加就是军事订货增加。这是实质问题。裁军会议取得的某些进展，都是枝节问题。

阁下说，世界上人口多的大国使人担心，因为它常规武器多，会比别国强。阁下来到的这个国家，对世界来说是最大的讽刺。为什么？因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十五年来一直被剥夺，这不是对世界的讽刺吗？你们是美国同盟国。艾登^[64]曾说，他要同美国谈这个问题。可以无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存在十五年，裁军会议还有什么真实意义？当然，尽管我们人口众多，但还是世界上落后的国家。我们要变得强大，还需要时间。即使将来变强了，我们仍然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仅我国人民如此，我们的国家制度也是如此。我国的制度不允许向外扩张、挑衅、掠夺。不错，我们现在要增加国防力量，但不增加国防预算，也不增加常规部队。我们倚靠广大人民，倚靠民兵制度。如谁敢来侵略中国，进来就出不去。你们的一位有预见的元帅蒙哥马利勋爵，他懂得这个道理。他来过中国两次。他曾公开劝告美国政府不要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关于中国是否有意参加裁军会议，讨论禁止核武器问题，我直率地告诉阁下，我们已被联合国无视十五年，如果这个形势没有变化，任何与联合国直接或间接有联系的国际会议，我们都不参加。我们不是不愿意促进国际合作。一九五四年我们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又参加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317]。

两次日内瓦会议我国都参加了。去年我们反对三国

条约，同时建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今年我们进行核试验，同一天我们就发表声明，主张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这说明我们愿意促进国际合作，没有任何理由责备我们。

中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日)

周恩来总理 (以下简称周): 这次访问非洲两个国家^[318], 它们都很关心东南亚局势的发展。我知道陈毅元帅访巴^[319]时也和总统阁下谈了一些。

阿尤布·汗总统 (以下简称阿): 我们也很担心。这种大规模的轰炸不知道哪天才会有结束。

周: 美国以为加强对南越^[149] 的侵略, 扩大对北越^[320] 的轰炸就能压服越南, 这种想法是要彻底失败的。

这次访问中, 非洲朋友和欧洲朋友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总起来说, 一共有三个问题: (一) 在美国加强其侵略和压力的情况下, 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如果能抵抗住美国的侵略, 那也会受到巨大损失; 如果抵抗不住, 在巨大威胁面前就会妥协。他们担心, 如果越南屈服于美国压力, 世界其他地区就要遭到同样的损失。(二) 担心

* 这是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会谈节录。

战争扩大，遇到抵抗而逐步发展为世界大战。（三）在妥协和世界大战两者之间是否有谈判的可能。

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回答。

（一）不存在越南屈服的可能性。三月二十二日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发表了最强烈的声明^[321]。他们坚信是能够战胜伪军的，南越伪军会逐步崩溃。美国所派去的军队只能驻守一小部分城市和海港。根据美国的计划，最多只能再调三个师去南越：一是美国的步兵师，一是美国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再从菲律宾、南朝鲜、泰国等地拼凑成另一个师。这些军队只能驻守南越的海港、城市和基地。美国想用这些部队代替南越伪军的正规部队，以使用伪军正规部队来对付南越人民。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相信能消灭伪军。美国当局担心伪军被消灭以后，美国军队怎么办。如果远离据点，也会遭到同样的失败。现在它的空军和陆军都不断地被消灭。南越伪政权已经换了十来个，几乎没有一个是美国可信赖的。吴庭艳^[308]兄弟俩就是美国人杀掉的。美国正在考虑，出兵时要同伪政权签订协定，说明是应伪政权请求出兵的，如果西贡现在的伪政权不复存在时，协定仍然有效。这不是奇闻吗？美国和蒋介石订了很多条约，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这些条约就无法保持了，只有在台湾是例外。现在美国在南越又想利用协定来办事。其实，美国早就知道它在南越是输定了，可是又不肯退出，就想出这个办法来挣扎。

另一方面，美国企图用扩大对北越轰炸的办法来压服北越。在去年八九月的时候，美国每周对北越进行一两次轰炸，从今年三月下半月到现在，几乎天天都轰炸。对此，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声明，不管持续多久，将坚决战斗下去，直到胜利为止。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支持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声明，准备给他们一切必要的援助。朝鲜政府也发表声明响应。中国也于二十五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表示决心支持南越人民取得胜利，准备向南越人民提供包括武器在内的一切援助，在南越人民需要的时刻，将派出中国人员和南越人民配合作战。虽然这只是一篇社论，但是外论反应强烈，特别是美国。陈毅外长在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外长的复信^[322]中也重申了这一立场。世界公众舆论对美国进行了谴责。面对美国的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已经进行了疏散，决心支援南越兄弟抗战到底。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政策怎么样？美国的宣传也反映出它的矛盾状况。一方面，美国宣传说，如果越南不停止其“侵略”，美国就要扩大侵略战争。这是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荒谬透顶。照这样的逻辑，南越对美国侵略的抵抗是“侵略”、北越给南越的支持是“侵略”自己的同胞，那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抵抗也成了阿尔及利亚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阿联收复苏伊士运河主权也成了埃及人对埃及人的“侵略”。这

个问题，同阿尔及利亚和阿联一谈就清楚。这完全是美国的强盗逻辑。

另一方面，美国又宣传说，战争的扩大仅限于南越；对北越来说，只要求它停止支持南越。美国打算把南越和北越分开，使南越感到孤立。

美国在扩大对北越的轰炸时又说，扩大轰炸仅限于北越，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它不仅这样宣传，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¹⁶⁸⁾中也这样声明。英国外交大臣在华盛顿会谈后说，英国得到美国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因此英国首相说，他很放心。这说明美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同越南隔开，使越南感到孤立。

美国的政策是动摇的。第一，叫越南人停止“侵略”越南人，它是无理的。第二，它对扩大战争是动摇的。每走一步要看一步，政策定不下来。泰勒⁽³²³⁾回华盛顿也是讨论这个问题，即出兵南越对美国是否有利，轰炸究竟扩大到什么地步。

在我们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陈毅外长复函越南民主共和国外长后，美国说，中国人只是说说而已，对南越人民的抵抗不会起真正的作用。有时美国又说，它拿不定中国是否会真正参战。这说明美国的政策不是建立在明确的基础之上的。它进行侵略，感到理亏心虚，站不住脚，但是又不肯认输撤走。由于输理，因此政策动摇。而撤走是它保全面子的最好办法，蛮干下去就只会更失

败更丢脸。

阿：如果美国向北越和南越施加压力，中国不会不出兵，美国对这点似乎并不怀疑。它所怀疑的是，苏联是否会提供援助。

周：你的提法是有一定根据的，等一下我谈到是否会发展为世界大战时再谈。现在先谈第一个问题，即所谓压服的问题。越南是压不服的。美国把它的很大一部分力量用于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其结果只能是失败和丢脸。

总统阁下访问美国时，如果美国问中国将怎么办，阁下可以告诉美国以下三点：

第一点：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台湾就是证明。我们完全有权收复台湾，但是我们从未使用武力。尽管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我们一直在华沙同美国谈判。

第二点：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凡是中国答应了的国际义务，就一定要履行。

阿：我们了解这点。

周：关于第二点，也有证明。中国解放不到一年时，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⁴⁷⁾，同时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企图阻挠中国收复台湾。中国通过当时印度驻华大使告诉美国：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²¹⁾，靠近鸭绿江，中国决不会置之不理。当时，印度政府也确实告诉了美国政府。

但是美国听不进去，不相信中国会援助朝鲜。这次总统阁下去美国，告诉它这几项，也许它还不信，也许象总统阁下所说，它可能信。两种可能都存在。不过，这次我们的朋友换了，不是印度而是巴基斯坦了。

阿：美国应该明白，如果压得太厉害，中国会提供援助的。每个有理智的人都应该明白这点。美国说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这是要看苏联人将以何种程度参与。美国认为，苏联可能不会参加，扩不扩大要看苏联帮助的程度。

周：（二）至于是否会扩大为世界大战，阁下是元帅，你也知道，战争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美国以为，不把对越南的侵略扩大到中国，中国就不援助越南。我们认为，即使不扩大到中国，中国也一样要援助越南人民，只要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要求，只要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提出要求。战争扩大时，是无法划一条界线的，就象火势会蔓延一样。美国要玩火，要冒险。中国要扑灭这场火。美国不干，还要加油，结果火就会越烧越大。战争的扩大是美国造成的，不是我们挑起的。尽管中国在许多方面保持克制，如果美国在这个战场上扩大战争的话，战火就必然会蔓延起来。美国说这是局部战争，它所进行的是有限的轰炸和有限的扩大。但是，即使它主观上想限制战争扩大，实际上也限制不了。尽管美国恐吓说，如果印度支那战争发展为朝鲜式的战争，它不会象朝

朝鲜战争那样限于局部战争，而会扩大到中国，中国就不会再是什么庇护所了。我们是知道这点的，中国是做好准备的。

我们是有准备的。这是阁下可以转告美国的第三句话。美国说，中国没有作战准备，以此来欺骗人民。中国并不准备同美国打仗。总统阁下昨天发表的广播演说中，也说中国是热爱和平的。总统阁下访问北京、上海时，也看到北京、上海的人民毫无发动战争的准备。但是在军事上，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如果美国把战火烧过来，我们不能不扑灭它。美国企图以朝鲜式的战争不限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支那来吓唬中国，孤立越南，这完全是妄想。

如果美国扩大战争，战争是会逐步扩大到中国的。对此我们已有精神准备和物质上的准备。希望我们的亚洲朋友在有机会对美国人民说话时告诉他们，不要不看到美国政府玩火的危险，战争扩大的可能是存在的，那时美国人民会被卷入大战之中。

问题在于战争扩大后，是否还会继续扩大。阁下刚才问，如果战争扩大到中国，苏联是否会进行干预。这个问题我们不答复，因为你明天就要访问苏联了。你可以问苏联朋友，让他们自己来答复。至于我们，则不考虑这个问题，也不指望苏联援助。

美国假如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那就够它受的了。世

界上已经有两个元帅说了以下的话，你是第三个元帅。英国的蒙哥马利^[238]元帅曾两次访华。他劝他的美国朋友说，美国如果打中国，就会进得来，出不去。前方开辟了新战线，后方却无法对付。麦克阿瑟^[24]临死前也这样讲，他告诉过艾森豪威尔^[48]和肯尼迪^[237]。约翰逊^[324]可以回忆这一点。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将抵抗到底，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一派人说，美国只进行轰炸，而不使用其地面部队。阁下是元帅，你知道战争这样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美国在空中轰炸，我们在地面上可以用别的办法到处活动。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所有的军人都了解这点。既然中国就够美国受了，那它怎么能扩大到世界其他各处？所以不需要回答苏联是否会过问，也不必指望苏联。如果美国把它的政策建立在中苏不会合作抵抗侵略的想法上而扩大战争，那它就会提前宣告失败。中国人民为了世界人民的利益承担更大的牺牲，那是值得的。

总起来说，这三句话是：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

我们是亲密的朋友，所以我把真话告诉你。尤其是你要去访问苏联和美国，所以更应当清楚地告诉你。

中国这一关美国就过不去，扩大为世界大战，它只会

失败得更惨。

（三）是否能谈判解决问题。中国并不根本反对谈判。任何问题最后总是要通过谈判才能解决的。但是，就南越问题进行谈判的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美国提出了谈判的条件，即越南停止“侵略”，南越民族解放阵线〔280〕停止抵抗，给伪政权喘息的机会，让美国继续对南越进行压迫。美国把南越人民的任何行动都说成是北越指挥的。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谈判的，这样谈十年也不解决问题。

中美谈判进行了十年，没有任何结果。我们是耐心的，因为台湾就是那么一块，再也不能长了，蒋介石越来越老，总有一天要死的。中国日益强大，总有一天能谈判解决问题。这是台湾问题可以采用的方式。南越问题不能采用这个方式。如果停止抵抗，哪怕只谈判一年，这期间死去的人就会比战争中死去的多得多。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现在不能谈判，这是正确的立场。

关于发展中苏两国关系的 六点建议*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五日)

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应该发展。这是柯西金同志经过北京的时候肯定了的,而且我们有具体的提议,你们同意。但是,我们两党两国在许多问题上,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争论,而且在许多国际行动上也有着严重的分歧,这是勿庸讳言的。

柯西金^[325]同志经过北京的时候,我们谈到怎样发展两国的关系。当时我谈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面临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9]签订十五周年,我们双方都愿意庆贺这件事情。因此,我提议,最好双方把彼此的贺电、讲话都在报纸上发表,表示我们双方采取一致的态度,这对我们共同反帝的事业是有利的。当时柯西金是完全赞成的。但是,结果如何呢?我们是全部实现了。可是苏联的报纸不是这样,有的发表,有的

* 这是同苏联驻华大使拉宾的谈话节录。

摘要发表，就是要删掉一些你们不赞成的东西。这就公开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你们把这个分歧向你们的人民、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证实了。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互相约定的事情，我们觉得苏联政府打了折扣。

第二，要发展两国贸易，并且可以在某些项目上长期合作。现在只有这方面进行得比较有成绩。但是，我们不应该满足，我们还愿意提出补充的货单，或者提出补充的长期合同。正如大使刚才所说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过去有些建设项目没有完成，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把它完成。如果你们有困难，或者我们发现了有些东西不合适，质量很差，向你们提出，希望这一部分问题能够早一点解决。至于过去停下来的项目，要等待没有完成的项目完成以后再作计议。因为现在两方面的情况都变了，如果我们真是需要你们的设备，那就重新协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正式备忘录。换句话说，就是把过去的那些建设项目作个结束。这一点，当时柯西金同志同意了，现在等待你们的回答。

第四，文化合作协定的年度计划，过去几年执行得不好，我们希望今年能够执行得好一点。我们说的文化合作协定，包括双方友好协会商定的一些项目。我当时是作为两个问题讲的。

第五，我们要派一些留学生，希望得到你们的回答。

当然，如果你们也提出要派留学生，我们应该相应地满足你们的要求。

第六，双方的旅行协定，我们也希望能够执行才好。

关于这六点，当时柯西金同志都表示赞成，并且要翻译同志把这几项写出来。

我所以谈这些，是想说明我们两国之间可以做的事情还不少。因为两国人民是愿意发展友好关系的，我们可以通过两国大使馆发展两国的关系，以满足人民的要求。我们政府的态度是，并不因为从二月到现在我们之间有一些新的严重的争论，就把这方面说过的话取消。你到中国来担任大使，我们初次接触，但是，我要告诉你，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关于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国政府说话是算数的。

支持越南反对美国 和谈骗局的立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 越南的主人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民族解放阵线^[280]。他们有自己的声明和主张。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邻国, 完全支持他们的声明和主张。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于今年三月二十二日发表声明^[321], 提出五项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也提出四项主张, 已经国会批准, 他们直到现在还坚持这四项主张。最根本的内容是, 谴责美帝侵略, 要求美国撤走一切军队、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 由越南人民自己解决问题, 先在南越成立符合当地人民愿望的政府, 根据日内瓦协议, 应当是和平、独立、不结盟的政府, 这是第一步。然后, 按照越南南方和北方人民的意志实现和平统一, 不要任何外来干涉。越南方面至今还是这样主张。中国支持他们。

* 这是同法国外交部长代表肖维尔的谈话节录。

至于侵略的一方——美国，不仅没有接受这四项主张的迹象，反而逐步升级，扩大战争。今年二月以来派往南越的美国军队已经接近二十万人，战争越打越大。对北越的轰炸，也日益扩大。此外，为了配合侵越，对老挝也扩大了轰炸，并加紧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按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106〕举行谈判的时机没有成熟，条件也不存在。我从公开材料上得知，法国政府也不得不说目前谈判时机尚未成熟。实际上也是如此。美国说什么“无条件谈判”、“无条件讨论”，都是鬼话。它在同有关国家幕后外交中表示决不撤军，企图通过谈判使它侵占南越合法化。越南人民怎么能同意呢？越南民主共和国不能接受，他们不能出卖南方兄弟，南越人民更不会接受。有些国家劝美国停止轰炸北越，而美国却回答说，要它停止，必须首先让北越停止对南越的支持。而且美国竟然把北越对南越的支持称为侵略，你说荒谬不荒谬？

我们知道，越南朋友认为现在不是谈判的时机，尤其是认为应当揭露美国的所谓和谈骗局。我们的态度很清楚，今后也是如此，就是支持越南的立场。

肖维尔(以下简称肖)：法国政府和戴高乐〔243〕将军认为，谈判时机可能没有到来，因为在他们印象中，北越、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和中国都认为条件尚未成熟。但是令人不安的是，逐步升级很快，现在还在不断上升。我上次

和章副部长〔326〕谈到过，美军已增加到十六七万人了，最初并没有那么多，而是发生了军官宿舍爆炸炸死二十名美国人等情况后才增加的。这说明，每逢美国人遇到困难时，就要增加兵力，就要升级。可是升级很快，降级却不容易。战争照这样发展下去可能还要打两年到两年半，因为离美国总统选举还有两年半时间，而方针性大变动一般要在总统选举时才可能发生。在这两年半时间里，战争会越打越大，可能发展到怎么样的地步呢？美国国会现在经常出现针对中国的言论，这是令人不安的。

我同意你说的最后有决定权的是越南人民。但我希望谈判时机仍会到来。如果要打出一个结果再来谈判，会产生许多严重因素。我们大家都记得，日内瓦会议〔52〕时是一边开会讨论，一边战争还在继续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认为，开会的第一个目的是要停止战争，虽然目前还没有谈判的可能，总有一天会举行日内瓦式的、讨论停火的谈判。你们说要美军先撤走才能谈判，这作为政治立场是可以的，但不切实际。美军在那里已有近二十万人了，不能设想他们能在别人还在打他们的时候撤退，即使美国愿意撤退，也行不通，只有停火以后才谈得上撤军。希望有一天能讨论停战，然后寻找政治解决办法。这就是法国的设想。法国将高兴地参加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谈判。当然，法国政府认为，上述会议的基础只能按照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的原则，这

也是北京、河内、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在声明里一再重申的。目前，美国不愿意听别人的劝告，如果有一天大家坐下来谈时，可能美国不得不听。参加会议的人不会同意美国留下它的军事设施，这就会对它形成更大的压力。当然目前还不是时机。

中法两国为了谋求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已经在一九五四年、一九六一年合作了两次，并为此订立了一些共同的原则。在出现有合作可能性的迹象时，我们愿意再一次同你们合作。

周：根据阁下刚才的推论，今天谈判的条件并未成熟。我可以举日内瓦会议等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是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当事人一方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柬埔寨和老挝；另一方是法国，还有其他一些参加国。那时，多数国家主张印度支那战争⁽⁵⁵⁾不应再继续下去。法国人民，甚至一些有见解的法国政治家也认为，战争继续下去不仅要使法国失去印度支那各国（因为法国将不得不承认它们独立），而且很难继续同印支各国保持关系，不能给它们留下好的印象。因此，奠边府一战⁽³²⁷⁾，拉尼埃——皮杜尔政府⁽¹³⁹⁾被推翻，建立了孟戴斯—弗朗斯⁽¹²³⁾政府。通过阁下斡旋，我跟孟戴斯—弗朗斯先生见了面，我们为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起了有利的作用。法国作为当事一方认识到需要和平解决，才促进了事态向有利方向发展，尤其是奠边府战役

后，法国看到不可能取胜了。现在，在越南挑起战争的是美国，不是法国。美国不承认和平解决的必要性，依然认为逐步升级、轰炸北越还可能取胜。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时，美国就不同意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它曾企图干涉，帮助法国继续作战，实则想取代法国。由于法国和英国反对，杜勒斯⁽⁵¹⁾的阴谋未能得逞。就是这样，美国还是不参加最后宣言，留下了后手，造成了越南今天的局面。

第二个例子是阿尔及利亚谈判⁽²⁴²⁾。当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号称八十万的军队，但签订埃维昂协议时，法国承认要撤军。为什么？因为戴高乐将军认识到继续打下去没有好处，不仅要同阿尔及利亚，而且要同整个非洲的人民对立起来，这对法国本身有害。但是，今天美国就是不想撤军，不论是在谈判以前还是谈判以后，都不承认要撤军。它怕在东南亚引起连锁反应，使它独霸全球的迷梦破灭。美国在全世界有六百多个军事基地，一个也不愿丢。

第三个例子是一九六一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³¹⁷⁾。这次会议你也参加了。协议上讲得很清楚，规定三方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组成联合政府，军队也逐步联合，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和军事基地。法国也撤走了空军基地。

肖：没有完全撤走。

周：实质上撤了，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

肖：留下人数很少。

周：主要是美国在控制。

美国不仅不撤，还不断增加军事顾问，不仅扶植右派，还想搞垮或收买中派。去年右派政变〔328〕完全是美国支持的。你们的朋友富马〔329〕不再是中派，成了右派的俘虏。现在已经根本不可能执行日内瓦协议。而右派分子只要美国不乐意就可以被干掉，如同吴庭艳〔308〕兄弟被杀一样，富米·诺萨万〔330〕被赶出国了。美国可以随时换马。所以，虽然有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老挝局势却更坏了，这是美国不愿和平解决老挝问题所造成的。

南越的局势也是美国不签署日内瓦协议造成的后果，美国势力还在不断增长。你们按照日内瓦协议撤了军。

肖：我们比协议中规定的走得更远，协议规定可以留一部分军队，我们没有留。

周：北越也走得更远，他们把南方的游击队，即使是南方人，也连人带枪都集结到了北方，甚至有的家庭都拆散了，男的去北方，女的留在南方。为什么？因为希望两年后能在国际监督委员会监督下通过民主协商，进行公民投票，完成统一。日内瓦协议规定得很具体，甚至有日期，但是被美国破坏了。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〇年，在美国控制下的吴庭艳政权屠杀了几十万南越人民。越南朋友说，战争中死的人还没有这么多。因此说只有打

到美国认输了，才可能有和平。否则，象老挝那样，过一段时间又会重新爆发战争。在南越主要是美军在起作用，其他一些国家的军队不起什么大的作用。你说得很对，战争可能还要打两年到两年半才有结果，不打到美国认输，不可能有和谈。中国有以下三种经验：

第一种经验是我们自己的解放战争。蒋介石发动内战，人民起来反抗。蒋介石有强大的美国军事和财政援助，美国并未直接参战，只是帮助蒋介石看守沿海口岸、机场等。蒋介石失败后，美国这十多万海陆空军跑得比谁都快，甚至没有跟我们交锋，就跑掉了。这是一种。

第二种经验是朝鲜战争^[47]。美国打了三年，认输了才同意停战，才签了字。十二年来，停战线一直没有发生大的问题。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第一部分是讨论朝鲜问题。我们曾希望会议能有助于南北朝鲜的进一步接近，以便达到统一。许多国家，其中包括有些参加美国纠合的所谓联合国军的国家也赞成。甚至比利时的斯巴克^[331]都同意。当时会议主席艾登^[64]也准备宣布与会国意见一致。但是由于美国代表史密斯^[332]摇手反对，就没能达成协议。可惜那时拍电影的不允许在场，否则可以拍下这一幕。就是因为一个国家不同意就达不成协议。但是，停战线还在那里，因为美国认输了。

当然，戴高乐将军在这个问题上也采取了独立行动，他说再不参加联合国军了，不愿意分担军费，等等。

第三种经验是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争端。你们的政府承认了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却利用朝鲜战争，派遣武装力量占领了台湾。尽管后来美国有时侵犯我国领空领海，但中美军队之间还没有战争行动。正因为如此，我们同美国进行着大使级谈判，从日内瓦开始，后来迁到华沙，王炳南副部长曾长时间代表我国政府同美国谈判，但十年来毫无结果。

上面列举的是三种情况：一种是打垮了美国所支持的反动政府，它可以走；第二种是打得美国认输了，它也可以签字；第三种是没有战争行动，即使谈十年也没有结果。中国的经验以及我们大家的经验，都是不打到美国认输，它是不会同意谈判的。美国现在说的谈判是欺骗，现在同美国没有谈判的可能。当然你可以同越南政府直接谈谈，了解他们的看法，越南问题最终取决于他们。

你谈过，战争扩大时该怎么办？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本地扩大，即在南越扩大。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已经声明决心打到底。凡是同情南越民族解放斗争的国家不会不给他们以道义上、政治上和其他方面的支援，包括西哈努克⁽¹⁴⁸⁾亲王也支持南越人民所坚持的正义斗争。二是地区扩大，即向外扩大，向北越、中国、印度支那其他国家扩大。佩耶大使在这里可以证明，我们是作了准备的，我们早已作了准备。我们不寄希望于别的方面，而寄希望于自己的人民。单单在中国战场上就容纳得下美国所有的

侵略军了。阁下会问，那么是否会遭受很大的损失？会的。动员兵力进行这样规模的战争，是需要时间的。再者，如果战争扩大，我们的建设将停顿并遭到破坏。这些我们都估计到了。从战争中诞生的新中国是了解这些代价的。可能阁下还要说，现在的战争不再是常规武器的战争，而是原子战争。当然，我们的原子弹现在还处于试验阶段，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我们还不能反击，要付出相当代价，这些我们都是准备好的。但是结果会怎样？只要他们敢来，就出不去，这就是结果！所以，如果美国决心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我们将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坚决抵抗。没有这样的决心，我们怎么能支持越南，我们怎么能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粉碎它的全球战略？这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决心。美国对此也不得不考虑。他们原来设想，如果从南越撤退，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在东南亚、在全世界就站不住了。他们舍不得丢南越，怕在东南亚站不稳。但是，逐步升级到中国，如果失败，就不再是东南亚，而是全世界的问题了。打这样大的仗，谁会帮他？

美国希望把日本武装起来，所以策划了日韩条约^{〔333〕}。美日各有打算，日本是想利用这一条约来重新征服朝鲜和台湾的。日本跟西德不同，还没有完全武装起来。日本不是几个国家占领，而是美国一国占领，日本人民不愿再度陷入战争的灾难。美国如果把日本武装起

来，很难预料日本是否会听它的话。

总之，我们不会挑动美国扩大战争。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尚且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而在华沙谈判。当然，我们决不拿原则作交易。华沙谈判虽无结果，我们也没有使谈判破裂。越南战争是美国在升级，责任在美国，不在任何别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邻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不仅提供精神上的，而且提供物质上的援助，是完全应该的。情况就是这样。

抓紧科学技术考察*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

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要从国外买一些东西，还要学一些东西。我们在国外的考察人员不是没有出过问题的。对出国考察人员的审批要严一些，出去的时间要错开一些，不要一个时期集中在一个国家。有些国外的东西并不那么先进，那就没有必要去考察。有些考察得不适当，不仅没有取得东西，反而把我们的底都漏给了人家。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一定要把住这个口子，对出国代表团、科技考察小组负责抓总。以后每年年底都应该抓下一年的出国代表团问题。外办可先要国内有关单位报告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和经验，然后作个总结。请陈毅^[208]同志或廖承志^[306]同志主持开个会，请有关各部部长来参加，把这方面的问题讲清楚。外办要有专人负责管理出国考察人员的工作。组织工作绝不能大而化之，作为

* 这是同我国部分驻外国使节的谈话节录。

综合的归口部门要抓得细。此外，外办和有关外事部门还要抓好对出国代表团的教育问题。大使们也要抓紧对出国代表团的领导工作。

各个不同地区的使馆应有不同的任务，有些使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抓好科技调研。我们可以从西方学到一些东西。当然，西方的科学技术也不是什么都先进，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要学，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已经有了。知道我们有什么不够的地方，才可以决定我们要向国外学习什么。

驻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要学点科技知识，夫人们也要学一点。我们的干部既要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又要有一定的科技知识，这也是两结合。在西方国家做大使要亲自学些东西，自己不懂，可以找一两个帮手，认真啃点东西。使馆回来的同志也应该结合驻在国的科技情况的特点，在国内参观一些有关的工农企业，如果在安排参观问题上有困难，可提到我这里解决。

关于中国对美国政策 的四句话*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

(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没有派兵去夏威夷,是美国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省。尽管这样,中国仍然努力通过谈判要求美国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并且已经先后在日内瓦和华盛顿同美国就这个绝不能让步的原则问题谈了十多年〔168〕。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

* 一九六五年春以后,美国约翰逊政府逐步扩大侵越战争,公然宣布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声称“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阴谋在亚洲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世界性的战争。针对这种情况,一九六五年四月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告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他同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谈话时,重申了这个政策,并说明这几句话是不能割裂的整体。同年五月十日在《人民日报》公布。

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

(三)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既然一千四百万越南南方人民对付得了二十几万美军，那么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也肯定对付得了二千万美军。美国侵略者不管来多少，必将被消灭在中国。

(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美国有些军事家想依靠海空优势轰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战争既然以空战或海战开始，那么，战争如何进行，就由不得美国一方作主了。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上去吗？因此，我们说，战争一旦打起来，就再没有什么界限。

· 致柯西金的信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在北京机场的会见〔334〕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还应该采取的临时措施交换了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一、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解决前，严格维持边界现状：

(1) 以一九六四年中苏边界谈判中交换的地图为准，在双方边界线画法一致的地段，双方保证，严格遵守条约规定的边界线，互不越过；

(2) 在双方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段，即对归属有争议的地区，双方保证，各自的居民原来在哪里居住、生产(包括陆地和岛上的耕种、修渠、放牧、割草、砍柴、江中的捕鱼等)和通行，仍然在哪里居住、生产和通行，互不推进，互不干涉；在双方原来无人居住、生产和通行的地方，

双方均不进入。

上述(1)(2)两类地区的范围,由双方有关边防机关协商确定,一次达成协议,以后就无须每次通知;此项协议,直至边界问题解决前,一直有效。

二、双方同意,避免武装冲突:

(1)双方保证,各自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核武装力量不向对方进攻和射击;

(2)双方保证,各自的飞机不侵犯对方的领空;

(3)双方保证,各自的军用舰艇和其他船舶,在国境河流主航道航行时,严格遵守现行航规,不妨碍对方船舶的正常航行和危害对方船舶的安全。

三、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1)双方一切武装力量从中苏边界一切争议地区撤出或不进入,脱离接触;

(2)在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的地区,如原来有居民点,可保留必要的非武装的民政人员。

四、双方同意,边界上发生争执,由双方有关边防机关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协商,求得合理解决;解决不了的,各自报告上级,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五、双方同意,上述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争议地区的归属。

以上各项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

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

我相信,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

顺致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 恩 来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

民族独立运动在不断高涨*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这二十五年来,新的世界大战没有发生,原因之一的确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一场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害怕打。两个超级大国都在争取核优势,越争取开支就越大。尼克松在联合国提到美苏四个共同点⁽³³⁵⁾的时候,有两点就跟这个问题有关。继续搞军备竞赛,增加军事费用,垄断资本当然有利可图。但是结果怎样呢?只能使困难加剧,或者发动战争。如果发动核战争,自己的劳动力要损失,对方的劳动力也要损失。结果是剥削的对象少了,市场也小了。所以只能收缩,不能扩张。另一方面就是限制核竞赛,减少军事开支,至少停止增加。美苏核谈判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他们自己也说,这不是几年能解决的。双方总想藏一手,以便取得优势,于是也就互不信任。所以军事开支还是减少不了,还会增加。军事开支增加,经济建设投资减少,经济危机

* 这是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会谈节录。

就不可避免。

过去发生经济危机有两种办法对付：一是紧缩经济，结果是失业增加，经济危机加剧。二是战争，但是核战争又不好打。怎么办？那就打局部战争。所以二十五年来局部战争没有断。二次大战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打了三年半。那是一次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国民党先后动员了八百万军队，我们到后来增加到三百万。结果是美国失掉了中国。接着就是朝鲜战争⁽⁴⁷⁾，美国动员了联合国十几个成员国参战⁽⁶⁹⁾，最后还是不得不停战。美国人自己也说，那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拉丁美洲的问题很多，那是美国的后院，美国投资很大。苏联想插手，美国一凶，它就撤走了。在一九六二年，苏联本来可以叫美国从土耳其和以色列也撤走火箭部队，土耳其又是北大西洋公约⁽¹¹⁰⁾成员，但是它不敢。

另一方面，美国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基地遍及全球，局部战争没有停。在印度支那，如果美国的局部战争不停，战争会扩大。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战争扩大不一定是世界大战，仍然是局部战争。原因是大国不敢发动核战争。中东搞了三年，问题还要继续发展。

在局部战争中，只要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完全可以取胜。中国胜利了，古巴也独立了。在朝鲜至少可以算是将美帝打回到三八线⁽²¹⁾。印支三国如不发

生别的情况，最终也将取得胜利。我们同印支三国的关系就是帮助它们，但不参加，除非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现在美国的空军有严格的命令，到距中国边界多少公里的地方就不能再前进。我们的工程兵和铁道兵在中越边境修公路和铁路，在老挝我们也修公路。美国很清楚地知道，但它就是不轰炸。象我们修建中巴两国之间的公路，美国也知道，但它也不提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只要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主，不听从超级大国的指挥，不论美国或苏联的干涉，都是要失败的。这样的国家虽然一时会遇到困难，但最终会胜利。现在世界的形势是两个超级大国自己找不到出路。尼克松上任两年，他的政策不断摇摆，说话不算数。苏联要解决经济困难，但解决不了。毛主席在五月二十日的庄严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在这里，革命是广义的，包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这是更主要的。例如，拉美十多个国家发表声明，宣布二百海里内的捕鱼权，不许美国渔船入侵，进来就抓，这就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革命行动。它们扣了一二百条美国渔船，美国政府不得不从国库中拿钱交给渔业公司，由它们赎回这些船只。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会议上提出各国领海为十二海里，并提出水深超过二百米的海洋为

公海，拉美国家不接受，它们也没办法。所以关键是依靠自己。如果全世界各国不分大小，都是依靠自己力量为主，抵抗超级大国的压迫、干涉和侵略，世界形势就会更好。许多国家同中国建交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个证明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建立了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受到柬埔寨人民的拥护。他们纷纷起来开展武装斗争。在不到十天之内就有近二十个国家承认，二十五年来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二次大战时，法西斯德国占领了法国，卖国贼贝当成立傀儡政府。戴高乐在伦敦成立革命委员会，没有几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大国，但是开始也没有几个国家承认，不用说十天，就是一年后也没有很多国家承认。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而柬埔寨不到十天就有近二十个国家承认了，这说明时代变了。

二次大战后，许多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了民族独立国家。开始的时候，新殖民主义还起作用。现在经济上的新殖民主义仍然存在。但是民族独立运动正在一天天高涨，新殖民主义的作用正在一天天减弱。现在一些发达国家以武装力量作为后盾，要用新殖民主义的办法实行经济扩张。这种做法不合时代的潮流，就连它们本国人民的觉悟也在提高，不断起来反对它们。所以，看起来世界形势是紧张的，但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势是在高涨的。

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 团长先生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吧?

格雷厄姆·斯廷霍文^[336](以下简称斯): 是的。我们代表团每个成员都是第一次到中国来。

周: 对中国有点生疏吧?

斯: 是的。对中国完全不熟悉,但对你们的好客很熟悉。

周: 中国有句古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337]。

斯: 在美国也有这样的说法,不论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很好的朋友。我们欢迎中国朋友去美国访问。

周: 是啊,罗德里克^[338]先生就来过中国。我和他比

* 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四月初,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比赛结束后,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的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这是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谈话。

较熟悉。我和你们国家的一些新闻记者比较熟悉，他们都要求来中国。当然一次不能都来，就分批来嘛。

斯：我们很高兴你们让我们的记者来中国。

周：你们可以来，他们也可以来嘛。

斯：对你们这样安排，我们很高兴。他们来了以后我们才能更熟悉起来。

周：不可能每个方面都熟悉。今天不仅美国记者、加拿大记者、路透社记者，还有别的国家的记者都来了。

过去有很多美国朋友来过中国，以后还会有不少朋友来。

斯：我想如果能够受到象对我们这样的热情欢迎和款待，碰到这样好的中国朋友的话，一定会有很多美国人要到中国来访问。我们也希望中国朋友能到美国去访问。

周：是啊，中美两国人民以后会经常彼此友好来往的。对不对？

斯：我们非常高兴听到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很快开始。

周：我想不会慢的。

斯：我们在美国等着欢迎你们。

周：那好。今天你们各位去逛颐和园，刮风了，对不起。这个节目和天气不符，发生了矛盾。

斯：其实我们对天气没什么抱怨，这种风在我们国内也常遇到，我们去时有准备，主人劝告我们带着大衣，

这是很好的劝告。

周：不要受凉了。

斯：在哪儿着凉都不好。

周：多保重。

斯：希望你也保重。

周：谢谢你。昨天你们球打得不错。

斯：我们的选手是尽力而为。同时，我们从你们的选手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对我们很有帮助。你们选手花了很多时间教我们年轻选手技术。他们对我们非常照顾，而且有礼貌。

周：是不是这样啊？

斯：的确是这样的。

周：不要太夸张。

斯：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的主人总是问我们有什么批评、建议没有。我就想尽办法找，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批评的，最后我找到了一点。

周：嗯，是哪一点啊？

斯：就是你们给我们吃得太多了。

周：你们可以选择吃。

斯：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吃饭，看到冷盘以后，我们以为是正餐，就吃了，结果后来一下子上了十道菜，我们还得吃，为着答谢你们的盛意，我们还是把这些都吃掉了。

周：怪主人没有告诉你们，菜单上也没有写清楚，前面的是小吃，后面的是正餐。

斯：菜单是有的，但只顾吃了，就没再看菜单。

周：那可以原谅。

蒂姆·博根：我是美国乒协副主席博根。我只想说，我今天上白大理石楼梯，看到《江山如此多娇》那幅画，十分欣赏，就象进入诗意般的仙境一样。

周：你太夸奖了。

迪克·迈尔斯：我是美国《体育画报》的记者迪克·迈尔斯。我到这里来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我是记者，另一方面我又是官方正式邀请的代表团成员之一。感谢你们的邀请。

周：是的，你是这个团的成员之一。

杰克·霍华德(以下简称霍)：**我是美国乒乓球队的领队杰克·霍华德。我想说，我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能够在最近的将来访问美国，以便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报答你们的好客精神并在美国进行友谊比赛。**

周：你的希望是好的。这个问题要决定于你们的团长。他是权威的，所以还是保留给团长回答。同意吗？

霍：同意。

周：我的意思是指团长同意吗？

斯：同意。

周：没有问题了？

格伦·科恩^[339](以下简称科):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总理对目前在美国青年中流行很广泛的“嬉皮士”运动有什么评论?有什么看法?我很想了解这些。

周: 第一,我对这个运动不很清楚。第二,如果要问的话,我只能说一点我的粗浅的、表面的观察。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求真理的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检验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别好奇。别的国家的青年来访问时,我们发现他们不一定和你们同一派,但是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形式,比如留长头发,等等。我碰到过英国青年也有留长发的,碰到过日本青年也有这样情况的。

科: 对,总理先生。这些表现形式是许多日子思索的结果,它比表面上看到的更深刻。这是一种新的思想,没有很多人熟悉它,可能有少数人熟悉。

周: 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我只

能回答这些了。

科：同意。

周：补充一句话，如果自己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改。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这是我们的认识。做为朋友，我们所以有这个建议。

科：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即进步只能从变化和
精神发展中得到。

周：精神只有变成物质的力量才能前进，只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才行，因为总是需要有大多数人赞成嘛。这是一个规律，我这是讲哲学了。

科：谢谢。

周：乒乓里也是有哲学的。我看你打得不错嘛。

科：也许可以打得更好一点。

周：祝你进步。

科：谢谢。

周：讲到哲学，我又把毛主席的话拿出来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的实践精神，也是我们的理论指导。

美国朋友刚才都已经谈了。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

持。罗德里克先生，你打开门了。

约翰·罗德里克：谢谢你，总理先生。我首先感谢你邀请美国记者访华。美国记者访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中断，终于实现了。同时我赞成你刚才的说法，我们的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如果我们两国间有更好的谅解，这新的一页将更加美好。我希望通过记者的报道，这种关系会得到改善。

周：谢谢你的好意。

台湾回归祖国， 中美关系会更好*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威廉·阿特伍德(以下简称阿)：我感到我们两国在发展关系上最主要的障碍，也就是路障，是台湾的地位问题。美国人民现在已经看出了台湾并不是中国。说台湾是中国只是一个神话。现在这个神话破产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美国人民对真正的中国感兴趣的原因。如何搬掉这个路障呢？美国政府采取哪些措施来搬掉路障呢？你们是不是设身处地为美国政府想一想如何搬掉这个路障，比如在六个月内。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限期就不太好回答了。

阿：把六个月忘掉算了。

周：你问我美国政府的做法，当然我不好回答。我愿意说说中国政府的态度。台湾本来是属于中国的，是中

* 这是同美国《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西摩·托平、《每日新闻》社长兼发行人威廉·阿特伍德和《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伯特·基特利等人的谈话节录。

国的一个省，历史上早就是这样。后来因为发生了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八九五年被日本割去了。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根据开罗宣言^[13]、波茨坦公告^[14]，台湾已经归还中国，回到祖国的怀抱，仍然是中国的一个省。托平先生和朗宁先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时候，看到了旧中国政府已经垮台，那大概是一九四九年的四月。

一九五〇年一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承认了这个事实。他说得很清楚，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美国政府对台湾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大陆和台湾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民自己会解决。这是在一九四九年秋艾奇逊发表白皮书^[95]以后，可以说美国政府向世界宣告了对新中国的态度。

但是，到了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国政府的态度忽然变了，派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割断了台湾和大陆的联系。

阿： 那是因为朝鲜战争^[47]。

周： 但是那时朝鲜战争和中国没有关系呀！

阿： 这个我知道。

周： 我们要求美国政府不要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尊重美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也希望它尊重我们的主权、独立和

领土完整，我们不会干涉美国内政。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中美关系，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关系就可以建立了。这是我们从一九五五年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¹⁶⁸⁾十五年来一贯的主张，没有别的要求。

阿：关于这一点，现在美国舆论越来越多地承认了。如果将来美国政府也承认这一点，而且美国部队也全部撤走，那么如何把台湾省重新统一到中国，就是说如何把蒋介石和他的部队及台湾人重新吸收回来，是通过谈判来实现，还是用武力来解决呢？

周：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儿绝大多数是汉族人，不仅蒋介石带去的一百多万人是汉族人，台湾本来八百多万人中，其中绝大多数也是汉族人，语言与福建相似，特别是接近厦门一带的方言。台湾的少数民族叫高山族，在中国，这样的少数民族不少，我们采取民族平等的政策。台湾如何回归到中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内政。一九四六年我离开南京时很多外国记者问我：你走了，还想不想回来？能不能回来？我说，我坚信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既然南京都可以回去，那么台湾回归祖国也是不难实现的。

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美国注意：蒋介石也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也反对制造一个中国另外加一个台湾独立实体，也就是“一中一台”。我们跟蒋介石联合过，也敌对

过，我们打了几十年，但在这一点上有共同性，都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外国只能承认一个中国。现在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总会找出办法的。

阿：谢谢你。

周：有人说，台湾生活水平很高，台湾回归祖国后，生活水平就会降低。相反，台湾回归祖国后，我们有可能在他们原来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第一，不仅不增加税收，还减少税收，如同祖国各地一样。

第二，不需要付债，祖国可以帮助他们建设。诸位知道，我们是一个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国家，这是我们稍取得的一点成绩。

阿：恐怕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周：我不敢这么说。

第三，我们是低薪制，不收所得税。在台湾的人，他们原来有多少收入，还可以保持多少收入，但因为不收他们的所得税，生活就会更加改善。

第四，有些失业的人，从大陆上去的，生活很困难，可以回到大陆，回到他的家乡，我们不会歧视他们。

第五，如果台湾回归了祖国，在台湾的人对祖国作出了贡献，那么，祖国就应该给他报酬。所以，我们不仅不会报复，而且还会给他们奖励。

诸位大概知道，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又做过“满洲国”

的皇帝，曾被监禁过，后来得到解放，恢复了公民自由。很不幸，他四年前死了。他的夫人还在，他的弟弟还在。他弟弟的妻子是一个日本的贵族，也在中国，在北京。蒋介石底下很多高级将领在解放战争中被我们俘虏，现在都找到了职业，不少人在北京。

所以说，这样做只会使台湾得到更多的好处，不会使台湾受到任何损失。如果这样做，中美关系会更好。正如你们报纸二月八日那篇社论所说的，同越南问题一样，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这是一件产生友谊的事情，也是可以喝采的事情。不知你们赞成不赞成这一点，可能我们的看法不完全相同，但我们希望这一天的来到。

阿：至少作为一个纳税人，而且我纳的税是美国向台湾提供十亿美元的一份，我是同意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的。美国在干涉人家内政。当然我这完全是自私自利的想法。

周：是啊，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友谊。这样，世界就会发生变化。

极左思潮干扰了 中国对外政策*

(一九七一年八月七日)

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一九六七年的事情，这件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发生这个事件的原因，边界问题关系不是太大。至于你访问美国，当时可能引起了一些议论，但在我的脑子里印象也不太深。

你知道一九六七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你们新大使来后可能知道一些。一九六七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

当时我国政府想把这件事尽量约束在政府交涉的范围之内。开始我国使馆有一份抗议照会送给了贵国外交部，我记得照会中提出了五点要求。接着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支持抗议照会的要求。《人民日报》就这件事刊登

* 这是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的谈话节录。

了一些文章和消息。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们担心会发生象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护住了，没有发生象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七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也被我挡住了。运动发展到八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了，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一个是要冲缅甸驻华使馆，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两件事都有坏人，他们想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

另外，那时我们驻外使馆也出现过一种情况，就是对重大政治问题直接对外发照会。我们使馆给你们外交部发抗议照会不经过我国外交部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查清到底有几个照会是未经外交部批准就送到你们外交部的，可能从你们的档案中可以找到。大概从一九六七年七月起，有些重要照会就由大

使馆直接送出，当然上面一定是盖了大使馆印的。你知道，那时我们的大使回来了，原来还要回去，六月底发生事情以后，我们才决定不要他回去了。

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当时我国在缅甸的专家虽然没有事做，但还留在那里，要看一看形势的变化。事态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到了一九六七年十月，你们通知我们的专家回国。十一月初，我们的专家都撤了回来。这样关系就搞得更紧张了。去年五一节，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请你们代办转达对阁下的问候。阁下在这个时期也采取了主动。这样，情况就转过来了。

我所以说这一段情况，是想说明我们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发现以后，坏作用就起不了了。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仅同缅甸、英国有，同其他国家也有，我就不详细说了。如果有功夫，另找机会谈文化大

革命情况时，我们可以多说一点。

对我们两国的关系，我们一直采取控制的措施，后来阁下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所以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没有走得很远。这对于在近两年促进和逐步恢复两国关系有好处，比较有利。

一九六七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年轻人、侨民有爱国心，他们学我们国内的样子去做，当然就不合适了。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万隆会议〔103〕以后，我们对华侨和华侨所在的国家都宣布，侨民应该服从所在国的法令，不应该违反所在国的法令，要按照所在国的习惯生活和工作，因为你是人家的国家嘛。有些中国血统的人，在所在国已经住了好几代，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应该放弃中国的国籍，不应该保留双重国籍，我们不赞成双重国籍。万隆会议期间，我们同印尼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我们向亚洲、非洲和欧洲许多国家申明了同样的原则。现在我们同美洲一些国家建立了联系，这个原则同样适用。

日本必须承认 台湾已经归还中国*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日)

中日之间存在一个台湾问题。刚才阁下谈到恢复日中邦交的三点前提^[340]，阁下谈了事实，我还想再谈一谈，就是内容和条件的问题。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联合国已经通过了嘛^[341]！代表中国的不是蒋介石集团，他窃据了二十二年。代表中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形势变了。所以，昨天派了一个代表团，第一次派了代表团到联合国去，大张旗鼓地送他们去。日本的佐藤^[311]政府、美国政府都把调子降低了，说代表中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我们认为，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不够，还要说台湾已经归还它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阁下是搞历史的，您很清楚，台湾

* 这是会见日本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等和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访华代表团的谈话节录。

自古就属于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只是因为甲午战争^[31]，中国被日本打败，才被日本割去。就象库页岛南部在日俄战争^[79]中被日本割去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罗宣言^[13]和波茨坦宣言^[14]都说日本要放弃过去占领的地方。南库页岛放弃了，过去把中国的东北说成是“满洲国”，也放弃了，朝鲜也放弃了，台湾也放弃了，在日本方面来说是放弃了。这些地方都已归还它们的祖国。虽然苏联没有和日本签订和约，但南库页岛还是归还苏联了。没有哪个说南库页岛地位未定嘛！朝鲜现在还是一分为二，但总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属于日本，分裂了还是一个国家，是独立的。台湾在一九四五年已经归还中国了。当时中国派行政长官陈仪、参谋长葛敬恩到台湾受降，日本当时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受降文件上签了字。受降以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要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美国派第七舰队侵占台湾和台湾海峡，台湾早被中国人民解放了。杜鲁门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初，也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宣布美国对台湾没有野心。所以现在的问题，即第二个问题，必须承认台湾已经归还中国了。

现在世界上有一股逆流，说“台湾地位未定”，就是说，那个地方还有可能独立或者民族自决，这等于说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种分裂思想在帝国主义者的头脑中是存在的。英国是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就有

这种思想。英国政府曾经同我们说到这种程度，即它可以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甚至于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说明一旦换文签字，马上把在台湾淡水保留的领事馆撤回去。但是，英国政府要求保留这么一句话，即如果英国的议会或者新闻界问到它对“台湾地位未定”这个论断改变没改变，回答说没有改变。这不是从简单的逻辑上都站不住吗？矛盾嘛！你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又说“台湾地位未定”，哪有这样的道理！既然没理由这样搞，还要坚持这一点，那为什么呢？表面上说，英国政府在国会说过的话不好否定，这是骗人的。张伯伦在慕尼黑签订的条约⁽⁹²⁾，丘吉尔⁽⁶⁵⁾就否定了嘛！英国政府为什么现在还要保留这个立场？它自己说不提倡，它大概没有这个力量提倡。所以，它说人家发表这个主张，它不积极支持，那也是因为它现在没有这个力量。但它还要保持这个立场干什么？就是为适应美日的这股逆流，鼓动台湾独立。台独分子在东京活动，您很清楚，在横滨也有活动，在纽约、在旧金山也都有活动，还不断有人从台湾跑到日本去。蒋介石没有死，他也不赞成台湾独立。蒋介石八十五岁了，总有一天不在。台独分子就是要搞台湾独立。现在联合国就有人说，蒋介石用中国的名义不能进联合国，如果用台湾的名义可以到联合国去。这个谬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在世界各地都还有市场。

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台湾问题,台湾究竟归还没归还祖国,地位定没定。比如说,有人要搞琉球独立,我们就不支持,你们当然也不会赞成,一定坚决反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二次大战结束不久，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了一篇反共反苏的演说^[342]，想把西方以至整个世界动员起来一齐反苏，以此来维持大英帝国的统治。这篇演说在美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美国就利用这篇演说的调子，大搞反共反苏的宣传。当时就有一种论调，认为反苏战争很快就会爆发。毛主席看出了其中有问题，就叫别人写了一篇文章^[343]，表示不同意说这场反苏运动就会导致反苏战争的爆发，指出，实际上美国是想拿反共反苏的宣传作烟幕，把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统统霸占起来。战后二十六年来，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但是在亚非拉这个第一中间地带，小的战争一直不断，其中首先发生的一个比较大的战争就是中国的内战。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曾不可一世地称霸世界。哪儿人民要解放，它就派军队去镇压，它建立了很多军事基

* 这是同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的谈话节录。

地，派出了很多军队。哪儿经济困难，要钱，它就给钱。它采用了两种方法：一个是马歇尔计划^[344]，另一个就是投资。马歇尔计划的总数大约三百亿美元，而投资的总数更超过这个数目。结果怎么样呢？美国不仅在第一中间地带^[240]，即亚、非、拉侵占了不少地方，对美苏以外的西方国家即第二中间地带，它的手也伸进去了。

今天的世界形势又是怎样的呢？今年七月六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作了一篇演讲，十月十六日英国首相希思在保守党年会上也作了结论性的讲话。这两篇讲话互相呼应。希思讲话的大概意思是：战后二十多年来，英国跟在美国后面跑，抛弃了欧洲，大英帝国终于衰落了，成为第二等的国家；现在英国应该回到欧洲，参加共同市场。结果，英国国会通过了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决议。在这以后，英法两国外长在伦敦会面，宣布英法合作，在西欧形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尼克松总统也不得不承认。

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中说，战后二十六年来，美国地位这样下降，在战后初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苏联在战后也逐渐变成了超级大国，同美国争霸。在第二中间地带的两欧，又出现了一个共同市场，使欧洲工业发达的国家联合起来，同美国争霸。这是第三种力量。第四种力量是日本。我对许多美国朋友说过，是美国把日本养肥了的。日本的钢产量今年或到明年有可能接近或超

过美国。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345]”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一棒打中了中间地带，首先是打了日本，然后是西欧国家，同时也使整个西方世界受到影响。尼克松总统说，还有第五种力量，这就是中国，但他说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力量。希思也说了同样的话。我们承认，我们可以在几十年后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但我们声明，无论如何我们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从整个世界来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的趋势。

这就是战后二十六年来世界局势的变化。

中美友好来往的大门 终于打开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客人们表示欢迎。

同时，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

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

* 这是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宴会上的祝酒词，刊载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人民强烈的愿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中国政府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公开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346]，这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方针。我们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在来华前的讲话中也谈到，“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中日两国人民应该 世代友好下去*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阁下应邀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我们感到高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对田中首相以及其他日本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

* 这是在欢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宴会上的祝酒词，刊载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最近几年来，每年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人数超过其他国家朋友，中国同日本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贸易额也高过其他国家。这就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340〕，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首相阁下，你来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恢复中日邦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7〕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将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扩大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

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致意，并衷心祝愿日本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今天，中日两国领导人已开始就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谈。我们期望，我们的会谈将取得圆满的成功。

第三世界国家 要自主地发展民族独立经济

(一九七三年二月三日)

尊敬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阁下：

最近，我们高兴地在北京接待了阿尔梅达外长一行。非常感谢你托他带来的良好祝愿。通过他这次来访，我们双方有机会进行直接交谈，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并且在加强中智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对此，我们表示满意。

总统阁下一月九日通过林平大使提出的要求，我们一直在认真考虑。这次阿尔梅达外长来访时，我们同他又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提出了一个具体措施，相信阿尔梅达外长会向你汇报。我们希望这个办法对你们能有所帮助，当然，这也只能起到一点应急作用。我们本愿能对智利人民的经济建设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我们的经济力量还很有限，同时又肩负着支援越南和印支各国人民斗争和其他方面的国际义务，目前尚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总统阁下想必对此能予谅解。

中智两国同是发展中的国家，对于智利现在面临的困难，我们很能理解并给予深切的同情。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是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留下的恶果。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遇到类似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发展中的国家除了相互帮助外，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如果经济不能立足国内，过多依靠外援，特别是依靠大国的贷款，这是很危险的。在这方面，一些国家有过沉痛的经验教训。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要自主地发展民族独立经济，就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牺牲。相信我们的人民都是勇敢勤劳的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干涉、赢得自己的独立幸福的生活，他们会懂得如何清醒地估计局势，勇于接受面临的挑战。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形势下，更要考虑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局面；作两手准备，争取好的，准备坏的。总之，改变经济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只有结合现实的条件和可能，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才能逐步实现。这是我们从中国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的一点体会。我们对智利的情况很不了解，但是，作为老朋友，出于关切，我愿坦率地同阁下交换看法，供彼此参考。

两年来，智利政府和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帝反殖、发展民族经济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

就。我们表示钦佩。相信智利政府和人民，在阁下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坚持斗争，进行充分的准备，谋而后动，就一定能够克服目前遇到的暂时困难，取得新的胜利，继续前进。

我们为两年来中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感到高兴。我们今后将竭尽自己的努力，使这种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乘阿尔梅达外长返国之便，特赶写此信。顺致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

周 恩 来

一九七三年二月三日于北京

同泰国总理 克立·巴莫的谈话*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 很对不起, 今天在医院里会见总理阁下, 因为我身体不好, 生病很久了。明天签字也只能在医院里签了。其他问题由我们副总理^[347]负责跟你谈。

克立·巴莫总理(以下简称克): 我完全理解。

周: 泰国朋友们都好吧?

克: 都很好。

周: 你们中间有些人来的时候, 我还没进医院。去年签完同马来西亚的建交公报, 第二天, 六月一日, 就进了医院, 到现在还没出去。马科斯总统来访时, 同菲律宾建交公报也是在医院签的。

克: 我们听说了。

*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因病住进医院后, 仍然坚持工作。到一九七五年九月上旬, 先后会见了来自世界五大洲的五十多批外国客人。这是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的谈话节录。

周：所以，这次也只好请阁下来医院了，可能不够礼貌。

克：阁下如此盛情允许我来看你，我很感激。我很久以来一直敬佩阁下，我一生中愿望不多，但是，想亲自见到你是我的一个宿愿，今天实现了我的愿望，感到很高兴。

周：很感谢阁下对我的信任。

克：我作为泰国政府的首脑，带来了泰国人民真诚的友谊。

周：很高兴听到这句话。我们两国有几个世纪的来往……

乔冠华外交部长：几十个世纪了。

克：几十个世纪是对的。

周：是啊，我们两国过去几十个世纪有来往，两国相隔很近，海上来往也很方便。因此，我们一说起来就是亲戚关系。

克：我可以证实这一点。实际上我也告诉了副总理，如果查一下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家谱，就可以发现，往前数几代人，就有不止一个中国人祖先。如果追溯得再远一些，几十世纪以前，关系更密切了。所以，我们之间肯定是亲戚关系，因为我们两国有密切的接触。

周：对。新中国一成立，我们就不主张双重国籍，这样可以搞好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亚洲的一些

国家，它们是我们的近邻。

克：我们也有同样的政策。

周：现在泰国还有三十多万人是中国国籍吧？

克：对。

周：如果他们都能加入泰国国籍，我们将很高兴。

克：我想他们加入泰国国籍不会有多大用处，他们大多数人都很老了，他们的儿子、孙子出生在泰国，已经成为泰国公民。我们把他们看作是朋友，他们长期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同甘苦，已经属于我们的一部分。我相信，他们会加入泰国国籍的。

周：是啊，他们虽然叫华侨，但是跟泰国人民生活在一起，相处得很好。我很欣赏总理阁下在曼谷、香港所宣布的：泰国华侨只能有两个选择，不是加入泰王国国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没有台湾国籍。讲得很肯定。我相信，他们会考虑选择泰国国籍的。

我有一个老朋友，二十一年前见过的旺亲王⁽¹¹³⁾，他还好吧？

克：他很好。我离曼谷前五天见了他，他还记得你，要我转达对你的敬意。他已经八十五岁了。

周：他身体还很好？

克：他各方面都很好，现在仍然很活跃。

周：我羡慕他，我比他年轻。

克：他不象你那么辛苦。

周：我见过他两次。上次他好意送来一张名片。我这次准备签个字，给他。

克：他会非常高兴的。我个人有一个要求，请你盛情在这张纸上给我写几个字，我将留作一生的纪念。回去后，我要把它用镜框镶起来。

周：好。明天签字时送给你。现在我心脏不好，写字时手要抖。在安静的环境下写，写得清楚些。我不象副总理那样，他笔力有劲。

阁下不象六十多岁的人，身体很好。

克：谢谢总理。因为我没有敌人。

周：你们麻烦少一点。国家越大，麻烦越多。但是，我们决定了一条原则，不称霸，不管中国将来如何发达、强大。

克：我已经答应你们的副总理，把这点告诉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

周：我就写这几个字。

克：太好了。

周：这一点，我们副总理在联合国大会上讲了。

克：我很高兴总理能把这些话写上，我将复制几份，让孩子们挂在脖子上，使他们记住。

周：我们副总理在那次讲话中说，毛主席说，将来如果中国的下一代称霸，全世界人民就应该群起而攻之，一起来推翻它。我们非常希望东南亚成为和平区。这不是

容易的，需要长期斗争。但是，我们支持你们的建议，就是使东南亚成为和平中立区〔348〕。

如果阁下有机会见到李光耀总理，请转告他：我们充分尊重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世界上有很多同血统、同民族的国家。我们为什么要跑到新加坡去捣乱呢？这首先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第一条嘛！我们希望新加坡的华侨都加入新加坡国籍。当然，也会有少数人不参加，每年回中国，回家乡看看，他们保守、传统观念很深。

克：不仅是保守观念，也是感情问题，难以阻止。

周：当然，现在保守观念较前淡薄了一些。过去凡是从中国出去的，不学当地语言，年老了还说汉语。有一个人很典型，美国华侨司徒美堂〔349〕，解放后回来，九十多岁了，仍旧不懂几句英文。马来亚的华侨陈嘉庚〔350〕，能讲一点英文，讲得不太好。有些人总想死了一定要把棺材送回中国。我们希望你们能多做一些工作。我们建使馆后，大使馆也多做一些工作。你们政府平等对待华侨，他们很高兴，这一点公报中讲得很清楚。公报中许多问题都讲得很清楚，我建议阁下把公报给李光耀先生看看。

克：我一定这样做。我会说服他改变看法，接受我们的观点。

周：我们对柬埔寨朋友西哈努克〔148〕亲王谈了，他们很倾向早点同泰国建立外交关系。

克：我们将很高兴。

周：这对两国和平相处有好处。你们两国都是佛教国家，很接近嘛！

克：文化上很接近。

周：西哈努克亲王现在在朝鲜。如果他回来，我把总理的意思转告他，可以吧？

克：请你这样做。过去西哈努克同一些人有冲突，现在不存在了，因为有的死了，有的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如果总理阁下能转达，我很高兴。我期望能见到他。我很尊敬他，请转达我对他的敬意。

周：泰国和柬埔寨建立良好关系对暹罗湾的和平有好处。

克：肯定如此。

注 释

- 1 引自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中共中央陕北米脂杨家沟会议上的讲话。——第3页。
- 2 马歇尔(一八八〇——一九五九),美国前国务卿、国防部长,民主党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任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第6页。
- 3 当时承认我国的九个国家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今罗马尼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今匈牙利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今波兰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6页。
- 4 指艾奇逊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五日在美国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国民俱乐部发表题为《美国对亚洲的政策》的演说。——第8、16页。
- 5 保大,原名阮永瑞,越南阮氏王朝第十三代皇帝。一九四〇年日军侵占越南后充当日本傀儡。一九四五年越南“八月革命”后被迫退位。此后,在法国的支持下不断进行复辟活动。一九四七年又得到美国的支持。一九四九年六月以“立宪君主”名义在越南南方复辟,一九五五年被废黜。——第9、60、65、105页。
- 6 李承晚(一八七五——一九六五),当时是美国扶持的南朝鲜总统。——第9、18、23、60、85、352、409页。
- 7 季里诺(一八九〇——一九五六),当时任菲律宾共和国总统。——第9页。
- 8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记者联谊会上发表关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演说,他在演说中称“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满洲”(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古、新疆为“中国的北部省份(地区)”,并认为这四大地区已经和正在“从中国分离出去,使他们附属

于苏联。”——第9页。

- 9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是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莫斯科签订的。同年四月十一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十年。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决定条约期满后不延长。——第11、21、85、109、385、424、445页。
- 10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中苏两国政府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签订了两个协定：一、《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在对日和约缔结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所有，苏联军队自旅顺口撤退；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协定规定，此项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长期贷款，是作为偿付苏联所同意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之用。——第11页。
- 11 艾奇逊（一八九三——一九七一），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国务卿。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三月十五日，接连发表关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演说。——第15、294页。
- 12 联合国宪章即《联合国组织总章程》，是由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六日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制订的。宪章共分十九章，一百一十一条。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性质的问题，并且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作为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以达到上述共同目的。为实现上述宗旨，宪章规定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遵循下列原则：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在国际关系中不得对其他国家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协助联合国依照宪章采取的任何行动；联合国不得干涉各国国内管辖的事项等。宪章还规定了会员国的义务和权利及六个联合国主要机构的职能范围。近年来许多国家要求修改宪章，经联合国第二十九届大会决定，成立了由四十二国组成的关于联合国宪章问题特设委员会。——第18页。
- 13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

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以及击败日本后如何处置日本的问题。十二月一日发表了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宣言》，主要内容是：三国对日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夺取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把日本从它用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所有土地上驱逐出去；使朝鲜自由独立；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第 19、38、96、255、477、486 页。

- 14 波茨坦宣言即《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也称《波茨坦公告》。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波茨坦会议通过并发表，同年八月八日苏联正式加入。主要内容是：盟国对日作战直到它停止抵抗为止，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日本军队要完全解除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远铲除；日本战犯将交付审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必须消除；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第 19、38、96、256、477、486 页。
- 15 《共同纲领》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确定了当时我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第 20 页。
- 16 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驻日占领军最高统帅的咨询机构。它根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协议在东京设立，由中、苏、美三国代表各一人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四国联合代表一人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实现《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装，并使其走向民主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该机构的席位仍由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非法占据着。一九五二年四月该机构由美国单方面宣布解散。——第 22 页。
- 17 辽东省，一九四九年设置，辖今辽宁省东部。一九五四年撤销，其大部分辖区和当时的辽西省合并为辽宁省，部分辖区划归吉林省。——

第 23 页。

- 18 斯德哥尔摩宣言 是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发表的。宣言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号召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在这个宣言上签名。随后,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签名运动。——第 23 页。
- 19 指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转来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致周恩来总理的电文。电文就联合国大会关于讨论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台湾归属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朝鲜战争等情况及印度政府的态度向中国政府作了通报。——第 25 页。
- 20 朝鲜问题 指当时正在进行的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正式参战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国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同时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第 25 页。
- 21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商定在朝鲜国上上以北纬 38° 线作为两国接受日军投降的临时分界线,分界线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这条线通称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时,朝鲜人民已在这条线以北地区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条线以南地区是在美帝国主义扶植的李承晚集团统治下。——第 25、30、294、328、440、466 页。
- 22 指周恩来一九五〇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报告,十月一日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其中中国政府关于朝鲜问题的态度,详见本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一文。——第 25 页。
- 23 这里指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第 26、30 页。
- 24 麦克阿瑟 (一八八〇——一九六四),美国职业军人。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第 26、31、443 页。
- 25 沃克 指沃尔顿·沃克,当时任美国陆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第 26 页。
- 26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

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28、50、294、328页。

- 27 华莱士(一八八八——一九六五)，原为美国共和党人，后加入民主党，在罗斯福任总统期间，曾任农业部长、商务部长和副总统。一九四六年加入美国进步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参加总统竞选失败后，在纽约州经营农业。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一方面支持美国政府的侵朝战争政策，另一方面又在九月二十九日以农人身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什么“如果新中国在学会制造卡车和拖拉机之前先学会了制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第29页。
- 28 尼赫鲁(一八八九——一九六四)，当时任印度总理。——第30、150、268页。
- 29 见本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一文。——第30页。
- 30 贝文(一八八一——一九五一)，英国工党首领之一。一九五〇年时是英国工党内阁外交大臣。当时我国同美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在关于朝鲜战争问题上同美国政府的一些交涉，是通过与我国已建立外交关系的印度，再由印度通过英国来进行的。——第31页。
- 31 甲午战争是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随即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中国方面在陆上和海上都遭到失败，被迫于一八九五年签订了《马关条约》。——第31、146、486页。
- 32 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当时称北平)城十余公里，

是北京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北京至辽宁沈阳的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北京西南的丰台，都有日本侵略军驻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向卢沟桥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第31页。

33 这里指美英两国政府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二日公布的“对日和约草案”。——第38页。

34 旧金山会议是指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至八日美国不顾中国、苏联和亚洲许多国家反对在旧金山召开的片面对日媾和会议。中国是对日作战的主要国家却未被邀请参加。印度、缅甸因反对美国片面对日媾和而拒绝参加会议。苏联在会上批判了美国单独对日和约方案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由于美国拒绝讨论苏联的方案，因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没有在美国提出的对日和约上签字。——第38、345页。

35 联合国宣言即《联合国宣言》，也称《联合国共同宣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对德、日、意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澳等二十六个国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以后，法国、墨西哥、埃及、菲律宾等二十一国陆续加入。主要内容是：签字国保证使用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日、意法西斯的侵略；签字国保证不同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第38页。

36 雅尔塔协定即《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秘密签订。主要内容是，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为：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恢复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丧失的权益，将千岛群岛交予苏联。苏联在会上表示要和中国政府签订友好同盟条约。——第38页。

37 波茨坦协定是《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和《柏林（波茨坦）会议公报》两个内容基本相同的文件的通称。苏、美、英三国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在波茨坦会议上签订。主要内容是：设立中、苏、美、英、法五国外长会议，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缔结和约的准备工作并商讨成员国间的有关其他问题；在苏、美、英、法四国占领德国期间，关于处置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原则，其中包括解除德国武装，铲除或控制可供军事生产的德国工业，摧毁纳粹党的一切组织和制度，逮捕和审判

纳粹战犯；以及有关德国的赔偿，准备同意大利、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五国缔结和约等问题。——第38页。

- 38 远东委员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根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协议成立的。由中、苏、美、英、法、荷、加、澳、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十一国代表组成，巴基斯坦和缅甸于一九四九年加入。总部设在华盛顿。主要任务是制订使日本履行投降条款的政策、原则及标准；应成员国请求，审查盟国最高统帅所颁布的有关命令及所采取的有关措施。委员会通过决议时须经多数赞成，其中必须包括中、苏、美、英的代表。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通过的《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的决议》，规定了盟国对日本实行占领和管制的最终目标，政治、经济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盟军在日本的权力。一九五二年四月美国宣布单独对日和约生效时，远东委员会被解散。——第38页。
- 39 这里指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第40页。
- 40 这里指七七事变。参见本书注 32。——第40页。
- 41 国际联盟委任日本统治的太平洋岛屿，指国际联盟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签订的《关于太平洋中赤道以北旧德国殖民地委任统治书》规定委任日本统治的太平洋中赤道以北的一切旧德国所属岛屿。——第40页。
- 42 美日军事协定指《美日安全条约》，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美国和日本在旧金山缔结和约的同时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效。条约以维持日本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这个条约遭到日本人民的反对。一九六〇年六月，日美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第42页。
- 43 即美澳新安全条约。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在旧金山签订，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生效，并无限期有效。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将单独地和共同地保持及发展它们单独及集体的军事力量；缔约国任何一国受到“威胁”时，应共同协商；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武装攻击”时，应共

- 同行动。——第45页。
- 44 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美国人,生于中国杭州。一九四六年七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国民党政府大使。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仍然留在那里观望。同年八月离开中国。——第50页。
- 45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苏联与芬兰因边界问题发生战争,为此,英、法两国在美国支持下组织了一支远征军拟经瑞典进攻社会主义苏联。苏联政府警告瑞典政府,希望它不要违反中立政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瑞典政府决定同苏联保持正常关系。一九四〇年四月初,希特勒军队占领丹麦和挪威后,瑞典面临被希特勒占领的威胁。十三日,苏联政府向德国驻苏大使发表声明说,苏联不能让德国破坏瑞典中立。这个声明引起了德国政府的重视。瑞典政府对苏联这一行动表示感谢。——第52页。
- 46 沙文主义原指资产阶级反动的本民族至上主义。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产生于法国,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扩张政策,主张用暴力建立法兰西帝国而得名。它宣扬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在帝国主义时代,沙文主义成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其他国家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思想工具。——第55页。
- 47 参见本书注26。——第58、65、80、99、114、128、294、330、440、454、466、477页。
- 48 艾森豪威尔(一八九〇——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59、80、101、164、245、264、443页。
- 49 艾克即艾森豪威尔。——第59页。
- 50 普法战争是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鲁士和法国的统治集团为扩张领土、争夺欧洲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法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被迫同普鲁士缔结了《法兰克福和约》,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赔偿五十亿法郎。——第60页。
- 51 杜勒斯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第60、85、262、297、319、452页。
- 52 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及英、美、法以外的其余十二个侵略国

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傀儡集团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第64、79、94、114、131、143、150、199、245、259、368、431、450页。

53 高棉即柬埔寨。——第64页。

54 寮国即老挝。——第64页。

55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法国为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先后侵入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发动了印度支那战争。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经过八年多的英勇抗战，迫使侵略者在一九五四年七月签订停战协定。同年八月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第65、84、99、451页。

56 越南独立同盟是一九四一年由胡志明发起成立的越南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其宗旨是打倒日、法侵略者及其走狗，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一九五一年并入越南国民联合战线。——第65页。

57 指一九五〇年四月成立的高棉抗战政府和一九四五年十月成立的寮国抗战政府。——第65页。

58 指当时的南越傀儡政府以及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的政府。——第68页。

59 指科伦坡会议，也称南亚五国总理会议。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日，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会议发表公报呼吁立即在印度支那实行停火，欢迎日内瓦会议通过谈判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并决定联合发起于一九五五年召开亚非会议的主张。——第71、114、133页。

60 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日内瓦会议上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一个供会议讨论的决议草案。主要内容是：一、为了统一朝鲜，并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应在全朝鲜领土上举行自由选举。二、为准备和进行全朝鲜自由选举，并促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之间的和解，应建立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和“大韩民国”代表组成的全朝鲜机构。三、一切外国军队应在规定期间内撤出朝鲜。四、应该决定成立适当的国际委员会来监督全朝鲜自由选举的举行。五、鉴于防止对

朝鲜和平的任何破坏的重要性，应该认为对维护远东和平有最直接关系的国家有必要承担义务，来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这将促进朝鲜全国统一问题的解决。——第74页。

- 61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在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保证朝鲜和平的六项建议。主要内容是：一、建议各有关国家的政府采取措施，遵照按比例的原则尽速从朝鲜境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二、在不超过一年的期限内，缩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军队力量，双方军队不得超过十万人。三、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创造逐步解除战争状态的条件、将双方军队转入平时状态等问题，并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缔结相应的协定。四、认为不论南北朝鲜，同其他国家订有牵涉到军事义务的条约，是同和平统一朝鲜的利益不相容的。五、为了创造使南北朝鲜接近的条件，成立一个全朝鲜委员会来拟订建立和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措施，并执行已取得协议的措施。六、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有必要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从而为尽速解决把朝鲜和平统一为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国家的任务创造有利的条件。——第76页。

- 62 “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是美国和南朝鲜当局于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军事条约。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将在无论何时，任何一方认为一方的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外来的武装进攻的威胁，进行共同磋商，双方将单独地和联合地，以自助和互助的办法，保持并发展适当方法以制止武装进攻；缔约各方承认，在太平洋地区对缔约任何一方的领土的进攻，都将危及它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将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的危险；南朝鲜给予美国在双方共同商定的“大韩民国”领土以内及其周围部署美国军队的权利。——第77页。

- 63 艾德礼(一八八三——一九六七)，英国前首相。当时是英国工党领袖、下院反对党领袖。——第79、101页。

- 64 艾登(一八九七——一九七七)，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一九五一年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一九五五年任首相。一九五七年辞职。——第80、94、434、454页。

- 65 丘吉尔(一八七四—一九六五),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一九三八年曾强烈反对张伯伦推行的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提出过联苏制德的主张。一九四〇年出任首相,领导战时联合内阁。一九五一年再次任保守党政府首相。一九五五年四月退休。——第80、164、487页。
- 66 指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德里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在仰光发表的《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这两项声明都把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第80、163页。
- 67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在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两个联合声明中正式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关系的准则。以后,许多国际文件中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这个提法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第80、119、128、163、179、212、236、268、285、304、381、387、421、495页。
- 68 东山岛的战事指一九五三年七月台湾的国民党军对福建南部沿海的东山岛进行的登陆骚扰。这一年的七月十六日晨,台湾的国民党军一万多人分乘舰艇十余艘,附水陆两用坦克二十余辆,在海、空军的支援下,进犯东山岛。同时在该岛北部海岸组织空降兵二百余人实施空降,企图切断东山岛与大陆的联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岛部队和民兵在陆上部队的增援下,经过两天激战,于十七日黄昏,胜利结束战斗,粉碎了台湾的国民党军的进犯。——第84页。
- 69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组织了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联邦、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希腊、菲律宾、泰国、哥伦比亚,连同美国在内共计十六个国家的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第84、466页。
- 70 这里是说艾登主张在东南亚搞一个类似《洛迦诺公约》的条约。《洛迦诺公约》也称《洛迦诺保证条约》、《洛迦诺体系》,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

的一系列条约的总称。其中主要是《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相互保证条约》(又称《莱茵保安公约》),条约规定签约国相互保证德法、德比边界不受侵犯;遵守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莱茵区非军事化的协定。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在一九三六年向莱茵区进军,同时宣布废止洛迦诺公约。——第85、98页。

71 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在美国策动下,由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它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声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对“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解释为“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它的“保护地区”。条约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生效。同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六二年七月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不承认它对老挝的所谓保护。一九六七年起法国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该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一九七七年六月该组织宣布解散。——第85、98、127、151、164、203、318、381、409、424页。

72 英属马来亚 指当时英属“马来亚联合邦”。一九五七年宣布独立。一九六三年与新加坡、沙捞越、沙巴联合组成马来西亚(一九六五年新加坡退出),为英联邦成员国。——第85页。

73 美蒋双边条约 是指当时正在策划中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详见本书注85。——第85页。

74 吉田茂(一八七八——一九六七),日本自由民主党前顾问。当时任日本自由党总裁、内阁首相。——第85、132、344页。

75 安倍能成(一八八三——一九六六),当时任日本学习院大学校长。一九五四年九月率领日本学术文化访华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第87页。

76 公元一二七四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元军二万五千人,从合浦(今朝鲜马山)出发,侵袭日本对马、壹歧两岛。在日本守军坚决抵抗下,元军未能深入,后遇台风,仓促退军。公元一二八一年,忽必烈又发动元军十四万人,从合浦及庆元(今宁波)分两路出征,再度侵袭日本,受到日军抗击,又遭台风袭击,元军统帅弃军乘船自逃回国,十余万

- 出征军大部被日军歼灭。——第87页。
- 77 日本改进党是一九五二年二月由国民民主党与新政俱乐部、农民协同党等合并组成的。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该党与自由党鸠山派合并组成日本民主党。——第88页。
- 78 这里所说的中日战争指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详见本书注31。——第89、255页。
- 79 日俄战争指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俄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日本的战斗力也消耗殆尽。在美国调停下，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两国订立《朴次茅斯和约》，宣告战争结束。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支配权。——第89、486页。
- 80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91页。
- 81 山口指山口喜久一郎(一八九七——一九八一)，当时任日本自由党副干事长、众议院议员。一九五四年九月以日本各政党国会议员访华团团长身份来中国访问。——第91页。
- 82 旧金山条约指美、英、法等国同日本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旧金山签订的片面和约。主要内容是：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等岛屿的权利和要求；同意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等通过联合国交美国托管；盟国可同日本缔结双边协定，在日本驻军；承认日本对领土和领海的主权；日本“得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和约违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不提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个和约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式生效。同日，日本吉田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中日和平条约》，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第91、227、340页。
- 83 吉田指吉田茂。详见本书注74。——第91页。
- 84 铃木指铃木茂三郎(一八九三——一九七〇)，当时任日本左派社会党委员长、众议院议员。一九五四年九月参加日本各政党国会议员访华团访问中国。——第92、225、291页。
- 85 美蒋条约即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国和台湾当局在华盛顿签订，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生效。条约共十条，主要

内容是：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条约规定适用的范围经双方协议，还可扩大到“其他领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第94页。

86 卡祺亚，一九〇五年生，当时任英国外交部副常务次官。——第96页。

87 宦乡（一九〇九——一九八九），贵州遵义人。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第96页。

88 陈仪（一八八三——一九五〇），浙江绍兴人。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任台湾行政长官。一九四九年春因倾向中国人民革命，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五〇年被处死于台湾。——第96、255页。

89 指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两个报告都讲到了中英关系，报告指出：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由于中英双方的努力，已经使两国的关系有所改进，这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但是，最近以来，英国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竭力追随美国侵略集团的危险政策，特别是在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问题上，英国政府竟支持美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鼓励美国强占台湾。这违背了英国政府在许多庄严的国际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并且使中英关系受到了损伤。中国政府对英国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第97页。

90 美李指美国和南朝鲜李承晚傀儡政权。——第98页。

91 范佛里特，一九五一年四月至一九五三年二月期间任侵朝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第99页。

92 慕尼黑协定即《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会议时签订。这个协定是英、法两国企图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换取

希特勒东进侵略苏联而签订的。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及同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其余领土由英、法、德、意“保证”不再受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国的军事威胁和英法的压力下，接受了这个协定。在英、法绥靖政策纵容下，德国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并于同年九月一日进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后，“慕尼黑”便成了为自私目的而牺牲他国利益、纵容侵略行为的代名词。——第99、487页。

- 93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就中英关系问题进行了多次交谈。当时周恩来总理表示，中英两国关系还应进一步发展，艾登表示了同样的愿望。——第100页。
- 94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英国外交副大臣、出席第九届联大代表团团长纳丁在纽约发表电视讲话，声称：“中国共产党进攻台湾，将是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进攻，这毫无疑问需要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作为一个会员国，我们当然会被牵涉进去。”英国外交次官脱榭不久以后在下院代表外交大臣艾登对台湾问题作了类似的声明。——第102页。
- 95 这里所说的白皮书是指美国国务院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全文共八章，叙述从一八四四年美国强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关于台湾的地位，白皮书第六章第十一部分中说：“根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开罗宣言的条款，美国和中国宣布他们的意愿，即台湾应该归还中国。一九四五年九月，根据日本投降书，及日本政府按照盟军总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指令所发表的总命令第一号，中国军队在美国小组的协助下，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该岛的行政权”。——第103、255、294、477页。
- 96 这里指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关于台湾的声明，声明说，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日本投降时亦曾接受此宣言的规定”，“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第103页。
- 97 哈马舍尔德（一九〇五——一九六一），瑞典人。当时任联合国秘书长。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曾致电周恩来总理，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

- 国政府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新西兰代表提出的关于在中国大陆沿岸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第106、263、295页。
- 98 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通过瑞典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总理转达口信，以他个人的名义对新西兰提出的关于安理会讨论中国沿海地区敌对行动的建议进行说明和解释，极力劝说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新西兰的建议。——第106页。
- 99 指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就联合国安理会邀请我国出席讨论新西兰的建议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复电。电文指出，新西兰代表提出的由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大陆沿岸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的建议，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这一违反联合国宪章、干涉中国内政的建议；由于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仍在联合国中窃据代表中国的地位，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能应邀派代表出席参加对新西兰的建议的讨论。——第106页。
- 100 新西兰的提案 指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孟罗致安理会主席的信中提出的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讨论“在中国大陆沿海附近的某些岛屿的地区发生武装敌对行动”的问题。——第106页。
- 101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规定：本组织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项。但此项规定不得妨碍对威胁和平、破坏和平的行为和侵略行为采取强制行动。——第107页。
- 102 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至十一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访华，在北京与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就有关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各项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十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和联合国秘书长的联合公报》。——第107页。
- 103 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第112、145、149、150、163、175、211、244、260、295、

378、393、396、407、421、424、484 页。

- 104 锡兰，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第112、184、293、355页。
- 105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法国为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先后侵入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发动了印度支那战争。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经过八年多的英勇抗战，迫使侵略者在一九五四年七月签订停战协定，同年八月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第114页。
- 106 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指一九五四年七月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等文件。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与会国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它们的内政；上述三国交战双方同时、全面停火；三国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容许外国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等。但美国没有在《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只声明美国政府将不使用武力去妨碍日内瓦协议的实施。后来美国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使这一协议遭到了破坏。——第114、133、255、353、449页。
- 107 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第一次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第114页。
- 108 指一九五四年三月美国在中太平洋的比基尼岛附近的公海上进行氢弹试验时，使日本船员久保山爱吉得“原子病”致死。——第115页。
- 109 茂物会议是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继科伦坡五国会议后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会议发表了联合公报，决定联合发起在一九五五年召开亚非会议。公报申明，召开亚非会议的目的，在于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讨论对亚非各国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例如有关民族主权的问题、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讨论亚非国家和它们的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第119页。
- 110 北大西洋公约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葡萄牙、加拿大、丹麦、挪威、冰岛等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实行“集体防御”；任何

缔约国同他国发生战争时，必须给予援助，包括使用武力。一九四九年八月条约生效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先后设在伦敦、巴黎，一九六七年迁至布鲁塞尔。土耳其和希腊于一九五二年，联邦德国于一九五五年，西班牙于一九八二年，先后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第127、151、164、318、336、381、466页。

- 111 罗慕洛（一八九九—一九八五），菲律宾前外交部长。当时任菲律宾总统个人驻美特使，出席亚非会议的非律宾代表。——第128、178、426页。
- 112 共产党情报局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等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成立的。情报局总部原设在贝尔格莱德，后迁至布加勒斯特。出版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六年四月宣布停止活动。——第129页。
- 113 旺亲王即拍翁昭旺·怀他耶功·瓦拉旺亲王，又名公摩万·那拉底·蓬巴攀（一八九一—一九七六），泰国职业外交家。当时任泰国政府外交部部长，出席亚非会议的泰国代表。——第131、178、502页。
- 114 鸠山指鸠山一郎（一八八三—一九五九），日本自由民主党第一任总裁。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第132、344页。
- 115 邓颖超，一九〇四年生，原籍河南光山，生于广西南宁。当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第140页。
- 116 巴朗蒂尼夫人，当时是戈登夫人的秘书。——第141页。
- 117 世界母亲大会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至十日在瑞士洛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六十六个国家的一千多名代表。大会讨论了反对战争、保护孩子、争取裁军和国际友好等问题，一致通过了《给四大国（指苏、美、英、法）政府首脑会议的信》、《致联合国呼吁书》和《世界母亲大会宣言》。会议号召全世界母亲团结起来，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第142页。
- 118 蔡畅，一九〇〇年生，湖南双峰县永丰镇（原属湘乡县）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第142页。
- 119 章蕴，一九〇五年生，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

- 会副主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曾率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法国。——第142页。
- 120 这里所说的大革命是指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在法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一次规模最大、最彻底的革命。——第142页。
- 121 亚历山大夫人,当时任法国爱兰德省妇联书记、法国妇女联盟理事会理事。——第143页。
- 122 越南战争这里指法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为了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入侵越南。为了保卫民族独立,越南人民开展了抗法战争。一九五四年五月越南人民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迫使法国于同年七月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从而结束了法国在越南的战争。——第143页。
- 123 孟戴斯-弗朗斯(一九〇七——一九八二),法国前总理、激进社会党领袖。一九五四年六月至一九五五年二月曾组织政府。——第143、156、325、360、451页。
- 124 维尔德美夫人,护士,法苏友好协会会员。——第143页。
- 125 法奇指伊夫·法奇(一八九九——一九五三),曾任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二年曾应邀来中国访问。——第144页。
- 126 这里是指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期间、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对法国的三次入侵。——第144页。
- 127 国际妇联即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立,总部设在柏林。其宗旨是:团结各国进步妇女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妇女平等权利,保卫儿童,支持民族独立运动。机关刊物是《世界妇女》。中国的民主妇女组织于一九四八年参加其第二次代表大会,蔡畅当选为国际妇联执委会副主席。中国妇女组织自一九六六年停止参加其一切活动。——第144页。
- 128 李德全(一八九六——一九七二),河北通县(今属北京市)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一九五四年十月底曾率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赴日本访问。——第146页。

- 129 这里指戈登夫人和维尔德美夫人。——第147页。
- 130 一九五四年十月，美国、英国、法国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同联邦德国在巴黎举行会议，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签订了关于终止联邦德国占领制度、关于西欧联盟、关于北大西洋理事会以及法国和联邦德国间的双边协定等一系列文件，统称巴黎协定。主要内容是：重申《波恩专约》中有关美英法三国在联邦德国境内和西柏林驻军和其他方面的“权利”的规定；删去《布鲁塞尔条约》中有关防止德国（联邦德国）侵略的词句，把该条约组织改为“西欧联盟”，并“邀请”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参加；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法国和联邦德国同意通过公民投票方式把萨尔交给“西欧联盟”任命的专员管辖等等。除关于“西欧联盟”的文件于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日生效外，其他文件均于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生效。——第148页。
- 131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一九〇三——一九七五），当时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一九五五年四月亚非会议上当选为大会主席。同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七日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来我国访问。——第150页。
- 132 对奥和约全称《重建独立和民主奥地利的国家条约》，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苏、美、英、法四国（盟国）与奥地利在维也纳签订。奥地利曾于一九三八年被希特勒德国吞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德国的一部分参战失败。战争结束时，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该条约确认奥地利重新独立，并对有关战后问题作了规定。主要内容是：承认奥地利重建为一个主权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国家，禁止德奥合并，禁止奥地利和德国结成任何政治、经济同盟，奥地利应组成民主政府，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解散境内一切纳粹组织并保证不准其复活，奥地利不得拥有、制造和试验原子武器及条约所指定的其他武器。一九五五年十月，四国占领军全部撤走，奥地利议会通过中立宪法，使奥地利成为一个独立和永久中立的国家。——第150页。
- 133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二日至十五日，苏联政府代表团同奥地利政府代表团就签订对奥和约问题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认为应该最迅速地缔结关于恢复奥地利的独立和民主的和约，这将会符合奥地利人民的民族利益，并且有利于巩固欧洲和平。在会谈中，奥地利方面保证，奥地利共和国按照一九五四年在柏林会议上所作的声明的

精神,不参加任何军事联盟,也不容许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奥地利将在同一切国家的交往中执行独立的政策。苏联方面同意在对奥和约生效后将军队撤出奥地利,并就移交苏联占领区的德国财产、战争赔款以及两国间贸易正常化等问题同奥地利代表团进行磋商,并取得协议。——第150页。

134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二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在贝尔格莱德和布莱俄尼岛举行会谈。双方就苏南两国所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全面研究了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考虑到几年来两国关系不协调给双方及国际合作造成的损害,两国政府一致同意采取进一步措施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发展两国的全面合作。——第150页。

135 《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第十三条是:“与会各国同意就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向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彼此进行协商,以便研究为保证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被尊重所必需的措施。”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日内瓦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美国代表拒绝在《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只声明美国政府对宣言中的第一到第十二条款,“将不使用威胁或武力去妨害这些协定和条款”,而对宣言中的第十三条款却未作任何承诺。——第80、151页。

136 吴努,一九〇七年生,缅甸前总理。一九五四年六月,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一九六〇年十月,代表缅甸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第152、428页。

137 戈登夫人,法国科学家、教育家、无党派民主人士。当时是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法兰西妇女联盟主席。——第153页。

138 麦卡锡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在美国的一种表现形式,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代表人物。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四年间,麦卡锡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以反对共产党为名,对许多机构和个人进行“忠诚调查”,实行非法审讯,采取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气氛。由于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对和世界正

- 义舆论的谴责，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美国参议院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第151页。
- 139 这是对一九五三年六月至一九五四年六月法国政府的称呼。拉尼埃指约瑟夫·拉尼埃，一九五三年六月至一九五四年六月，任法国内阁总理。皮杜尔指乔治·皮杜尔，任拉尼埃内阁的外交部长。——第156、451页。
- 140 富尔指埃德加·富尔，一九〇八年生，法国激进社会党人。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两度任法国政府总理。一九五七年后曾三次访问中国。——第156、325页。
- 141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写成的。——第159页。
- 142 李森科（一八九八——一九七六），苏联农学家。一九三八年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他在学术界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打击、排斥不同观点的学派，造成了严重后果。一九五二年底开始受到批判，一九五六年去职。——第161页。
- 143 胡先骕（一八九四——一九六八），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当时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在一九五五年三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学用书《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曾对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作了批判性的介绍。——第161页。
- 144 巴格达条约 即伊拉克同土耳其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的《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于同年相继加入，美国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巴格达条约组织是西亚地区性的军事联盟组织。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国为了“安全和防御应进行合作”；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任何盟员国或“积极关心本地区的安全和平”的国家得加入本公约；在有四国成为本公约缔约国时，即成立常设理事会等。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伊拉克宣布退出。同年八月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美国又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的常设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三月，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先后宣布退出。根据同年四月美、英、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四国代表的决定，该组织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解散。——第164、203、318、381页。

- 145 苏加诺(一九〇一——一九七〇),当时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第165页。
- 146 尼赫鲁总理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建议是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印度人民院发表的声明中提出的。其内容是:一、由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双方正式宣布它们最近赞成结束暴力行动的声明的要旨,从而促进和平解决的气氛。二、法国政府在自由的基础上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实体和人格。三、有关各方承认阿尔及利亚各族人民不分种族一律平等。四、承认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不分种族的全体人民的祖国,而且他们都将有权利分享由于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实体和人格以及自由而带来的好处和义务。五、开始举行以上述的基本观念为基础并且依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直接谈判。——第165页。
- 147 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也称和平相处十项原则,即《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到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第165、179、379、387、421页。
- 148 西哈努克即诺罗敦·西哈努克,一九二二年生。一九五五年起任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兼外交大臣。一九六〇年当选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一九七〇年朗诺发动政变后,在北京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阵线主席和国家元首。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埔寨全国解放后回国。——第165、455、504页。
- 149 南越指当时美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政权“越南共和国”。——第166、374、436页。
- 150 指一九五六年六月我国政府依法对在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处

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组成特别军事法庭于一九五六年六月九日到二十日，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对十七名罪行特别重大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审讯，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和在押期间的表现，分别从宽判处了徒刑。同时，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第一批三百三十五名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实行了宽大处理，免于起诉，立即释放，交由我国红十字会于六月二十八日协助遣送他们回国。——第169页。

151 这里所说的铁路协议指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同日本国营铁路工人访华友好代表团达成的协议。主要内容是：为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为反对试验和使用原子弹、氢弹，为加强亚洲铁路工人之间的联系、友好和团结，为促进体育、文化活动的交流而共同努力。——第171页。

152 陈云，一九〇五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第172页。

153 指英、法帝国主义为重新霸占苏伊士运河联合以色列共同发动的侵略埃及的战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同年十月二十九日晚，以色列在英、法唆使下侵入埃及领土西奈半岛。三十日，英、法向埃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借口“保证运河的通航安全和自由”要求占领塞得港、伊士美利亚和苏伊士，遭到拒绝。三十一日，英、法对埃及进行海空袭击，并随即侵入埃及领土。埃及人民奋起抗战，全世界舆论强烈谴责英、法侵略行径。在联合国的干预下，十二月二十二日，英、法军队全部从埃及领土撤退。一九五七年三月以色列军队也全部撤出埃及领土。——第186页。

154 征侧、征貳是亲姊妹。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四十年）在交趾郡率众起义，赶走郡太守，自立为王。建武十九年（公元四三年）为汉将马援所灭。——第188页。

155 指苏联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宣言”指出了苏联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的错误，损害了平等的原则。同时表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第195页。

- 156 指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的声明》。“声明”支持苏联政府的宣言，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要防止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第196页。
- 157 巴基斯坦和印度原是一个国家。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宣布独立时由东、西巴基斯坦两部分组成。一九七一年东巴基斯坦独立，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西巴基斯坦今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第202页。
- 158 克什米尔问题 指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克什米尔位于南亚次大陆北部山区，面积二十万平方公里左右，人口约五百万，其中穆斯林占百分之七十七，印度教徒占百分之二十。一九四七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时，对克什米尔的归属未作明确规定。为此，一九四七年印巴发生武装冲突，一九四九年划定停火线，根据该线，巴基斯坦控制克什米尔五分之二地区和四分之一人口，其余为印度控制。一九五三年印巴两国总理达成协议，声明克什米尔争端“应该遵循该邦人民的愿望加以解决”，“确定人民愿望的最实际的方法是举行公正无私的公民投票”。但是这一协议至今未实现。一九七五年印度宣布克什米尔为印度的一个邦，巴政府对此表示抗议。——第210页。
- 159 指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周恩来总理访问锡兰（今斯里兰卡）时，和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在科伦坡共同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锡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第210页。
- 160 万隆决议 指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十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准则。参见本书注147。——第212页。
- 161 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国会两院特别联席会上，提出了美国对中东政策的特别咨文。咨文主要内容：一是授权总统在中东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并且为了“保护”中东国家的

“独立”可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一是授权总统对中东国家在今后两年内给予四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宣传机关把这一计划叫做“艾森豪威尔主义”。——第215页。

162 洛克菲勒指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一九〇八——一九七九），美国共和党人、前副总统。一九五六年一月他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主张对亚非经济不发达国家先以经济援助为诱饵，然后提出政治上的代价和军事上的要求，以建立美国对全世界的统治。——第218页。

163 一九五六年七月，埃及政府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为了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英、法、美三国在伦敦举行会谈，并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六日召开没有埃及参加的二十二国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的伦敦会议。会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国际管制”苏伊士运河的计划，即所谓杜勒斯方案。该计划强调苏伊士运河具有“国际性质”，苏伊士运河公司是一个国际机构，因此，对运河公司不能施行国有化。该计划还拟重新成立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国际机构“国际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并使该管理局拥有“治外法权”。如果实施这一方案，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将被剥夺，所以说杜勒斯的“国际管制”计划是一个“集体侵略”计划。这个计划在伦敦会议上未能获得一致协议，最后又被埃及拒绝。——第219页。

164 “第三种力量”也称第三种势力，是五、六十年代国际舞台上以法国为首的独立于苏联、美国两大力量以外的第三种政治势力。——第219页。

165 指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苏联政府发表的《苏联政府关于裁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问题的声明》，“声明”提出了关于苏、美、中、英、法和其他国家裁军数字和步骤；禁止生产、使用和彻底销毁原子武器、氢武器，首先是立即停止这些武器的试验；以及实施相应的有效的国际监督等建议。——第221页。

166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一日苏联政府以内容相同的照会递交给美、英、法三国政府，建议由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制定和宣布关于中近东和平和安全以及不干涉这一地区各国内政的基本原则，并以这些基本原则为基础通过一项联合宣言。照会最后附有由苏联政府起草的《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关于中近东和平和安全以及不干涉这个地

区国家内政问题的宣言的基本原则草案》。——第221页。

- 167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约旦国王侯赛因、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库阿特利、埃及共和国总统纳赛尔在开罗举行了四国首脑会议。会议讨论了当时国际形势中的重大问题以及对阿拉伯民族的生存、复兴、进步和保护它的独立有影响的问题，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强调指出“阿拉伯世界的防务应当按照阿拉伯国家的真正安全由阿拉伯国家建立并且应处于外国公约的范围之外。”——第221页。
- 168 中国和美国一九五五年八月开始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双方商定会谈包括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前项议程在同年九月十日达成协议，后项议程一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中美大使级会谈改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第221、242、254、295、346、439、460、478页。
- 169 一九五三年六月八日，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美国陆军中将威廉·凯·海立胜在板门店达成了关于遣返战俘的协议，并签署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文件。根据这个协议，除直接遣返的战俘外，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生效后六十天内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第222页。
- 170 浅沼指浅沼稻次郎（一八九八——一九六〇），当时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一九六〇年三月任社会党委员长，同年十月十二日被右翼分子刺杀身亡。——第225、342页。
- 171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日本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了社会党一九五七年的运动方针，其中规定，社会党决不承认“两个中国”，要求日本政府迅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第226页。
- 172 日美安全条约是日本和美国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旧金山与《旧金山对日和约》同时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参见本书注42。——第227、426页。
- 173 太平洋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

- 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英对日宣战。同日，德、意对美宣战。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第232页。
- 174 华伦·麦肯纳，美国圣公会牧师，美国青年代表团团长。——第239页。
- 175 史蒂·泰勒，学生，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0页。
- 176 博布·威廉逊，美国共产党人，学生，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1页。
- 177 杰克·罗森，美国共产党人，学生，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2页。
- 178 盖·卡勒万，美国劳动青年联盟盟员，职业民歌歌唱家，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3页。
- 179 埃尔·威廉逊，中学教员，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4页。
- 180 帕提·泰勒，画家、作家，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4页。
- 181 乔安妮·格兰特，美国黑人作家，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4页。
- 182 希勒·格林堡，美国劳动青年联盟盟员，学生，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5页。
- 183 拉里·莫耶，电影和戏剧导演，合众社特约记者，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5页。
- 184 夏格·阿维迪亚恩，银行职员，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6页。
- 185 朱迪·柯林斯，美国劳动青年联盟盟员，速记员，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6页。
- 186 丹·奥康奈尔，美国共和党人，芝加哥青年商会秘书，国际新闻社特约记者，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7页。
- 187 杰里·菲迪勒，美国劳动青年联盟盟员，化验员，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7页。
- 188 李却特·兰恩，学生，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7页。
- 189 反右派斗争指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一

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党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第247页。

190 尤金·布朗斯太因，木工，记者，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8页。

191 林肯指阿伯拉罕·林肯（一八〇九—一八六五），美国共和党人，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期间任美国总统。他领导了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颁布了著名的《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这里引用的林肯的话，一般译为政府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参见林肯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说》（《林肯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9—240页）。——第248、370页。

192 佩吉·西格尔，民歌歌唱家，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8页。

193 劳勃脱·寇因，电影导演，作家，美国国家广播电视部特约记者，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9页。

194 拉里·施瓦兹，作家，牧师，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9页。

195 苏珊·基德，美国共产党人，职员，舞蹈家，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49页。

196 迪恩·霍赛，X射线技术员，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50页。

197 诺埃耳·卡勒万，美国劳动青年联盟盟员，雕刻家，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50页。

198 埃地·霍克曼，作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无线电部门特约记者，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第250页。

199 达赖喇嘛指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法名丹增嘉措，俗名拉木登珠，一九三五年生，青海湟中人。藏族。一九三九年被选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一九四〇年二月五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 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三月十七日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第251、272、285页。
- 200**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七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三八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一九四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去美国。一九五八年离开美国到台北定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第253页。
- 201** 李宗仁(一八九一—一九六九)，广西临桂人，原为国民党桂系首领。一九四八年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任代总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去美国，一九六五年七月回到北京。——第253页。
- 202** 指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七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印度、苏联、中国、美国、英国等八十三个国家的政府和红十字会的代表或观察员。大会通过了关于保护平民规则和关于反对核武器等决议。十一月七日下午，由于美国代表团的压力，会议通过了美国提案，邀请台湾国民党当局以“中华民国”名义出席大会。中国、印度、苏联等十七国代表团退出会场表示抗议，会议陷于中断。——第254页。
- 203** 考尔夫人指阿姆里特·考尔(一八八九—一九六四)，印度人。当时任印度卫生部部长、印度红十字会主席、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在第十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当选为大会主席。——第259页。
- 204** 梅农指文加利尔·克里希南·克里希纳·梅农(一八九六—一九七四)，印度前国防部长、外交家。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二年任出席历届联合国大会的印度代表团团长。一九五五年随印度总理尼赫鲁参加亚非会议。同年访问中国。——第259、262、295页。
- 205** 指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提出的“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关于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协议声明”。——第263页。
- 206** 指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提出的“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大使关于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协议声明(草案)”。——第263页。
- 207** 这里所说的八国委员会指参加联合国的亚非国家在当时为起草关于台湾海峡局势问题的声明而排举出来的八个国家。他们是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伊拉克、阿联(今埃及。另一说为马来

- 亚)、加纳、菲律宾和日本。——第264页。
- 208 陈毅(一九〇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第264、373、458页。
- 209 指一九五八年美国武装部队入侵黎巴嫩的事件。一九五八年五月,黎巴嫩各地发生了反对政府执行违反民族利益的政策起义。七月十五日,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在“保护美国侨民”和“保卫黎巴嫩主权”的借口下,派遣武装部队在黎巴嫩登陆,对黎巴嫩内政进行武装干涉。在黎巴嫩人民、中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下,美国侵略军于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被迫撤出黎巴嫩。——第265页。
- 210 陈诚(一八九八——一九六五),浙江青田人。当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第266页。
- 211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借达赖喇嘛预定这一天到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礼堂看戏一事,大肆散布西藏军区部队要扣留达赖喇嘛的谣言,并以此为借口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劫持达赖喇嘛,打死打伤藏族爱国人士多人,提出“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的反动口号。事件发生后,达赖喇嘛分别在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六日三次亲笔写信给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说明西藏叛乱分子以保护他的安全为名,进行危害他的活动,制造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他正在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并向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进行教育。三月十七日夜,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三月十九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对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的全面进攻,从而撕毁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三月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奉命平叛。——第273、287页。
- 212 西姆拉会议 指一九一三年十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开、一九一四年七月破裂的所谓“中英藏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国代表、中国政府(即当时袁世凯政府)的代表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英国代表一手把持会议,提出一个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和一份所谓《西姆拉条约》草案,无理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西藏有完全自治权,不得改为行省”;“中国政府除驻藏代表率卫队外,不派军队驻藏”;“英国人在西藏之商务,享受最惠国待遇”等等,妄图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中国政府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反对西藏地方当局代表以平等地位与会,不

- 同意英国代表提出的“草案”。中国代表最后拒绝签字，并于一九一四年七月三日正式发表声明，不承认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签订的条约及文件，指出所谓《西姆拉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以后中国历届政府均不承认所谓《西姆拉条约》。——第275页。
- 213 班禅指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俗名贡布慈丹（一九三八——一九八九），青海循化人，藏族。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正式成为第十世班禅喇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九五六年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一九五九年三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圆寂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第275页。
- 214 所谓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于一九一四年三月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之外阴谋设计的一条非法边界线，企图把位于中印边界东段历来属于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因而是非法的、无效的。直到一九三六年，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开始出现在英国和印度出版的地图上，但是在一九五四年以前，仍被注明是“未标定界”。一九五三年，印度基本上侵占了该线以南的中国领土。——第278页。
- 215 乌热地区，历来受中国西藏阿里地方政府管辖，是中国的领土。一九五四年后，印军侵入并同我军形成对峙。一九五六年，双方达成互不驻军的协议。一九五八年，中印双方在德里就乌热问题举行谈判，没有结果。——第284页。
- 216 岸信介（一八九六——一九八七），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六〇年六月任日本内阁首相。——第289、344、410、415页。
- 217 池田指池田勇人（一八九九——一九六五），当时任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首相。——第289、410、416页。
- 218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接见以田尻正泰为首的日本民间广播联盟代表团和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记者时，以及

- 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接见新华社记者时，都谴责了以岸信介为首相的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对华政策。——第290页。
- 219 日本总评是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简称，一九五〇年七月成立。它是日本最大的受日本社会党影响的工会组织。——第291页。
- 220 日中贸易促进会，一九四九年八月成立，原称日中贸易促进协会，一九五五年一月改为日中贸易会，一九五八年四月改称日中贸易促进会，由二百七十家日本贸易商、制造商、轮船公司、银行、保险公司、运输公司、工业团体等组成。——第291页。
- 221 一九六〇年八月一日，周恩来在瑞士驻华使馆国庆招待会上提出：“我们主张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把这整个地区建成为没有核武器的地区。这当然是一个长期努力的方向，但是，我们将为此作不懈的努力。”——第292页。
- 222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就当时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对外关系问题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为了保障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中国政府曾经多次建议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缔结一项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把这整个地区建立为无原子区。中国政府将继续为争取这一建议的实现而努力。”——第292页。
- 223 杜鲁门（一八八四——一九七二），美国民主党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总统。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遵循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台湾已归还中国。——第294页。
- 224 艾伦·杜勒斯（一八九三——一九六九），当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第296页。
- 22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公布中美会谈的经过并说明中国方面的立场》（1956年1月19日《人民日报》第1版）。——第300页。
- 226 山本指山本熊一（一八八九——一九六三），当时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率日本经济友好访华团访华。——第303页。
- 227 一九五二年起，中国和日本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一九五七年第

- 三次协定期满后，日本岸信介内阁一再阻挠新协定的签署。直到一九五八年三月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才得以签订。然而，岸信介政府不准驻日本的中国商务代表机构悬挂国旗，使刚签订的贸易协定便告作废。同年五月，在日本长崎中国邮票和剪纸展览会上，又发生两名暴徒撕毁中国国旗事件，岸信介政府袒护肇事者，拒不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合理要求，从而最终导致两国贸易往来全部中断。——第 305 页。
- 228 嵯峨浩(一九一四—一九八七)，日本华族、原侯爵嵯峨实胜的长女。一九三七年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结婚。一九六一年五月来中国与丈夫团聚。一九八七年在北京病逝。——第306页。
- 229 参见本书注 39,32。——第 307 页。
- 230 为了探讨缓和中日紧张关系的途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前首相石桥湛山、政界知名人士松村谦三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相继来华访问，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在同他们会见时多次提出了改善日中关系的三项条件，也称政治三原则，即：日本政府保证不再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论；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两国民间正常关系的发展。——第 308、417 页。
- 231 贸易三原则是：一、政府协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详见本书《关于促进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一文。——第308页。
- 232 这里所说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至六日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二十五个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宣言》和《关于“战争的危險和呼吁和平”的声明》。这次会议对促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第 310、376 页。
- 233 这里指蒙哥马利提出的关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即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第311页。
- 234 联合国第十六届大会于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在纽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九十八个会员国的代表团和非法窃据中国合法席位的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团。十二月一日至十五日，联大全体会议讨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大

- 会否决了要求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并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的苏联提案，却通过了美国等国提出的把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作为必须有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重要问题”的提案，以此来继续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第313页。
- 235 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一九五三年九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九五八年三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党内外职务。——第314、374页。
- 236 参见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8年9月9日第1版)。原文是：“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中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第314页。
- 237 肯尼迪(一九一七——一九六三)，美国民主党人。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日当选为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在竞选旅行中遇刺身亡。——第316、336、376、443页。
- 238 蒙哥马利(一八八七——一九七六)，英国前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子爵。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曾两次访问中国。——第319、443页。
- 239 这里是指阿尔及利亚人民为反对法国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动武装起义起，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三日正式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先后进行了近八年的民族解放战争。——第320页。
- 240 中间地带指二次大战结束后一段时期内，介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极其辽阔的地带。这个地带分为：第一中间地带，包括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第二中间地带，包括欧洲、大洋洲、日本、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第320、490页。
- 241 苏发努冯，一九〇九年生，前老挝副国王汶孔亲王之子。一九五六年任老挝爱国战线主席。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任第一次联合政府公共工

- 程和经济计划大臣。一九五九年七月被捕，一九六〇年越狱回到桑怒解放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家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第321页。
- 242 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谈判，指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为争取民族自决与国家独立于一九六〇年六月至一九六二年三月同法国政府进行的谈判。阿尔及利亚一八三〇年被法国侵入，一九〇五年沦为法国殖民地。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阿尔及利亚人民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坚持与法国侵略者进行斗争，迫使法国于一九六〇年六月接受谈判。虽然由于法国的干扰，谈判中断过几次，最后终于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签订了《埃维昂协议》，承认阿尔及利亚的自决和独立，从而结束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一百三十多年的殖民统治。——第322、452页。
- 243 戴高乐(一八九〇——一九七〇)，当时任法国总统，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他领导下，法国政府于一九六四年一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第322、449页。
- 244 阿联，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同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叙利亚脱离阿联，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联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第327、373页。
- 245 指一九五〇年九月三十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报告中，针对美国在朝鲜进行的侵略战争所讲的一段话。见本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一文。——第328页。
- 246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英、澳等国授权美国侵略整个朝鲜的提案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军大规模越过三八线，再次警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对于美国及其帮凶国家侵略朝鲜的严重状态和扩大战争的危险趋势不能置之不理，侵略者要对他们疯狂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第328页。
- 247 参见本书《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一文。——第328页。
- 248 一九五九年八月，由于印度军队侵入中国西藏的朗久而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印边境的第一次武装冲突。至一九六二年十月，印度军队先后在中印边界西段和东段越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建立军事据点，不断进行军事挑衅。中国政府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并建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均遭拒绝。同年十月,印军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实行自卫还击,击退了印军的入侵。为了进一步谋求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从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中国政府还主动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人员,交还战斗中缴获的武器。到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后撤计划。——第328页。

249 班夫人指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一九一六年生。当时任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复信班达拉奈克夫人,同意她在适当的时候公布科伦坡会议的建议,同时表示中国政府原则上接受以科伦坡会议建议作为中印官员会晤的初步基础,并衷心希望他们的努力将能导致中印双方就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开始直接谈判。——第328页。

250 指为促进和平解决中印边境冲突而举行科伦坡会议的锡兰(今斯里兰卡)、柬埔寨、缅甸、埃及、印度尼西亚、加纳等亚非六国。——第328页。

251 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全称“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是非洲统一组织的最高机构。一九六三年五月,非洲三十一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代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为加强非洲各国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合作,会议决定成立非洲统一组织,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并把“宪章”签字日(五月二十五日)定为“非洲解放日”。——第329、393页。

252 何赛·安西萨·洛佩斯,当时是哥伦比亚众议院议长、哥伦比亚议员访华代表团团长。——第330页。

253 吉列尔摩·费尔南德斯·鲁那,当时是哥伦比亚参议员、哥伦比亚议员访华代表团成员。——第332页。

254 指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第333页。

255 三国条约指《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由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草签,八月五日在

- 莫斯科正式签字。主要内容是：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包括领海或公海)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但并不禁止在地下进行核试验。三国企图以此巩固核大国的垄断地位，限制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条约签订后，美、苏频繁进行地下核试验，继续进行核军备竞赛。——第335、360、382、432页。
- 256** 腊斯克，一九〇九年生，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国务卿。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代表美国在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第336、408页。
- 257** 哈里曼指威廉·艾夫里尔·哈里曼，一八九一年生，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一九六三年七月以美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英、苏三国禁止核试验谈判。——第336页。
- 258** 麦克纳马拉，一九一六年生，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第336页。
- 259** 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关于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同年八月二日，周恩来总理发信给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我国政府上述声明中提出的建议。——第338页。
- 260** 石桥湛山(一八八四——一九七三)，前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首相。一九六三年后多次任日中经济贸易展览协力会会长。一九六四年、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连续当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总裁。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当选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顾问。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三年两次访问中国。——第340、406、416页。
- 261** 美国违背《联合国共同宣言》等有关对日作战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应订立全面对日和约的协议，在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情况下，操纵英、法等国，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召开了旧金山对日和会，单独签订对日和约。同年九月十八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不承认这个非法和约。——第340页。
- 262** 日台“条约”，指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国强令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在台北签订的所谓《和平条约》。“条约”宣布承认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美国单方面和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归还台湾国民党政府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

- 同年五月五日发表声明，指出这一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署后，日本政府声明日台条约宣告结束。——第340页。
- 263 片山哲（一八八七——一九七八），前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内阁首相。当时任民社党最高顾问。五十年代后致力于日中友好运动，积极主张恢复日中邦交。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曾访问中国。一九五六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后，任首任会长。——第341页。
- 264 廖文毅（一九一〇——一九八六），台湾台南人。五十年代曾在日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自任“大统领”、“名誉会长”，长期鼓吹台湾独立。——第342页。
- 265 冈村宁次（一八八四——一九六六），前日本侵华军事首脑之一，首要战犯。抗日战争结束后，曾任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一九四九年一月被国民党政府宣判“无罪”，纵放回国。一九五〇年被蒋介石聘为台湾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支持台湾“反攻大陆”。一九五四年起先后任“日本樱星会筹备会”理事长、日本旧军人全国性组织“战友联”副会长、“日本乡友会联盟”会长，从事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第342页。
- 266 一九五八年四月，日本岸信介政府破坏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公开声明不承认中国商务代表机构有权悬挂国旗，并声称日本刑法第九十二条关于损坏外国国旗的行为将加以处罚的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五月二日下午，两名日本暴徒闯进正在长崎市“滨屋”百货公司举行的中国邮票和剪纸展览会的会场，使用暴力扯下了悬挂在会场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事后，日本政府当局对侮辱中国国旗的两名暴徒在没有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予以释放。这一事件的发生，进一步破坏了中日民间往来。——第343页。
- 267 松村指松村谦三（一八八三——一九七一），当时任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众议员。一九五九年以后五次访问中国。中日恢复邦交前，他是日中贸易日方总联系人。一九六二年九月访华时同我缔结日中综合贸易协定。一九六四年继高碕达之助负责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宜。——第344、415页。
- 268 高崎指高碕达之助（一八八五——一九六四），日本自由民主党人，前众议员、参议员。当时任日本内阁国务大臣兼经济审议厅长官。并

- 以日本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后任通商产业大臣、日中综合贸易联合协议会会长等职。一九六二年同我国廖承志签订发展日中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第344、381、403、416页。
- 269 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贸易的议定书，是廖承志(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和高碕达之助(日本自由民主党人士、众议院议员)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签订的。备忘录记载了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五年内，双方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出口的主要商品、交易合同的签订、各项交易的结算、商品检验和仲裁等各项问题所达成的协议。——第345、417页。
- 270 南越吴庭艳政权，指在吴庭艳统治下的“越南共和国”。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南越阮氏王朝的总理吴庭艳废黜保大皇帝，成立“越南共和国”，自任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任内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破坏日内瓦协议，阻挠越南南北方统一。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美国策动的军事政变中吴庭艳被击毙。——第351页。
- 271 鉴真和尚(六八八——七六三)，唐代高僧，日本佛教律宗的创始者。唐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应日僧荣叡、普照等邀请东渡，十多年中，经过六次努力，于天宝十三年(公元七五四年)到达日本。鉴真把戒律传到日本，同时还把中国的佛寺建筑、佛像雕塑的艺术及医药学介绍到日本，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第354页。
- 272 这里指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在扬州举行的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佛教协会和日本佛教代表团发表的一项共同声明。“声明”宣布双方将进一步推动纪念鉴真和尚的活动，并为中日两国永不相犯世代友好而努力；同时还宣布双方将共同合作表彰在历史上曾对两国佛教交流及人民友好作出过贡献的两国佛教徒。——第354页。
- 273 玄奘(六〇二——六六四)，俗称唐僧，通称三藏法师。唐代僧人，佛教唯识宗创始人之一。唐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从凉州出玉门关西行，经过现在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到达巴基斯坦和印度。他在今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印度北部游学了三年，随后到当时印度的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今伽雅城西北)学习。贞观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回到长安后，翻译佛经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根据西行途中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

——第354页。

- 274 法显(约三三七——约四二二),东晋僧人。中国僧人到印度留学取经的先驱者。东晋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从长安(今西安)出发,西行求法。遍历北、西、中、东天竺(古印度别称)等地,后又从中天竺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义熙八年(公元四一二年)经海道回到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市崂山)。回国后译出经典百余万言。并将旅行见闻,写成《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一书。——第355页。
- 275 抵抗运动时期,指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法国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占领的斗争时期。——第361页。
- 276 贝当傀儡政权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权。亨利·菲利普·贝当(一八五六——一九五一)原是法兰西共和国内阁总理。一九四〇年投降纳粹德国,组织“法兰西国家”,出任国家首脑。一九四五年八月法国解放后,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第367页。
- 277 皮杜尔指乔治·皮杜尔(一八九九——一九八三),法国前总理、人民共和党领袖。一九四六年六月至十一月、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曾两度组织政府。多次任外交部长。——第368页。
- 278 美国南北战争也称美国内战,是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由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政府总统林肯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并采取其他民主措施,激发了工人、农民和黑人的革命斗志,因而联邦政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经过这次战争,美国的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370页。
- 279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十一个州脱离联邦政府,另立代表奴隶主利益的政府,通称南方政府。一八六五年四月这个政府在战败后结束。——第370页。
- 280 这里的民族解放阵线是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它成立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是越南南方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七七年二月,与越南祖国战线和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等组织统一成为越南祖国战线。——第375、444、448页。
- 281 华盛顿指乔治·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国首任总统。在

- 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的北美独立战争时期任大陆军总司令，积极进行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战争。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六年连任两届美国总统。——第375页。
- 282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及十五日在雅加达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上，决定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在非洲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后来由于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使会议一再延期。一九六五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二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国家外长会议上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定期延期。——第376、421页。
- 283 这里所说的中印冲突是指一九六二年十月印度军队在中国边境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和中国边防部队为保卫祖国领土主权进行的自卫还击。详见本书注248。——第376页。
- 284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日及十二日，由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缅甸、阿联(今埃及)、柬埔寨、加纳六国的代表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交换意见，并向中印双方提出了一项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呼吁中印双方进行直接谈判的建议，通称科伦坡建议。中国政府对科伦坡会议为调解中印边界争端所作的努力表示欢迎和支持，并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解决中印冲突问题谈判的初步基础。——第376页。
- 285 萨布里，一九二〇年生，埃及前副总统。当时任埃及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九六三年四月曾来中国访问。——第378、402页。
- 286 一九五七年宣言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第384页。
- 287 一九六〇年声明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384页。
- 288 维辛斯基指安德烈·扬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一八八三——一九五四)，当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第385页。
- 289 恩克鲁玛(一九〇九——一九七二)，一九六〇年七月加纳共和国成立时，任第一任总统。一九六五年六月，再度当选总统。——第397页。
- 290 杜波依斯(一八六八——一九六三)，美国黑人领袖、学者。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投身于美国和非洲黑人的解放运动。晚年加入加纳国籍。——第397页。

- 291 陈毅副总理在一九六四年随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时，有感于非洲人民解放事业蓬勃发展填词一首，题为《满江红·黄金海岸》。其中有“惊世间残暴竟如斯，两洲血”句。——第397页。
- 292 指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非洲殖民地而召开的柏林会议。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根据德国首相俾斯麦的倡议，在柏林举行有德、英、法、俄、美、比利时、意大利、奥匈、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挪威、荷兰、土耳其等十五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刚果自由邦”，承认刚果盆地“贸易自由”和刚果河、尼日尔河的“航行自由”，确定葡属安哥拉的边界，规定以后任何国家在非洲取得领地必须通知其他国家。这次会议成为西方殖民国家进一步瓜分非洲的新起点。——第398页。
- 293 杜尔指艾哈迈德·塞古·杜尔（一九二二——一九八四），当时任几内亚共和国总统。——第398页。
- 294 葡属几内亚即现在的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第398页。
- 295 塞拉勒窝内是塞拉利昂的旧译名，即现在的塞拉利昂共和国。——第398页。
- 296 象牙海岸即现在的科特迪瓦共和国。——第398页。
- 297 达荷美即现在的贝宁人民共和国。——第398页。
- 298 桑给巴尔即桑给巴尔共和国；坦噶尼喀即坦噶尼喀共和国。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桑给巴尔与坦噶尼喀组成联合政府，同年十月二十九日改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第401页。
- 299 非洲外长会议指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在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特别会议。会议讨论了东非局势、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边境争端、肯尼亚和索马里的领土纠纷等问题。会议建议以非洲独立国家的军队代替驻扎在坦噶尼喀的英国军队。——第401页。
- 300 布尔吉巴指哈比卜·布尔吉巴，一九〇三年生，当时任突尼斯共和国总统。——第402页。
- 301 纳赛尔（一九一八——一九七〇），当时任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最高执行委员会主席、共和国总统。——第402页。
- 302 法鲁克（一九二〇——一九六五），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本代国王。一九三六年四月其父死后继位，称法鲁克一世。一九五二年

- 七月被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第402页。
- 303 孙平化，一九一七年生，辽宁盖县人。当时任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第403页。
- 304 王晓云（一九二〇——一九八三），山东寿光人。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日本组副组长。——第403页。
- 305 冈崎嘉平太（一八九七——一九八九），曾任全日本航空公司总经理、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会长。一九六四年高碛达之助去世后，为高碛事务所的负责人。——第403、417页。
- 306 廖承志（一九〇八——一九八三），祖籍广东惠阳，生于日本东京。当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第404、458页。
- 307 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是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及十五日在雅加达举行的。参加筹备会议的有阿富汗、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喀麦隆、锡兰（今斯里兰卡）、中国、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利比里亚、摩洛哥、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叙利亚、坦噶尼喀、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二十二个国家的代表。会议决定一九六五年三月在非洲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并就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目的、临时议程和邀请参加的国家作出决定。——第407、426页。
- 308 吴庭艳（一九〇一——一九六三），原南越傀儡政权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美帝国主义策划的军事政变中，同其弟吴庭儒一起被击毙。——第409、437、453页。
- 309 村田省藏（一八七八——一九五七），日本政治家、实业家，一九五四年十月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曾是签订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的日方最高负责人。一九五六年来我国主持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开幕典礼。——第415页。
- 310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签订的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中，双方同意在对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各自取得本国政府的同意，给予对方商务代表机构及其所属人员以安全保证和进行工作的方便；在发生法律纠纷时，采用双方所同意的办法处理；商务代表机构有权在其建筑物悬挂本国国旗等。但是，日本政府对上述规定声明：日本政府坚持尊重同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关系，无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

商务代表机构有权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同时宣布将按日本国内法令规定处理中日贸易协定有关法律纠纷问题。这就表明日本政府在上述几个原则问题上坚持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违反国际惯例，破坏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精神，对中国商务代表机构的安全及工作便利也无意提供保证。由于日本政府设置障碍和破坏，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未能生效。——第415页。

311 佐藤荣作（一九〇一——一九七五），前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二年七月，三次组阁，出任日本内阁首相。——第416、485页。

312 一九五八年贸易协定，即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同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协商在北京签订了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由于日本政府的破坏，贸易协定未能生效。参见本书注310。——第417页。

313 吴巴瑞，一九一五年生，缅甸前总理。曾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两次访问中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与到缅甸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商谈解决中缅边界的问题，使这一问题更接近于达到双方满意的解决。——第428页。

314 奈温，一九一一年生。缅甸前总理、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九六〇年一月来华访问期间，同周恩来总理共同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第428页。

315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声明还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时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第430页。

316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周恩来总理写信给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中国政府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声明中提出的关于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信中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中国政府郑

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国政府的建议将得到各国政府的有利考虑和积极响应。——第430页。

- 317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又称“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是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会议。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违反协议,对老挝进行干涉和侵略,于一九六〇年挑起老挝内战。为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在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倡议下,召开了这次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有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柬埔寨、老挝、越南、南越、中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另外,还有印度、加拿大、波兰、泰国和缅甸。会议最后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第434、452页。
- 318 周恩来总理在参加罗马尼亚前国务委员会主席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后,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二日先后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第436页。
- 319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对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进行了五天的友好访问。——第436页。
- 320 指当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第436页。
- 321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就美国在南越扩大战争发表声明:不惜一切牺牲抗战到底赶走美国侵略者。——第437、448页。
- 3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复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春水,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谴责美帝侵略,要求美国撤走一切军队,由越南人民自己解决问题的严正立场和正义要求,坚决支持三月二十二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声明,中国人民将尽自己的一切力量,给予英雄的南越人民必要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并表示中国人民随时准备着,当南越人民需要的时候,派出自己的人员,同南越人民一道共同战斗。——第438页。
- 323 泰勒指马克斯韦尔·达文波特·泰勒,一九〇一年生,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当时任美国驻南越大使。——第439页。
- 324 约翰逊(一九〇八——一九七三),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第443页。

- 325 柯西金(一九〇四——一九八〇),当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五年二月五日率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途中,在北京停留,周恩来、陈毅设宴招待,宴会后双方进行了谈话。——第445页。
- 326 指章汉夫(一九〇六——一九七二),江苏武进人。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第450页。
- 327 奠边府一战是一九五四年越南抗法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法军侵占越南战略要点奠边府,作为进犯解放区的据点。同年十二月,越南人民军发起反攻,解放了莱州,并包围了奠边府。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至五月七日,越南人民军对奠边府法军展开进攻,全歼法军一万六千余人,解放了奠边府。——第451页。
- 328 指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九日以库帕拉西和西何为首的军官在万象发动的政变。政变推翻了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组成了以富马为首的被右派集团完全控制的政府。——第453页。
- 329 富马指梭发那·富马(一九〇一——一九八四),当时任老挝王国政府首相。——第453页。
- 330 塞米·诺萨万(一九二〇——一九八五),前老挝王国政府副首相。一九六五年二月发动兵变失败后逃亡泰国。——第453页。
- 331 斯巴克(一八九九——一九七二),比利时前总理。当时任比利时外交部长,是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第454页。
- 332 史密斯,当时是美国副国务卿,出席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副团长。——第454页。
- 333 日韩条约即《韩国和日本基本关系条约》。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日本佐藤政府和南朝鲜朴正熙集团在汉城草签,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在东京正式签字。“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南朝鲜和日本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互派大使级外交使节;朝鲜和日本在一九一〇年签订的日韩合并条约及其以前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无效;南朝鲜朴正熙集团是“朝鲜唯一合法政府”;双方尽早举行谈判以缔结条约和协定,建立双方之间贸易、海运及其他商务关系,缔结关于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同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此发表一系列声明,郑重宣布日韩条约以及南朝鲜与日本缔结的其他“条约”和“协定”是非法的。

——第456页。

- 334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第462页。
- 335 美国总统尼克松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美国和苏联之间尽管存在深刻分歧，但有四大因素可以作为减少分歧共同合作的基础。这四点是：双方都不要核战争；双方都欢迎减少军事开支；双方都希望增加贸易和商业接触；双方都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挑战。——第465页。
- 336 格雷厄姆·斯廷霍文，当时是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代表团团长。——第469页。
- 337 见《论语·学而第一》。——第469页。
- 338 罗德里克指约翰·罗德里克，当时是《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第469页。
- 339 格伦·科恩，美国圣莫尼卡市立学院学生，男子乒乓球运动员，当时是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代表团成员。——第473页。
- 340 美浓部亮吉谈到的恢复日中邦交的三点前提是：第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第三，表示废除“日台条约”的愿望。——第485、495页。
- 341 指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联合国是一九四五年建立的国际组织，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二十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一直被剥夺。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上述提案后，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席位从此得到恢复。——第485页。
- 342 指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出“铁幕”的反共名词，宣称苏联用“铁幕”把东欧一些国家笼罩起来，共产

党“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他主张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各个领域实行合作，加强实力，反对公开原子弹秘密，准备反共战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冷战”演说。——第489页。

343 指陆定一撰写的、发表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四日和一月五日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这篇文章曾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第489页。

34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由于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为了控制西欧和扩大国外市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一次演说中，建议欧洲国家共同拟订一个“复兴”计划，由美国予以“援助”。七月，英、法、意等十六国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建议，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改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提出“欧洲复兴方案”。由于方案是根据马歇尔的建议制订的，故又被称为马歇尔计划。一九四八年四月杜鲁门总统签署美国《一九四八年经济合作法》（即《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后，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一九五一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执行这个计划。——第490页。

345 尼克松自一九六九年就任美国总统后，面临着美国财政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的局面。当时，生产下降，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庞大，对外贸易连月出现逆差，美元地位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多次采取了应急措施，并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宣布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美国暂时停止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对进口商品增收百分之十的附加税，对援外金额减少百分之十，在国内冻结工资、房租和物价九十天。随后两年半，尼克松又分阶段实施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这种政策是把美国日益恶化的财政经济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因而遭到西欧、日本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猛烈抨击和抵制。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十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加拿大、荷兰、比利时和瑞典）会议上，美国被迫同意将美元贬值，并取消百分之十的进口附加税。——第491页。

346 见本书《中国愿就台湾地区问题同美国进行谈判》（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一文。——第493页。

- 347 指邓小平。——第500页。
- 348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当时的马来西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拉扎克首次提出了东南亚中立化的建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东南亚国家联盟五国外长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会议在听取了拉扎克对东南亚中立化的进一步说明后又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发表了《吉隆坡宣言》即《东南亚中立化宣言》。“宣言”声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决心初步地进行必要的努力来获取对东南亚作为一个不受外部强国的任何形式或方式的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区的承认和尊重。”——第504页。
- 349 司徒美堂(一八六八——一九五五)，广东开平人，爱国华侨领袖。曾任美洲致公党主席。一九四九年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504页。
- 350 陈嘉庚(一八七四——一九六一)，福建同安集美镇(今属厦门市)人，爱国华侨领袖。早年南渡新加坡从事工商业。一九四九年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504页。

后 记

《周恩来外交文选》是继《周恩来选集》和《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教育文选》、《周恩来书信选集》之后又一部周恩来同志的专题文集。

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编辑的，在编辑工作中得到了钱其琛同志和李琦同志的具体指导。外交部参加编辑工作的有：裴坚章、黎光、**王永华**、胡叔度、方祖安、林晨、束思明、陈文营。文献研究室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吴瑞章、王永钦、赵春生、曾自、李静。参加注释工作的有：曾宪新、陈铭康、邓培、贾云、李艺之、郑建英、沈学明、高煜英、刘金田、韩洪洪、邓石、李庆田。

本书编辑过程中，宫达非、浦寿昌、马列、陈浩等同志阅过全部书稿并提过宝贵意见，给予了大力帮助；赵朴初、阎明复、章文晋、何英、余湛、张香山、柯华、刘德有、孙平化、钱嘉东、杨迈、王效贤等同志，对部分篇目提过宝贵意见。